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成果

胡德坤 主编

#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 中国与世界研究

第七卷

## 战时英国对华政策

李世安等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成果  
胡德坤 主编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

## 第七卷

# 战时英国对华政策

李世安 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 第7卷, 战时英国对华政策/李世安等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成果/胡德坤主编

ISBN 978-7-307-07461-3

I. 反… II. 李…[等]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研究 ②对华政策—研究—英国—1931~1945 IV. ①K152  
②D822.3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6228 号

责任编辑:黎晓方

责任校对:刘欣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6.25 字数: 375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7461-3/K·438 定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出版说明

以中国为主要参战国的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光明与黑暗的生死搏斗，是将人类从法西斯侵略与暴政下解放出来的正义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是 20 世纪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既决定着人类的命运，也决定着战后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其意义之重大，其影响之深远，是过去任何一个事件都无法比拟的。

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最先站起来同法西斯战斗的国家，在世界上开辟了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反法西斯战场，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大主战场之一。中国不仅为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而为推动世界历史从动荡与战争的旧时期走向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中国历史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从而也就成为中国独立解放与和平崛起的起点与开端。

由此可见，中国抗日战争与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但在国际学术界，战后由于西方冷战思维和中苏关系破裂的影响，更有个别战争发起国对侵略战争缺乏反省，使得美英苏日等国的大多数学者在二次大战史研究中，对中国战场很少提及，对中国战场的作用视而不见，更有甚者还加以贬低、歪曲。因此，研究与探讨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厘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便成为中国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任务。

出于上述考虑，本课题组设计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课题：“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本课题力图对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研究，最终成果为一部九卷本的著作，书名为《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本书按内容分为九卷。第一、二、三卷主要从中国抗日战争与日本世界战略、中国抗日战争与美英东亚战略、中国抗日战争与国际关系等角度，探讨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第四、五卷主要探讨战时中国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第六、七、八、九卷主要探讨战时美英苏德等国的对华政策。本书的九卷是从不同角度探讨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这同一般的研究丛书是不同的。

本书的出版是集体智慧和辛劳的成果。本课题组由武汉大学校内外同行 20 余人组成，他们中许多人已是著作等身的专家，已有丰富的学术积累，为完成本课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书在确定编写指导思想、编写要求、编写大纲的基础上，分头执笔撰写。成稿后先由各分卷审稿，再经主编审稿、集体审稿修改、主编审定，最后交付出版社。

本书编写分工如下：第一卷由胡德坤撰写全书总论、引言之一部、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本卷综论，熊沛彪撰写引言之一部、第一章第一节、第五章，韩永利撰写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第二卷由韩永利撰写；第三卷由刘晓莉撰写第四章、第五章，关培凤撰写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胡德坤审稿；第四卷由彭敦文撰写；第五卷由王建朗撰写；第六卷由陶文钊主编，徐友珍撰写第 1 章，刘早荣撰写第 2 章，李业胜撰写第 3 章，张愿撰写第 4 章，张士伟撰写第 5 章，叶静撰写第 6 章；第七卷由李世安撰写；第八章由汪金国撰稿，沈志华审稿；第九章由马振犊主编，由何兰、戚如高等撰稿。在本课题早期阶段，罗志刚、熊伟民分别承担了第八卷、第六卷的大纲编写和部分资料准备工作。本课题于 2006 年 3 月正式启动，历时三年有余。课题组成员大都是该单位的学术带头人或骨干，肩负重担，但大家都能克服困难，完成书稿，实属不易。作为项目主持人，我由衷地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谢意。

还有一位要特别感谢的是齐世荣先生。齐先生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领军人物。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齐先生发表的《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历史研究》，

1985年第4期)、《中国抗日战争与国际关系》(《世界历史》,1987年第4期),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国与国际关系,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证,代表了我国学术界的最高水平,堪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国与世界这一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本课题从开题、撰写到审稿的全过程,都得到了齐先生的指导。在本书成稿之后,齐先生又欣然应允将《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作为本书代序,从而提升了本书的学术价值。

本课题从申报、开题、编写、定稿到出版,得到了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武汉大学校党委、校行政,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部、历史学院、世界史所、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边界研究院,武汉大学出版社等单位的指导和支持;各卷的责任编辑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课题组各成员的家人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我代表课题组一并致谢!

从主观愿望来看,作者力图完整收集和运用中国内地和台湾的中文资料以及英、日、俄、德等外文资料,写出一部能代表当代中国学术界水平的专著。但因为时间紧迫,来不及精心打磨,书稿错误疏漏在所难免;加之书稿是以问题展开的,有些地方内容有重复与交叉现象,很难达到预定目标,恳请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抗日战争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开端,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开端,抗日战争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基石。因此,谨以此书献给新中国六十周年华诞!

## 引 言

战时英国对华外交,是盟国战时外交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英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对战时英国对华外交的研究,已有了一些成果。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弗里德曼(Friedman, Irving. S)的《英中关系:1931—1939年》(New York, 1940)、李(Lee, Brandford. A)的《英国与中日战争,1937—1939年》(London, 1973),有克利福德(Clifford, Nicholas. R)的《从中国撤退:英国在远东的政策,1937—1941年》(Washington, 1967),还有谢阿罗(Shai, A)的《英国和中国,1941—1947》(Macmillan, 1984)等。

但上述著作,缺乏对战时英国外交文件档案的研究,比较粗略,缺乏深度,较少涉及英国对华政策的具体内容、制定过程、执行过程等问题。而且国外的研究成果,大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出版的著述。近年来英国和西方对战时英国对华外交政策的研究成果不多。

我国台湾和香港学者,对战时英国对华外交的研究很为重视。但其精力主要集中在资料汇编上。在这些成果中,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编、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续编:抗战时期对外关系》,二十辑第二编《中英关系》,第三编《战时外交》,第七编《抗日战争》,以及由其他一些学者编著的其他各种资料,影响都非常巨大。不过我国台湾和香港学者在研究战时英国对华政策方面的专著并不多见。

1978年前,我国对英国战时对华外交的研究比较薄弱。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局面开始改变。在资料建设上,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出版了不少关于中英关系的资料汇编。在这些资料汇编中,有李巨廉和王斯德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集》,有袁旭、李兴仁、雷德昌和吴美华编著的《第二次中日战争记事》等;此外还有不少翻译的著作,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的《顾维钧回忆录》,有张玉祥和赵宝库译校的、由日本学者服部灼四郎所著的《大东亚战争全史》等。这些资料和翻译著作的出版,推动了我国对战时中英关系的研究。但是这些成果,并没有专门提供关于英国战时对华政策的资料,它们只全面提供了战时各国外交的主要或部分信息。

我国学者还出版了不少有关论著。在这些论著中,有胡德坤、韩永利著的《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所著的《中国对外关系》;有萨本仁、潘兴明合著的《20世纪的中英关系》,还有马振犊的《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等著作。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涉及战时英国对华政策。但这些著述,并不是专门研究战时英国的对华政策。其中虽然萨本仁、潘兴明合著的《20世纪的中英关系》系统论述了20世纪的中英关系,但是其中对战时中英关系的描述比较简单,没有全面反映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更没有全面反映战时的英国对华政策。

笔者在1994年出版的《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一书,对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进行了研究。但是该书没有研究详细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之间的中英关系,对战时英国对华政策的反映也还不全面。因此迄今为止,国内外还没有一部全面反映英国战时对华外交的著作。

英国的传统对华外交政策,是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20世纪20年代,由于英国国力的衰退,特别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斗争,使得英国不得不改变其对外交政策,即从炮舰政策改变为退让政策。不过这种改变和退让,是英国实力衰落的结果,英国并没有洗心革面,彻底抛弃其对华殖民主义政策。因此只要有可能,英国就仍然企图维持其殖民主义的对华政策,例如拒不废除不平等条约、不肯撤走在华驻军等。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使英国对华的退让政策发生了变化。日本在华侵略势力的扩大,构成了

对英国在华侵略利益的最大威胁。英国由于实力衰落，在与列强的争夺中处于下风，无力与日本争夺。因此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英国采取了对日绥靖政策，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来满足日本的侵略野心，达到与日本妥协的目的。其对华政策，就是听任日本侵略中国，以维护其在华的既得利益。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先后占领了北京和天津，然后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东南部，特别是指向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上海。日本这样跳跃式地由华北的平津转向上海，不仅有把英国在华势力彻底驱除的趋势，而且其侵略行动威胁到了英国在远东整个殖民地的安全。因此英国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对华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从听任日本侵略中国、对日绥靖的政策，逐步改变到“援华抗日”的政策。这一政策的目标，是希望中国的抗日战争，拖住日本的兵力，从而达到维护英国在华和在远东的殖民利益的目的。由于战时英国对华政策，具有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性质，使英国在支持中国抗日的同时，仍然幻想在有利于英国的条件下，与日本妥协。

英国对日妥协最明显的例子，是发生在 1939 年 7 月的“天津事件”。这一事件的起因，是英国天津租界当局拒绝交出几位因刺杀汉奸而逃入天津租界的中国人。日本一再要求英国交出这几个中国人未果，于是在北京和日本发动了反英运动。日本新闻界 7 月 14 日发表了《反英宣言》，日本东京还爆发了反英游行，游行者的冲进了英国驻东京大使馆。这使得英国政府焦头烂额，穷于应付。

在日本的强大压力下，1939 年 7 月 24 日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与日本外相有田，在东京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英日初步协定”），同日本达成协议，承认日本在华侵略造成的“实际局势”。但这一事件的发生，并没有改变英国的援华抗日政策。《有田——克莱琪协定》的签订，只是英国的权宜之计。在该条约签订后不久，英国立即又开始援助中国。

不过英国对日政策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的确显得非常软弱。英国在一些问题上，不断向日本妥协，其对华政策出现明显倒退。例如 1939 年 9 月 6 日，日本要求英国、法国撤退在华驻军。英国在经过一段时间犹豫后，只好照办。1940 年 8 月 9 日，英国陆军部宣布：“驻扎在上海及华北之英军将调往他处服务。”18 日，英驻天津军队开始撤退。

在日本政府要求下，英国政府还在 1940 年 7 月 17 日，宣布停止滇缅公路军事运输 3 个月，封闭了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18 日，英、日签署《封锁滇缅公路协定》，规定日本自该日起 3 个月内设法与中国建立全面和平。日本签订这个协定的目标，是以滇缅公路断绝中国外来抗日物资之接济，迫使中国向日本投降。这种妥协，是非常无耻的。因为英国首相丘吉尔一方面公开宣布了援华抗日的政策，并正在争取美国的配合，以实现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但是当日本要求英国关闭滇缅公路时，他又不肯得罪日本，只好暂时牺牲中国的利益，换取英国远东殖民地暂时的安宁。

1940 年底之后，英国对日政策又逐步强硬起来，并加大了援华的力度。促使英国援华抗日政策逐步坚定起来的原因有以下四点：

第一，是美国对英国的影响。英国由于国力下降，其在远东的利益需要借助美国力量来维护。英国在反对德国的侵略战争中，更需要美国的支持。因此英国对华政策上不能不仰人鼻息，唯美国马首是瞻。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反对日本独占中国，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恢复“九一八”事变前的状态。美国的这一立场，对英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美国对华政策影响下，1938 年 5 月 7 日，英国驻华大使许格森向英国外交部建议，由于美国对华援助已经收到很好的效果，因此英国也应该援助中国。此后，英国政府采取了措施援助中国。例如重开了滇缅公路，让抗日物资运送到中国。英国还给了中国 800 万英镑的出口贷款，

其中 1938 年 12 月 20 日英国宣布给予中国 50 万英镑的贷款，后扩大为 300 万英镑；1939 年 3 月 10 日订立了 500 万英镑外汇平准基金贷款。

《有田—克莱琪协定》签订后，美国对英国的影响就更明显了。就在《有田—克莱琪协定》签订后两天，即 1939 年 7 月 26 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宣布废除 1911 年订立的《美日通商航海条约》，与日本断绝了商贸关系。而英国立即就在 7 月 27 日对华签订了 300 万英镑贷款，支持中国抗战。

1940 年 12 月 9 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宣告中、美、英三国命运密切相关，美国将是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他保证，美国将以大批军需物资援助中国。1941 年 3 月 15 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再次发表广播讲话，声称美国已逐渐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他表示要援助中国和英国抵抗侵略，并保证一定要援助中国，直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为止。

罗斯福的这一谈话，对英国坚持援华抗日政策，有很大的鼓舞作用。美国希望通过废除列强在华不平等条约，以激励蒋介石政府继续抗日。在美国压力下，英国不得不考虑通过修改不平等条约，来改善战时中英关系，以提高英国在中国的地位。1941 年 7 月 4 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照会国民政府，表示等到远东和平恢复时，英国政府愿与国民政府商讨取消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并根据平等互惠原则，修改条约。

此后，英国紧跟美国的对华政策，对日政策日趋强硬。例如 1941 年 8 月 1 日，美国宣布禁止油类输日；1941 年 8 月 15 日，美国又宣布自即日起禁止一切货物运日。英国于是在 1941 年 8 月 26 日宣布，放弃英本国及自治领印度、缅甸与日本之通商条约。尔后，英国宣布了封存日本在英国的资金。

在 1941 年 8 月 14 日的大西洋宪章中，美、英两国更在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在大西洋宪章中，有两款规定涉及中国。这两款规定是：“（二）凡未经有关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的领土改变，两国不愿其实现。（三）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所赖以生存的政府形式权利。各民族中主权和自治权有横遭剥夺者，两国俱欲设法予以恢复。”这两点规定，明确表示了英国和美国一样，公开采取了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立场。

第二，是因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同情；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这使得英国人民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要求政府援助中国抗日。在国际和英国国内的压力下，英国开始并坚持了援华抗日的对华外交政策。

第三，英国不愿将中国推向苏联的怀抱。“卢沟桥事变”后，苏联马上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无耻侵略。1937 年 7 月 14 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接见中国驻苏大使，明确表示苏联愿意援助中国抗日。英国并不乐意看到中国与苏联达成互助协定，英国担心苏联对中国提供武器、设备、军事顾问、飞机以及飞行员等方面的援助，会更加促使中国倒向苏联。英国害怕苏联影响的日渐加深，成为英国确保在华地位的绊脚石。同时，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使得英国对苏联有着仇视，担心苏联对中国局势的干预将“导致某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席卷中国，并且在印度和缅甸的边界上树立起苏联的影响力”。正是出于上述考虑，英国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对日政策日趋强硬，对于中国道义和外交上的支持也越来越多。

第四，是因为日本与英国的矛盾日益加剧。日本的“南进”政策，威胁到英国在远东的殖民统治，引起英国对日本政府的不满。英国需要中国的抗日战争，来保卫英国在远东的利益。正如英国驻华大使卡尔 1938 年在一次报告中，向英国外交部所说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既是为他们自己战，也是为我们而战，因为只有日本人的失败，才能把我们从危及我们在远东地位



的灾难中解放出来。”

但是英国在支持中国抗日的同时，仍然存在与日本妥协的幻想。1939年1月15日，在英驻日大使克莱琪向日本政府提交的照会中，就明确表达了这种观点。该照会说：“英国仍坚持中国门户开放及机会均等政策，凡以片面手段破坏九国公约者，英国不能承认，但若日本对于修改九国公约能提出建议时，英国也准备加以考虑。”在这个照会中，英国一方面宣布不承认“以片面手段破坏九国公约”，即不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另一方面又留下了与日本妥协的余地，即“若日本对于修改九国公约能提出建议时，英国也准备加以考虑”。

但“珍珠港事变”使英国彻底抛弃了对日本妥协的幻想。“珍珠港事变”后，英国和美国立即向日本宣战，1942年2月23日，英国与美国订立了“联合王国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在进行反侵略战争中相互援助所事业原则的协定”。1942年6月2日，中美订立“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至此英国完全站在中国一边，对日作战。英国的对日绥靖政策寿终正寝，英国和中国正式成为盟国。

然而在盟国之间，存在分歧。英美之间在抗日战争问题上就既有合作也有矛盾。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在其著作《如此盟国：美国、英国和抗日战争，1941—1945》一书中，研究了战时美国与英国的同盟关系。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战时，英国和美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这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英、美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合作中又充满了矛盾。例如，两国都同意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国的战略是“欧洲第一”，即首先在欧洲打败德国法西斯及其盟国，然后再挥师向东，击溃日本法西斯。<sup>①</sup>但是在实践中，双方的做法并不一致。

由于美国人民遭受了“珍珠港事变”的打击，他们从感情上来说，关注的中心在太平洋地区，而不在大西洋地区。因此，在“欧洲第一”战略的实施上，美英双方产生了矛盾。据统计，在1943年之前，美国战略资源的1/2以上，是用到了打击日本法西斯的太平洋战场，而不是用在欧洲战场。这种情况引起了英国人的不满。此外，在对欧洲和北非战场的策略上，以及在一些战役的合作上，英、美之间还存在分歧。而且美国为了战后称霸世界，用新殖民主义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双方在许多问题上也存在矛盾。

英、美是战时盟国，美国虽然强大，但英国毕竟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虽然英国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斗争，需要美国的支持，但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基本上还是一种平等的盟国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尚且产生了许多矛盾。而英国与中国虽是战时盟国，但是英国是强国，中国是弱国，而且由于历史上英国不断侵略中国，要弥合两国之间的隔阂，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中英两国之间，存在更多的矛盾和斗争。

作为盟国，英国对华外交政策的主调，是与中国合作抗日。英国的这一对华政策，在英国海外宣传委员会制定的对华宣传口号中有明确体现。这一政策是：“共同的战争，共同的战线，共同的胜利！”在合作抗日政策的指导下，英国在战时给予了中国一定的经济援助；英国与中国在军事上也开展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在文化科学领域更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英国在“珍珠港事变”后的对华外交政策，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了贡献。

然而由于英国对华政策始终存在殖民主义的考虑，因此双方在合作中充满了分歧、矛盾与斗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和英国制定了“欧洲第一”的战略。这个战略是正确的。但是英国在“欧洲第一”战略的借口下，企图战后恢复在华侵略利益，恢复英国在远东的殖民统治，

---

<sup>①</sup> Christopher. Thorne. *Allies of a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执行殖民主义的对华政策。这些政策表现在以下方面：拖延缅甸战役、贬低中国战后的国际地位、在援华问题上制造障碍、妄图把中国的西藏、新疆和东北分裂出去，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上制造困难，妄图永远霸占中国的香港，等等。英国的这些对华政策，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对，并且激化了重庆国民政府与英国的矛盾。经过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英国政府被迫让步，两国的同盟关系才得以维持下去。

中英两国正是在这种又合作又斗争的过程中，迎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这段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即：为了共同的目标，盟国需要合作；只有盟国的合作，才能取得共同的胜利；然而在合作中由于国家利益的不同，必然会产生分歧、矛盾与斗争。盟国需要求同存异，从大局出发，坚持合作。在合作中，一定要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只有坚持维护国家利益的合作，才能实现共同的目标，实现双赢互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英国战时对华外交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本书使用了英国政府的官方档案资料，其中包括英国外交部资料、国防部资料、内阁会议资料、英国议会记录，丘吉尔个人档案、艾登档案、战时英国驻华大使薛穆档案等档案资料。本书还使用了美国或其他国家第一手资料以及国内最新的一些中国档案资料和其他资料。在研究这些资料的基础上，作者力图详细地揭示英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时代背景、思维方式、现实考虑、政策目标和实施后果等，以全面反映战时英国对华政策。但是限于作者的水平，恐难完全实现这些目标。不足之处，恳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李世安

2009年7月30日

## 目 录

第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英国对华政策 .....	1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与英国对华政策 .....	6
一、20 世纪 20 年代英国对华政策的转变 .....	6
二、“九·一八事变”后英国的对华政策 .....	6
第二节 英国对“七七”卢沟桥事变的反应 .....	16
一、英国政府对“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态度 .....	25
二、英国舆论对“七七”事变的看法 .....	25
第三节 “七七”事变后的英国对华政策 .....	29
一、“七七”事变后的英国对华政策 .....	32
二、英国舆论对“七七”事变后英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	32
 第二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至珍珠港事变前英国的 对华政策 .....	40
第一节 珍珠港事变前英国的援华抗日政策 .....	50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对英国的政策 .....	50
二、珍珠港事变前英国的对华政策 .....	50
第二节 珍珠港事变前英国援华抗日政策产生的原因 .....	53
一、美国对英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	55
二、英国公众和民间组织对英国对华政策转变的影响 .....	55
三、日本扩大侵略迫使英国改变了其对华政策 .....	58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英国对华政策 .....	59
第一节 珍珠港事变后英国的对华战略 .....	63
一、“先欧后亚”战略指导下的对华政策 .....	63
二、英国政府利用舆论宣传英国的对华政策 .....	63
三、英国对华宣传计划 .....	64
四、重庆国民政府反对英国“先欧后亚”战略的斗争 .....	68
第二节 英国对战时中国国际地位的否定 .....	79
一、英国对中国世界“四强”地位的否定 .....	84
二、丘吉尔贬低中国抗日的贡献 .....	84
第三节 英国实施“先欧后亚”战略的策略 .....	88
一、拖延缅甸战役 .....	94
二、在援华问题上制造障碍 .....	94
 第四章 战时英国的对华殖民主义政策及其失败 .....	98
第一节 英国对我国西藏、新疆和东三省的殖民主义 政策 .....	103

一、英国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	103
二、英国对我国新疆的反动政策·····	103
三、英国对我国东三省的殖民主义政策·····	107
第二节 英国关于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的政策·····	108
一、1942 年 10 月 9 日前英国关于废除在华不平等 条约的政策·····	112
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和九龙问题·····	112
三、1943 年条约签订后的英国对香港政策 ·····	116
第五章 战时英国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政策·····	120
第一节 英国与重庆国民政府·····	127
一、充满矛盾的英国政策·····	127
二、蒋介石访问印度与英国的对策·····	127
三、英国与暗杀蒋介石的阴谋·····	133
第二节 英国政府援助重庆国民政府抗日的政策·····	138
一、英国援助重庆国民政府抗日政策的确立·····	142
二、英国援助重庆国民政府抗日政策的反复·····	142
三、英国援助重庆国民政府抗日政策的结束·····	146
第六章 战时英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147
第一节 英国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变化·····	153
一、从传统到现实·····	153
二、从敌视立场到中立的转变·····	153
第二节 英国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起源·····	159
一、英国错失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的时机·····	164
二、英国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起源·····	164
第七章 战时英国对国共斗争的政策·····	166
第一节 战时英国对国共斗争的基本政策·····	170
一、太平洋战争时期英国对国共斗争的基本政策·····	170
二、战时英国对国共斗争前景的分析·····	170
第二节 英国对战后国共斗争的政策·····	170
一、英国对战后国共斗争的分析·····	176
二、英国对战后国共斗争“不干涉”政策的内容 ·····	176
第三节 战后英国“不干涉”政策的实施 ·····	180
一、战后初期英国“不干涉”政策的实施 ·····	188
二、从不干涉到承认新中国·····	188

第八章 战时英国与中国进行科学技术合作的政策.....	192
第一节 战时英国对华科学技术合作政策的产生.....	203
一、英国文化协会驻华办事处的设立.....	203
二、英国对华文化政策的演变.....	203
第二节 李约瑟与中英科学合作馆.....	211
一、李约瑟科学代表团访华.....	211
二、中英科学合作馆的成立.....	214
三、英国工商业界与技术援华问题.....	223
四、李约瑟对中华文明的宣传.....	226
参考文献.....	229
出版后记.....	233

## 第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

### 英国对华政策

####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与英国对华政策

##### 一、20 世纪 20 年代英国对华政策的转变

英国的传统对华政策，是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在远东的实力与地位的变化，英国实力相对衰落，在与日本和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中国的斗争中，处于下风；更主要的是由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中国人民的不断反抗斗争，迫使英国的对华政策，开始从炮舰政策向让步政策转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利用欧美各国忙于欧战、无暇东顾的有利时机，加紧了在中国的侵略活动。1914 年 8 月，日本以英日同盟的名义对德宣战，并出兵中国山东；1915 年日本又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企图把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日本还在战时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与英国争夺海外市场。这导致日本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中国的实力大增。1918 年时，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已经超过英国居各国之首<sup>①</sup>，在中国的投资方面，日本已经与英国不相上下。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还在远东拥有了巨大的军事优势，成为世界第三大海军强国。日本在远东构成了对英国利益的威胁。

而对英国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却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战争使英国经济受到了巨大的破坏，战争使英国的国力损耗巨大。在战争期间，英国为战争支出了 124 亿 5 千 4 百万英镑，相当于国家收入的 44%。<sup>②</sup>

不仅如此，英国在战时还向美国大举借债，1919 年英国欠美国的债务，高达 8 亿 5 千万英镑，占美国对协约国贷款的 45%。<sup>③</sup>英国面对着战前和战后各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和调整，面对着各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中国实力对比和影响的变化，其对外政策必然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and 变化。

于是，英国在华盛顿会议前，一改巴黎和会上支持日本的做法，决定联合美国共同抵制日本。在巴黎和会上，英国政府表示，英国不能放弃诺言，必须采取支持日本的态度，支持日本取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而到在华盛顿会议召开前，英国政府则明确表示反对日本独占中国。在中国问题上，英国认为：第一，中国未来所处的地位，将构成远东局势中的一个有利因素；第二，华盛顿会议如果能召开，中国理应受邀出席；第三，山东问题虽然是中日双方之间的事，但列强均极为关注，因此中国山东问题可能成为大会讨论的议题。

由此可见，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前夕，英国对中国的立场已经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巴黎和会期间，英国牺牲中国的利益并与日本狼狈为奸、极力支持日本获得原来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而在华盛顿会议前，英国虽然预料到日本必将反对讨论山东问题，但是又不得不考虑美国和中国的立场，在外交政策上已经明显转向“联美制日”，这个转变实际上意味着“英国对华政策的某种变化”。英国发现，联合美国抵制日本，维持中国政局的稳定，保持中国某种程度上的独立自主，甚至在不妨碍英国在华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支持中国收回部分权利，才是防止日本独占中国且符合英国在华利益的最佳选择。

华盛顿会议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英国的“联美制日”的目的。华盛顿会议在客观上拆散

---

① E. M. Gull. *British Economic Interests in the Far East*, London, 1943, p. 108.

② Keith Hutchis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British Capitalism*, Newyork, 1950, p. 134.

③ Keith Hutchis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British Capitalism*, Newyork, 1950, p. 142.

了自 1902 年以来的英日同盟，这种联合美国抵制日本战略部署，有利于英国遏制日本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特别是有利于遏制日本在中国的势力扩张。然而，华盛顿会议同时也削弱了英国的势力，比如会议上签订的《限制五国海军军备条约》，规定美、英、日、法、意五国的主力舰总吨位比例为 5 : 3.5 : 1.75 : 1.75。这样的规定，在无形中削弱了英国的军事势力，英国已经失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海军方面的绝对优势。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国内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国民党的革命化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革命注入了新的因素。1924 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成为中国革命高涨的起点。

1924 年 5 月，《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正式签订。苏俄宣布，废除中俄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帝俄时代在中国的一切租地和租界；放弃“庚款”的俄国部分；取消帝俄时代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中东铁路由中国赎回；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等。这个条约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基本平等的新条约，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一致欢迎。这个条约的签订，还直接推动了中国人民要求废除一切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的反帝运动。而中国人民反帝革命运动的矛头，自然首先对准了最早侵略中国、在中国有着最大利益的英国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

1925 年在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国内各地发生了一连串的反英行动。如 6 月 11 日的“汉口事件”、6 月 20 日的“九江事件”、6 月 23 日的“沙基惨案”，这些事件和惨案的发生，使得中国国内的反英情绪不断走向高涨。中国朝野普遍都认为，要打破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枷锁，首先就必须排除英国在华势力、废除英国在华特权等。在全国反帝浪潮的推动下，1926 年广东国民政府开始了北伐进军，矛头直指被英国视为最重要的在华利益范围——长江流域。英国对此十分惊恐，他们特别担心英国在华势力的彻底覆灭，而英国在中国的彻底失败，很可能是英国势力从亚洲的另一大国印度被迫撤退的序幕，从而使英国在整个苏伊士运河以东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面临巨大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对华外交政策不得不做出新的调整，不得不对中国采取新的策略，即从对中国的完全的炮舰和高压政策，改变为在保住英国在华最重要利益的同时，对中国做出一定的让步。1926 年 8 月，英国副外交大臣、对华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威尔斯利（W. Wellesley）表示，英国已经不可能对华继续实行炮舰政策。他说：“从陆军、海军的观点来看，对付像中国那样的一大群混乱的民众，我们多少是无能为力的；必须排除任何强制性的东西，除非有可能与其他列强一起进行海军示威。”<sup>①</sup>

英国对华采取一定让步政策的标志，是 1926 年 12 月 18 日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Chamberlain. Austen）发表的英国对华“新政策”备忘录，即《圣诞节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张伯伦承认，当时中国的时局与各国缔结《九国公约》时的时局，已经完全不同了。因此，张伯伦宣布英国愿意就修改不平等条约与中国进行谈判。这样，该备忘录被称为“英国为软化中国革命，重新调整对华政策的标志和信号”。

《圣诞节备忘录》的出台，有着深刻而复杂的背景。“五卅运动”后，持续不断的中国国内反对英国的革命浪潮使英国政府认识到，同中国国民党的对抗，会使英国对华政策的总目标——扩大中英贸易难以实现。而扩大对华贸易的总目标，又与三个具体的目标密切相关，即保护英国对华贸易的特权和英国在华工商企业利益、保护在华商人和臣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同美国共同维持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可是事实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对中国实施的武力或炫耀武力的高压政策，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不仅无效，而且只能激起中国人民更为激烈的反抗。

---

<sup>①</sup> 萨本仁：《20 世纪的中英关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158 页。



英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势在必行。

因此，英国对华“新政策”的核心是在新的形势下，承认中国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合法性，也承认在当时中英对立、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修订新约的难度。但是《圣诞节备忘录》认为，英国对中国的让步应该是有分寸的、有步骤的：英国认为，较小的利益可以放弃，中等的利益可以协商，根本的利益则必须维护，英国是决不会一举放弃在中国的所有利益的。英国被迫退还“庚款”一事，体现了英国《圣诞节备忘录》对华新政策的实施情况。

英国“庚款”是庚子战后中国政府的战债赔款，是《辛丑条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英国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最不平等的条款之一。对于“庚款”，英国政府虽然于1922年就宣布退还中国，但是英国一开始就不愿意放弃对“庚款”的支配权。《1925年中国赔款（用途）案》，就鲜明地体现出了英国对“庚款”的控制意愿。但是面对中国国内日益高涨的反英浪潮，面对美国、日本特别是美国在华势力和影响的急剧增长对英国构成的威胁、面对英国国内在“庚款”问题上的不同的声音和立场，英国政府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顺应这些变化了的新形势。于是在退还“庚款”问题上，英国被迫不断逐步退让。

英国议会在1925年5月，决定将英国“庚款”自1922年12月1日起到1945年为止，全额归还中国。全部退还的“庚款”总额约为1100万英镑，从1925年起至1945年为止，每年英国退还的“庚款”数目，平均是约为55万英镑。根据英国议会的决定，英国退还“庚款”应用于有益于中英两国之教育或其他目的。

英国这种放弃“庚款”的做法，体现了英国对华政策缓慢转变中的殖民主义动机。例如，英国提议用“庚款”发展在华英式教育，其目的就是用“庚款”在中国变相地用于传教事业。用中国的款项，培养为英国利益服务的中国青年人才。

中国则反对把“庚款”用于英式教育。中国舆论认为，这种做法实际上会给中国带来无穷的危害。为此，中国人民进行了坚决斗争。中华教育改进社为此在南京开会，在其通过的致函英国驻华公使、上海英国商业会和中国外交部的决议中，就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态度：“庚子赔款余额，英国如果于退还以后悉用于英人在华国有之事业，是退者其名，而不退者其实。……是巧取吾国之赔款行文化侵略之野心，而更谋得一退还庚子赔款之美名而已。玩弄吾国，实为已甚，此吾人不能承认者也。办理教育宜使适合国情，立国根本，在于精神统一。吾国教育自有吾国教育之精神，如某国所退之款必以办理英国式之教育，则一国之教育精神立见分裂，其为危险将不可思议。此吾国人不能承认者也。赔款余额，若俄，若美，均为无条件退还，美国且有教会学校不能分润之宣言，一秉大公，世人共见。如英国退还此款，先行制定用途之范围，似不足以代表退款之诚意，此吾国人不能承认者也。”<sup>①</sup>

中华教育改进社、北京8所大学的教师代表以及胡适等5人，会见英国驻华官员，说他们不喜欢日本把“庚款”用于培养亲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有条件的退还方式。他们劝告英国不要采取日本那样的退还方式。他们要求英国，应该给中国完全的决定资金使用的自由。<sup>②</sup>

顾维钧在与英国驻华官员会晤时表示，中国教育界强烈反对英国按照日本制定的归还“庚

---

① 邵爽秋：《庚款与兴学问题》，第26页。

② Kenneth, D. Cameron Watt and M; Chael Partridge, eds.,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BBFA), F 为 BDFA.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Vol. 28, China, New York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77, p. 286.



款”方式予以退还。相反，他们赞成美国的做法，要求英国仿效美国那样归还“庚款”，让中国完全控制和管理退还的“庚款”。他还向英方暗示说，如果英国不仿效美国模式，英国在这个问题上肯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sup>①</sup> 中国外交部在致英国外交部的信件中，更明确表示：“其他国家，如俄美已经无条件退还庚款。美国更是宣布教会学校不会从庚款退还计划中受益，一副相当的对中国放手的姿态。而英国的建议却与真正的中英友好交往精神不一致。……假如这样的建议，得到英国议会的批准通过并被置于法律地位，那么最终将带来的是无穷的矛盾和迟到的遗憾。”<sup>②</sup>

而在英国国内，对退还“庚款”，有三种主张：一种认为应该按照美国模式，将“庚款”交与中国，由中国自己控制，将“庚款”用于双方共同指定的方面；第二种观点是英国仿效日本模式，由英国控制资金，支持英国在华教育事业的发展；第三种观点是认为应该走一条中间路线，将一部分“庚款”用于在华英国文教卫生方面，将另一部分“庚款”交给中国政府以资助中国教育机构。

但在英国，主张仿效美国退还方式的占少数。在这少数人中，英国外交部官员 R. H. 格里佛 (R. H. Clive) 的观点最为典型。格里佛主张仿效美国式退还，即“庚款”由中国人控制。而英国商会和教会等团体，多主张由英国控制和管理“庚款”，通过利用“庚款”在中国发展英式教育，最终来维护英国的商业利益，来发展英国在华教会势力。<sup>③</sup> 英国外交部另一名官员格雷 (Gray) 和多数外交部官员等则认为，如果将“庚款”无条件退还给中国，很可能被军阀所控制，用于打内战，反而不利于中国局势的稳定，也不利于英国在华利益的保护和发展。1924 年 2 月 2 日，英国外交部在其通过的关于“庚款”问题备忘录中指出：“许多建议认为，退还的‘庚款’让中国政府无拘束地利用是不明智的。我们也认为应该由英国外相掌管用于对中英双方互有利益之事。”<sup>④</sup>

但是中国人民的斗争，迫使英国政府逐步改变了其政策。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人民反对英国《中国赔款用途法案》的斗争。

1925 年 5 月 26 日，英国议会下院经过三审通过了《中国赔款用途法案》。该法案全文并没有对退还“庚款”问题做出什么明确的表示。实际上该法案全文，根本没有一个“退还”、“偿还”这样的字眼。对“庚款”问题，始终用的都是“运用”一词。而且在有关“庚款”如何运用的讨论过程中，完全是在英国政府主导下进行的，英国人甚至认为这是属于英国的内政。

《中国赔款用途法案》规定，英国外交大臣对于“庚款”的用途，有最终的决定权。在英国外交大臣之下，设立“庚款咨询委员会”，辅佐外交大臣处理“庚款”事宜。法案规定建立一种赔偿基金，用于教育或其他中英两国共有利益之事。“庚款”的用途和分配由英国外交大臣与咨询委员会商议后做决定。咨询委员会由 11 人组成，全部由英国外交大臣任命，其中两名委员为中国人。每年向中国支付的账目，由英国政府向议会下院申报。

---

<sup>①</sup> *BDFA*,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Vol. 28, China, p. 285.

<sup>②</sup> *BDFA*,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Vol. 28, China, p. 317.

<sup>③</sup> *BDFA*,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Vol. 27, China, p. 398.

<sup>④</sup> *BDFA*,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Vol. 28, China, p. 132.

总之，该法案名义上为向中国退还“庚款”的法案，但是没有一个字眼提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权限。从“庚款”管理人员的组成、“庚款”管理和“庚款”用途到实际账目的支付，全部都是由英国外交大臣来控制。

而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对于退款的管理和使用上给了中国很大的权限。美国成立了一个由中美两国人士共同组成的“庚款基金董事会”，由15个董事组成，其中中国人10个，美国人5个，董事会董事皆由中国政府委任，董事会享有保管和使用“庚款”的全部权限。英国则规定了英国政府对“庚款”的支配权。至于“庚款咨询委员会”，仅是附属于英国外交部的一个咨询机构而已。它的职责就是向英国外交大臣提供意见，用于咨询，仅有的两名中方代表更完全是一个摆设而已。所以，退还“庚款”的处理大权，完全操纵在英国政府手中。在这样的条件下，讨论到“庚款”的用途，如果规定“庚款”用于教育，那么所创办的教育完全是英国的教育；如果规定“庚款”用于实业，那么创办的实业完全是英国的实业；如果规定“庚款”用于筑路，那么修筑的铁路完全是英国的铁路……

英国政府开始时，顽固坚持其立场，对政府中持不同意见者，采取排斥态度。例如在英国赔款法案三审的过程中，主张退还“庚款”应该专用于教育的工党成员罗素（Bertrand. Russel）和狄金生（Lowss. Dickinson）两位“庚款”委员会委员，被保守党从“庚款咨询委员会”中解聘。这激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转而公开反对英国政府的政策。例如罗素就直接号召中国人民进行斗争。在1924年12月16日，他电告自己1920年在中国访问时认识的翻译赵元任，鼓励中国人发起反抗运动。他建议，对有损中国之“庚款”退赔计划，中国如果没有否决权，则应该拒绝参加。他还鼓励中国争取保管和使用“庚款”的权力。赵元任将罗素来函刊登在了教育杂志上，这引起了中国强烈的反对情绪。<sup>①</sup>1925年赔款法案公布后，在中国更激起了强大的反对浪潮。

面对中国人民强烈的反对情绪，1925年5月英国驻成都总领事奥顿（A. G. N. Ogden）建议，显然英国应该有控制权，否则就不会达到正当使用的目的。但是控制的方法，不要引起中国人的怀疑。他建议组织一个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中国人占多数，主席为中国人，英国人可担任副主席，但有全权。奥顿的这种构想，与美国的“庚款”管理方式有了一些相近的地方。但是英国对“庚款”主权和用途的改变是，在英国调查团来华访问之后做出的。

面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反帝和反英浪潮的发展，英国政府决定派出调查团来中国对“庚款”使用和权限情况进行调查。其实在这之前，曾有许多人向英国政府建议一定要先派遣一个代表团来华调查，再作出相关的决议。如1919年，威尔顿就曾经建议派专家到中国就“庚款”使用问题进行调查；1923年，英国在山东一所教会大学校的校长班勒姆（Balme），建议派人来中国调查，还主张调查团代表中必须有教育界人士。他还建议，在调查团中，中英两国的代表人数应该相等，等调查团来华调查后再决定“庚款”的分配原则，然后再设立一个管理“庚款”的永久基金会。1924年7月，英国外交部的官员格雷（G. D. Gray）也建议先派代表团来华调查。

1925年，班勒姆在中国目睹中国社会各界人士反对西方各国在中国建立的教会学校及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反宗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的运动，这实际是一场民族意识进一步觉醒的反帝运动。班勒姆对“庚款”资助在华教会学校，对英国退还“庚款”方式，再次提出自己的建议说：英国退还“庚款”，本在增进中英友谊，但是如果做法不当，不仅不能增进友谊，反而有害中英关系。他认为目前英国的做法，已引起了中国人的怀疑，原因有：一是咨询委员会人数问

---

<sup>①</sup> 王树槐：《庚子赔款》，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4年版，第447页。

题，一是关于“庚款”用途对英国有利问题。他建议采取明智的办法，走美国式道路，具体的改进措施是：第一，调查委员会中英两国的代表人数相等，且其作用为咨询。第二，组织基金委员会管理“庚款”，在该委员会中，中国代表应该占多数。第三，“庚款”用于中国教育，但暂时不用于英国在华教会学校。<sup>①</sup>

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普拉特（John. Pratt）对班勒姆的建议，发表了意见。他认为，虽然班勒姆的建议，有些夸大中国人反对英国的社会舆论的危险性，并说中国目前的仇英舆论是共产主义精心宣传的结果，目的是为了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但是他仍然向英国驻华公使建议，目前英国应该推迟利用“庚款”资助教会学校的计划，管理“庚款”的基金委员会中，中国代表应该占多数。<sup>②</sup>

不久，“庚款咨询委员会”在朱尔典去世之后，补充了一名中国委员，使中国委员成为了三名。12月底，英国将“庚款”用途进行了初步修改，规定用于赔偿在华英国人在20年代的中国革命反帝运动中，遭受到的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这一项删掉；并且在一个长篇备忘录中，首先声明退还“庚款”之目的，“在于增进中英间的友谊，使两国更为了解，相互尊重”，“‘庚款’不仅要去做最好的用途，同时也要最适合中国人的意见和舆论”。该备忘录还说：“有必要说明的是，英国无意利用‘庚款’剥削中国，无意利用‘庚款’维护英国的影响或商业或教育宣传等方面的利益。此款虽用于教育但是其方式计划必须为中国政府和教育人士所接纳。任何教育方案的目的应该是将管理权力交给中国自己。”<sup>③</sup>从这份备忘录可以看出，英国对“庚款”管理和使用的观点，与刚刚公布赔款法案时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让步。

在英国对“庚款”管理和使用权限上做出初步调整的同时，组织了“庚款调查团”，访问中国。在“庚款调查团”中，中国和英国每方各三人，英方代表是威灵顿子爵（Viscount. Willingdon）、苏威廉教授和协助上海市议会调查上海童工问题的安德森（Anderson）女士；中国代表是中东铁路督办王景春、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以及北京大学哲学系及英文系教授胡适。双方代表人数相等，权限地位平等。代表团将去中国南北及长江各地重要城市游历考察，而后讨论“庚款”最适当的用途和管理方法以及基金董事会组织等，并报告给伦敦。

在三名中国委员中，王景春代表中国铁路部门，而王景春任职的中东铁路一直是英国工业界觊觎的在华投资项目之一；胡适代表中国教育界；丁文江则同时具有教育界和实业界双重身份，1926年间他在上海协助盘踞在东南五省的军阀孙传芳筹划建设“大上海”计划，这也是令英国实业界感兴趣的一个项目。三名中国委员理论上代表的是中国的整体利益，但是广州的国民政府却没有机会参与进来。

在三名英国委员中，威灵顿曾经担任议会下院两次，是一名保守党成员，1905年担任英国财政副大臣，任职7年。1913年起他先后在印度的两个省担任总督，1924年卸任。苏威廉教授，精通中国文化，曾经在浙江等地传教多年，后来回到英国后，在牛津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安德森

---

① *BDFA*,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Vol. 29, China, pp. 79-80.

② *BDFA*,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Vol. 29, China, p. 80.

③ *BDFA*,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Vol. 30, China, p. 76.

夫人，是一名政府官员，担任英国全国工厂监察官 24 年之久。1924 年曾经到中国，在上海协助调查中国许多工厂中存在的雇佣男女童工的问题。

“庚款调查团”于 1926 年 2 月 14 日抵达上海，后来先后访问了汉口、南京、杭州、北京，最后一站是天津。截止到 6 月 18 日提出考察报告时，“庚款调查团”在中国考察历时四个月，所到之处，有欢迎者，也有不欢迎者。欢迎者，在民间有上海总商会、南京总商会、汉口总商会、全国道路建设会，东南大学等；官方有北京之段祺瑞政权，各地之军阀有吴佩孚、孙传芳、卢永祥等人。不欢迎者为广东国民政府，1925 年 6 月，在广东刚刚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沙基惨案”。

6 月 23 日，广州的工人、学生、市民、黄埔军校的学员共 7 万多人为抗议“五卅惨案”召开大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走到沙基路时，却遭到了英、法、葡三国军警的联合射击，造成了死 52 人、伤 117 人的惨剧。广州国民政府在“沙基惨案”发生后，要求制造惨案的有关国家，包括英国在内，向广东革命政府谢罪、惩办凶手、撤退所有驻广东的外国军舰、交还沙面租界、赔偿中国人损失，但是英国没有答应。

于是“沙基惨案”发生后，英国等国家的凶残态度，使已经开始的香港工人罢工规模更加扩大，参加罢工的工人陆续离港返省，迅速出现了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省港工人大罢工。一时之间，港粤交通断绝，香港的电力、煤气停供，商店关闭，企业破产，港英政府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和打击。在“沙基惨案”和省港工人大罢工期间，在广东国民政府与英国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广东国民政府自然拒绝了“庚款调查团”前往访问。

中国教育界对“庚款”法案大多表示了不满意甚至反对的态度。1926 年 2 月 1 日，留英学生龚远光，组织设立了退款与兴学研究会，并函告国内，分析此次退款之缺点，建议中国教育界先统一意见，消除内部不和，团结一致，共同对外，与英国进行交涉。<sup>①</sup> 2 月 28 日，《上海时报》刊出某教育家感想：国人对“庚款”处分未认清，不加深察，欢迎情盛，甚为愚昧。若照英国办法，由其支配，必得恶果，有负此美举。中华教育改进社致函全国各机关，说“英国处分庚款法案……此种真相如何，国人急宜注意。此款仍未英国所有，并未退还我国；照此精神在我国领土内办理各种事业，是否有损我国主权，应请国人共同慎重考虑；敝社主张以为国人对于此事，应先保主权，后谈用途。……在主权问题未确定以前，实属无从讨论（使用问题）。”

因此，中华教育改进社坚决主张，在“庚款”问题上，应该先力保对“庚款”的主权，然后再商谈其用途。3 月 16 日，北京教育界和欧美同学会等召开会议讨论“庚款”问题，参加者有颜惠庆、姚金绅等五十余人。会议最后就英“庚款”问题通过决议：反对英国政府所定之处置办法，以保国权；要求英国无条件抛弃“庚款”，如非无条件抛弃，无论以此款在中国作何种事业，均认为伸张其行政权于中国领土，中国决不承受，并极端反对之；举五人为执行委员会，执行反对，并召集会议商讨进行办法。<sup>②</sup>

3 月 18 日，南洋大学校长凌鸿勋致函胡适：“中英庚款于中国有两点必须纠正，一为争回退款主权，一为修改委员会之组织性质，为国家主权计，应请以去就力争，以促英人之反省。”<sup>③</sup>

杨杏佛也在致胡适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英国退还庚款由希望到失望和气愤的心情。他说：

---

① 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 1847—1945 年》，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6 年，第 390 页。

② “英退回庚款问题之纷扰”，《教育杂志》，第十八卷第四号，1926-04-20，第 3~4 页。

③ “与庚款委员商榷之两函（1926 年 3 月 18 日凌鸿勋呈）”，《申报》，1926-03-21（4）。



“英似已决定以此款退还中国，专办中英互利事业……甚以为慰。继从各方文字观察，始悉英政府所决议者，并非退还‘庚款’，仅指定‘庚款’作中英互利事业之用而已。无退还之实，而欲得亲善之名……以空言市惠，欲以不可必得未必有利中国之数百万赔款，转移四万万华人要求民族独立与国际平等之心理，其事之不可能，无待言说。”杨杏佛尖锐地指出，如果按照英国退还“庚款”的办法，那么在中国建筑的铁路是英资铁路，兴办的学校则是英国的教会学校。他还在致胡适的信中，提到了刚刚发生在1925年的“五卅事件”和1926年的沙基惨案，指出英国人可能企图利用“庚款”，来转移中国人民的要求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指向。杨杏佛在信件的最后向胡适呼吁要他“宜联合中国委员，要求英政府，无条件退还赔款。否则，全体退出英‘庚款委员会’，以示国人对于此事之决心。”<sup>①</sup>

3月21日，中国工程学会通电全国：“英国退还庚款，已有成议。但退款主权仍不在我，此时吾国教育实业各团体，若不问主权，从事呼吁，或欲争设铁路，或主发展工业，或求补助教育，众口嗷嗷，有类乞食。殊于本末先后之旨，大相刺谬，敝会主张，全国公团一致要求英国政府如有诚意退还庚款，即宜仿照美款办法，由中国组织委员会，调查研究分配全权。”<sup>②</sup>

中国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界对英“庚款”退还方式的不满，使威灵顿为首的英国“庚款调查团”，对中国人民的斗争开始有所了解。因此，“庚款调查团”为了减轻中国人的反感，特意在3月22日在上海的礼查饭店招待中国新闻界。威灵顿在招待会上诚恳地表示，在“庚款”问题上，唯有合作，方能达到原有之目的。他日作何用途，亦赖大家指导。随后，考察团赴汉口考察。<sup>③</sup>

“庚款调查团”在中国考察期间，经常听到中国教育界人士反对的声音。如浙江省教育会主张英国首先退还“庚款”，由中国直接使用。上海中华教育改进社认为应该先确定“庚款”的各项原则，将“庚款”退还中国，然后再论及“庚款”的用途，主张用于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上。5月19日，各教育机关代表集会，决定为促进英国正式向中国退还“庚款”，由中国设立一个专门的董事会保管和支配使用“庚款”，教育机关的代表还分别访问了胡适等“庚款调查团”的委员，表明了他们的想法和立场。

5月25日，调查团在天津发表宣言，声明在中国设立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会有处理“庚款”的全权。董事会成立后，咨询委员会即将解散。

调查团在中国，切身感受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庚款”管理和使用上的坚定态度。因此，调查团在其考察结束后，咨询委员会在10月18日提出了“庚款报告书”，对“庚款”的管理和使用做出了一些调整，特别是在庚款的管理权限和人事任命权上做出了有利于中国利益的重大调整。这些调整，包括解散“庚款”咨询委员会，另组基金委员会，设在中国，其下设分组委员会。基金会由11人组成，中国6人，英国5人，初步由中国政府任命，但是必须得到英国政府的同意，以后由委员推选，任期3年，可连选连任，主席一职中英双方均可担任，由该委员会委员推选产生。中英人数之比，至1945年为止。以后可以用中国人代替英国人，每年向中英两国提出财务报告。

同时中英两国也可派观察员与会。“庚款”基金，每年支付150000磅至350000磅为补助之用，余款作为基金，共可得3500000磅或5000000磅，作为生利之用。“庚款”用途，补助方面

---

① “与庚款委员商榷之两函（1926年3月18日凌鸿勋呈）”，《申报》，1926-03-21（4）。

② “中国工程学会对英庚款之意见”，《申报》，1926-03-21（4）。

③ 《英庚款委员会招待新闻界》，《申报》，1926-03-23（4）。

即农业教育及农业改良：农业方面，30%，科学研究，23%，医务与公共卫生，17%，教育事业，30%；投资方面：铁路，完成粤汉路未完之部分，约需500万磅；河务工程：直隶水利，约需3200000磅，导淮水利，约需2000000磅。<sup>①</sup>

从1925年的《中国赔款用途法案》到1926年的“庚款考察团修改报告”，可以看出中国朝野关于“庚款”管理和用途的争论。中国朝野对“庚款”管理和用途上权限问题上与英国的斗争，对英国政策的变化和调整产生了重大的作用。英国政府面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的浪潮不得不做出适当的调整。在“庚款”管理上，不再由英国外交部长全权负责，专设了“庚款董事会”，并且在董事会中中国代表占多数；在人事任命上，董事会不再由英国外交部长任命，而是由中英两国政府商议后再任命；在“庚款”的用途上，也由原来几乎专门用于教育上，现在调整为用于实业和教育上。

“庚款调查团”完成其调查工作后，中国的时局却变得动荡不宁。在报告书完成一个多月后的1926年7月26日，10万国民革命军就开始了北伐。英国政府本来希望如果能够有一个稳定的中国中央政府出现，就可以通过法令执行报告书建议，但是这种形势还没有出现，英国政府对发生的延迟表示十分遗憾。还表示这不是因为英国政府的政策发生了任何改变或者是因为英国政府对该建议缺乏兴趣，而仅仅是因为中国目前形势的不稳定才没有采取必要的执行措施。<sup>②</sup>

1927年7月，中国国民党政府从广州迁往南京，表面上取得了国家的统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巩固胜利果实，为了进一步完成和实行国家的真正统一，国民政府宣布要按照孙中山的实业计划进行国家经济建设，还指出铁路建设为当务之急。1928年11月国民政府成立铁道部，由孙科出任铁道部长。1929年1月，孙科提出利用退还的“庚款”和关税增额修筑铁路计划的提案。粤汉铁路的建成对中国政治和军事上的统一，对社会的稳定，对刚刚遣散回家的广大士兵解决就业问题等都有巨大的好处。

英国政府虽然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有疑虑，但是也认识到它面对的毕竟是一个名义上统一的中国，因此全面贯彻执行《圣诞节备忘录》即对华“新政策”的时代已经到来。在“庚款”问题上，英国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经济建设计划和铁路建设计划表示了支持的态度，表示愿意将退还的“庚款”用于中国铁路建设，特别是用于粤汉铁路剩余路段的完工。

英国政府对“庚款”用途的转变，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斗争，另一方面也与这个时候英国国内经济形势开始恶化有关。这时的英国国内，开始出现了经济大危机来临前的预兆，如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工人失业人数不断增多，社会矛盾开始变得尖锐起来等。

英国政府面对开始恶化的国内经济和社会形势，更加迫切地希望将退还“庚款”用于发展中国实业上，特别是希望用于中国铁路建设上。希望通过中国购买自己的枕木、钢材等铁路建设中的物资，刺激国内制造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改善人民的生活，从而来摆脱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再有，英国希望退还“庚款”用于建设粤汉铁路，是与希望维护英国在华传统势力有关。早在1926年就有人指出：“粤汉铁路可以将广东、湖南、湖北等南方各省联系起来，粤汉铁路的完成对英国殖民地的繁荣十分重要。香港政府也正在急切地盼望这条铁路的完成。”<sup>③</sup>

---

① 财政讨论会编印，《研究各国变更庚款办法意见书》，中华民国十六年六月，第156页。

② BDFA,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Vol. 35, China, p. 110.

③ BDFA,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Vol. 31, China, p. 35.

“虽然中国的铁路里程数不大，但是铁路发展的潜力巨大，当中国国内趋于稳定，中国对铁路的需求，对铁路设备的需求会对所有工业国家产生强大的吸引力。”<sup>①</sup>

粤汉铁路其实在 1911 年就完成了广九段的通车，1919 年广韶段竣工。但是当时的广州商人和百姓为抵制英国货物大量涌入，反对将各自完成的两段连接起来。而英国一直特别希望能够全部完成粤汉铁路工程，这样就可以使英国的商品从香港、广东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国辽阔的内地，扩大英国商品在中国的市场，还可以通过中国购买英国的钢材、枕木等铁路材料刺激国内各制造业的发展，为英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国内不景气的经济状况和动荡的社会形势。

但是，由于 1927 年以来中国政治局势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盘踞湖南等地的吴佩孚和广东的国民革命政府处于交战中，所以没有实施“庚款”退还的时机。当然，英国这么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维护“庚款”的安全，是出于维护退还“庚款”为英国带来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政治利益的角度，如此谨慎地等待中国国内政局的稳定。威灵顿子爵说：“在中国不知道何时能够建立起有效稳定的中央政府，不知道它与 18 个省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依我所见，英国政府明智的做法是置身事外，不要使自己陷于任何不必要的麻烦中。……对于完成粤汉铁路，这个对两国皆有益的方案，我希望尽早拨款给这个方案。但是我建议应该推迟行动直到中国的政治形势较少混乱和动荡的时候。”<sup>②</sup>

1929 年 7 月，驻华公使蓝浦森在与中方代表会见时，中方代表表示他昨天已经与铁道部长孙科商量过，中国政府将作出保证将所有的购买材料的订单都放在英国，用于完成粤汉铁路建设，因为出于中国国内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原因都是有必要完成粤汉铁路的。<sup>③</sup>

1930 年英国议会通过、英国国王最终批准了《解决中英庚款换文》后，对“庚款”的管理和使用权基本上就由中国控制了。1930 年，中英两国就“庚款”问题在 9 月两次换文，最终达成了对该问题的解决。

两次换文的主要内容：第一，“庚款”经英国议会通过后即退还中国；第二，该款大部分投资于铁路修建及其他生产事业上，所得余利用于教育事业；第三，由中国任命组织一中英“庚款”委员会，分配及管理该款；第四，投资修建铁路及其他生产事业上，应向英国购买材料；第五，在伦敦组织购料委员会，由中国驻英大使任主席，铁道部代表及英国外交部推荐殷实有商业经验者，由中国政府谘商庚款委员会后，任命四人，合组而成；现在积储之赔款中，提二十六万五千磅交香港大学，提二十万磅交伦敦中国大学委员会，以其利息办理中英文化活动。<sup>④</sup>

1930 年 12 月 12 日，英国外交部向议会提出新“庚款”用途法案。1931 年 1 月 22 日二审后，经过一些讨论修改，2 月 19 日在议会下院通过，3 月 5 日在上院通过，同日英国国王批准了该法案。最后通过的法案与 1926 年调查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也相差甚远，原来建议直接用于教育文化及医学教育方面的用途都被废除，现在规定“庚款”直接用于中国铁路建设和其他生产事业上，投资实业所获得的余利才能用于两国文化教育方面。这种巨大的变动是与 1925 年、特

---

① BDFA,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Vol. 37, China, p. 199.

② BDFA,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Vol. 31, China, p. 35.

③ BDFA,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Vol. 37, China, p. 50.

④ 参考中华民国外交部编：《解决中英庚款换文》，中华民国十九年九月，第 1 到 22 页。

别是 1926 年以来中国英国两国局势的重大变动密不可分的，中英两国都迫切希望将“庚款”用于中国国内铁路建设上。

1931 年 3 月国民政府召开会议决定拨用“庚款”保息原则：凡拨用“庚款”事业，照五厘认息，本身非生利者，由国库负担利息。暂时不生利者，由国库垫付。本身生利者，由本身负担。<sup>①</sup> 以此来保证息金的固定来源。1931 年 4 月根据《解决中英庚款换文》设置了“中英庚款董事会”，由 15 名董事组成，其中 10 人为中方代表，5 人为英方代表，任期 3 年，朱家骅为董事长。

英国“庚款”从 1912 年首先提出退还，到 1930 年 9 月《解决中英庚款换文》的签订，即中英“庚款”退赔问题的最终解决，历时达 18 年之久。这与其他国家“庚款”的退赔过程和时间相比，英国“庚款”退赔的时间最长，历程也最曲折。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英国把退赔“庚款”作为调整和改善中英外交关系的重要手段，特别是英国把退赔“庚款”作为维护和扩大其在华利益的重要手段。同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还与英国政府在国内外形势的压力之下，被迫走上向中国退还“庚款”有关。正是这种被迫和不情愿，所以英国政府在退赔的过程中，才千方百计地保留对“庚款”的控制和管理权限，希望能够利用在名义上向中国退还“庚款”，来达到最大程度地维护和保障英国在华利益的目的，达到政治外交和经济外交一样的维护和保障英国在华利益的目的。

总之，英国之所以以“庚款”为外交手段，来改善英中两国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内外的各种压力，在被迫之下做出的选择，其目的是为了以这样的让步，来换取英国在华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保护，以这样的形式为外交手段，来达到其整体外交政策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目的，所以，英国政府在向中国退还“庚款”的过程中，对“庚款”的用途和控制权，即对“庚款”的主权企图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更好地达到维护和发展英国在华利益的目的。但是在中国人民的斗争下，最后不得不把“庚款”退还中国，用于中国的建设和文化事业。英国“庚款”退赔的曲折历程，反映了英国对华让步政策的变化和逐步调整过程。

## 二、“九一八”事变后英国的对华政策

在 20 世纪 20 年代，由于英国国力的衰退，特别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斗争，英国不得不改变其对华政策，从炮舰政策改变为退让政策。但是这种退让，仍然是殖民主义政策的继续。英国在华仍然推行殖民主义政策，拒不废除不平等条约，在华仍然保持驻军等。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确保在华利益，英国采取了牺牲中国的政策。为此，英国采取了对日的绥靖政策，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来满足日本的侵略野心，达到以日本妥协的目的。英国的对华政策从对华退让政策，又发展到对日绥靖政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政府采取了依赖国联解决问题的政策。9 月 21 日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根据国联盟约第 11 条，把事变诉诸国联，要求国联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国联的主要领袖英国此时的态度十分关键，可是英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微乎其微：1929 年英国在上海的企业投资是 7 亿 3 千 7 百万美元，在香港的企业投资是 8 千 9 百万美元，两者合计占 82.9%；在中国其他各处的企业投资，总共为 1 亿 3 千 6 百万美元，仅占 14.1%，至于英国在东北所占的份额很少。所以，英国面对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觉得与己无关，并且此时英国政府正在为应付 1929 年经济大危机下的各种新旧困难，如关税问题、德国赔款、印度骚乱等忙得不

---

<sup>①</sup> 王树槐：《庚子赔款》，第 474 页。



可开交，对事变毫无准备，即使是在得知事变的消息后，英国政府也并没有打算做出什么来阻止日本的侵略，维护国联盟约和《九国公约》的有效性，没有打算做出什么来维护一战后建立起来的远东殖民体系。

所以在英国这种消极态度面前，国联在9月30日，只是通过决议呼吁中日两国尽量避免局势的恶化，并没有提及日本撤兵的要求。日本对国联和英国的让步，报之以进一步的侵略。10月8日，日本轰炸了东北重要城市锦州，英国特别担心在京奉铁路上的利益受到损害。当时，英国在京奉铁路和大连海关的经济利益大约为100万英镑。<sup>①</sup>在次日，英国外交大臣雷丁（Reading）指示驻日大使林德利（F. Lindley）：“我被轰炸锦州的报道搞得心烦意乱……请你提醒日本注意英国在京奉铁路线上的巨大经济利益。”<sup>②</sup>但是英国没有考虑使用武力。10月24日在英国的领导下，国联通过决议要求日本军队在11月16日以前撤退到南满铁路区域之内，决议并没有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因此英国政府的态度是软弱的。

在“九一八”事变期间，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是维持现状，虽然强调和提倡维护中国领土的完整，但是对中国提出制裁日本的要求不予支持，反而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更不顾中国的反对，使日本在中国东北获得了所谓的“匪贼讨伐权”。这就给日本以后在中国东北地区开展新的军事侵略提供了“合法”的借口，也使日本对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提出的不承认主义予以拒绝，没有与美国一起向日本联合施以压力。所以这一切都使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更加有恃无恐。日本后来能够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所谓的“满洲国”与英国政府的这种不作为直接相关。

英国的报纸，对“九一八”事变的报道，更充满了绥靖政策的语调。在英国众多报纸中，《泰晤士报》是最有影响的报纸，其作用尤其突出，素有官方喉舌之称。虽然它宣称自己一直秉承“独立地、客观地报道事实”、“报道发展中的历史”这样的宗旨，但是该报的政治倾向基本上是保守的，在历史上历次重大国内和国际事务中支持英国政府的观点。

《泰晤士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两任主编，杰弗里·道森（Geoffrey. Dawson）（1923—1941年在任）和罗伯特·巴林顿·沃德（Robin. Barrington. Ward）（1941—1948年在任），是英国两个有名的绥靖主义分子，支持以张伯伦为首的保守党政府的绥靖政策。这两个人虽然不是政府高官，但是他们却可以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利用他们同政府要员之间的密切关系，对英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起到出谋划策的作用。如道森与张伯伦首相的关系非同一般，英国历史学家瓦特认为：道森不是张伯伦的“工具”，而是他的“谋士”<sup>③</sup>，两人之间是“参谋与司令官的关系”，大量的观点看法“来自道森，而不是传给他”<sup>④</sup>。道森和沃德更利用他们手中的《泰晤士报》这个重要的宣传工具，为英国政府不同时期的不同政策制造舆论。

《泰晤士报》对“九一八”这个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故意制造的入侵中国事件的报道，颠倒黑白，认为事变的主要责任在张学良一方：“他的政府造成货币贬值，并榨干了百姓的血汗，使得这片对于土地经营者来说，本应是一片沃土的土地，变成了束缚奴隶的土地，从中得益的只是那些军事冒险者。”<sup>⑤</sup>而事变爆发后，中国普通民众，尤其是学生组织的各种抗议活动以及在全社

---

① F. S. Northedge, *The Troubled Giant*, New York, 1967, p. 356.

② *DBFA*, Second Series, Vol. VIII, p. 733.

③ D. D. Watt, *Personalities and Policies*, London, 1965 p. 163.

④ D. D. Watt, *Personalities and Policies*, London, 1965, p. 12.

⑤ *The Manchurian Crisis*, *The Times*, 1931-11-21 (11).

会范围内掀起的排斥日货、敌视日人的浪潮，在《泰晤士报》看来，完全是一群无序的民众进行的野蛮行动，说中国孕育着危险的排外情绪，该报说中国民众“普遍的愤怒情绪在迅速积攒，随时有可能导致情况的进一步恶化”。该报对中国常驻国联代表提出向远东派遣军事调查委员会的方案，持反对态度。该报还流露出同情日本在中国东北“无序的”环境下的态度。<sup>①</sup>

“九一八”事变期间，《泰晤士报》在描述“中日军事冲突”时，确认日军对沈阳的袭击是一次有准备的军事行动，对日军屡次违反承诺的行为，该报的态度是予以谴责。但是该报并不认为日本的行动具有侵略的性质，而且指认中国军队的挑衅行为，也是导致日本采取行动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中国普通民众，尤其是学生组织的各种抗议活动，以及在全社会范围内掀起的排斥日货、敌视日本人的浪潮，在《泰晤士报》看来，完全是一群无秩序的民众进行的野蛮行动。因此，《泰晤士报》将日本的军事行动，看做是对中国军民的一种报复。

《泰晤士报》始终认为，当时中国国内秩序过于混乱，在中国无法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行使职权，对于外国签订的各项条约也无法完全履行，因此总体上对中国充满了不信任感。该报强调，在中国出现一个“有效率、有责任感的中国和地方政府是抵御日本的最好方法”。《泰晤士报》甚至认为满洲当地政府如果脱离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的冲突或许已经可以避免了。<sup>②</sup>这种言论，已经是在鼓吹东北独立了。

《泰晤士报》还认为张学良下令不抵抗是非常明智的，说他的军队尽管人数上占了优势，但战斗力极差，根本无法与日军交战。<sup>③</sup>《泰晤士报》虽然指出，日本的军事行动是一次冒险，事实上已经违反了《凯洛格公约》和国联盟约，但是中国民众“普遍的愤怒情绪在迅速酝酿，随时有可能导致情况的进一步恶化”，该报对中国常驻国联代表提出向远东派遣军事调查委员会的方案，持反对态度。<sup>④</sup>

但是在日军不断升级的军事行动面前，《泰晤士报》的评论，由最初对日军事行动的危险性不置可否，转而开始对这种态势表现出忧虑的情绪。这种忧虑矛头不仅指向日本军方，也指向了日本政府，但语气很软弱。该报一再指出，日本这样的行为是不必要的，它完全有理由因此而失去国际社会的同情。<sup>⑤</sup>在《泰晤士报》几乎全部社论中，作者即使是对日本军事行动有所不满，但对日本表现出来的也是一种相对平等甚至尊敬的态度，但是当分析中国当时的情况与事变之间的关系时，对中国表现得完全是一种谴责和蔑视的态度，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表现得十分明显。

英国希望看见中国的分裂。1932年1月11日，《泰晤士报》发表社论，称赞英国政府拒绝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该社论说，英国政府的行动是明智之举，声称：“捍卫中国的行政完整，在那个完整仅仅是一种理想的时候，似乎不是外交部当前的任务。中国的行政完整性在1922年就不曾存在过，在今天也不存在。自从九国公约签字以来，中国的中央政府，从来没有对这块巨大的领土实行过任何真正的管理……尽管她对满洲的主权无可争议，但是自从南京成为首都以来，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中央政府在这里行使过任何真正的管理。”<sup>⑥</sup>

---

① Manchuria and League, The Times, 1931-9-26 (11).

② The Occupation of China, The Times, 1932-1-4, (13).

③ Fighting in Manchurian, The Times, 1931-9-21 (13).

④ Manchuria and League, The Times, 1931-9-26 (11).

⑤ The Trouble in Manchuria, The Times, 1931-10-21 (15).

⑥ I.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1940, p. 25.

《泰晤士报》甚至在一篇报道中，指出如果中国东北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可能对英国的经济利益更有好处。报道说日本在从俄国人那里夺得东北后，当中国一直“挣扎在内战中时，由它控制的南满、安奉铁路以及辽东半岛的财富却一直在增长”<sup>①</sup>。对日本取得这样的建设成就，英国感到非常钦佩。

《泰晤士报》对事变发生后，中国政府通过利用国联来解决中日问题的策略，《泰晤士报》警告中国说：“行政院提倡和平，根本不意味着它对刺激性的政策抱以同情的态度，中国政府近年来是过于经常地陶醉于这种政策的。”27日的社论中又指出：“国联应该正视这样的情况，即日本现在根本不可能撤兵的现实，如果国联实行强制措施，使日本不能够体面地解决问题，必定会带来日本与国联的正面冲突。”<sup>②</sup>

1931年11月14日，《泰晤士报》更评论说，国联调解中日冲突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是存在问题的。《泰晤士报》说：“国联从一开始就使自己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当事变发生，国联面临这一问题时，国联没有考虑该事件的对与错，没有试图弄清楚到底有什么不满的行为，会刺激着日本占领沈阳。”<sup>③</sup>

其他英国国内新闻媒体也积极宣传英国政府的绥靖政策，如代表着英国在华商业利益的《华北先驱导报》，1932年1月12日在一篇报道“九一八”事变的文章中说，“九一八”事变的原因归结为中国统治的混乱，而且将国联的作用定义为开导日本，最终劝告日本向国联和英国做出不再扩大对中国侵略并维持与英国友好的保证。这篇文章说：

“当中国的领土完整被内部的行政管理的缺陷威胁时，将会对九国公约签字国所担负的责任带来危害。如果承认满洲军队在这方面有明确的这样的作用，那么日本的宣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明智的……但是在满洲地区异常混乱的统治，货币的极度贬值，无穷的赋税等更加剧了政府的不负责任。”“……考虑到中国的情形，英法乐于相信日本会在适当的时间向他们做出保证。国联的作用就体现在这里，国联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开导者。……英国承认日本10月13日在国联中所叙述的情况。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英国在向日本传达着一种友好的暗示。……相信这种暗示会被日本所领会。”<sup>④</sup>英国其他报纸，如《曼彻斯特导报》和《新闻纪事报》等英国报纸，也毫不例外地支持英国政府的政策。但是它们在反对中国通过国联解决中日冲突的办法的同时，也对日本进一步扩大冲突、危及英国这个在国联中的领袖国的在华利益深深担忧。而这种一定程度上相反的论调，无疑更刺激了日本对完全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的胃口。

这一时期英国的对日政策，不但是妥协政策，而且是缺乏远见的：虽然从暂时来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没有表现为英国在华实际利益的损失，但是却对国联盟约和《九国公约》等一系列条约架构起来的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整个远东秩序，公开起到了破坏作用。英国也没有看到这种破坏，将损害英国在世界和远东政治利益和国际地位，损害英国在华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

由于没有看到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将给英国带来各种明显的、潜在的损害和威胁，各报纸媒

---

① Dispute over Manchuria, The Times, 1931-10-29 (11).

② I.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1940, p. 25.

③ I.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1940, p. 25.

④ I.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1940, p. 26.

体就都普遍主张对日和解，反对中国诉诸国联谴责日本侵略，制止日本侵略的正当做法。因此英国媒体对日本侵略中国，表现出明显的“扶日抑华”倾向。但是随着日本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和占领，对英国在华地位和利益构成了巨大威胁。于是英国对地政策，出现了短暂的强硬态度。

1932年1月28日，日本对英国在华利益最集中的上海发动了进攻。上海是欧美列强在中国利益最集中的地方，也是英国在中国利益最集中的地方。1929年英国在上海的企业投资为7亿3千7百40万美元，约占其在华企业投资的72.6%。<sup>①</sup>英国怡和纺织厂有限公司在上海地区有三家纺织厂，英、美烟草公司和大英烟公司在上海也设有卷烟厂；英国人在上海投资的公用事业也很多，如上海自来水公司、上海制造电气公司、中国公共汽车公司等；英国在上海还大量投资不动产，有许多英商地产公司，如规模最大的一个是上海业广公司；此外英国在上海地区投资的工业还有水泥厂、制药厂、榨油厂、面粉厂、印刷厂，等等。在上海还聚集了大量的英国人，1930年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人为9331人，而同年英国在华人口的总数为13015人。<sup>②</sup>

因此日本对上海的进攻，直接威胁到了英国在华利益，使英国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担心日本用武力把自己的利益从上海市场赶出去。因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在华贸易就受到了来自日本的严峻挑战。1913年英国对华贸易占中国国际贸易总额的11.4%，而1930年仅占7.8%。<sup>③</sup>英国对华贸易的跌落，日本的竞争是众所公认的一个原因。1930年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为17亿4800万日元，上海约为24.6%。<sup>④</sup>虽然东北仍是日本在华投资最多的地区，但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到1931年，日本在上海的企业投资，比在东北的投资发展要迅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纺织业对英国纺织业竞争中不断取得进展的结果。如1900年至1913年，英国占世界棉织物出口贸易总额的60%~65%，日本不到3%。1929年英国减至45%，而日本增至17%。1913年英国对中国和香港的出口，四倍于日本出口的价值，但1930年仅占日本出口价值的六分之一而已。<sup>⑤</sup>

在经济战场上，日本已经在向英国步步紧逼，在与英国争夺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并且不断取得胜利。现在，日本又要举起手中的武器来逼迫英国退出上海，退出中国这个英国已经经营了近一个世纪的市场。这对在世界贸易中正在不断走下坡路的英国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对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国的统治来说，上海市场的失去，中国市场的失去，会产生连锁反应，带来不可想象的严重后果。

正如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官员普拉特分析的那样：“如果日本继续得不到控制，英国将必定会从远东完全撤退……而英国从远东的撤退，很可能是从印度撤退的先奏。”<sup>⑥</sup>所以英国政府面对“一二八事变”采取了与“九一八”时期不同的政策，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并且希望能够与美国合作，迫使日本停止侵略行动。“一二八”事变的第二天和第三天，英国接连向日本提出严重的抗议，31日英国召开了有外交部、财政部和海军部参加的会议，讨论上海形势以及向上海地区

---

① 雷麦：《外人在华投资》，蒋学楷、赵康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95页。

② 雷麦：《外人在华投资》，蒋学楷、赵康书译，第271~272页。

③ 雷麦：《外人在华投资》，蒋学楷、赵康书译，第272页。

④ 雷麦：《外人在华投资》，蒋学楷、赵康书译，第352~353页。

⑤ 雷麦：《外人在华投资》，蒋学楷、赵康书译，第275页。

⑥ DBFA, Second Series, Vol. IX, p. 281.



派遣军舰问题。

1932年1月29日,《泰晤士报》发表社论,指出英国应该像1927年那样,向上海派出军队保卫租界区,“日本采取的措施无疑刺激了对日本人的攻击和对日本商品的抵制。一些大国在最近就采用了类似的行动。1927年英国政府在与其它一些国家商议后,向上海地区派出了一支强大的远征队保卫英国在那里的租界的安全……英国政府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无力保证英国在华居民的安全时,有权派出军队。”<sup>①</sup>这个论调与“九一八”时期对日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九一八”事变时的英国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的无序和无能导致了日本军事力量进入中国东北。

1月30日,日军轰炸上海闸北。这天,《泰晤士报》又发表评论,进一步指出在上海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必要,指出国际力量首先要防止中国政府采取莽撞的行动,刺激日本,造成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和日本对中国沿海地区的军事封锁。“在现在的远东形势面前,如果要想恢复上海地区的秩序,防止人员和财产的进一步损失,需要采取一种更有力的国际联合行动。首要的是防止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发展到正式的战争阶段。南京国民政府愚蠢的反抗,可能会为日本封锁整个中国沿海提供充分的理由。而这对外国租界区,尤其是对上海这个最大的商贸中心来说,产生的打击是致命的。必须要坚决保卫上海外国租界区……国联……拥有关注国际政策的便利机构,通过国联可以实现这种目的。”<sup>②</sup>

但是,日本此时进攻上海的目的,还不是为了驱逐英国在上海的利益,日本进攻上海的目的是为了达到转移国际视线,加紧使中国东北脱离中国,落入日本手中。所以,日本在进攻上海的同时,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外交工作上,试图通过外交努力,确保将所谓“满洲事变”和“上海事变”分开解决。而英国为了保住自己在上海的利益,不顾美国的反对,在1932年2月15日召开的内阁远东委员会会议上,明确制定了放弃满洲以保上海的政策。

所以英国政府在“一二八”事变期间的强硬政策只是短暂的,是因为担心上海地区的英国经济利益面临直接的日本侵略威胁而做出的短暂的、强硬的表示。这时候的日本还没有做好大规模开展在华军事行动的准备,日本在上海的突然军事行动完全是为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占领而虚晃的一枪,是为了达到吓唬住英国,使英国在东北问题上做出有利于日本的安排。实际上,日本是要通过在上海地区制造事端,达到自己的目的。

英国的这种态度,正合日本心意。因此,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直到“卢沟桥事变”前,这中间将近6年的时间,日本的侵略并没有在中国东北地区止步。由于英国的对日政策一直是绥靖政策,日本就一方面利用这段时间,巩固自己在东北的侵略果实,成立了所谓的“满洲国”;另一方面在世界市场范围内开展了与英国的贸易战。从1930年到1932年,日本从印度、埃及、澳大利亚、西非及荷属东印度共获利1亿2千5百万日元,其中从英帝国获利9千1百万日元。<sup>③</sup>在英日贸易战中,日本大获全胜。这使得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更加认为在中国的军事行动是正当的,是值得的,要求进一步向中国华北地区进行扩张。

1933年日军开始大举进攻热河,日本在中国的势力已经威胁到长城脚下,这直接威胁到了

---

① I.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1940, pp. 28-29.

② I.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1940, p. 29

③ Louis, Wm. Roger., *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 1919-1939*, Oxford, 1971, p. 220.

英国在中国华北地区的利益，如英国控制的开滦煤矿和门头沟煤矿等，英国在开滦煤矿投资截止到1930年有100万英镑，还有债券79万英镑，在门头沟煤矿的投资有50万两白银。<sup>①</sup>因此英国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1933年1月16日，英国驻日大使林德利在接到外交大臣西蒙（John. Simon）的指示后，向日本侵略热河提出了严重的抗议。他对日本外长说，目前长城以南危急的局势，将会影响到英国在中国的利益。1月21日，林德利致电西蒙，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作为驻日大使，我的一个最急切的任务就是利用驻日大使的影响，阻止日本军队对热河的进攻。……日本占领热河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它可能会以此为借口攻击、进而占领英国不同意日本占领的中国领土。……我要严正劝告日本外长，向他说明英国一定会尽一切力量阻止日本进攻热河。”<sup>②</sup>

他还进一步分析了日本进攻热河的严重后果，说日本在热河并没有什么特殊利益，日本占领热河将它归属到“满洲国”境内，这个行为是对中国权益的严重侵犯，也是对相关在华有利益大国权益的严重侵犯。还说：“日军占领热河那将是一个连锁的反应，日本一旦占领热河，接着的将是它对北平的占领，实际上日本的这种行为将是无止境的……日本会借此一步步侵占中国的领土，这将会把国联特别是英国放在一种特别难堪的境地。”<sup>③</sup>

但是，英国外交部对日本的步步侵略和威胁的这种表示，仍然采取了绥靖的态度。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官员普拉特（John. Pratt），非常担心日本的报复。普拉特在1898年到1924年间在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工作长达26年时间，1925年回国后在外交部远东司任职，对中国一向比较友好。但是他很担心英国态度强硬会遭到日本的报复，他说：“如果英国对华政策导致日本对英仇视，中国会趁机利用英日之间的矛盾，这样就会造成英国在华公民和商业利益保障的困难。”“而如果英国一旦加入对日本制裁的行列，日本肯定会占领香港、上海英租界区以及英国在中国的一切租界区，英国公民将会被日军从中国驱逐出去，他们在华投资利益将会不复存在，那时的英国是不会有力量反击日本的。……英国在华利益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于中国，而更多的是来自于日本。”<sup>④</sup>

普拉特同时认为英国保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也是相当重要的，他说：“中国对英国的重要性不是依靠金钱来衡量的，而是与英国国家荣誉和权威等这样不可估量的东西来体现的。如果英国要保持她在远东的地位和威望，就必须与中国保持友好的关系，这也是英国未来的对华政策……同时，英国对华同情政策必须要以实际行动来体现出来。虽然英国要尽可能地对日本友好，但是英国在远东的政策不能仅仅限于与日本的关系。……英国还要与美国在这方面协调一致。”在他看来，尽管英中友好，意味着“英国对华应该抱有同情之感情，但同时应该清楚两国的友谊，并不意味着牺牲英国必要的利益或者免除中国自己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应当适当地承担的责

---

① Louis, Wm. Roger. , *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 1919-1939, Oxford, 1971, p. 220.

② *BDFA*,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Vol. 41, China, pp. 302-303.

③ *BDFA*,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Vol. 41, China, p. 364

④ *BDFA*,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Vol. 42, China, pp. 272-276.

任”。普拉特的言下之意是，英国不应该从单纯的英中友好关系出发，实行某些可能会使英日之间关系紧张并有害于英国在华利益的措施。无论什么情况下，英国的利益和地位，尤其是目前的英国利益和地位才是至关重要的。<sup>①</sup>

至于英国政府其他各部门，如财政部等更是在对日本的侵略问题上，倾向于与日本和解，财政部仍将经济复苏放在了工作的首位。因此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英国政府对中国的侵略是克制忍让的。

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官员天羽英二对记者发表了一个声明。在声明中他声称，日本决心完成维持东亚和平和秩序的使命；如果中国采取依靠其他国家反对日本的政策，那将遭到日本的反对；如果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或技术上的援助，也将遭到日本的反对。很明显，《天羽声明》实际上就是一份亚洲的《门罗宣言》，是日本独占中国企图的表白。

英国政府对天羽声明保持着克制态度，英国人认为：“对日本最新的举动，没有听到对日本对华政策的谴责……这是希望仍与旧盟国日本保持友好关系，希望由日本帮助在中国实现和平和秩序。”<sup>②</sup>英国的态度，反映出英国政府希望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的强烈愿望，只要日本对中国的政策和对海军军备条约的态度，没有迫使英国的政策彻底改变，英国就不会反对日本，听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天羽声明》发表后，日本开始了对中国华北地区的肆意渗透。日本先是策动了“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张北事件”等，迫使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央军队的势力撤出华北地区，只留下了一些地方军事力量，方便了日本对他们的分化瓦解。接着，日本在华北五省扶植傀儡政权，逼迫国民党政府承认了日本在华北的“指导地位”。日本在对华北的政治扩张过程中，还伴随着对华北的经济侵略。

日本对于华北的经济侵略是以“经济提携”的形式进行的。所谓提携，就是日本供给工业品，中国供给原料，即推行“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分工制度。日本打着“提携”的口号，大肆掠夺华北的铁、煤、石油等工业资源。对华北的棉花市场进行渗透，企图独占华北的所有棉花。日本在华北还凭借武力，进行大规模的走私活动，给中国财政收入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使华北地区的民族工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面对日本在华北地区的经济侵略和政治渗透，英国政府派出了以李滋罗斯（Leith-Ross, Frederick）为代表的考察团到中国，展开经济调查，帮助中国政府实行币制改革，稳定币制和经济。李滋罗斯在一开始，想实行以英国为主、日美合作联合对华贷款的形式，支持中国的币制改革，达到稳定中国币制，同时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的目的。他还考虑在与日本达成谅解的基础上，把日本的势力限制在长城以北。

但是李滋罗斯的方案遭到了美国的婉拒，当然也遭到了日本的彻底拒绝。李滋罗斯的方案，根本就是脱离当时的现实的。当时的日本，正在加紧对华北地区的扩张和渗透，因此任何增强中国政府经济实力，扩大英国在华影响的方案都是日本所不允许的。不过，李滋罗斯在中国将近一

---

<sup>①</sup> BDFA,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Vol. 42, China, pp. 272-276.

<sup>②</sup> I.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1940, pp. 46-47.

年的时间，从1935年9月到1936年6月，耳闻目睹了日本对中国华北的侵略给英国利益所造成的威胁，于是建议英国政府迅速采取措施，遏制日本的侵略。他说：“英、美烟草公司正处于大力发展之际，但是因为害怕自治政权，已经决定不往内地作进一步的发展。……开滦矿务局也认为，自治政权会干扰他们的特许权并课征新税。……英国政府完全有理由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阻止华北各省的分裂，这种分裂显然会严重损害英国的重要商业利益。”<sup>①</sup>

英国新任外交大臣贺尔（S. Hoare），1935年12月5日在下院谈到华北局势时，对李滋罗斯的担忧，只是简单地表示“关心”和“焦虑”，而没有宣布将采取任何实际的措施，来反击日本在华北的侵略。<sup>②</sup>实际上，英国外交部对李滋罗斯的言论还产生了不满情绪，认为他的言论已经超出了其职权范围。如英国外交部一位官员认为，李滋罗斯的言论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而这对他来说是不合适的，“难道英国在中国有两个大使吗？”<sup>③</sup>12月12日英国外交部电告李滋罗斯，指示他说：“您应该保持克制的态度，避免任何可能不适当地引起日本疑虑的言论，这是非常重要的。”<sup>④</sup>

对日本在中国华北地区推行的经济侵略和政治扩张政策，英国采取容忍态度，并幻想英国能够与日本在经济方面进行合作，发展英国在华利益。如认为“英日之间政治上的合作可能不现实，但是双方可以在中国进行经济方面的合作”、“英日合作共同开发落后的世界市场”、“英国将是第一个承认日本的经济贡献有助于中国发展的国家。英国自己的义务可能阻止着双方政治上的合作，但是这不必妨碍双方经济上的合作，以保证远东的稳定”<sup>⑤</sup>。

有的英国人对日本在华北的经济计划表示了担忧，害怕日本会“将中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他们主张在绥靖日本的同时，采取比较强硬的对日政策。他们表示，只要日本保证中国的独立和西方国家在远东的利益，英国就将乐意让日本在世界贸易中“担负起合理责任，担负起中国重建的责任”。但是如果日本拒绝做出保证，英国和相关国家将会“采取共同的坚决的抵抗行动”<sup>⑥</sup>。

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英国一直不情愿地执行着对日绥靖政策。在日本压力下，1931年至1933年，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Lampson）企图要中国作出让步，促使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妥协，接着英国承认了日本的傀儡政权华北自治政府。但是日本并不满足，对英国不断进行挑衅。1937年夏天，日军飞机在南京至上海的公路上，还炸伤英国驻华大使许格森（Huggessen）。对此事件，英国仍然敢怒不敢言。英国的反应，仅限抗议为止。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在1938年后，还不断对日妥协。

英国政府的对日妥协，以牺牲中国换取其远东殖民地安宁的政策，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进一步降低了英国在华的威信。英国的妥协政策，还损害了英国的国际声望，影响了英国在华利

---

① DBFA, Second Series, Vol. XX, pp. 687-689.

② Stephen Lyon Endicott, *Diplomacy and Enterprise, British China Policy 1933-1937*,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75, p. 122.

③ DBFA, Second Series, Vol. XX, p. 690.

④ DBFA, Second Series, Vol. XX, p. 718.

⑤ I.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1940, pp. 57-58.

⑥ I.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p. 58.



益。当日本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时，英国对华政策开始了逐步的转变，从绥靖政策，向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政策转变。尽管这种转变是非常缓慢的，其间充满了曲折。但是 1937 年“七七”事变后，这一转变进程就已经开始了。

## 第二节 英国对“七七”事变的反应

### 一、英国政府对“七七”事变的态度

“七七”事变，是战时英国对华政策转变的起点。“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暴露无余。英国出于中国是“帝国防御的第一道防线”的考虑，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并且警告日本停止侵略。尽管这种警告，并不是激烈到要立即向日本宣战，但是却明确了英国反对日本扩大侵略的态度。随后，英国积极主动地充当起仲裁人的角色，竭力遏制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虽然在开始时，英国的态度还是软弱的，但是英国提出了对解决这一事变的底线，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英国政府也没有制定任何出卖中国来实现其对日妥协的计划，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已经危及英国在华利益。英国必须采取对华政策，确保英国在华利益。这就决定了英国不可能再实行传统的绥靖政策。英国对华政策开始变化。

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后，由于感到自己在中国的利益受到了巨大威胁，必须对日本加以遏制。因此英国政府做出了比“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迅速得多的反应，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英国政府立即对日本发出警告，要求日本停止行动。同时，英国积极主动地充当起仲裁人的角色，竭力遏制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英国政府不再隔岸观火。

英国政府内对“卢沟桥事变”的起因，存在各种不同的看法。英国政府中还有一些人认为，是中国引发了这起事变。这些看法和态度，是错误的和没有经过调查研究而发表的，有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在当时，英国与日本的关系仍然很好，许多英国政府官员，对日本的感情深厚，替日本开脱。例如当时的英国驻华使馆秘书郭万安在 1937 年 7 月 12 日时说：“在谈到中国方面认为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有意挑起的时候，我应该说明我的观点，即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当时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因病正在天津，大量的日本外交防卫人员在通州、多数参加演习的日本人员已经返回到丰台，要说谁先开的第一枪已不可能。”<sup>①</sup>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也认为：“我仍相信日本政府不是有意有计划地开始侵略的”<sup>②</sup>，“我绝不相信日本政府，会在此时会在中国愿意冒一场军事冒险”<sup>③</sup>。英国驻日使馆的临时代办多兹则说：“没有满意的证据向我们表明，卢沟桥事变上到底是谁开了第一枪。日本报界异口同声地说首先开火的是中国人。”<sup>④</sup>他还说：“日本向中国派出军队的原因，是为了保护日本在中国华北的安全和利益。”<sup>⑤</sup>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更认为：“这或许并不是日本有意挑起的事变，日本也不想把事态扩大化。”<sup>⑥</sup>

不过英国政府官员们也同时指出，这次事变是日本长期的侵华政策所导致的。这就从根本上说明了“卢沟桥事变”产生的原因。英国政府官员们都认为，日本长期以来在中国的渗透和侵

---

① BDFA, Part II, Series E, Asia, 1914-1939, Volume 45,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p. 40.

② BDFA, Part II, Series E, Asia, 1914-1939, p. 41.

③ BDFA, Part II, Series E, Asia, 1914-1939, p. 42.

④ BDFA, Part II, Series E, Asia, 1914-1939, p. 71.

⑤ BDFA, Part II, Series E, Asia, 1914-1939, pp. 74-75.

⑥ BDFA, Part II, Series E, Asia, 1914-1939, p. 53.

略行为是导致“卢沟桥事变”的重要原因。例如郭万安指出，日本人长期以来因为其行为早已为中国人所痛恨，所以发生这样的事变也是自然的。他说：“日本人很清楚北平城附近的日军演习部队为许多中国人所痛恨，那天晚上在政治局势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日本军队进行的演习只能被认为是很愚蠢的。”<sup>①</sup>多兹说：“局面的最终责任，应该更多的在日本方面。”<sup>②</sup>许阁森也认为：“中国方面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些想法也是无可厚非的。”<sup>③</sup>因此，从感情上说，他们是同情中国，而谴责日本的。

不仅如此，英国政府开始察觉到日本不愿再局限于独占中国的东北和华北，日本的目标在于征服和占领整个中国。这种情况，是英国所不愿看到的。英国驻华公使许阁森 29 日称：“目前的局势，的确是对 1931 年以来中日历史背景的反动，是日本为了占领和统治整个中国这样的目的而导致的局势日益严峻的结果。”<sup>④</sup> 0

尽管英国政府认识到了这次事变是日本蓄意挑起的。但出于自私自利的考虑，他们并不愿因此而与日本发生对抗，进而影响到英国的利益。同时他们还认为，由于欧洲形势的日益严峻，此时要在远东同日本进行直接的对抗也是不太现实的，只有努力推进双方和平解决冲突，才是上策。这充分暴露了英国对日政策的软弱。但是英国也公开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其绥靖政策在逐步变化。

首先，英国外交部明确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例如英国外交部认为，英国应该就此事件警告日本，特别是要警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已经危害到了英国在中国的安全和利益。因此英国政府公开谴责了日本的侵略行为，并要求日本采取行动结束冲突。

第二，事变发生后，英国政府多次警告日本的侵略行为。外交大臣艾登在 1937 年 7 月 13 日表示：“我已经警告日本大使：只要当前的局势继续下去，开始英日谈判是不可能的。”<sup>⑤</sup>他又于 7 月 20 日正告日本政府说：“日本政府认为中国政府的抵抗行动会很有限……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确实，中国政府渴望和平，但蒋介石也有一个他不能放弃的底线。”<sup>⑥</sup>

英国为了制定恰当的对日政策，需要征求欧洲国家的意见。1937 年 7 月 24 日，英国政府对德国进行试探性地询问，看德国是否有意在维持远东和平上有所作为。当然，英国不可能得到满意的答复。而这时苏联向英国暗示，苏联愿意与英国一起共同向日本施加压力。但英国外交部认为与苏联的联系和合作，只能是一种最后不得已的手段。英国强烈反对苏联在远东问题上的任何的干预，英国对苏联干预的恐惧，一方面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害怕共产主义在中国力量 and 影响，会随着苏联的介入发展起来，但是英国更担心的是苏联在远东影响的增加会威胁到英国的在华利益。<sup>⑦</sup>

但是英国更重视美国对日本的态度，英国希望与美国共同发表声明，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艾登在 7 月 20 日发表声明，希望得到美国的合作，他向美国建议两国共同声明：共同支持

---

① BDFA, Part II, Series E, Asia, 1914-1939, p. 40.

② BDFA, Part II, Series E, Asia, 1914-1939, p. 71.

③ BDFA, Part II, Series E, Asia, 1914-1939, p. 53.

④ BDFA, Part II, Series E, Asia, 1914-1939, p. 53.

⑤ BDFA, Part II, Series E, Asia, 1914-1939, p. 41.

⑥ BDFA, Part II, Series E, Asia, 1914-1939, p. 49.

⑦ Bradford A. Lee, *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3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21.

支持中国、日本军队暂停其在华的军事活动。但是，艾登的建议遭到了美国的拒绝，美国重申了美国希望与英国平行展开行动的立场。<sup>①</sup> 美国之所以拒绝艾登的建议，主要是出于策略考虑。在当时，美国还不愿与日本翻脸。而英国由于力量衰弱，其对日外交，不得不看美国的眼色。因此英国在7月21日，发表声明，公开宣称对“七七”事变，采取不介入的态度。

但美国对日态度日趋明朗。1937年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演说，明确指出，“七七”事变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他严厉谴责了日本是侵略国。罗斯福还说：“我们虽然正在采取措施，尽量减少卷入他国纠纷的危险，但是在这个国际信义和安全保障遭到破坏的无秩序的世界里，单纯采取漠不关心的超然态度，是无法彻底保证安全的。”<sup>②</sup>

罗斯福的演说，引起了世界的轰动。他的演说，被称为“隔离宣言”。这一宣言的要点，是强调美国不会无视日本在远东的扩展。这一宣言，也是美国政府对“七七”事变的态度和对日政策的基础。紧接着在第2天，美国国务院就发表了声明，断然认定日本违反了《九国公约》和《凯洛格非战公约》。日本外务省对此非常不满，日以情报部长发表谈话的形式，反击美国总统罗斯福10月5日的讲话。<sup>③</sup>

尽管英国发表了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不介入”宣言，但是在美国态度明朗的情况下，英国的对日政策日趋强硬。于是英国开始考虑到制止日本侵略的进一步发展。例如英国驻华公使许格森在7月31日致电哈里法克斯说：“应该特别关注的是，我们应尽可能防止1932年上海情形的重演。”<sup>④</sup>英国首相张伯伦也十分担忧日本的侵略行为，主张召开国际会议谋求中日停火的途径。但他反对国际社会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和军事制裁，因为他担心制裁可能导致日本对印度或香港进行报复，极大地危害到英帝国的根本利益。

第三，张伯伦曾拟定一个调解中日战争的和平方案。这个方案表明，英国并不存一个既定的“对日妥协，出卖中国”，以保全英国在华利益的计划。张伯伦计划的内容计分三点，即：一、日本于平、津留驻少数定额军队外，所有在华日军，尽数撤退，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状态。二、日本留驻华北等地特务机关完全撤销。……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对中国国民政府在卢沟桥事变以来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和具体行动，表示理解和同情；对中国国民政府对外寻求国际援助的行动，也表示理解和同情。<sup>⑤</sup>

7月16日，日军在卢沟桥附近再次向中国军队开火。同日，中国国民政府制定了它的第一个寻求国际援助的建议，中国国民政府向《九国公约》的签字国发出呼吁，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动已经破坏了中国的主权，违反了《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和《国联盟约》等。7月19日，中国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号召中国在军事上团结一致抵抗日本的侵略，不要使中国华北变成第二个“满州国”。

英国驻华大使许格森，曾经试图阻止蒋介石发表这样态度强硬的声明。但是许格森清醒地认识到，蒋介石作为中国国民政府的最高领袖，如果在日本入侵面前无所强硬行为和强硬态度表

---

① BDFA, Part II, Series E, Asia, 1914-1939, p. 49.

② [日]服部卓四朗著：张玉祥、赵宝辉译校：《大东亚战争全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页。

③ [日]服部卓四朗著：张玉祥、赵宝辉译校：《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9页。

④ BDFA, Part II, Series E, Asia, 1914-1939, p. 55.

⑤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 1840—1949》下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0页。

示，那么带来的将是蒋介石本人在政治上的自杀命运。因此，他事后表示同意蒋介石的声明。

7月21日，许格森应邀来见蒋介石，蒋介石说：“现在的局势，只有英、美两国努力从中设法，或可变为和缓，而东亚和平亦可维持。此意请即转达贵国政府。”<sup>①</sup>许格森非常重视蒋介石的要求，立即向英国政府作了报告。英国政府在接到许格森的加急电报后，立即采取了行动。外交大臣艾登立即约见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向日本提出忠告：“英国政府重视中日之间的和平解决。日本为了远东全局之利益，应该自我节制。东京似乎认为中国的抵抗不过嚷嚷而已，这种看法实则大错特错。我深知中国极愿和平，但蒋介石委员长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超过了限度，是不能再忍耐的。”<sup>②</sup>

开始时，英国政府对援助中国抗日的政策，仅限于口头，并没有采取官方行动对中国进行援助。但在卡尔继许格森之后任英国驻华大使后，情况有所改变。卡尔不断要求英国政府改变其远东政策，用物质力量，支持中国的抗战。当然他的考虑，也是从维护英国在华利益出发。他说：“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既是为他们自己而战，也是为我们而战，因为只有日本人的失败，才能把我们从危及我们在远东的地位中解放出来。”<sup>③</sup>

他的看法，得到英国外交部一些官员的支持。1938年5月31日，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向英国内阁提出了一份名为《关于中国请求援助的备忘录》，要求英国内阁批准援助中国。该备忘录写道：“关于荣誉和自身利益的每一种考虑，都敦促我们尽我们所能去帮助中国。花费一笔数额非常有限的金钱，我们也许可能因此而保存我们在远东的至关重要的利益。”<sup>④</sup>但是由于财政大臣西蒙和首相张伯伦等人担心援华抗日会恶化与日本的关系，英国内阁并没有批准这份备忘录。不过张伯伦并不反对援助中国，张伯伦7月26日在英国下院发表讲话，表示尽管英国当时不准备向中国提供贷款，但它将考虑其他的援华方式。<sup>⑤</sup>

因此英国政府不反对私人企业对华武器的出售。例如7月25日中日两国军队，在平津铁路沿线发生了一系列的军事冲突，中国严重失利。随后的几天内，日本军队完全控制了华北的两个重要城市北平和天津。7月28日对中国大使再次提出的要求英国军事援华问题，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回答：“英国本身的需求非常大，可是武器的生产和供应却十分有限”，“英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英国私人公司对华出售武器”。<sup>⑥</sup>

这就可以看出，“七七”事变爆发后，中英关系进入了一个更为复杂多变的阶段。英国作为一个西方列强在华利益最多的国家，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反对日本独占中国，始终坚持支持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统一这一基本点。但是另一方面，又力求保持与日本的关系，以保全英国在华投资的权益，保全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全部利益。这样的双重目的，在日本侵略中国的背景下，必然是具有矛盾和冲突性的。所以它使得英国政府从英国的总体利益出发，对日本的侵华活动既有抵制、冲突的一面，又有一定的软弱之处；对中国是既有同情、理解，但同时又有一些消极成

---

① “中央日报译”印：《蒋总统秘录》，第十一册，台北：1984年版，第68、69页。

② “中央日报译”印：《蒋总统秘录》，第十一册，台北：第68、69页。

③ 《英国外交文件》，第2辑第21卷，第762页~763页，转引自陶文钊 杨奎松 王建朗：《中国对外关系》，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书名、卷数及页码）。

④ 《英国外交文件》，第2辑第21卷，第143页。

⑤ 《英国外交文件》，第2辑第21卷，第143页。

⑥ BDFA, Part II, Series E, Asia, 1914-1939, p. 53.



分。但总的来说，英国的态度与“九一八”事变时期相比，对日本更多了些强硬和抵制的成分，对中国则多了些同情和支持的成分。英国对中日战争的基本政策是策划尽早结束冲突，力求将战争给英国在华利益带来的损害减少到最低限度。

同时英国主张通过国际努力，特别是依靠美国来遏制日本对华侵略。艾登在7月30日与中国大使会晤时说，关于中国国民政府将中日冲突问题诉诸国联，“这完全是一件关系到中国政府必须自己做主的事情……中国政府如果期望国联能够有些有效行动，这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政府是否愿意与国联合作。可是关于美国的态度，英国现在还不清楚”<sup>①</sup>。对中国大使认为中国政府利用《九国公约》捍卫自己的权益、解决中日冲突比诉诸于国联更有效，艾登回答说“如果政府想利用《九国公约》来解决中日冲突，但最好应该在通过外交谈判打好前提的情况下，这样做是十分必要的。”<sup>②</sup>

在寻求美国的合作问题上，英国虽屡遭冷眼，仍然不断向美国频送秋波。7月28日，艾登再次约见美国驻英大使宾厄姆，重申了其7月20日向美国提出的要求，并进一步建议：由英、美倡议中日双方和平谈判，并齐心协力解决谈判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然而，美国对英国的计划看来毫无兴趣，始终采取规避、拖延的办法不予答复，这实际上等于拒绝了英国的请求。<sup>③</sup>

在遏制日本、解决中日冲突问题上，美国为什么没有英国那么积极？美国为什么多次回避英国的要求，而采取“不干涉”政策呢？这主要是因为此时的美国正笼罩在孤立主义情绪之下。孤立主义者竭力反对与欧洲的合作，更不愿卷入美洲之外的一切争端，要求严格将国家的利益局限于西半球，反对国家卷入远东的争端。因此英国虽然同期中国，但没有采取官方行动援助中国。不过英国对华政策在逐步转变，开始不断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英国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

## 二、英国舆论对“七七”事变的看法

“七七”事变爆发后，英国舆论界经过短期的混乱后，开始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开始时，一些报纸的报道和论述，是在为日本北平地区开展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这些报道居然说，日本向中国派出军舰，是保护日本人生命财产的正常措施。一些报纸对该事变演变为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性，则估计不足。它们希望事变能够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地方化处理。如《华北先驱报》等报纸甚至认为，“卢沟桥事变”两周后，中日之间就会达成和平协议。<sup>④</sup>《泰晤士报》报社论，甚至认为“七七”事变爆发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军队的失误。说中国军队错误地把日军的演习，当成了真正的军事进攻，导致了“卢沟桥事变”的发生。<sup>⑤</sup>

但是这种情况很快有了改变，英国各报开始谴责日本侵略中国。《泰晤士报》对事变爆发原因的看法，开始改变改变。该报在后来的一篇社论中，将事变的起因，归结为日本低级军官和士兵的鲁莽。<sup>⑥</sup>7月10日，《泰晤士报》再次强调，日军不断在中国军队面前进行军事演习，是导致

---

① BDFA, Part II, Series E, Asia, 1914-1939, p. 54.

② BDFA, Part II, Series E, Asia, 1914-1939, p. 54.

③ BDFA, Part II, Series E, Asia, 1914-1939, p. 96.

④ I.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1940, p.

⑤ Fighting Near Peking, The Times, 1937-7-9 (15).

⑥ Fighting Near Peking, The Times, 1937-7-9 (15).

摩擦的原因所在。<sup>①</sup>7月17日的报道中，记者对日本不断向华北增兵感到不满，并且明确指出日军在华北的兵力已经超员。<sup>②</sup>

而《曼彻斯特导报》对“卢沟桥事变”原因的分析更加深刻，7月13日该报发表社论，指责“日本军阀之行动为一种藉口，藉以蓄意滋事，其言曰：北平附近之事端，初无重要可言，今乃引起此次中日纠纷，然即令酿成战争，此种事端亦不过一种口实而已，初非真正之原因也”<sup>③</sup>。这是从“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英国各家报纸中首次对事变发生的深层原因进行的分析。《曼彻斯特导报》是属于英国自由党所办的一份报纸，其对日态度更强硬一些。

当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卢沟桥时，中国守军奋起抵抗，记者在报道中用了一些比如“勇猛”这样的正面词汇，来形容中国守军。《泰晤士报》同时告诫日本，应该避免采取大规模侵略行动。对于中日之间可能爆发的大规模战争，评论员说：“日军或许可以取胜，但是永远无法征服。在华北的胜利，可能仅仅意味着繁重的财政和兵役负担，而且也不会提高日本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只会使日本陷入到中国开展的大规模经济抵制活动的浪潮中。”<sup>④</sup>

到了7月底，英国舆论界要求对日实行强硬政策的声音日渐强烈。它们认为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是一场冒险，最后必定是以失败而宣告结束。7月22日，《泰晤士报》指出：“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日本与中国开战，最好的事情，唯一好的事情——对日本将要发生的事情，是它肯定会被中国军队打败：这是不可想象的。……简单来说，不存在战略和政治上的或经济上的目的，这是一场在华北地区的军事冒险。”<sup>⑤</sup>

在7月27日军即将发动全面进攻夺取平津时，《泰晤士报》以警告的口吻说“中国通常是不希望战争的，当前形势发展的结果，取决于日方是否执意要挑起事端”，并认为日本很难通过这种极端的行为获得益处。<sup>⑥</sup>

《泰晤士报》在7月29日刊登的一篇总结性文章中，将此次事变，定位为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该报认为，军事形势已经超出常规，日本在中国一个省就驻扎了装备精良的7000人的大部队，这已经清楚地表明日本对中国抱有经济上和领土上的野心。<sup>⑦</sup>6月6日，《泰晤士报》评论说：“现在似乎能确定的是华北局势不可能再恢复了……但日本可能需要以极大的军事力量，才能保住日本的地位。……日本是错误的，如果它认为自己在上个月的军事行动以及它所计划的惩罚性政策，已经令世界对它的不负责任印象深刻的话，那么日本就错了。”<sup>⑧</sup>

日本在增兵华北地区、侵占平津的同时，图谋在上海发动攻势，以迅速占领上海，进而威逼南京，迫使国民党政府完全的屈服。所以在1937年8月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八一三”事变爆发。“八一三”事变后，英国报界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谴责，就不断增多。

英国在中国的主要利益集中在长江流域特别是在上海地区。据统计，截止到1937年英国在

---

① North China Clash, The Times, 1937-7-10 (11).

② Peace Hopes in Tokyo, The Times, 1937-7-17 (12).

③ 《抗战以来欧美同情我国之言论与行动》，《扫荡报》，1938-12-31 (2)。

④ The Far East in Arms, The Times, 1937-7-14 (15).

⑤ I.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1940, p. 94.

⑥ More Fighting in China. The Times, 1937-7-27 (13).

⑦ The Issues in China, The Times, 1937-7-29 (15).

⑧ I.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1940, p. 94.

上海的直接投资达到1亿8千万英镑，相当于在华全部投资的72%。<sup>①</sup>因此，英国政府对上海地区事态的发展极为关注，英国外交部在“八一三”事变发生的当日就召开了有外交部、海军部和陆军部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研究保护上海的英国人和外国人问题。15日英国外交部指示驻日代办多兹（Dodds），向日本指出日本应当对中日军事冲突负责，并极力要求日本撤退其登陆部队。<sup>②</sup>16日和18日英国外交部又两次向日本提出解决上海事变的方案，要求中日两国军队同时从上海地区撤退，上海地区实行中立化，由英、美、法三国负责保卫中国人、日本和其他国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日本进攻上海直接对英国在华巨大利益产生了威胁，这次日本对上海的进攻不是像在1931年时那样掩人耳目，目的是为了占领中国东北。这次日本进攻上海的目的是为了逼迫中国政府向日本投降，征服全中国。所以，面对日本的疯狂扩张气焰，英国报界出现了更加强硬的声音。8月20日《泰晤士报》警告日本称：“现在是时候了，应该让日本了解它在东亚自由行动的要求，绝对不能包括肆意地破坏英国的利益。”<sup>③</sup>英国报界对日本在上海展开军事行动坚持反对的态度，认为这将会对英国在华利益产生严重的威胁。9月25日在《政治家和国家》杂志上，曾经为英国共产党党员的弗雷达·阿特丽（Freda. Uttley）发表文章，呼吁对日本实行制裁。<sup>④</sup>

虽然《泰晤士报》在反对日本的道路上没有走得这么远，态度没有这么激烈，英国自由党的《曼彻斯特导报》、代表着左翼力量的《每日电讯报》和《每日快报》也没有准备走这么远。但是《泰晤士报》和《观察家报》等报纸都表示希望英国政府，应该以经济手段限制日本的侵略。<sup>⑤</sup>

对于从“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中受到侵略的中国，英国各媒体普遍表示了同情的态度。如8月28日，日本飞机轰炸了上海火车南站，当时火车站内挤满了中国难民，日机轰炸造成了无辜中国平民死伤的惨剧。英国人在上海出版的《字林西报》于轰炸发生的次日，便对这一惨案进行了报道，所用标题令人触目惊心：《二百名难民在南站死于空袭——日本轰炸机使南市成为废墟、陈尸满地——中国方面否认该地区有任何军事力量》。

《泰晤士报》对蒋介石7月17日庐山谈话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是一个坚决而合理的表态，体现出了国家领导人维护领土完整的决心。<sup>⑥</sup>蒋介石7月17日在庐山就抗日问题发表重要谈话，并郑重声明：“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如何人皆有抗战守土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之一切之决心，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sup>⑦</sup>英国报界舆论对中国军队在上海地区坚持的长达三个月之久的淞沪抗战，也大加赞扬，如9月2日的《新闻纪事报》，报道了中国士兵视死如归的精神；10月28日，《泰晤士报》的社论称，“上海抗战不仅目

---

① Nicholas R. Clifford, *Retreat from China, British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37-1941*, Washington, 1967, p. 16.

② DBFP, Second Series, Vol. XXI, p. 244.

③ I.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1940, p. 80.

④ Bradford A. Lee, *Britain and Sino-Japanese War, 1937-1939*, London, 1973, pp. 50-51.

⑤ Bradford A. Lee, *Britain and Sino-Japanese War, 1937-1939*, London, 1973, p. 51.

⑥ Sabre-Rattling, *The Times*, 1937-7-22 (15).

⑦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台北：1981年版，第58页。

前，而且将来也会对全中国起着鼓舞士气的作用”<sup>①</sup>。

但是，英国各报纸普遍不相信中国政府领导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决心和能力，因此需要英国的调停。7月22日，《华北先驱报》说：“没有人会郑重地相信中国政府期望着与日本进行战争。”<sup>②</sup>英国人在中国所办的另一份报纸《金融商业报》的发言人，他同时也是英国在华经济利益的权威发言人，在谈到英国对华态度时，虽然表达了对中国的同情，对日本侵略行为的谴责，但是该报说：“如果中国中央政府得出结论，认为现在是为自己的生存而战的时候，战火将会从北方燃烧到南方。在短时间内会爆发极大的爱国热情。但是虚弱的中国迎战日本，是很难有什么希望获得军事上的胜利的，而由此带来的商业和财政上的损失却是巨大的。他认为虚弱的中国要对付日本，必须要依靠国际社会特别是英国的力量。”“即使日本对英国生命和财产的进攻，也不能有效阻挡英国自己作为调停者的角色。”<sup>③</sup>

《泰晤士报》同样认为：“世界在焦急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世界各国政府和美国已经对远东和平发表了强硬的表示，虽然日本私下表示不欢迎这种干预。”<sup>④</sup>不过，这一时期的英国报界，对中国这个受到日本大规模侵略的国家虽然满怀同情，但是却对中国政府却抱有不信任的态度，而且对中国的援助要求，更是很少有媒体予以呼吁。

总之，“卢沟桥事变”期间的英国报界，面对日本在中国的不断扩张，对日本的态度变得日益强硬起来。英国报界这种态度的转换，既是由于受到英国对日政策的影响，同时也在也对政府的对日决策施加着一定的影响。英国舆论界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态度，从侧面反映了英国的对华政策。

### 第三节 “七七”事变后的英国对华政策

#### 一、“七七”事变后的英国对华政策

“七七”事变并没有完全改变英国对日本的妥协政策。当英国支持中国抗日的政策遭到日本反对时，在日本压力下，英国就会退让；而当英国利益因日本的侵略而受到进一步损失时，英国就又会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样，“七七”事变后，英国的对华政策就在曲折中发展。

1937年10月13日，英国召开了内阁会议，会议的议题是远东问题。会上讨论是否对日本进行制裁的问题。英国首相张伯伦在会上作了发言。他在发言中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英国的对日政策是软弱的，并且说明了对日政策软弱性的原因。

张伯伦认为，如果要制裁日本，就要冒战争的风险，但是“不冒战争的风险，要实行有效的制裁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如果不冒战争的危险，制裁达不到目的。他说：“我们可搞无效的制裁，但这种制裁将不会达到目的，并会导致（如在意大利问题上那样）长期的痛苦和恶感。”他还说，即使能促使足够数量的国家实行有效的经济制裁，也不一定能收到效果。张伯伦说，如果制裁是有效的，也丝毫不能保证日本可能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怂恿下，不会不对东印度群岛的石油供应地、香港和菲律宾发动报复性的进攻。而张伯伦非常担心日本对英国的报复。

他设想，英国如果要对日进行制裁，必须得到美国的支持。他说：“在现在的欧洲形势下，派遣舰队赴远东将是不安全的。因此，如果不能从美国得到一项保证，即他们准备正视可能落到

---

① 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 中华民国时期 1911—194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09页。

② I.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1940, p. 92.

③ I.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1940, p. 94.

④ I.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1940, p. 94.



在远东有重大利益的国家身上的一切后果的话，我们就不能实行制裁。即使在那时，要预见美国公众舆论为保证这样的立场准备多久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的结论是：“除非得到压倒性力量的支持，否则经济制裁将是无用的。”<sup>①</sup>

虽然张伯伦不打算立即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但是仍坚持制止日本在华进一步扩大侵略的政策。在张伯伦召开内阁会议一个月后，即在1937年11月3日，英国与美国、法国、苏联等10多个国家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九国条约会议”，主张中国和日本谈判解决“七七”事变。这又表示了英国愿意出面，在中日之间进行调停，结束日本侵华战争的立场。

日本对英国的这种态度很不满意，反对英国出面调停。1938年4月13日，在“日本情报部长关于日华和平交涉说的谈话”中，日本情报部部长说：“最近，路透社和塔斯社大肆报道，日本政府希望英国政府出面在日华间调停，甚至煞有介事地报道其理由，声称日本统治阶级为最近的事态担忧，真心希求停战。然而，今年初政府已声明，帝国政府的方针是不理睬国民政府，期待建立和发展一个能真正和帝国进行合作的新兴的支那政权，以协助建立一个新的支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及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正在健全发展。帝国所希望的新支那的建设即将走上正轨。在这时候，路透社和塔斯社别有用心地所谓日本要求第三国在日华中间调停的报道，不过是拙劣的试探气球而已。”<sup>②</sup>

重庆国民政府对英国的态度也不满意，也反对英国出面调停。例如1938年9月13日，蒋介石在汉口接见英国代办葛凌蔚，葛向蒋探询中国在原则上可否同意在汉口设安全区，并面呈日本所提之苛刻条款。蒋介石答称：“凡有中国军队驻守的地方就是安全区”，断然拒绝日方无理要求，并强调指出：“中国抗战是自卫，也为保卫国联盟约，英法既同为会员国，应彻底同中国合作，驱逐人类公敌；此种无理条款，英国根本不应转递。”<sup>③</sup>

重庆国民政府还不断要求英国加大对华援助的力度。1938年11月6日，蒋介石在与卡尔谈话时，明确表示了对英国在援华问题上无所作为的态度不满，并要求卡尔明确回答，英国是否会给予中国援助。中国外交部，也一再要求英国政府回答蒋介石提出的这个问题。在中国政府的不断努力下，卡尔才表示，他将向英国政府建议，对华提供经济援助。<sup>④</sup>

英国在当时国力已经衰落，无力左右远东的局势。英国的远东政策，主要是紧跟美国的远东政策。早在“七七”事变发生不久，美国就下令禁止政府船只向日本运输武器。而在美国总统发表了芝加哥“隔离宣言”后，美国就于1938年7月1日，开始实行对日本的“道义禁运”，即加大民间禁运力度，号召民间向日本实行各种禁运。到1941年8月，美国的“道义禁运”发展为全面禁运。<sup>⑤</sup>美国的这些行动，使英国不可能继续其与日本的妥协政策。

1938年7月12日，日本的“五相会议”，做出了关于适应时局之对华策略的决定。《决定》

---

① 《英国远东战略》，第244页，见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

② 《日本外交文书》，下卷，第389页，见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第154页。

③ 袁旭等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记事（一九三九·九—一九四五·九）》，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76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书名、卷数及页码）。

④ 《战时外交》，二，第30页，转引自陶文钊 杨奎松 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第150页。

⑤ [日]服部卓四朗著，张玉祥，赵宝辉译校：《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0页。

规定的目标是：如果要使中国失去抵抗日本侵略的能力，就要推翻蒋介石政府。而且日本政府“为使敌人丧失抵抗能力，并推翻支那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应加强目前正在实施的计划”<sup>①</sup>。

英国反对日本“五相会议”的决定，反对推翻蒋介石政府。英国加强了对中国的援助。1938年12月6日，英国考虑予国民政府出口信用贷款。1938年12月15日，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了2500万美元的贷款，英国则向中国提供了1000万英镑的原则贷款；18日，英国确定对华首批贷款50万英镑。14日，中美信用借款2500万美金签订。

英国援华抗日，是英国为了其在远东的殖民利益。正如英国驻华大使卡尔1938年在一次报告中，向英国外交部所说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既是为他们自己战，也是为我们而战，因为只有日本人的失败，才能把我们从危及我们在远东地位的灾难中解放出来。”<sup>②</sup>

英国的对华贷款，遭到日本的抗议。1938年12月19日，日本外相有田发表谈话：“（一）反对英、美对华贷款；（二）九国公约已部分不适用；（三）中、日、满经济集团并不排斥第三国利益。”<sup>③</sup>

1938年11月3日，日本在攻陷汉口后，提出了所谓建设“新东亚秩序”的声明，并对蒋介石政府发出引诱说：“国民政府如能以前的指导政策，改变人事安排，真正走向更生，前来参加新秩序的建设，则绝不加以拒绝。”<sup>④</sup>美国和英国认为，这表明了日本要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决心。美国采取了实际行动支持蒋介石政府。英国也紧跟美国，使其援蒋抗日的政策具体化。<sup>⑤</sup>

1939年1月14日，美、英、法三国共同对日提出照会，不承认东亚新秩序。1月20日，国际联盟理事会通过了援助中国抗日的决议。当然，国联是由英法操纵的。国联援华决议案的通过，也表明了英国对日政策的日趋强硬。<sup>⑥</sup>

英国对中国的这些少量援助，给中国带来希望。中国政府希望得到英国进一步的支持。1939年3月22日，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通知外交部远东司司长霍维说，中国政府正在考虑欧战爆发时他们的立场。中国政府希望发表这样的声明，即如果战争爆发，他们愿意与英王陛下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并准备进行最充分的合作以保卫两国的利益。他们要求了解英王陛下政府的看法。在郭泰祺与霍维的谈话中，他还表示，他已接到政府的进一步指示，前来提交有关中英两国为保卫它们在远东的财产和利益而采取共同行动的下述计划。

但是英国并不愿意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合作关系。1939年4月13日，在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致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的电报中，哈里法克斯通报了他与郭泰琪会谈的情况。在会谈中，郭泰祺说，中国政府自中日战争一开始就认为，日本侵华并非仅仅企图统治中国的政治与经济，而首先是消除西方国家在远东的影响，取得远东和西太平洋霸权地位计划中的第一着棋。统治中国只不过是实现著名的田中奏折所陈述的行动计划的第一步，该备忘录在日本人心目中所占

---

① 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第231页。

② 《英国外交文件》，第2辑第21卷，第762~763页，转引自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第142页。

③ 袁旭等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记事（一九三九·九——一九四五·九）》，第177页。

④ [日]服部卓四朗著，张玉祥、赵宝辉译校：《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0页。

⑤ [日]服部卓四朗著，张玉祥、赵宝辉译校：《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1页。

⑥ [日]服部卓四朗著，张玉祥、赵宝辉译校：《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1页。

的地位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在德国纳粹领导人心中所占的地位是一样的。显然，如果允许当前远东事态继续发展下去，如果对日报占领海南岛之类的行动不加阻遏，一旦欧战爆发，英法两国的殖民地和交通线将遭到严重危害。<sup>①</sup>

郭泰琪转达了中国政府的观点。中国政府认为，由最关心在远东反对日本不断侵略的大国进行有效的磋商，并采取有利的联合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为此，他建议根据下列方针采取行动：

“第一，为了一致对日作战，英法两国在军事和经济规划方面与中国合作，在适当时候要求苏联参与这项计划，邀请美国采取类似行动。

第二，在军事领域里，中国提供所辖的全部人力和物资，而其他参与国提供海空部队。各国分别从其总参谋部中任命一位代表，起草详细的行动计划。

第三，在经济方面，各参与国采取一致措施以维护他们的通货与贸易，对侵略国实施经济和财政制裁。为此，各国将分别任命一名经济代表，与其他参与国代表共同磋商。

第四，各参与国保证不同侵略国单独媾和。”<sup>②</sup>

哈里法克斯对郭泰琪采取了敷衍的态度。哈里法克斯说，英国政府当然会研究这些提交的建议。他说：“只要有时间，研究那些所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决非是件坏事。”<sup>③</sup>

哈里法克斯在给卡尔的电文中，阐述了英国的政策：“一旦爆发全面欧战，英国在远东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的态度。只要日本保持中立，即使不是好意的中立，英国还是要尽一切可能阻止它主动地站在敌国一边。为此，在中国同日本交战时，英国将不得不避免与中国进行太公开的合作。”<sup>④</sup>

哈里法克斯认为：“中国政府目前提出询问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愿望，即通过与我们事先同他们达成一项谅解，来防止或至少推迟我们改变迄今为止所持的态度。”<sup>⑤</sup>但哈里法克斯表示，英国不愿公开出面反对日本。

不过，哈里法克斯在电文中明确表明了下面的观点：即日本如果坚持与英国为敌时，英国就要接受中国的建议，支持中国抗战。他说：“另一方面，如果日本公然成了敌人，我们就要尽力援助中国同日本作战，并接受中国能报答我们的任何帮助。除了像在上次战争中那样提供劳力以及诸如钨等原料（这要取决于交通畅通的程度），中国人能直接帮助我们的途径并不多。但是，他们可以牵制大量在华日军，阻止或牵制日报对我们在南海的殖民地采取行动。然而，与中国政府商定协议之事只能视当时的形势而定。显然，我们只有在确信日本会主动反对我们之后，才能

---

① 《英国外交文件》，第3辑第9卷，第5~7页，见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第572页。

② 《英国外交文件》，第3辑第9卷，第5~7页，见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第572页。

③ 《英国外交文件》，第3辑第9卷，第5~7页，见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第572页。

④ 《英国外交文件》，第3辑第9卷，第5~7页，见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第572页。

⑤ 《英国外交文件》，第3辑第9卷，第5~7页，见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第572页。

考虑中国的建议。”<sup>①</sup>

因此，哈利法克斯对卡尔说：“目前，已奉告这位再次回到这一话题的中国大使，远东形势，尚未发展到可以有效地去研究中国政府建议的阶段。同时，英王陛下政府在考察总的国际形势时会牢记这些建议。”<sup>②</sup>

这封电文，就是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因此被抄送给了英国政府驻东京、巴黎、莫斯科、华盛顿、柏林和罗马大使，要他们参照执行。<sup>③</sup>哈利法克斯给卡尔的电文，表明英国对日政策是软弱的。

然而英国政府的上述政策，被日本认为是亲蒋援华的政策。为了迫使英国改变立场，日本制订了促使英国改变亲蒋援华政策的方针。1939年7月3日，在《日本陆军对时局外交的希望》，日本军部提出了其《外交的一般方针》。在这份《外交的一般方针》中，日本陆军决定：“促使英国放弃亲蒋援华的政策。”<sup>④</sup>

同时日本还拟订了《对英工作要领》，以使英国放弃援华的政策。日本对英工作要领规定的方针是：“在使英国谅解帝国公正而坚定的态度的同时，调整英国在华的经济状况，促使它尽快放弃亲蒋援华政策”。其具体做法是：“1. 促使英国认识到拖延事变的解决对其远东政策不利；同时，只要英国顺应帝国解决事变的方针，我方就相应地逐步对其在华的利益给予善意的考虑。为此，特别要利用英国在华的各种势力。2. 对英国在华权益采取措施时，望特别慎重，避免不必要的摩擦。3. 同意和刷新我驻英联邦的外交、经济及宣传机构，调整帝国国内朝野的对英言行，使英国看到我方在贯彻对华政策上的信念及实力。”<sup>⑤</sup>

尽管日本采取了各种手段，企图改变英国援华的立场，但英国一再明确声明，英国对华政策没有改变。

1939年1月15日，针对1938年12月22日日本内阁首相近卫发表的第三次声明，英驻日大使克莱琪访问日本外相有田，并送交照会，请日本首相近卫给予解释。克莱琪强调“英国仍坚持中国门户开放及机会均等政策，凡以片面手段破坏九国公约者，英国不能承认”等。18日，法国政府也以相同内容照会日本政府。<sup>⑥</sup>

同时，英国在实践中仍坚持同情中国抗日的立场。1939年2月18日，世界反侵略大会在伦敦开幕，中国、西班牙等17国代表参加。19日，大会通过援华决议，主张各国对日禁运军火；订立国际协定抵制日货；英法美苏各国切实合作，援助中国制止侵略，并拒不以金钱及其他战争

---

① 《英国外交文件》，第3辑第9卷，第5~7页，见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第572页。

② 《英国外交文件》，第3辑第9卷，第5~7页，见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第572页。

③ 《英国外交文件》，第3辑第9卷，第5~7页，见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第572页。

④ 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第701~702页。

⑤ 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第704页。

⑥ 袁旭等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记事（一九三九·九——一九四五·九）》，第181页。



必需品供给侵略者国。<sup>①</sup>

日本并未放弃拉拢英国的努力,准备采取其他一些措施,来促进英国政策的转变。例如:在1939年8月1日颁发的《日本陆军关于今秋处理事变的最高指导》文件中,日本政府要求:“为在事变的处理上造成有利的国际形势,其重点应放在以日、德、意协定为后援的对英政策上,即使在天津问题解决后,还要继续诱导英国转向日方。为此,首先要弄清楚和掌握英国本身的权益以至其对事变的真实意图,同时暗示甚至明示我方对事变的基本观念。这样一来,在操纵权利和日、德、意协定的压力下,在处理事变上将出现非常有利于我方的倾向。一旦出现这种倾向,就要即使加以引导和利用,使之秘密地服务于对重庆的劝降工作,不仅要阻止英国采取有碍我方对支持支那新中央政权的措施,而且应该制订加强与我方步调一致的具体政策。为有效地推动这项工作,应准备好针对英国在华权益的强硬措施,根本需要实施。实现这项目标时,处理权益的依据是《对第三国的活动及权益的措施纲要》。”<sup>②</sup>

但日本拉拢英国的政策并没有奏效,英国决定继续援华抗日的立场。1938年5月31日,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在向英国战时内阁提交的《关于中国请求援助的备忘录》中,承认“如果日本赢得战争,我们在那里的利益将注定要被消灭”,“中国现在从外部得到的援助越少,战争就可能结束得越快,日本就更可能将它的计划付诸实现,应该在中国的利益被扫地出门的时刻就会更快地到来”。<sup>③</sup>因此,“关于荣誉和自身利益的每一种考虑都敦促我们尽我们所能去帮助中国。花费一笔数额非常有限的金钱,我们也许可能因此而保存我们在远东的至关重要的利益”<sup>④</sup>。

1939年发生了“天津事件”的发生,使日本与英国的关系恶化。1939年6月14日,日本以天津英租界当局没有交出刺杀伪海关监督的4名中国人为借口,封锁天津英租界。<sup>⑤</sup>随后,日本在日本国内和中国北京掀起了激烈的反英运动。日本东京举行了大规模反英游行,游行还冲进了英国驻东京大使馆,以迫使英国妥协。在日本的强大压力下,英国驻日大使馆官员克雷吉曾起草了一份报告,向英国政府建议妥协。他说:

“鉴于前面刚发生的一些事态(谈判中断、煽动反英等等),任务是艰巨的,但也绝对不可能是办不到的。第一步是必须重开天津谈判,并尽快结束。我现在正着手搞清楚,是否能使日本政府在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同意在封存目前所在地点的白银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封存直到敌对行动终止,或者有关各方就移交白银问题达成协议为止,以何者最快为选择。”<sup>⑥</sup>

“我可以顺便对日本使用这项理由:双方在目前发生水灾的情况下,势必都想要摆脱封锁。”

---

① 袁旭等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记事(一九三九·九——一九四五·九)》,第185页。

② 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第774页;1938年12月22日,日报内阁首相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提出所谓“亲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三原则,并声称只要中国允许日本在特定地区驻军和开发华蒙疆的资源,日本则考虑撤消治外法权,归还租界,企图以此为诱饵,引诱国民党投降;参见袁旭等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记事(一九三九·九——一九四五·九)》,第177~178页。

③ 《英国外交文件》,第2辑第21卷,第792~793页。

④ 《英国外交文件》,第2辑第21卷,第729~793页。

⑤ 《英国外交文件》第3辑第9卷,第495~497页,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第856页。

⑥ 《英国外交文件》第3辑第9卷,第495~497页,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第856页。



“天津谈判达成协议，当然仅仅是所建议的政策的第一步，但这却是重要的一步。其最终目的是在远东有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因此，我们或许只得承认日本以优势地位占有名义上自治的华北（这种局势不论怎样，几乎肯定必将得到承认）。不过这这么一来，华中的经济情况也许就会从进一步恶化中拯救出来，中国人民也许将被从一片焦土中拯救出来。它要求蒋介石和我们自己都作出牺牲，但这绝对不能作为谴责我们‘背弃中国人民’的理由。我们也必须放弃按照九国公约进行协商的想法，除非有可能作为一种最后手段以巩固各主要有关方面之间所达成的协定。我们应努力导致谈判，最先的谈判范围只限于日本、中国、美国和我们自己。不要扩大（如要法国参加，就意味着也要让德国和意大利参加，这一点必须非常谨慎的考虑）。正如此处所认为的那样，今后几天局势将出现进一步也许是无可挽回地把日本拉倒反英集团的危险中去的危险；迄今为止。尚未能出现能在真正谅解以及在共同利益基础上把日本从极权国家方面拉过来的机会。”<sup>①</sup>

“如您所知，日本首相是渴望改善英日关系的，外相也告诉我说，这是他本人的目的；而我们也可以利用后者曾作为最早的反共产国际条约的签署者的虚荣心。我们在这一届内阁中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毋庸置疑。总之，日本是值得争取的。它承认已把大量精力和金钱花费在至今尚未能结束的战争上面……（原句不清——作者注）但是，它有一支完整无损的、拥有现代化战争经验的海军；有一支经过高度训练的陆军，这是一支有充分后备力量，能应付任何突然紧急状态的第一流的部队；而且还能够在最后作出自我牺牲的坚强的人民。对于这些人民来说，我敢预言，他们会有一个伟大的未来。我并不低估在尽可能早的时刻开始与中国进行谈判解决的重要性，正如您所建议的那样，我将与法国和美国同僚在这个问题上保持密切接触。但困难还是很大，目前我认为，我们还是要集中精力把日本从德国那里争取到我们自己这边来。”<sup>②</sup>

“在提出上述这些建议时，我并没有抛弃对日本早期侵略行径和最近反英运动表示憎恶的意思。但是对我们来说，眼前的时刻太至关重要了，以至我们迅速行动起来，我们完全有可能扭转目前形势使之有利于我们。一旦我们能够按照我在第 572 号<sup>③</sup>电文所建议的政策那样，通过舰队部署来增强我们在远东的实力，那么上述政策将更能使日本人信服。”

“诚然，如您所建议的那样，我将非常乐于奉劝我的法国和美国同僚在这种事情上带头。我对您授予我的处理权限表示感谢。我将慎重从事，务求符合紧迫的形势。”<sup>④</sup>

在日本的强大压力下，1939 年 7 月 24 日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与日本外相有田，在东京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英日初步协定》）。协定规定：

“英国政府完全承认正在大规模战争状态下之中国之实际局势，在此种局势继续存在之时，英国知悉在华日军为保障其自身安全与维持其占领区内公安之目的计，应有特殊之要求。同时知悉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日军之敌人之行为与因素，日军均不得予以制止或消灭之。凡有妨碍日军达到上述目的之行动，英政府均无意加以赞助。英国政府将趁此时机，对在华之英当局及英侨

---

<sup>①</sup> 《英国外交文件》第 3 辑第 9 卷，第 495~497 页，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 7——1939. 8）》，第 857 页。

<sup>②</sup> 《英国外交文件》第 3 辑第 9 卷，第 495~497 页，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 7——1939. 8）》，第 857 页。

<sup>③</sup> 克雷吉起草的这份草拟于 8 月日的电文，直到战争爆发尚未送达英国外交部。

<sup>④</sup> 《英国外交文件》第 3 辑第 9 卷，第 495~497 页，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 7——1939. 8）》，第 858 页。

说明此点，令其勿采取此项行动与措置，以证实英国在此方面所采取之政策。”<sup>①</sup> 这样英国又对日本采取了绥靖政策。

但是这种绥靖是暂时的、表面的，英国的援华政策并没有就此而改变。

这个条约是在日本压力下签订的，是英国为了摆脱因“天津事件”带来的日本激烈的反英运动，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这个条约的签订，并不是“慕尼黑阴谋”，因为这个协定没有改变英国援助中国的政策。英国的对日政策，是紧跟美国对日政策的。仅以英国一国，是不可能搞出“远东慕尼黑阴谋”的。“远东慕尼黑阴谋”的成立，必须要有美国参加。

而美国此时并没有策划“慕尼黑阴谋”的打算。相反，美国对日采取了激烈的政策。1939年7月26日，就在《有田—克莱琪协定》签订后两天，美国突然通知日本，美国废除了《日美通商航海条约》。美国的这个政策，被日本认为是一个“晴天霹雳”，是一个重大打击。此后，美国的援华抗日政策就一步步加强。<sup>②</sup>

26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宣布废除1911年订立的《美日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注：此事未征求国会同意，即由罗斯福直接处理。正式废除须在通知后半年）。在美国影响下，27日，英对华签订300万英镑借款。<sup>③</sup>

1939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中共中央认为：“（一）根据各方材料（参考三十号军政通讯），证明英日谈判，英国对日已有重大的原则让步。这种让步，造成东方慕尼黑的可能的严重局势。（二）蒋介石的谈话，虽然指出了独立奋斗，反对以来与观望的决心，但对英国仍抱有极大的幻想；特别由于金融上对英国的以来，使英国对蒋仍有很大的支配力量。（三）我党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推动各方共同起来：1. 在舆论、行动上，表示全国人民对于英国张伯伦妥协派向日投降、牺牲中国利益的严重抗议，反对任何形势的东方慕尼黑，揭破张伯伦政策是拥护日本侵略中国、反对中国抗战的政策，这政策只有助长世界法西斯侵略国的侵略，促进世界普遍的大战争的来到。2. 坚决反对中国抗战阵营内部任何人因张伯伦的对日投降，而对抗战表示动摇；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破坏抗战的活动；强调自力更生的口号，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及民族自信心；打破对英国的幻想，反对依赖英国的外交政策。3. 但对英方面，应集中力量反对张伯伦的投降政策，主张英国人民与政府应改变这种害人害己的错误政策，以争取英国改变政策，继续支持中国抗战。4. 指出即使英国停止援助中国，与日妥协，只要克服内部投降危险，中国仍有一切办法坚持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并宣传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sup>④</sup>

从中共中央的指示来看，也没有把《有田—克莱琪协定》为“慕尼黑阴谋”，而是说“英国对日已有重大的原则让步”。“这种让步，造成东方慕尼黑的可能的严重局势。”这清楚表明，中共中央认为这是一种妥协投降政策，有可能造成“慕尼黑阴谋”。但是并没有说这就是“慕尼黑

---

① 《新中华报》，1939年7月28日，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料选辑（1931—1945）》，第120页。

② [日]服部卓四朗著，张玉祥 赵宝辉 译校：《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1页。

③ 袁旭等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记事（一九三九·九——一九四五·九）》，第176页。

④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940—1949），下卷第二分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2~133页，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料选辑（1931—1945）》，第120~121页。

阴谋”。<sup>①</sup>

而重庆国民政府的记录，更没有认为英国的对华政策中有慕尼黑阴谋。例如，7月20日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接见中央社记者，驳斥“有田声明”。该发言人指出：美英对华贷款无论纯系商业或含有政治作用，“日本均无权反对”<sup>②</sup>。这就表明了重庆国民政府的态度。

7月24日，蒋介石在重庆“国府纪念周”讲话时声称，抗战国策决不受东京谈判影响，并说：“现在外国舆论说敌人希望造成‘远东慕尼黑’，这是新闻界揣测敌人心理的说法，事实上决不致有远东慕尼黑发生。”<sup>③</sup>蒋介石非常重视“外国舆论”。事实上外国舆论对外交政府的对华政策却有影响。其中，英国舆论对英国对华政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 二、英国舆论对“七七”事变后英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七七”事变后，英国舆论界在英国对华政策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当时的英国，还没有当代现代化的媒体，其舆论压力，主要是通过报纸来体现。

英国的报纸，情况复杂。有的报纸是英国政府的喉舌，例如《泰晤士报》就是英国政府的工具。但是即使是《泰晤士报》，也在改变英国对华政策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泰晤士报》为了争取公众，其报道有时也不得不注意标榜公正与客观，注意顺乎时代潮流。而在其他各种报纸中，有许多报纸相对独立，并不完全为政府控制。因此这些报纸，既能反映英国政府的观点，又能对政府政策产生影响。

英国政府在“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采取了比“九一八”时期积极的政策。1937年11月在英国的倡导下，《九国公约》各签字国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了调解中日冲突的国际会议。

英国政府为这次会议定的调子是和平和调解，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Chamberlain, Neville）说，对日本无效的制裁达不到目的，但是会激怒日本，对日本有效的制裁也不可能拯救中国。<sup>④</sup>《泰晤士报》配合着政府的调子，在11月2日发表社论说：“九国公约会议不是课以刑罚的法庭，而是为恢复和平进行外交努力召开的。”<sup>⑤</sup>

而《曼彻斯特导报》则反对张伯伦的主张。例如英国政府的态度使布鲁塞尔会议，没有能够做出实际谴责日本侵略和援助中国的决定，而仅仅重申了一些一般的原则性的规定。对此，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布鲁塞尔会议最后结束的时候发表声明：“面对极端的和残酷的国际暴力，仅仅通过语言和无能为力试图恢复和平和正义……”“你们难道不能用全部的力量，通过自己的一些积极的行动，即使这些行动是间接的，以维护法律、秩序、世界安全和国际和平？”《曼彻斯特导报》就重点刊登了顾维钧的悲愤声明，表明了支持顾维钧声明的观点。<sup>⑥</sup>

日军在占领上海后，向英国提出了由日本控制上海及整个沦陷区海关的要求。同时，日本军队还不断向长江流域推进。中国政府面对日本的武装和经济双重侵略，一方面进行了坚决的抵

---

①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940—1949），下卷第二分册，第132~133页，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料选辑（1931—1945）》，第120~121页。

② 袁旭等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记事（一九三九·九——一九四五·九）》，第177页。

③ 袁旭等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记事（一九三九·九——一九四五·九）》，第205页。

④ DBFP, Second Series, Vol. XXI, p. 374.

⑤ DBFP, Second Series, Vol. XXI, p. 374.

⑥ China Bulletin, Nov. 30, 1937, Issue No. 1, Published Fortnightly by the China Campaign Committee, London, p. 1.

抗，另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积极争取外来援助。在中国争取外援的过程中，英国是中国工作的首要目标。中国政府派出陈公博到伦敦去展开游说活动；在国联大会上，在布鲁塞尔会议上也向英国提出了援助要求。1937年11月29日，中国政府向英国递交一份外交备忘录，要求英国援助飞机、步枪等军火物资及1亿英镑的贷款，但是英国政府一直没有答复。这些情况，英国各报都给予了报道。

这时，英国政府对中国坚持抗日仍然信心不足。英国各报纸也就普遍认为，中国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军队的侵略面前会很快土崩瓦解。所以在1937年12月初，南京陷落的前夕，英国媒体呼吁中国向日本投降。《金融和商业报》：“日本占领南京透露出中国战事即将结束的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开始后，一切都会恢复正常。某些中国军队继续抗争可能是会有的，但是全国范围内的抗争是不会有。”<sup>①</sup>在1938年前，英国报纸，主要重复政府的腔调。

但是当日本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后，英国舆论界的调子就有了改变。从12月初以来，英国一些在长江流域行驶的商船和军舰多次遭到日军的袭击，并造成了多人伤亡。《泰晤士报》愤怒地指责袭击英国的船只是日本故意而为，是为了把包括英国在内的外国船只从长江流域驱逐出去的证明。<sup>②</sup>但是《金融和商业报》却和《泰晤士报》持相反的看法，认为日本还没有胆量故意打击英国在华利益，制造英国与日本之间的紧张关系。它说：“在日本向南京推进的过程中，轰炸了英国商船和美国军舰，一些人认为日本的进攻是全面预谋的。而不认为是这样，因为虽然日本军官似乎发了疯，但是不能想象日本完全失去了责任感来故意激怒与英国和美国的战争。”“但同时，必须承认日本与中国之间不宣战的战争仍然在继续，只要战争在继续，就会带来越来越大的灾难。为中国着想，为世界着想，我们相信南京希望战争的结束。”<sup>③</sup>

中国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陷落了，但英国和世界也并没有看到中国人民和政府放下武器，举手向日本投降，没有看到中日战争的结束。而且不幸的是，中国必须要面对不知道限期的抗日战争，英国也必须要面对无休无止的日本侵略中国过程中，所必然造成的对英国在华利益的威胁和损害。

但是，英国报界仍认为只有结束眼前的战争才能保护英国在华利益，所以那种鼓励中国人继续抵抗下去的宣传是不明智的、不切合实际的。中国政府继续抵抗下去也是不明智的、不切合实际的，最终是没有什么前途的。《金融和商业报》评论说“中国或许比日本更有条件继续战争，但是只有坚定的乐观主义才能使自己真的有机会将敌人从国土上赶走。中国的工业计划现在已经完全被日本的进攻所摧毁，当和平来临，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予以恢复。同时外国利益也深受其害……对许多关注中国的人来说，前景的确是黑暗的。……所以无论从哪种观点来看，都值得对这个问题及早考虑。那些战争贩子们呼吁中国战斗到最后……但是这样的提议从上海地区外国利益来看，是太不切合实际了。”<sup>④</sup>

英国报界正是基于上述这样的心态，对英国政府与日本在1938年5月2日签订的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进行评价的。根据这个非法协定，整个沦陷区的全部关税收入都要交给日本人，而这些收入在1938年底占据了中国关税收入的3/4，该协定使中国海关变成了为日本购买屠杀中国人枪支弹药的银行。但是英国报界对这个非法协定还聊以自慰，认为这个协定即使对中国利

---

① I.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1940, p. 116.

② Bradford A. Lee, *Britain and Sino-Japanese War, 1937-1939*, London, 1973, p. 89.

③ I.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1940, p. 116.

④ I.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1940, pp. 116-117.



益有所损害，但是毕竟能够对英国在华利益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1938年5月11日的《华北先驱报》，在描述该协定时说“这个协定是最糟糕事情中的唯一有效做法。当人们相信日本会认真保护外国在华利益的解释时，并认为协定会有助于恢复我们的信心时”接受了该协定。<sup>①</sup>

但是，日本侵略中国和英国在华利益的步伐，并没有随着英国政府的妥协而放缓。相反，日本军队继续在英国利益集中的华南地区肆意侵略。战争中的英国在华利益没有任何的保证，更谈不上有什么发展。于是英国许多报纸开始出现了援华呼声，这些呼声，成为推动英国政府援华政策制定的因素之一。

如《金融和商业报》明确指出它最痛苦的不是日本对中国的进攻，而是日本对英国在华利益的侵犯，“八个月来，基本没有什么实际的新的商业活动……这是一个等待未来的时期，一个希望接着一个希望地希望和平不会太迟到来……但是和平好像遥遥无期，同时政治状况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大，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即使等待时期结束，外国商人在中国也很难获得任何公平的机会，商业前景黯淡……许多商人焦急地询问日本对商业的意图”<sup>②</sup>。

随着在华英国商人失去对与日本合作保护英国利益的信心，英国报界鼓励与日本合作的声音日益减少，越来越多的援助中国国民党政府抗击日本的呼声出现在英国各报刊中。

当年在日军即将占领南京时，一些英国报纸建议中国向日本投降。但是中国人民和政府却继续抗战，这种誓死不投降的抗争给在华英国人和英国新闻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英国报界，不相信中国人民和政府的抗日能力和决心、提倡投降的论调成为过去；同时，在这些报纸的报道中，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威望正日益上升，并对日本是否具有彻底征服中国的能力产生了疑问。

日本军队在1938年2月开始了对苏州的进攻，因此保卫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成为中国的主要目标。《华北先驱报》，对即将到来的苏州战事的意义进行评价：“国民党政府认识到日本可能会取胜，但是仍然宣布残酷的战争的前景可能是汉口的陷落，但是即使失败也不会扑灭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热情。”

在这家报社记者的报道中，表现了一种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全新的认识。《华北先驱报》更从多次战役中，看到了中国军队誓死抗日到底的决心，看到了中国人民众志成城、抵抗外侮的精神，坚信中国最终会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该报发表著名文章，评论说：“国民党政府仍然在屡败屡战，他们已经接受了这样的抗战到底的信念，他们相信日本政府面临着不可忍受的资源上的压力，相信中国会最终获胜。……中国军队在物质缺乏的情况下仍然士气高昂，坚持抗战，虽然即将到来的对陇海铁路的保卫战对任何一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它的失守不会对中国人民的决心产生什么大的影响，产生的影响不会超过对上海和南京陷落的影响。”<sup>③</sup>

英国报界不仅表示了他们对日本遭受日本侵略的同情，对中国在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坚持抗日斗争的钦佩，更提出了对英国政府屡屡拒绝中国的援助要求的批评，指出英国应该对中国进行有效的实际的援助。他们的要求，推动了英国政府采取行动。

1938年初，中国再次要求英国提供3千万英镑的贷款援助，结果遭到英国政府的拒绝。1938年3月中国向英国要求2千万英镑贷款，以中国的钨锡等矿产品出口英国作为保证，可是英国仍然没有给与明确的答复。

---

① I.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1940, p. 120.

② Bradford A. Lee, *Britain and Sino-Japanese War, 1937-1939*, London, 1973, p. 186.

③ I.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1940, pp. 139-140.



其实在这期间，英国政府内部一直有人主张对中国进行援助。特别是在英国外交部，如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 Clark. Kerr）。卡尔在山东、湖北等地亲眼目睹中国军队和人民的英勇抗日事迹，说自己“坚信中国只要达到足够的外援就能坚持抗战，就能持久有效地坚持抗战直到最后打败日本为止。中国人民对此坚信不疑”<sup>①</sup>。

卡尔对待援助中国问题，态度很是坚决。他认为援助战时的中国对英国在华长远利益是有利的，他说中国在“从事着我们的战斗”，援助中国“这在我们应该起到重要作用的关键时刻到来之际，对我们的利益是很有好处的”<sup>②</sup>。而中国一旦被日本征服，则必定会对英国利益带来巨大的危害：“我们英国设想过中国被日本打败，被日本征服的后果吗？被日本征服的结果就是日本利用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在世界上成为一个最主要的危害。”<sup>③</sup>

1938年5月6日，卡尔再次致电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Viscount. Halifax），恳切地向他表示：“是时候下决心考虑我们在远东的地位利益是否足够重要到决心努力予以挽救了，或者是否决定抛弃英国在远东的一切而任由日本毁灭。如果觉得值得挽救，我们就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如果觉得不值得挽救，就公开地对蒋介石说，让他别指望着英国的援助了，告诉他要相应地改变他的寻求外援的计划。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是我强烈坚持的，我们应该努力去搏一搏。我认为这这是一场赌博，但是一场充满了成功的希望的赌博，而相反的选择则是空空的承诺和灾难。”<sup>④</sup>

但是，哈利法克斯、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R. Craigie）都不同意对华援助。他们认为在目前欧洲形势日益危急的情况下，援助中国可能会给英国带来它难以承受的反英风暴。因为在欧洲处于战争边缘的时刻，援助中国而得罪日本可能会使日本更加滑向德国怀抱，可能会出现英日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而这是英国不能承受的。

克莱琪认为：“在一场世界战争或有世界战争的威胁下，中国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相反日本是。任何英日之间的冲突将会导致日本不可改变地倒向德国，这迟早会影响我们在欧洲的防御，这是一个我们目前可能不能承担起的危险。”<sup>⑤</sup>克莱琪还认为即使对日本做出一定的让步，即使牺牲了中国的一些利益，但是如果能够最终达到英国与日本之间的和解，就是维护了中国的利益，就是维护了英国的在华利益，“通过某种程度上的不公，能够比较容易地使日本最终接受英国的调解或英、美的调解，这种方式所获得的利益中国也可以分享。坚持采用这样的方法，我认为会带来一些成功的前景”<sup>⑥</sup>。

哈利法克斯则希望在援助中国问题上，能够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合作，以减低英国单独对华贷

---

① *BDFA*,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Vol. 46, China, p. 3.

② *BDFA*,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Vol. 46, China, . p. 4.

③ *BDFA*,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Vol. 46, China, p. 4.

④ *BDFA*,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Vol. 46, China, p. 15.

⑤ *BDFA*,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Vol. 46, China, pp. 21-22.

⑥ *BDFA*,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Vol. 46, China, pp. 21-22.

款或其他援助的危险，说：“如果美国银行能联合对华贷款，那么这种危险就不存在了，我认为在没有首先弄清楚援助是否到时候之前，英国无论如何都不能在援助中国问题上做什么。如果到了该援助的时候，而且如果美国政府也准备分担这个任务时，这个援助方案就将是另一种意义了。”<sup>①</sup>而在这之前，英国财政大臣西蒙（Simon. Rt. John）会见孙科和中国驻英大使时，就断然拒绝了英国提出的对华贷款要求。财政大臣粗暴地对中国代表表示：“英国对中国的市场贷款无论如何是不能给予的，即使是由中国政府提出对贷款实行保证也是不实际的。”<sup>②</sup>因此，英国政府各部门面对中国政府一次又一次提出的援助请求，要么直接拒绝，要么一再拖延。

而这时的一些英国报纸如《泰晤士报》已经洞悉到了英国援助战时中国，就是在维护英国在远东利益；英国援助中国，就是在维护包括印度在内整个英联邦的利益；英国援助中国，就是在削弱日本的力量，在削弱日本和德国这两个法西斯国家可能联合起来形成的对英国利益的危险。因此这些报纸要求英国政府援华抗日。

1938年5月21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指出：“一个明确的援助中国打败日本的措施……是一种姿态，它将实际改善英国在中国和印度的前途，也将大大削弱柏林——东京这一轴心的作用。”<sup>③</sup>《金融和商业报》也展开了对英国政府援华不利的批评：“牛奶沸腾掉了，哭泣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如果仅仅表示对中国的同情，仅仅在国联中领导其他国家通过呼吁援助中国的决议，而没有什么实际行动也是徒劳无益的。”<sup>④</sup>

1938年9月以来的欧洲形势格外紧张，德国和捷克的关系由于希特勒咄咄逼人的入侵态势令英国高度关注，但是英国首相张伯伦坚持对德绥靖政策，并最终在9月30日签订了出卖捷克利益的《慕尼黑协定》。日本从张伯伦首相对德绥靖的行动中看到了英国虚弱不堪的实力和软弱的政治态度以及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牺牲弱小国家利益的心理，认为日本即使现在在中国发动新的进攻，也不必担心来自英国的反对和制裁，所以在1938年10月下旬占领了广州，侵入中国华南地区，并在22日封锁了珠江，切断了香港与大陆之间的联系，使13000名在香港的英国人面临着灭顶之灾。

日本对华南地区的入侵，是其反对英国政策的具体表现，是对英国在华南利益和香港利益的直接挑战和威胁。蒋介石呼吁，英国应该对中国抗日提供实际的援助，并对日本采取强硬的态度和制裁。“日本侵略广东标志着日本南下政策序幕的拉开，它不仅直接反对中国，而且也是在试探英国的态度，南下政策是日本反英的表现。”蒋介石向英国提醒说：“一旦日本在南中国获得一个巩固的基地，日本自然会将会英国在太平洋西部地区的领土和利益都当做自己吞并的目标。”“因此英国应该给予中国一切切实的援助，采取强硬措施反击日本。日本大胆的南下政策是受到了日本统治集团对欧洲形势面前英国厌战惧战态度的认识，所以日本采取试探行动，希望英国不情愿地顺从日本的策略。”蒋介石还认为英国已到了需要做出决定不能继续延迟的时候了。<sup>⑤</sup>

---

① BDFA,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Vol. 46, China, pp. 16-17.

② BDFA,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Vol. 46, China, p. 13.

③ I.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1940, p. 143.

④ I.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1940, p. 147.

⑤ BDFA,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Vol. 46, China, . p. 306.

对日本侵入广州城，香港形势岌岌可危，英国报界迅速做出了激烈的反应。10月23日《泰晤士报》发表社论指出：“广州的陷落对英国和香港的意义来说是同样的，它不仅关系到香港的前途，而且关系到英国与中国的贸易。即使香港没有被日本侵略占领，广州的陷落也使英国在港和华南的利益深受其害。”<sup>①</sup>

但是广州失陷后，中国国民党政府仍拒绝对日和谈，在外来援助有限的情况下，仍继续坚持抗战。在美国国内，商业集团特别是在中国有利益的商业集团，要求美国军舰和在华驻军保护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政府的对日态度开始强硬。11月3日美国国务院询问英国，如果日本继续封锁珠江和长江流域，英国和美国应当怎么办。12月1日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Welles. Sumner）对英驻美大使说，伦敦和华盛顿存在着“联合经济行动，以保卫日益增长的需要”，美国还要求得到英国对这个问题的答复。<sup>②</sup>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也跟随美国立场，谴责日本占领中国，破坏门户开放的政策和行为。

中国的顽强抗战，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对日的强硬表示，都大大鼓舞了英国报界。而英国报界呼吁援华制日的活动，促进了英国援华抗日政策的逐步形成。《金融和商业报》呼吁相关国家成立联合阵线，保卫外国在华利益；谴责日本没有履行对外国在华利益予以保护的承诺。

该报撰文说，再也不能相信日本人一再地对外国利益的尊重和保护的承诺了，现在仅仅“通过抗议不可能达到保护外国在华租界区合法利益的作用。相反，会刺激日本更多的更大的侵略。中日之间的冲突必须要结束，除了在英、美和其他在华有利益国家之间的紧密合作之外，没有什么有效措施保护这种合法权益。这些相关国家通过成立联合阵线，在外交上进行合作，可以在物资方面合作，使问题得到公正地解决，这对这些国家在华利益是至关重要的”<sup>③</sup>。

11月3日，《泰晤士报》对张伯伦首相“战后中国离不开英国，不论中日之间战争的结局如何，英国都将会从中日冲突中获利”的观点表达了不同的意见。《泰晤士报》还深深惋惜，英国政府至今没有拿出什么实际的措施解决中日冲突，报纸还引用日本驻意大利大使的话说，英国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已经结束，日本统治之下的中国将是第二个“满洲”这样狂妄之词来激励读者，建议英国政府考虑采取措施对日本施加压力，而不是一味地与日本之间进行友好的观点的交换。<sup>④</sup>

对日本拒绝英、美法三国联合向其提出的开放长江流域的拒绝，《金融和商业报》的社论说全世界都“对日本的政策产生了不信任”。该社论还指责日本掠夺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加强日本的战备和进行新的对中国和在中国有利益国家的侵略：“日本船只在长江流域为所欲为……中国的各种资源棉花、石油、糖等资源源源不断地开往上海，运往日本国内。……英国投资400万英镑修建的上海到南京、上海到汉口到宁波的铁路也被日本用来运送军队。”<sup>⑤</sup>

也就是在此期间，何登夫人（Mrs. Beatrice. Harthan）代表英国《前驱日报》等各家报纸、伦敦援华委员会、世界反侵略大会、英国工党和社会党来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何登夫人在《中央日报》、《新蜀报》、《新民报》、《时事新报》、《商务日报》、《扫荡报》及中央通讯社等组

---

① I.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1940, p. 160.

② *DBFP*, Second Series, Vol. VIII, p. 160.

③ I.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1940, pp. 163-164.

④ I.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1940, p. 167.

⑤ I.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1940, pp. 173-174.

成的中国新闻界举行的欢迎会上表示：在她没有到中国之前，“虽也知道不少贵国全面抗战之可泣可歌的事实，然而远没有想到贵国军民能够合作到这个地步，这是我要带回欧洲去广为宣传的……我们认为只同情而无任何行动表现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在欧洲除了给与贵国英勇抗战的军民以精神同情之外，我们还继续不断举行盛大的宣传，捐募金钱和医药，直接间接地督促英政府确定实际援华的外交路线……”<sup>①</sup>

此外还有更多的英国新闻界人士如奥登（Auden. W. H）、伊修乌特（Isherwood）等来到中国考察，向英国国内报道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传达中国呼吁外来援助的声音。英国公众通过这些来华记者的报道逐渐开始了解中国的艰苦抗战环境，对中国人民几乎是独自坚持多年抗战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钦佩，并不断发起向中国进行捐助各种抗战物资的活动，英国新闻界和社会各界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声援对英国政府走向实际援华道路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压力。

而此时，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的诱降蒋介石、企图灭亡中国、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第二和第三次声明更使英国政坛感到了强烈的震动，经过英国报界的宣传，更加促使英国政府认真考虑实施援助中国的政策。

1938年1月16日，近卫发表第一次声明，称蒋介石如不接受议和条件，日本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另建“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11月3日，近卫发表第二次声明称：如国民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12月22日，近卫又发表第三次声明，提出所谓“中日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诱胁蒋介石接受条件，在东亚建立所谓的以日、满、华合作为基础的新秩序。

尽管此前，日本屡次违反自己对相关国家在华利益做出的尊重门户开放政策、尊重和保护西方国家在华利益的承诺。但是现在近卫声明的发表则说明日本早已经抛弃了所谓的尊重和保护西方国家在华利益的虚伪的表示，以建立东亚新秩序这样的主张公开否认了《九国公约》所制定的对华原则，表达了日本决心将西方国家利益从中国驱逐出去的图谋，这是向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又一次挑战。

近卫声明在英国政府内部造成了极大的震动，一向亲日的克莱琪也开始感觉到日本对英国利益尊重和保护的承诺毫无价值。<sup>②</sup> 卡尔表示：“日本的东亚新秩序不符合我们的计划，英国要准备支持中国……如果决定要挽救我们在中国的利益……不能再对日本迁就了。”<sup>③</sup>

在《近卫声明》发表后，英国报界对近卫声明的反应非常强烈，英国各报立即做了报道，并表示谴责。1938年12月25日出版的《扫荡报》对当时英国报刊在近卫声明发表后的评论情况进行了报道，说英国“各报多于显著地位，揭载日首相近卫列举‘对华媾和条件’之声明书”<sup>④</sup>。其中《新闻纪事报》的观点最激烈，它抨击近卫声明中提倡的所谓中日满集团，显示出日本这个独裁国家“似真拟将所有民主国家势力，自中国完全逐出”，“声明书内并宣称，日本拟取消中国租界云云，可见近卫声明书实为日本对中国之引饵物，”“近卫三条件，仅为新的二十

---

① 《渝新闻界昨欢迎何登夫人，何对我抗战极表同情，望各界供给宣传材料》，《扫荡报》，1938-10-20（3）。

② BDFA,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Vol. 46, China, p. 378.

③ BDFA,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Vol. 46, China, p. 378.

④ 《英报抨击近卫声明，谓为新的二十一条》，《扫荡报》，1938-12-25（2）。



一条耳，绝对无讨论之余地”。<sup>①</sup>

可以看出，《新闻纪事报》对近卫声明诱降蒋介石、灭亡全中国、排斥西方在华势力、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真正目的看得一清二楚。《华北先驱报》也说，近卫声明就是“对九国公约的新挑战”。它大声疾呼英法荷等国家，在美国的领导下，“不论这些利益相关国家是共同合作还是采取平行行动，只要他们能够及时地全体一致地行动就可以。日本对这些国家在华利益的严重威胁，已经使他们忍无可忍。欧亚之间令人恼怒的问题必须要结束”<sup>②</sup>。

配合着近卫声明，日本政府积极在中国实行日元集团经济发展计划，计划将中国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与日本的资本和技术结合起来，把日本、“满洲国”和中国的工业建设成一个共同的经济实体，并准备大规模推行联银券。如果日本的这个计划实施，不仅会极大地破坏中国的货币体系，也将严重威胁到英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自由和商业利益。

面对日本排斥英国，独霸东亚的侵略态势，克莱琪喊出了“目前是英、美共同向日本经济施压援助中国的时候了”。“因为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中国广大的地区，将来日本面临的经济和金融上的困难局面开始对日本发生影响，美国的态度首次表现出强硬，1938年12月3日以来的一系列声明显露出日本在结束战争后准备破坏九国公约、食言对英、美两国的保证，这就为我们反击日本、消灭日本的这种希望提供了合法理由。”<sup>③</sup>1月14日，他又代表英国政府向日本提出了措辞强硬的外交照会，抨击日本的侵略政策。

对此，《泰晤士报》很快加以评论说：“英国政府昨日所提出之照会，乃以坚决词语说明英国对于此项政策之态度其情词坚决，殆为中国战事发生以来所仅见。”<sup>④</sup>《曼彻斯特导报》评论英国政府对日照会，说该照会“仅有一重大错误，足以引起外界之批评，即此项照会，早应发出也，除此以外，实并无可批评之处。该项牒文措辞之明白率直，为过去八九年来所未有。如政府诚能继续与美国政府亦步亦趋，则吾人有充分之理由，可信日本必能审慎将事，以现在之情形观之，英政府终已循此方针前进矣，此次牒文，谓正义之第一声，亦为英国第一次不拟继续对侵略屈服之表示”<sup>⑤</sup>。《泰晤士报》驻外记者评论说，英国对日照会“足证明各国对于日本在侵犯各国权利之反抗力量，已逐渐增强”<sup>⑥</sup>。

在内外压力之下，英国政府不得不迈出了实际援助中国和反对日本侵略的第一步。在12月20日，英国政府宣布向中国贷款50万英镑，准备用于修筑滇缅公路。对此，《泰晤士报》给予了高度肯定。《泰晤士报》在12月28日指出：“这些贷款是用合法的手段反对非法的歧视，保卫英、美在华利益的共同行动的象征。”<sup>⑦</sup>《泰晤士报》虽然对英国贷款援助中国表示了赞同，但是不无遗憾地承认说：“美国政府在最近几个月中在此地区实行了比其他国家更坚决的措施”，“我们最近十八个月内在远东的政策是值得怀疑的”。同时《泰晤士报》还指出了对华贷款所包含的不可想象的政治意义，甚至愿意承认说正是在这方面即英国与美国对华援助力度上的巨大差

---

① 《英报抨击近卫声明，谓为新的二十一条》，《扫荡报》，1938-12-25（2）。

② I.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1940, p. 169.

③ *BDFA*,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Vol. 47, China, p. 90.

④ 《英、美对倭拟采取同样政策，泰晤士报昨加以评论》，《扫荡报》，1939-1-16（2）。

⑤ 《英报之评论，英国诉诸报复手段，美法当可协力合作》，《扫荡报》，1939-1-17（2）。

⑥ 《英报之评论，英国诉诸报复手段，美法当可协力合作》，《扫荡报》，1939-1-17（2）。

⑦ I.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1940, pp. 178-179.



距,“使美国在世界取得了领导地位”<sup>①</sup>。

3月3日,英国宣布对中国提供500万外汇平准基金,以稳定中国币制。3月9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说,英国对华贷款稳定中国币制的举动,将会受到伦敦商业区的大力支持,特别是会在那些在中国有商业利益的地区,受到极大的欢迎。<sup>②</sup>《泰晤士报》虽然没有承认贷款的政治意义,但是它表示了这是对日本在华币制政策的反击。《新闻纪事报》称:“为维护英国财政经济利益着想,维持华元之稳定,实属必要,如此一端,可知吾国确应援助中国,吾人为本身广大之利益着想,不应听任日本对邻国逞暴不已,为欲加强中国之抵抗起见,对华予以财政援助,即为一法。”<sup>③</sup>

“《财政新闻报》昨日以四栏之地位,揭载专文篇群述日本妨碍英国在华利益之事例,继续鼓吹坚决保护英国在华利益问题。……敦促政府考虑应否更进一步,禁止以大量军需品及其他重要商品对日输出,同时亦禁止日货进口。”《曼彻斯特导报》称:“日本之经济组织,全赖其出口贸易。现日本金准备日益竭蹶,前途危机甚大。……若西方各国直接出面干涉中日事件,实不可能。但英国保护其在华贸易事,乃属另一问题。吾人具有极有力之武器,此时大可一用。”<sup>④</sup>

一些在中国出版的英国报纸,也高度赞扬英国的举动。如英国在上海办的《字林西报》发表社论,说:“欧局既严重转使远东事件退居次要之地位。但从长期观察,可知英人重视远东,实过于其关心欧洲。日本独霸太平洋之企图,其影响之大,过于德意之领土争夺,因一旦日本势力伸入印度洋,则不仅印度、缅甸,即欧洲亦感威胁。”<sup>⑤</sup>“不能说是英国采取的对日本在华经济歧视政策的报复措施,但是它确实是一个极好的、合法的保护英国在华利益的行动。”“这个新的动向……肯定会得到在华英国人的欢迎,因为这是英国处理远东问题态度开始强硬的表现。”该报认为对华贷款援助会帮助稳定中国的币制,会增强中国政府的抵抗能力,会使中国人民和政府继续抗战到底。<sup>⑥</sup>

在英国报界援华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英国政府继续着援华行动,并开始考虑对日本实行制裁。1939年1月5日和6日,在舆论压力下,张伯伦首相先后和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财政大臣西蒙及殖民大臣麦唐纳(MacDonald, Rt. Hon. Malcolm)等会谈,商讨以经济手段制裁日本,提出对日本输往英联邦各地的货物提高进口税。3月30日英国外交部向内阁提交一份备忘录,要求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哈利法克斯在备忘录中,建议废除1931年的英日通商条约,降低日本进口英国各殖民地和自治领的商品限额,提高出口日本的商品税率等。但是英国内阁迟迟没有接受外交部的这个备忘录。

英国内阁没有接受这个备忘录的原因,主要是英国认为,只有英国一国进行制裁,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在没有得到美国政府联合对日制裁的保证之前,考虑到在欧洲形势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英国单独对日制裁会进一步激怒日本,使德意日在联合侵略西方国家利益的道路上日益接近。对这一点,哈利法克斯在与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就远东问题进行会谈时,公开承认。他说:“你自然也知道在欧洲这场大火面前,英国在远东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日本的态度。只要

---

① I.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1940, p. 179.

② I.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1940, p. 189.

③ 《助我加强汇兑平准基金,中英贷款成立》,《扫荡报》,1939-3-10(2)。

④ 《英政府进行考量对日经济报复,中英借款数额将提高》,《大公报》,1939-1-7(2)。

⑤ 《字林西报论远东局势,英国之重视远东之过于其关心欧》,《大公报》,1939-1-23(1)。

⑥ I.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1940, pp. 190-191.

日本仍采取中立，即使是恶意的中立，我们也应该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阻止日本站在德国这一边。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应该不得不去避免与中国进行公开的合作，对日本施以经济上的压力。”<sup>①</sup>所以，尽管英国知道在制裁日本上英国无所作为会使中国失望，但是英国在美国没有采取配合行动的前提下，是不大可能单独行动实行对日本的经济制裁的。虽然这个备忘录迟迟没有实行，但英国开始了事实上的援华抗战。在“七七”事变后英国对华政策曲折发展的过程中，英国舆论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

<sup>①</sup> *B DFA*,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 Vol. 47, China, pp. 283-284.

## 第二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至珍珠

### 港事变前英国的对华政策

#### 第一节 珍珠港事变前英国的援华抗日政策

#####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对英国的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仍然坚持援华抗日的政策。但是英国认为，英国无法单独打赢与日本的战争，如果美国不参加反对日本的战争，那么英国就不可能与日本交战。因此英国的对日政策，紧跟美国对华政策，动摇不定，存在与日本妥协的倾向。

由于英国对日本态度的不明朗，因此日本对英国采取了拉拢的政策。日本参谋部在研究对外政策时，曾提出过“联苏讨英”的政策。这种政策体现在1939年8月28日日本参谋部拟订的《关于对外方针的根本性再检讨》文件中。日本参谋部提出了三种政策，即“联苏讨英、联英讨苏和全面协调”<sup>①</sup>。

日本参谋部的“联苏讨英”方案是：“将苏联的对华活动限制在支那西北地区，在这个思想下指导事变。”该方案规定的“联苏”的方式是，“在军事上和意识形态上互不侵犯，防卫包括满、蒙、华地区。”方案还附有经济协定，规定由苏联提供它本国的矿物和燃料。同时方案认为，划定满、苏、蒙国界要有先决条件：即要充分调查有争议的地区，该地区立即实行互不侵犯。双方确定，日方暂时默许苏方在甘肃以西地区的赤化活动，阻止苏方向该地区以东推进。

至于“讨英”的方式，日本参谋部要求加强同德意合作，协助他们实现各自的欧洲目标；同时，以不惜一切对英一战的决心，对英国在华和在南洋的权益施加强大压力，迫使英方服从我方处理变局的立场。<sup>②</sup>

日本参谋部认为该方案实行后的成果是要“强行建设一个遍及中原的新支那（新政权）”。日本参谋部的考虑是，虽实现日苏妥协，但重庆国民政府对新政权甚至对日本的抵抗依然存在。其结果，中原地区成了缓和设置阻止日苏直接对抗的地带。从处理事变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种针对英国的各个击破之举。

但是日本参谋部认为“联苏讨英”方针难于实现，因为“联苏讨英”的前提，是实行在日本国内的革新，但是要在国内贯彻这个方针，比较困难。<sup>③</sup>其所以困难，是由于这个方案以决心不惜一切对英一战为前提，故很难在国内通过。<sup>④</sup>

另一方面，日本参谋部也曾考虑了“联英讨苏”的方案，即联合英国，反对苏联。但日本参谋部认为这也不可行。日本参谋部认为：“虽然北方已经处于基本解决的态势，但转180度的弯怕相当困难。”

既然上述两种方案都不可行，日本参谋部又提出了“全面协调”方案。日本参谋部的看法

---

① 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第859页。

② 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第859~862页。

③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资料选辑（1931—1945）》，第142页；亦见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第859~862页。

④ 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第859~862页。

是：“全面协调在目前虽然是一种平稳的方式，但系下策：从长远看，走这条道路要有决心割断与事变有关的一切联系，实行自我孤立。”

在比较了三种方案后，日报参谋部的出结论：“因此目前帝国应采取的方针是，从全面协调主义出发，缓和各国对事变的干涉。最高领导机关应伺机转向联英讨苏，通过解决事变和全面作好北伐准备，稳定国内形势并适当增强国力”，“特别要抛弃不成熟的强硬论”。<sup>①</sup>日本参谋部的最后结论，强调了“伺机转向联英讨苏”。这说明在当时，英国还没有与日本勾结在一起，而日本执行着“伺机转向联英的政策”，意在拉拢英国。

这一政策的执行，具体体现在1939年12月28日由日本野村外务大臣、烟陆军大臣和吉田海军大臣联名签署的《日本对外政策的方针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在这个纲要中，他们宣称：“由于欧洲战争的爆发，国际形势发生遽变，在这样的时局之下，帝国所采取的政策，应以建设大动员新秩序为基本目标，除适应形势变化的策略更需加以考虑补充之外”，要制订“当前的重点对外措施”。在这些措施中，日本对对待欧洲战争的方针，是置身事外，采取“中立”立场。但是“如果随着战局各阶段的进展，到各种形势显然有利于帝国参战的时候，那又当别论；目前应根据不介入的方针，最有效运用帝国中立的立场，引导国际形势，以有利于促进处理中国事变，同时，采取措施，造成对建设新东亚新秩序（包括南方在内）的有利形势”<sup>②</sup>。

在运用帝国的中立立场时，《纲要》指出，日本要特别应该考虑到该国对于帝国处理中国事变的赞同之点，和该国对于帝国运用发展的障碍之点，适当地加以安排。“同时，在利用有关欧洲战争的国际形势时，应注视战局变化形势的急转，并注意不放过时机。”<sup>③</sup>为此，他们拟订了对付主要西方国家的方针政策。

在对待苏联上，日本采取和平方式。日本内阁三相在《纲要》中说，对待苏联：“帝国坚定不变的国策，是坚持防共的方针，不过对于苏联，特别是为了设法在中国事变中使两国关系保持平静无事，尤其为了保持国界的安全，并使国界纠纷不诉诸武力，设法用和平谈判的方法予以解决。应讲究必要的外交措施，但是，苏联的政策有时会发生突然的转变，并且他的赤化政策是根深蒂固的，必须不放松警惕。”

《纲要》还考虑了具体的办法，如：为了邦交的平静无事起见，应考虑解决一般的国界问题，并解决通商协定的缔结问题、渔业基本条约、库页岛北部的权利（根本情况，把库页岛北部买下来）等的悬案。而国界问题应用和平谈判方式加以解决，准备设置处理纠纷和确定国界两个委员会。日本还准备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至少以苏联放弃对华援助和撤销威胁日满的军备为前提。但《纲要》认为，在预测证实前，不作正式处理。因此，日方不作这样的提议。而在对方有这样的提议时，应竭力说明确立上述前提条件比缔结条约更为重要，一面利用对方这种心情来促进解决各种悬案，一面应诱使其采取互不侵犯的态度。

对于美国，日本的方针是拉拢。在《纲要》中，三相认为，应防止美国用经济手段阻挠和干涉日本对于事变的处理，至少竭力不让它陷于没有条约关系的状态，同时采取措施，指望在实质上使它对日方处理事变采取赞同态度。日本认为美国对日态度的恶化，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日本的军事行动对在美的美国人或美国的宗教文化设施造成了不良影响；日本的军事行动，

---

① 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第859页。

②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资料选辑（1931—1945）》，第148页。

③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资料选辑（1931—1945）》，第148页。

对于美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造成了影响；第三，美国对于日本所谓的中国新秩序的真相存在着怀疑和不安的情绪，等等。所以，《纲要》要求日本应该进行活动，消除这些原因。一方面，日报政府必须注意不要流露日本的弱点及焦躁的心情。同时，有时又需要稍微表露牵制的手段（应考虑德苏或中南美的关系等）。最后，《纲要》设想，在美国始终用政治意图来限制日本的态度时，还必须考虑相应的措施。<sup>①</sup>

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使美国专心于欧洲战争，又为了防止战祸波及太平洋方面，或者使日本便于实现侵略南洋的对策。《纲要》要求，在必要时应采取适宜的措施与美国取得政治谅解。

但是，在菲律宾问题上，日本不想与美国妥协。《纲要》认为，对菲律宾的独立，要心中有数，认识到这是解放亚洲南部的第一步，并采取措施，消除美国因菲律宾独立而发生对日本的不安心理，并使它不阻挠菲律宾的独立。同时应努力扩大日本与菲律宾的友好经济关系。<sup>②</sup>而对于英国，日本更希望英国保持中立的立场。在《纲要》中，三相称：“应该根据该国表示它在中国没有政治目的的态度，帝国利用它的中立立场，已经对它的在华权益的处理等等，加以因势利导，采取措施，使它不得不逐渐赞成帝国所设想的东亚新秩序的建设。”

为此，日本要采取以下措施：第一，把天津会谈作为进入上述英日谈判的开端，尽快采取善后措施；第二，对于英国提出的和平调停工作，虽然我方对重庆的方针是蒋介石下野和国共绝缘，但从利用英国的观点来看，目前以国共绝缘为先决条件来应付；对于英国在汪蒋之间的协调工作，也要让汪政权用这个原则进行应付。\*

与上述有关中国问题的对英措施相结合，努力利用欧洲形势微妙之处，消除和大英帝国各个地区的通商障碍，并且特别努力使我方有可能向南洋方面发展。<sup>③</sup>《纲要》认为，日本工作的重点，在于使英国赞同建设中国新秩序，首先必须确立建立中国中央政府和调整日华新关系的内容。在缺点之前，主要以测定对方心理和谈判悬案为限度，而不使谈判成为我方的束缚。

一方面，日本要注意英、美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考虑这样的事实：英国在中国有很多的权益，但是没有保护的实力，美国在中国只有很少的权益，但是限制日本的力量却最大。即使英、美有共同的利害关系，也要采取个别的措施，同时竭力用对英谈判的进展，来缓和美国在共同问题方面的对日态度。<sup>④</sup>

日本对法国的政策，与对待英国大致一样。《纲要》认为：“大概以对英措施为准，但特别利用该国在东方的立足点的脆弱性，考虑加以劝导，以有利实行对英措施。”<sup>⑤</sup>随着形势的演变，

---

①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资料选辑（1931—1945）》，第148页。

②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资料选辑（1931—1945）》，第148页。

\* 1938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攻占武汉后，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策略，英、美等帝国主义也一再示意蒋介石与日和议，企图牺牲中国以取得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英国首相张伯伦表示要参加“远东建设”。1939年4月，英国驻华大使往返于东京、重庆之间，进行议和活动。7月，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在天津租界一名汉奸被刺事件，迫使英国与其会谈，并缔结《有田·克莱琪协定》。在该协定中，应该政府完全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的所谓“新局势”。

③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资料选辑（1931—1945）》，第150页。

④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资料选辑（1931—1945）》，第151页。

⑤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资料选辑（1931—1945）》，第151页。



对于法属印度支那特别应采取措施，使它在停止向蒋政权输送军需品，改善通商关系和修改排他性的垄断政策等方面，接受我方的要求。”<sup>①</sup>

在对待德国和意大利的政策上，《纲要》认为：“德苏协定签订后，情况有所变化。但我国应该着眼于德、意两国在建设世界新秩序方面和帝国站在共同立场这一点，继续保持提携及友好关系，大力加以运用，同时里戒与德、意造成隔阂的印象。”<sup>②</sup>

对于荷兰，日本“一方面要考虑该国对于所属东印度感到不安，另一方面诱导荷兰允许我方在东印度有发展的余地。目前的措施，特别是使它对我方从动印度获得必要物资提供方便”<sup>③</sup>

《纲要》还拟订了对泰国的政策，即要“支持其完成真正的独立，并在文化上、经济上使其与我方紧密合作，并在适当的时机，诱致在政治上取得一定的谅解”<sup>④</sup>。

《纲要》所有的考虑，都是以达到日本与英、美合作的目的。在《纲要》的对外经济政策大纲中，日本强调要增进和各国的经济联系，要努力向南方各地区推进经济发展，要“努力纠正帝国的贸易偏向某一些特定国家的依赖关系，特别注意向中南美和向西南亚方面进行经济发展，必须尽快摆脱对英、美的过分经济依赖关系。但是由于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一下子做到，对与英、美两国的关系应以充分注意，努力诱使英、美对新中国经济建设合作”<sup>⑤</sup>。日本此后就执行着这种拉拢英国的政策。

## 二、“珍珠港事变”前英国的对华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英国忙于抵抗德国的侵略，而无暇顾及远东地区，特别是由于日本对英的拉拢政策，使英国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不仅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并且英国的对日政策还出现暂时倒退的现象。在这一时期，英国对华的基本政策，是援华抗日政策。但是在许多问题上，又向日本妥协退让。

英国对华政策，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自私自利的。但从国家利益出发，英国不会赞成日本独占中国，只要日本不放弃独占中国的政策，英国就会反对日本。但是由于英国实力不够，不能武力干涉日本的侵华行为，因此对日政策非常软弱，并且具有妥协性质。例如：1939年8月英国政府对赴莫斯科参加会谈的军事代表团的指示中说，英国代表团应该注意，不管是政治还是军事协定都只能同欧洲有关，不应涉及远东地区。这就说明英国不敢公开得罪日本。<sup>⑥</sup>

---

①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资料选辑（1931—1945）》，第151页。

②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资料选辑（1931—1945）》，第152页。

③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资料选辑（1931—1945）》，第12页。

④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资料选辑（1931—1945）》，第152页。

⑤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96~302页；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料选辑（1931—1945）》，第147~153页。

⑥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料选辑（1931—1945）》，第123页，该指示是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英苏谈判进程的政治备忘录的一部分，此备忘录仅供英国代表团使用，而不得叫给苏方。

又如在日本政府要求下,1940年7月17日英国政府宣布停止滇缅公路军事运输3个月,封闭了我国西南国际交通线。18日英日签署封锁滇缅公路协定,规定日本自本日起3个月内设法与中国成立全面和平。(以滇缅公路断绝中国外来抗日物资之接济,迫使中国向日投降)<sup>①</sup>英国还屈从日本的要求,从中国撤军。1939年9月6日,日本要求英国、法国撤退在华驻军。1940年8月9日,英国陆军部宣布:“驻扎在上海及华北之英军将调往他处服务。”18日英驻天津军队开始撤退。<sup>②</sup>

这些事实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到珍珠港事变前,英国处处对日本退让,容忍了日本在华对英国利益的多次挑衅。

但是英国的根本利益是要保持在华的既得利益,因此无论英国援华政策如何倒退,它都不能容忍日本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只是由于英国力量不足以在远东与日本发生战争。因此虽然在英国援华抗日政策中不断出现倒退的情况,但是英国的倒退是有底线的,即不容许日本独占中国。这从丘吉尔的态度可以看出。

首先,丘吉尔是支持中国抗战的。1940年前后,丘吉尔发表了大量同情中国抗日的言论,例如在1938年10月16日,丘吉尔在对美国人民广播中说:“中国正被日本军事集团撕成碎片,但是可怜的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正在进行英勇顽强的反抗。”<sup>③</sup>

早在同年5月他在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厅还做了题为“武装、立场和契约”的著名讲演。他说:“在远东,人数众多还没有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正受到残酷的蹂躏。但是勤劳、智慧、勇敢的中国人民,尽管没有武器,仍然聚集起来抵抗残酷的日本侵略者。我们相信最终中国人民绝不会被征服。”<sup>④</sup>他断言日本绝不可能征服和剥削四亿中国人民。<sup>⑤</sup>他当选首相后宣称中国的抗日战争对英国在远东的利益是无价的,战后与中国保持友好,意义十分重大。<sup>⑥</sup>

但是在实践中,丘吉尔被迫不断对日妥协。直到珍珠港事件前,他奉行了一条比张伯伦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退让政策。在张伯伦时期,英国还重开了滇缅公路。英国政府通过滇缅公路给了中国一批物资和各种援助,其中包括达八百万英镑的出口贷款。<sup>⑦</sup>滇缅公路是中国对外联系的唯一通路,抗日物资通过这条公路运入中国。但是在日本压力下,丘吉尔在衡量利弊得失之后,把正义、道德以及英国政府对支援中国的承诺统统丢开,于1940年7月关闭了滇缅公路。关闭滇缅公路在中英关系中造成的恶果是十分严重的,遭到了中国人民的愤怒谴责。连英国外交部也承

---

① 袁旭等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记事(一九三九·九——一九四五·九)》,第244页。

② 袁旭等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记事(一九三九·九——一九四五·九)》,第247页。

③ Winston Churchill: His Complete Speeches Vol. 6. (1935-1942), p. 6015-6016 页。

④ Winston Churchill: His Complete Speeches Vol. 6. (1935-1942), p. 5957.

⑤ Winston Churchill: His Complete Speeches Vol. 6. (1935-1942), p. 5957.

⑥ Christopher Thorne, *Allies of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8, p. 67.

⑦ FO731/46232/F1331/409/10, British Foreign Policy Towards China, Foreign Office.

认，中国人民的愤怒不是没有道理的。<sup>①</sup>

尽管丘吉尔执行对日退让的政策，但英国的对华政策的基调并没有改变，即为了维护英国在华利益，英国反对日本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并且在可能的范围内支持中国。例如 1940 年 3 月 14 日，英国、美国通知日本，表示维护《九国公约》，否认汪伪政权。<sup>②</sup>

1939 年 1 月 15 日，英驻日大使克莱琪访问有田并送交照会，请解释近卫去年 12 月声明，并说明“英国仍坚持中国门户开放及机会均等政策，凡以片面手段破坏九国公约者，英国不能承认，但若日本对于修改九国公约能提出建议时，英国也准备加以考虑”等。18 日法国政府也以相同内容照会日本政府。<sup>③</sup>

1939 年 2 月 18 日，世界反侵略大会在伦敦开幕，中国、西班牙等 17 国代表参加。19 日，大会通过援华决议，主张各国对日禁运军火；订立国际协定抵制日货；英法美苏各国切实合作，援助中国制止侵略，并拒不以金钱及其他战争必需品供给侵略者国。<sup>④</sup> 1940 年 9 月 25 日，美国政府再次贷款 1500 万美元给国民政府，即“中美钨砂借款”<sup>⑤</sup>。1940 年 12 月 10 日，英国政府宣布贷给国民政府 1000 万英镑。<sup>⑥</sup>

尽管英国一心要取悦日本，换取和平，但珍珠港事件粉碎了英国决策者对日妥协的梦想。当英殖民地受到攻击后，丘吉尔立即对日作战的决心，而且他发表了公开讲话，向中国人民道歉。他说英国曾被迫关闭滇缅公路，但英中两国一直是朋友，“现在两国又面临共同的敌人”<sup>⑦</sup>。

## 第二节 “珍珠港事变”前英国援华抗日政策

### 产生的原因

#### 一、美国对英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大爆发到“珍珠港事变”这一历史时期，英国的对华政策受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极大影响。由于英国抵抗德国侵略的战争需要美国的支持，在对华政策上，英国不得不向美国对华政策靠拢。

英国的对华政策与美国的对华政策，是紧密联系的。当时美国对华的基本政策，是不允许日本独占中国，也不允许德国称霸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虽然美国中立，但其中立是有倾向性的中立，美国实际上倾向支持英国反对德国的侵略战争。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面对德国的侵略，需要美国的支持，来进行保卫英国的战争。只要美国对华政策不变，英国也不可能单方面改变其对华政策。<sup>⑧</sup>

1940 年 12 月 9 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宣告中、美、英三国命运密切相关，

---

① Christopher Thorne, *Allies of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8, p. 66.

② Winston Churchill: *His Complete Speeches Vol. 6. (1935-1942)*, p. 6525; 袁旭等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记事(一九三九·九——一九四五·九)》,第 233 页。

③ 袁旭等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记事(一九三九·九——一九四五·九)》,第 181 页。

④ 袁旭等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记事(一九三九·九——一九四五·九)》,第 185 页。

⑤ 袁旭等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记事(一九三九·九——一九四五·九)》,第 251 页。

⑥ 袁旭等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记事(一九三九·九——一九四五·九)》,第 258 页。

⑦ Winston Churchill: *His Complete Speeches Vol. 6. (1935-1942)*, p. 6525 页。

⑧ 袁旭等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记事(一九三九·九——一九四五·九)》,第 259 页。

美国将是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并以大批军需物资援助中国。<sup>①</sup> 1941年1月15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发言时声称，美国是不能赞同日本人的，因为他们打算“成为几达世界半数居民所住地区的主人，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无限制地控制太平洋和这个地区的贸易道路”<sup>②</sup>。

1941年3月8日，美国国务卿赫尔与日本驻美国大使野村会谈，拟订了《美日谅解案》，关于中国问题该案规定：美国总统确认下列条件，并在日本政府对此作出保证之后，美国政府据以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和平劝告：（一）中国独立；（二）根据中、日间即将成立的协定，日本军队从中国领土撤退；（三）中国领土不被兼并；（四）无赔偿；（五）恢复门户开放，但其解释与运用，于将来适当时期，有美日两国协议之；（六）蒋政权与汪政权合并；（七）日本对中国大量的、集体的移民，应加以自制；（八）承认满洲国。<sup>③</sup>

4月16日，双方正式谈判，赫尔向野村提出四项原则：（一）对一切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尊重原则；（二）维护对别国国内为体不加干涉的原则；（三）维护包括通商方面机会均等在内的平等原则；（四）除以和平手段变更现状外，不得扰乱太平洋现状的原则。如日本承认此四项原则，即可将上述《日美谅解案》作为日美谈判的基础。由于双方意见分歧，谈判未果。

1941年3月1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广播讲话，声称美国已逐渐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表示援助中、英抵抗侵略，并明言必援华获得最后胜利而后已。这一谈话，对英国继续坚持援华抗日政策，有很大的鼓舞力量。<sup>④</sup>

在美国的影响下，英国的对华政策没有倒退到绥靖政策。相反，英国被迫采取措施，逐步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例如1941年6月11日，英外相白特勒宣称：英国愿于战后放弃在华特权。18日，中英滇缅划界条约在重庆签字。<sup>⑤</sup>

1941年7月4日英国大使卡尔照会国民政府，“俟远东和平恢复时，英国政府愿与国民政府商讨取消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并根据平等互惠原则，修改条约”<sup>⑥</sup>。1941年8月1日，美国宣布禁止油类输日。1941年8月15日，美国宣布自即日起禁止一切货物运日。英国也加以配合。1941年8月26日，英国宣布放弃英本国及自治领印度、缅甸与日本之通商条约，并封存日本。美国宣布封存日本资金。同日，日本宣布封存英国及其自治领印度、美国之资金。<sup>⑦</sup>

14日罗斯福、丘吉尔在大西洋第一次会议发表共同宣言（即《大西洋宪章》）。提出：“两国不要求领土或其他方面之扩张”等八原则。<sup>⑧</sup>

8月18日延安《解放日报》评《大西洋宪章》指出，该宣言“是反对穷兵黩武的纳粹侵略的战斗纲领，是一切爱好自由民主的民族所应加赞扬的”。同时批评宣言中美国对日政策“仍未关闭姑息政策之门。”

8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指出：《大西洋宪章》及提议在莫斯科

---

① 袁旭等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记事（一九三九·九——一九四五·九）》，第259页。

② 袁旭等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记事（一九三九·九——一九四五·九）》，第262页。

③ 袁旭等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记事（一九三九·九——一九四五·九）》，第169页。

④ 袁旭等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记事（一九三九·九——一九四五·九）》，第270页。

⑤ 袁旭等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记事（一九三九·九——一九四五·九）》，第279页。

⑥ 袁旭等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记事（一九三九·九——一九四五·九）》，第281页。

⑦ 袁旭等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记事（一九三九·九——一九四五·九）》，第283页。

⑧ 袁旭等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记事（一九三九·九——一九四五·九）》，第284页。



召集三国外长会议，“乃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从此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阶段”。“即是表明了全世界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伟大战斗阵线一样在政治上完成，而莫斯科会议在将在组织上完成之。”“英、美的慕尼黑政策，只在残酷战争的教训之后，这一错误政策才改变过来。”<sup>①</sup>

1941年10月27日，美国政府宣布，中、英、美三国在香港召开金融会议，讨论援华、支持法币及开发中国资源问题。<sup>②</sup>

英国由于实力的下降，在对日政策上为美国的马首是瞻。而美国对日政策是一贯的，即反对日本独占中国。

在1941年8月14日的大西洋宪章中，美英两国达成了一致。其中有两点涉及中国，即“（二）凡未经有关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的领土改变，两国不愿其实现。（三）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所赖以生存的政府形式权利。各民族中主权和自治权有横遭剥夺者，两国俱欲设法予以恢复。”<sup>③</sup>

1941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以下简称《声明》），在声明中高度赞扬了英、美的这一立场，《声明》说：“关于罗斯福丘吉尔宣言及行将召开的莫斯科会议，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如下：八月十四日美国大总统罗斯福及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联合宣言及提议在莫斯科召集三国会议，乃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从此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阶段，罗丘宣言及其提议召开莫斯科会议，表示了英、美打倒法西斯主义的决心，这种决心是完全有利于苏联，有利于英、美，有利于中国的，有利于世界的。因为过去与现在最大的危险，是英、美内部一部分亲法西斯的反动派，企图违背人民意志，接受法西斯和平，但此宣言拒绝了这种和平。或者主张隔岸观火，让苏联独负消耗法西斯的负担，以便将来乘机取利，但罗丘提议召集莫斯科会议，以便具体分配战争任务与战争资材之行动，则打击了这种消极的企图。只要英、美承认‘解除各侵略国武装是必要的’，主张‘纳粹的最后崩溃’，同意分配战争人物与战争资材，边保证了苏联与英、美的胜利，保证了中国与全世界的胜利。”<sup>④</sup>

在《声明》中，中共中央坚持说：“这又是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结果，中国阻止了日本法西斯匪军的进攻，使得英、美有勇气声明解除一切侵略国的武装。宣言未提日本之名，宣言的第四条暗示可与日本通商及供给原料，第七条暗示允许日本移民，仍有企图拉拢日本维持现状，表示其愿与日本妥协的一面，但宣言的第二条反对强制变更领土，第三条主张恢复被剥夺权利的国家，特别是第八条承认接触一切侵略国武装的必要性，这些都是积极反日的。总之，全中国人民都欢迎英、美宣言。欢迎行将在莫斯科召集的英、美苏三国会议。中国人民相信，这不但是英、美苏三国人民从法西斯威胁下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而且是全世界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而且是我们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sup>⑤</sup>

此后，美国和日本仍然在进行谈判，但是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立场，难于达成一致。例如在1941年11月2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的帝国国策实施要点》中，日本政府的立场

---

① 袁旭等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记事（一九三九·九——一九四五·九）》，第285页。

② 袁旭等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记事（一九三九·九——一九四五·九）》，第289页。

③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料选辑（1931—1945）》，第190页。

④ 《解放日报》，1941年8月20日，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料选辑（1931—1945）》，第191~192页。

⑤ 《解放日报》，1941年8月20日，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料选辑（1931—1945）》，第191~192页。



是：“帝国为了打开目前的危局，达到自存自卫的目的，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先在决心对美、英、荷开战，并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反对武装进攻的时期定为十二月初，陆、海军应完成作战准备。第二，对美谈判，根据附件要求进行；第三，设法加强和德、意两国合作。第四，在发动武装进攻以前，和泰国建立密切的军事联系。但日本政府决定，如在十二月一日上午零时以前对美谈判取得成功，即终止武装进攻。

在对美谈判要点的附件（甲案）中日本强调：“（一）在中国的驻兵和撤兵问题关于本条，鉴于美国方面（一）重视不确定时期的驻兵，（二）对于把驻兵包括在内的和平解决的条件内有异议，（三）关于撤兵要求作出更明确的表示，而暂时撇开不谈驻兵的理由。于实现日、华和平后的必要时间内，为日、华事变而派到中国的日本军队仍应驻扎在华北和蒙疆的一定地区和海南岛。期于军队，在实现和平的同时，就根据日、华两国间的另行规定开始撤退，在两年内撤退完毕。注：如美国方面对‘必要时间’提出质问时，可以这样应付：大概以二十五年为目标。”

在乙案中，又规定：（一）美国政府不得采取行动，阻挠为日、华两国的和平所作的努力。这些都是美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因此谈判只是在拖延时间，双方都明白，日美战争不可避免。<sup>①</sup>

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立即向日本宣战。1942年12月8日，美国罗斯福总统致国会请对日宣战咨文：“余兹请国会宣布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遭受日本蓄谋非法袭击后，合众国与日本帝国间，已处于战争状态。”<sup>②</sup>美国向日本宣战后，英国立即向日本宣战。英国彻底与日本决裂。

重庆国民政府也正式对日宣战。中国共产党非常欢迎这一事态的发展，并愿意与英、美结成反法西斯战争的同意战线。1941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中，强调了“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sup>③</sup>。

1942年2月23日，英国与美国订立了《联合王国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在进行反侵略战争中相互援助所事业原则的协定》。1942年6月2日，中美订立《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至此英国完全站在中国一边，对日作战。<sup>④</sup>

## 二、英国公众和民间组织对英国对华政策转变的影响

在“珍珠港事变”前，英国的对日政策基本上已经形成，那就是援华抗日。但是英国全力在欧洲对付德国，无力东顾，因此维持着与日本的关系。在英国对日政策的这一转变的过程中，英国公众和民间组织起了较大的作用。

与英国政府的态度比较起来，英国民间团体和人士对中国的态度更加多了许多理解、支持，对日本的侵华行为更多了些谴责和抨击。早在1935年，一部分同情中国的英国人士就组织了“中国人民之友社”。它的行动纲领的主要精神是：政治上帮助中国解除不平等条约束缚，求得绝对的自由平等；道义上对中国一切天灾人祸进行救济工作。

“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之友社”做了许多宣传和募捐工作。由于感到该组织缺乏有社会基础的团体参加，不能适应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从而产生了1937年9月23日成立的英

---

①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料选辑（1931—1945）》，第204~206页。

②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料选辑（1931—1945）》，第224页。

③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料选辑（1931—1945）》，第232页。

④ 袁旭等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记事（一九三九·九——一九四五·九）》，第317页。

国援华会。英国援华会的任务是向中国提供医药和衣服等慰问品的援助；在英国国内，并通过国际组织向世界进行援华制日的鼓动宣传，号召抵制日本贸易，尽可能援助中国；提供揭露日本侵略的宣传材料并组织宣传等。

英国的许多团体和知名人士在英国援华会的带动下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战。他们在道义上声援中国，还以抵制日货、拒绝装卸日货和运日物资、向中国捐款等实际行动支援中国抗战。英国工会是最早号召抵制日货的。1937年7月，运往日本的英国船只“西凡蓝勒克号”载汽油停泊在香港，英国海员实行罢工，拒绝工作。<sup>①</sup>以后，英国的运输工人和码头工人拒运日货的运动此起彼伏。8月24日，工党全国委员会强烈谴责日本的侵华行径，要求英国政府与美国采取一致措施维护英国在华利益和尊严。9月29日，英国劳工运动全国执委会决议要求政府禁售军火给日本，以药品援助中国，并向国际联盟建议各会员国普遍抵制日货。

在劳工运动全国执委会的倡议下，从“卢沟桥事变”后到1937年底的几个月中，举行抗议日本侵略、声援中国抗日集会的英国劳工团体还有许多，如南威尔士新埠的码头工人、哈尔特爾普尔铁路工人、格拉斯哥职工委员会、运输工会伦敦区委员会等。<sup>②</sup>

总之，包括反对党在内的英国社会各界力量和团体以及个人，多数主张英国应该改变英国在“九一八”事变中的消极态度和作为，采取对日强硬立场，并积极与美国等国家合作解决中日之间的冲突。他们的态度，极大地影响了英国政策的对日政策。

1937年9月26日，英国外交部前次长亚克兰发表谈话，主张英、美、荷三国联合抵制日货。10月1日，英自由党领袖辛克莱在伦敦白场教堂集会上演说，英下院议员劳合·乔治女士在北威尔士自由党联合会上演说，一致主张抵制日货。10月3日，英国工党举行年会，会上有代表发言呼吁英国联合美国和国联成员国共同想日本施加压力，制止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这位代表认为，日本经济地位很虚弱，如果英、美等国家联合起来抵制日货、拒绝向日本提供任何的财政援助，将很快会使日本经济陷入困境。10月8日，伦敦各界代表在伦敦市长寓所集会，讨论援华问题。10月11日，英国各界群众2000多人在伦敦集会，抗议日本侵略中国，要求政府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并号召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同日，90位英国著名科学家合教授致电中国政府，声援中国抗日。这些活动向英国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在国内的强大压力下，英国对日政策日趋强硬。<sup>③</sup>

### 三、日本扩大侵略迫使英国改变了其对华政策

日本扩大对华侵略，危及英国在华利益，这是英国对日政策日趋强硬，并坚持援华抗日政策的最主要原因。

“卢沟桥事变”以后，英国对日态度从软弱转为日趋强硬，其对日政策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绥靖政策，而是一种自私自利的、有条件的、逐步形成的援华抗日政策。这种政策的转变，除了美国的影响、英国舆论的影响和英国公众的努力外，还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

首先，日本在中国扩张不仅危及英国在华权益，而且还将危及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殖民地的安全，因此英国希望中国战场能够拖住日本，以寻求东南亚殖民地的安全。但是由于英国在远东地

---

<sup>①</sup> 《解放日报》第17期，37年9月25日。

<sup>②</sup> Nicholas R. Clifford, *Retreat from China, British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37-1941*, Longmans, 1967, p. 32.

<sup>③</sup> Nicholas R. Clifford, *Retreat from China, British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37-1941*, Longmans, 1967, p. 32.

区防务力量较弱，无力同日本抗衡，所以在对日态度上表现软弱。但总的来说英国对中国给与了同情和支持，希望中国战场消耗日本的力量以使其无力威胁到英国东南亚的殖民地。这正如布拉德福德所指出的那样：“只要日本深陷于中国，英国在南方和西方的利益看来就很安全。”伦敦担心如果日本打败蒋介石，他们将毫不客气地攻击英国的亚洲和太平洋帝国。因此，英国倾向于将中国看做帝国防御的第一道防线。这是英国在对日态度软弱，但同时又给与中国一定支持的原因。<sup>①</sup>

日本在占领北京和天津后，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东南部，特别是指向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上海。日本这样跳跃式地由华北的平津转向上海，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其一，上海离中国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可以说是近在咫尺，是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利益的心脏所在，日本认为占有上海就是征服了中国国民政府。其二，上海是世界资本主义通过金融、贸易、交通、工业、航运等事业获取重要利益的大城市，也是日本与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利益矛盾的集中地。日本如果占领上海就可以取代英国独霸在华利益。其三，日本向上海的侵略，可以有效地扩大侵华战争，迫使中国国民政府屈服，摧毁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尽早结束对华战争，然后准备和实施向北或向南的进攻战略，进攻苏联或配合德国和意大利进攻英、美，以达到共同称霸世界的目的。所以，战火很快蔓延到了上海。

英国虽一直极为关注并忧心于上海的局势，却无力阻止上海“八一三”事变的爆发。开始，英国抱着让中日双方和平解决问题的希望，向双方提出种种方案皆以结束战事为目标。可是，事态逐渐在按照英国所不希望的方向发展，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一步步丧失。于是，英国对日本的政策更加趋于强硬，英国与日本的关系也迅速恶化了。

接着，英日之间于1937年8月26日又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摩擦。英国驻华大使许格森在乘专车从南京到上海的旅途中遭到两架日本飞机的轰炸，身受重伤。但是英国除了抗议外，别无选择。特别令英国担忧和恐惧的是，日本还在8月25日宣布封锁从香港至上海的沿岸地区，这使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受到了更加严重的威胁，因为英国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区就是中国南方和沿海地区。英国认识到：对日本的软弱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只能使自己在中日冲突问题上越来越被动。<sup>②</sup>

以上两件事最终促使英国逐步改变其对日本的软弱立场。此后，在中日冲突中，英国的立场已经越来越明显，即尽可能协助中国抗击日本；而英国对于中国的立场偏向以及对日政策的日趋强硬，进一步导致了英日矛盾的激化。

1938年5月7日，英国驻华大使许格森向英国外交部建议，应该援助中国。英国政府开始采取措施援助中国。例如重开了滇缅公路，让抗日物资运送到中国。英国政府通过滇缅公路运给了中国一批抗日物资，还给了中国800万英镑的出口贷款（1938年12月20日英国宣布给予中国50万英镑的贷款，后扩大为300万英镑；1939年3月10日订立了500万英镑外汇平准基金贷

---

<sup>①</sup> Bradford A. Lee, *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3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8-21.

<sup>②</sup> 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书名、卷数及页码）。

款)。1939年1月,英国对日本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进行了反驳。<sup>①</sup>

1938年10月16日,丘吉尔在对美国人民的广播中歌颂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说:“中国正被日本军事集团撕成碎片,但是可怜的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正在进行英勇顽强的抵抗。”他相信中国人民绝对不会被征服。英国的对日政策日趋强硬。<sup>②</sup>

其次,英国不愿将中国推向苏联的怀抱。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使得英国对苏联有着仇视,担心苏联对中国局势的干预将“导致某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席卷中国,并且在印度和缅甸的边界上树立起苏联的影响力”<sup>③</sup>。

“卢沟桥事变”后,苏联马上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无耻侵略。1937年7月1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接见中国驻苏大使,明确表示苏联愿意援助中国抗日。英国并不乐意看到中国与苏联达成互助协定,英国担心苏联对中国提供武器、设备、军事顾问、飞机以及飞行员等方面的援助,担心这种对华援助会更加促使中国倒向苏联,“英国害怕苏联影响的日渐加深将是英国确保在华地位的绊脚石”<sup>④</sup>。因此,出于这种考虑,英国“卢沟桥事变”以后对日政策日趋强硬,对于中国道义和外交上的支持也越来越多。

第三,英国考虑到,如果日本在中国战场迅速取得胜利,那么就极有可能抽出手来与欧洲的德国、意大利这两个法西斯国家联合,对欧洲形成三面夹击之势,这势必会极大地危及英国本土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安全。

最后,中国人民英勇的抗日斗争和中国国民政府军事上的积极准备以及蒋介石等国民政府领袖面对最后关头的决心和勇气,促使英国实行支持中国的政策。“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召开了各国记者招待会,坚决表面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他分别会见了英国大使许阁森、美国大使詹森、德国大使陶德曼、法国大使那齐雅。

中国国民政府在“卢沟桥事变”后积极向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大国寻求支持援助,如派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出面请英国公使出面解决日本侵略中国问题等。

蒋介石和中国政府的积极外交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英国对日华政策的转变。英国在“卢沟桥事变”后,一直与国民政府保持外交关系,而没有承认汪伪政权。

由此可见,尽管英国特别是英国政府对中日冲突问题上的态度,在“卢沟桥事变”后呈现出复杂的特点,但总体上是援华制日,而不是绥靖。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与当时英国所处的国内外形势密切相连。因为在欧洲形势已经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日本在中国战场的速胜必将使欧洲局势雪上加霜,英国对此十分忧虑,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英国的远东政策发生转变,即越来越偏向于中国,希望日本长期身陷于中国战场,无力与德国和意大利一起夹击欧洲,以保护英帝国的根本利益包括其在华利益。

---

① 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第2页;胡德坤:《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书名、卷数及页码)。

② Winston Churchill: His Complete Speeches Vol. 6. (1935-1942), New York, 1978, p. 6015-6016.

③ Bradford A. Lee, *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3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8-21.

④ 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北京师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书名、卷数及页码)。

英国对中国和日本外交政策的转变，深刻地体现了英国外交政策中的保护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务实原则，这种务实原则是英国外交的传统。正如人们熟知的即英国 19 世纪的首相帕麦斯顿所说：“英国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大英帝国永久的利益。”的确，在英国看来，维护英国乃至整个大英帝国的利益，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卢沟桥事变”以后英国对日政策走向强硬。因为，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已经危及英国的在华权益和远东利益，英国必须做出这种与日本疏离而与中国友好的现实选择。而实际上，各国政府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或根本立足点，无不为本国争取和维护最大限度的利益。在中国抗战期间，各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也基本上根据这个原则。各国自身的利益决定了对华的亲疏和敌友关系。利益所驱，态度多变，是各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真正写照。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与美国一起，已经考虑到与日本发生战争的可能。英国参加了 1941 年 1 月在华盛顿召开的英、美联合作战计划会议，会议制定了一旦对日战争爆发，英、美对日战争的战略计划。这个战略，就是著名的英、美联合战略 ABC-1 作战计划。<sup>①</sup>

不过，无论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对日政策的出发点是什么，英国对日政策从绥靖转变到援华抗日，对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孤军奋战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和帮助。

---

<sup>①</sup> 马振犊：《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265 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书名、卷数及页码）。



###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

#### 英国对华政策

#### 第一节 珍珠港事变后英国的对华战略

##### 一、“先欧后亚”战略指导下的对华政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推行“欧洲第一”的战略方针，把全力运用于欧洲战场，而忽视亚洲战场。在这一战略指导下，英国的对华政策，是既要维持中国的抗战，又要防止中国通过抗日战争而变成强国。同时由于英国的衰落，也无力给中国较多的援助。因此英国奉行对中国援助口惠而实不至的政策。这种政策，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

“先欧后亚”战略，是美国首先提出来的。1940年9月28日，面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由美国总统罗斯福主持，召开了有美国国务卿和美国三军首脑高级领导人等参加的会议，研究一旦美国参加对日战争时的战略方针。会上，美国确定了“大西洋第一，欧洲第一”的基本战略。<sup>①</sup>

1941年1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英、美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上，美国提出这一战略，立即得到英国赞同。这样“欧洲第一”战略，就被列入了英、美联合战略ABC-1作战计划中。从此“先欧后亚”战略，成为盟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全球战略。<sup>②</sup>

这一战略的提出，具有深远的影响，在反对法西斯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英国所想的“欧洲第一”战略与美国提出的“欧洲第一”战略不同，其侧重点也不一样。英国的“欧洲第一”，实际上是“地中海第一”。其内容是先在北非作战，然后发动地中海战役，夺取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再进攻德国。英国偏爱这一战略，首先是因为这一战略方便英国对德国和意大利作战；其次这一战略有利于英国维护其战后在地中海地区的殖民利益。北非和地中海地区，是英国的传统势力范围，英国绝对不肯轻易放弃。

英国还企图利用“欧洲第一”战略，为其在远东的殖民主义政策服务。英国在“欧洲第一”战略的借口下，消极抗日，不愿增加对中国的援助。英国知道，在打败德国后，日本的失败就是时间问题。有强大的美国为后盾，英、美军队到远东打败日本，将必胜无疑。到那时，英国就将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在远东。那么战后英国可以继续其称霸远东的殖民主义计划。因此英国的“欧洲第一”战略，从一开始，就带有双重目的：既可以集中全力在欧洲打击德国，确保其在地中海地区的殖民利益；又可以用“欧洲第一”战略为借口，借用日本人之手，削弱中国的军事力量，维持远东僵持的战争局面，使中国被战争拖累，不能强大到战后威胁英国在远东的殖民主义统治。

而美国的“欧洲第一”，与英国不同。美国主张以英国为基地，在欧洲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直接与德军决战，打败德国。这表明，在“欧洲第一”的战略上，即使在对欧洲战场如何进行，英、美双方都存在分歧。<sup>③</sup>

美国最初全力贯彻“先欧后亚”的战略，忽视了中国战场。因此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不是数量太少，就是迟迟不能落实。例如1942年6月，美国军方甚至将原已确定加入中国战场的空军

---

① [美] F. 戴维斯、E. K. 林德赛：《战争是深夜到来的，从法国沦陷到珍珠港——美国的白皮书》，纽约：1942年版，第157页，转引自马振犊：《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第265页。

② 马振犊：《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第265页。

③ M. Howard, The Mediterrean Stratedge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68, p. 7.

调往非洲。<sup>①</sup> 1943年1月，罗斯福与丘吉尔等在北非的卡萨布兰卡召开军事会议，再次确定以欧洲战场为重点。但是在1943年后，美国看到了太平洋战争的重要性，认识到在贯彻“欧洲第一”战略时，不能不顾亚洲战场，而要支持亚洲战场。因此美国开始两头并重。在对德战争的同时，进行对日战争。因此美国主张早日发动缅甸战役，支持中国抗日。

英国本土受到德国的袭击，自顾不暇，无力东顾，对中国援助不多，这是可以谅解的。但是英国殖民主义的对华政策，不利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进行，给太平洋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造成了损失。因此英国“欧洲第一”的战略，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反对。中国各报，都载文批判“欧洲第一”战略。旅居海外的华人，也在英、美等国发表文章，反对英国“欧洲第一”的战略。

为了贯彻英国“欧洲第一”的战略，消除中国人民对“欧洲第一”战略的反对，改善中英关系，英国政府加强了对英国舆论的控制，并精心制定了一个对华宣传计划。

## 二、英国政府利用舆论宣传英国的对华政策

英国政府对舆论的控制是非常严密的，英国政府一贯利用舆论贯彻自己的对华政策。在英国政府的控制之下，英国报界紧跟政府，宣传政府的战略和策略。例如，英国政府关注的重点是欧洲战场，那些紧跟政府政策动向的报纸，特别是《泰晤士报》等，自然也把报道的重点放在了欧洲战场上。报界关注的重点是欧洲事务，对远东和中国战事的报道篇幅大幅减少，同时报界所反应的舆论倾向与政府的政策倾向更加一致，即使对英国政府的制日不力和援华不力，甚至损害中国抗战的决策，报界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抗议性的报道和评论。

到了40年代，由于法国沦陷，英国孤军奋战，当时英德之间的战争异常凶险和激烈，所以英国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舆论的控制。英国国家信息部给所有英国驻华的领事和大使发出指示，要求在中国开展英国政府控制之下的宣传活动。信息部规定，在日占区进行宣传要谨慎从事；上海、广州、天津、北平和厦门等地方的宣传活动必须要由英国或国际控制进行；在重庆昆明桂林贵阳等地，要特别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并在这些地方建立了强大的广播电台，帮助进行宣传。<sup>②</sup>

英国在国内对报界还进行了整顿，封闭了一些左翼报纸，如英国共产党的喉舌《工人日报》被关闭，而这家报纸和其他一些左翼报纸，一贯热烈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批评英国政府援华不利，疾呼英国政府应该加大对中国的援助。

因此，在这样的控制之下，英国报界对中国抗战报道的篇幅，在数量上大幅减少，同时在报道倾向上与政府政策更加一致。但是英国比较是一个标榜“自由”的国家，英国政府无法控制所有的报纸。因此有的独立的报纸要求政府援助中国。如在欧洲战争刚刚爆发之时，《曼彻斯特导报》等多家报纸发表文章指出“在远东方面，英法苏三国利益完全一致，与日本帝国主义之利益及目的则截然相反，故三国应以现实主义之态度，积极合作，以援助中国”<sup>③</sup>。但是这些呼吁，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

当英国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在1940年7月17日做出关闭滇缅道路三个月的决定之后，英国国内的报纸却表现得十分沉闷，《泰晤士报》驻外记者仅在其文章中轻描淡写地称，“关于

---

① 杨天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宋美龄与丘吉尔》，《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4日。

② B DFA,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es E, Asia, Vol. 48, China, p. 371.

③ 《牛津大学名讲师主张，英、美法苏援华征倭，协力维护四国远东利益》，《扫荡报》，1939-11-25（2）。

日本要求英方禁止军火经由缅甸输入华问题，英方所作之临时让步，会引起美方非官方人士之批评”<sup>①</sup>。而全然不顾中国政府向英国提出的最严正的抗议。因为英国的这个决定，将断绝中国战时最重要的国际通道，切断外部世界对中国人民提供军需品和其他必需品的供应，而且也完全违背了国联曾经多次做出的不得以任何方式削弱中国抵抗力的决议。

英国政府后来在三个月关闭期限结束后，重新开放了滇缅道路，但是英国的关闭举动给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造成的重大打击，对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带来的严重影响却是不可挽回的。更重要的是，日本通过丘吉尔关闭滇缅道路这个决定，看穿了英国在远东政策的矛盾之处和虚弱地方，因此不久之后，他们就终于决定对英国在东南亚的帝国利益彻底开刀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联合国宣言》正式发表，中国和英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同对德、意、日法西斯国家进行作战的盟国。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为两国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双方在互相援助和合作问题上更进了一步，英国对中国除了在物质和贷款问题上援助之外，在军事上双方还进行了初步的合作。

在对华政策上，英国政府利用国内外的宣传机构和媒介，宣扬中国政府领导的军民共同参加的抗日战争中的英勇事迹，这为双方的继续合作提供一个舆论上的环境和基础。但是由于中英两国战略目标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加上历史上形成的各种复杂问题，以及以丘吉尔为首的英国政府在对华思维和政策上，仍经常暴露出来的殖民主义倾向，这些情况和问题的存在为两国在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合作蒙上了一层阴影，影响了两国的战时合作，也影响到了包括英国报界在内的新闻部门和媒介对中国的报道倾向和特点。

英国对华外交政策中的这种思维和倾向，充分反映出英国舆论完全是政府主导的特点，以及反映出英国对华政策宣传中，始终存在着殖民主义色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政府加强了对国内舆论的控制工作和宣传工作。在战争爆发的前夕，长期担任《泰晤士报》主编的杰弗里·道森退休，原来的副主编巴林顿·沃德出任主编，沃德是一名保守党人，与道森一样坚持绥靖政策，但是他在1941年就任《泰晤士报》主编期间，绝对支持政府进行抗击纳粹侵略的斗争，实际执行了一条中间偏左的路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驻华使馆在英国外交部的指示下，日益重视对华宣传。特别是薛穆（H. Seymour）在1942年初就任英国驻华大使后，对英国在中国的宣传工作十分重视。他在到达重庆的第一个重要工作是在驻华大使馆中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成立的新闻专员室改造为新闻处，在昆明、成都、桂林等地的英国领事馆设立了公共事务局。目的是为了适应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的新形势，特别是为了适应英国在亚洲的一个重要殖民地新加坡陷落后的新形势。因为，在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利益遭受到日本侵略而带来的重大打击之下，为了与中国等反法西斯盟国联合作战，有必要更好地开展对华宣传事宜。

英国政府加强对华宣传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服务于英国国家利益。对华宣传的政策是由英国情报部制定的，情报部的首任部长是丘吉尔的私人秘书布拉根，情报部远东司司长瑞德曼侨居日本16年，曾到过中国沿海各省，熟悉中日两国情形，该部门该聘请了多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在这些官员和专家的努力下，新闻处很快在中国出版了一些每日英文新闻小报，这些新闻小报主要在重庆、昆明和成都三地出版，然后分送到中国各省和各种教会组织中。

英国在对华宣传政策上，围绕在抗战时期中英之间矛盾比较多的问题如印度问题、香港归还问题、缅甸战役问题、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方针问题上，特别表现出避实击虚的特点。“对于其

---

<sup>①</sup> 《英停止某种物品经缅输华，我向英提最严重抗议》，《扫荡报》，1940-7-16（2）。

真正企图讳莫如深，面对其力所不能及之或心所不愿为之事，反振振有词。”<sup>①</sup>

如在对印关系问题上，由于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大贡献和作用，由于美国的支持，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不断上升，并成为世界四强之一。英国对此十分地轻视，以丘吉尔为首的具有强烈殖民主义主张的政府首脑多次发表带有殖民主义倾向的、有损于中英关系的言论，同时又对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壮大，在美国扶持之下成长起来的这个地区和世界大国——中国十分地担忧和恐惧，担忧中印两国战时关系的加强，恐惧中国对印度影响的加深，会带来印度独立运动的发展，并最终脱离英国走向独立。

所以，英国对一切“中国对印之态度及对英印关系之舆论，异常为英方注意。英国新闻处在华编印及运送来华关于印度问题之宣传品殊多。目的不过在为其帝国主义立场辩解及混蒙我国人民对于印度问题之了解。许多关于英国与远东之问题常被伦敦运来之宣传品中删去”<sup>②</sup>。

比如关于香港问题，英国在对华宣传中对日本投降后将香港归还中国闭口不谈，反而对战后英国殖民地的加强喋喋不休。“英最近出版物中固有论及此，而在华宣传品则终未提及一字。但是对于战后英国必须维持其远东殖民地及英国新殖民观念并战后殖民政策，此一类题目在对华宣传品中时常见到。”<sup>③</sup>

在缅甸战役问题上，中国国内舆论对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上勇敢作战的事迹，经常予以大量的报道，这使英国感到不快。于是，英国针锋相对，在中国出版了大量的新闻小报、小册子、地图等，在上面登载英国在缅甸境内的作战实况，大肆宣传英军在缅甸战役中的丰功伟绩。英国的目的很明显是害怕中国在缅甸影响的加深，会导致缅甸与中国关系的不断紧密。“中缅历史关系使中国人民对于国军在缅战绩，油然而有一种新感觉，此点英方颇疑虑，国军入缅，英方不免如芒刺在背之感，故英新闻处极力宣传英缅关系及东南亚盟军总部之复缅计划等复表扬英军在缅战绩，其用心可知。”<sup>④</sup>

对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方针，即“先欧后亚”问题，“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中国政府对于英国政府内宣扬欧洲第一的言论再三表示不满，尤其对于英国没有给予中国抗日战争以有效的援助，时有责难”。英方宣传机构经常“阐说英国军政领袖对于中国之保证……但又辩护欧洲战争之较东方为重要。”当中国舆论怀疑“英国在欧洲胜利有把握之时，其对日态度将有变稳之可能。……伦敦情报部请军事记者撰文，重申英国对日之军事上积极准备以及英国之不忽视日本为一强敌，为达此宣传目的，又特派相关新闻电记记者多次来华。”<sup>⑤</sup>

对丘吉尔经常发表的对华殖民主义言论，英国对华宣传却经常或者装聋作哑，或者百般辩解，“丘吉尔演词批评美国对华之援助为‘过分’，我国舆论沸然，对丘吉尔此言殊表不满，但英方始终认为系我通讯社误译此字。官方对我国批评未作正式答复，而宣传亦未作正面解释，但其后时时藉暗示方法之宣传，说明英国同情中国之需要更多援助，并指出英国正积极设法以物资援助中国”<sup>⑥</sup>。而对蒋介石所写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对蒋介石提出在战后收复香港、西藏、台湾等地区，实现国家的大统一，英国社会上下却是如临大敌，大肆宣扬蒋介石等中国领导人身

---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关于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之活动》，档号：18-1654。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关于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之活动》，档号：18-1654。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关于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之活动》，档号：18-1654。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关于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之活动》，档号：18-1654。

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关于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之活动》，档号：18-1654。

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关于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之活动》，档号：18-1654。



上和中国的政策中所体现出来的所谓的殖民主义色彩。

当然，太平洋战争时期中英两国间出现的种种问题，大部分是由于涉及国家利益而出现的，但是有些情况也与双方对彼此的误解有关。所以英国驻华使馆新闻专员局，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1941年8月，就向英国外交部建议希望外交部派人到中国访问，改善双方的关系。1941年10月，卡尔大使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外交大臣艾登考虑到战时交通困难，所以没有成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显得紧迫起来，卡尔在离任之前再次致电英国外交部，英国外交部认为虽然这时的交通状况更加困难，但是两国既然已经成为共同作战的盟国，又考虑到日本猖狂的侵略气焰和行为，所以觉得任何有助于中国能够继续对日作战的行动都是值得采取的。<sup>①</sup>

因此在英国驻华使馆新闻处和外交部的努力下，1942年末英国议会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一个月的友好访问。这种友好访问对消除彼此之间的误解，加强双方的了解和合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次英国议会代表团对中国的友好访问也促成了1944年中国代表团对英国的访问，并由此引出了中英两国新闻界的第一次正式接触。

但是在太平洋战争时期，由于英国已经对日宣战，1941年12月8日，日本轰炸了位于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在偷袭珍珠港后仅数小时，便轰炸了香港启德机场，12月25日香港沦陷。所以英国报界对华报道的增多和援华的呼吁力度不断加大。

在太平洋战争时期，英国报纸对中国的报道，相对欧洲战争爆发到太平洋战争开始这段时期要多一些，而且对中国的报道，多为赞颂中国人民抗战的成就和坚持抗战精神的正面报道。如在“卢沟桥事变”四周年时，许多报纸盛赞中国抗战。《曼哲斯特导报》称：“四年前日本开始对华作战……迄今则尚不能结束之，日本虽曾有若干胜利……但其官兵阵亡累累，国内之困难日增，反观中国精神，毫不动摇，战斗意志仍很坚强，殊非日本始料所及。”《泰晤士报》以“中国继续作战”为题，对于日军在中国之破坏行为及日本利用傀儡组织，痛加抨击，赞扬中国军民继续勇敢抗战。<sup>②</sup>

对中国军队在1943年12月成功在湖南常德遏制住了强敌的进攻，英国报纸予以了高度评价。“伦敦两大著名日报今日刊载常德胜利消息，并特别强调我军英勇作战使日军直驱长沙之企图，终被遏阻。”《新闻纪事报》以首页全版篇幅登载该报特派记者描写的常德会战情形，称常德之战为：“中国饭碗之战”，该报道长达四百字的篇幅叙述了常德战役的始末，在结语中说：“外国观察家咸视常德之役为中国重要之胜利。”《泰晤士报》在社评中赞美中国守军，“常德之胜利，殊令人兴奋……常德除为粮仓外，且具战略上之重要性，故无怪日军之猛攻及中国军队之英勇抵抗，又谓：日军进攻常德，不仅企图独占此粮食仓库，且欲囊括长沙……”<sup>③</sup>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英国各报纸呼吁英国政府要加紧援助中国：《每日快报》强烈呼吁英国加大对中国的援助。《每日电讯报》描写说：“运往中国的援助是保障远东这个自由国家的关键。”《新闻纪事报》说：“就目前的远东而言，中国失去，就意味着所有的都失去了。也请记

---

<sup>①</sup> B 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5, Far Eastern Affairs, p. 138-139.

<sup>②</sup> 《我神圣抗战四周年纪念，英、美舆论一致赞扬》，《扫荡报》，1941-7-9（2）。

<sup>③</sup> 《常德之战，英伦各报备极赞扬》，《扫荡报》，1943-12-15（2）。



住，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对世界前途起到如此大的作用。”<sup>①</sup>

《泰晤士报》在一篇社评中说：“现各国深刻不容缓之工作，端在支持中国。至下月为止，中国从事于自卫抗战，已五年，在此长期之痛苦中，中国之心灵与组织曾受沉重之伤痛及多次之凌辱，但其英勇之精神，则迄无丝毫动摇，且不论侵略者今后能再攻陷若干土地，此项心防绝无被敌攻陷之可能。……惟中国之需要援助，则属孔急，中国所获得之同情，也已至最大之程度，但中国抗战之儿女……获得左券，则彼等需要坦克，大炮，飞机及现代战争中一切器械。中国之人力无缺，而租借协定则为中国获得充分装备之保证。”<sup>②</sup>

英国舆论为政府操纵，宣传了政府的对华政策。但是由于英国政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对华关系的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坚持殖民主义的立场，因此在这些问题上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为了消除中国人民的反对。英国政府还专门制定了对华宣传计划。

### 三、英国对华宣传计划

旅美中国著名作家林语堂。1942年3月21日在美国发表了《亚洲之命运》一文，点名批判丘吉尔和英国的“欧洲第一”战略。在文中，林语堂写道：“四天之前，即三月十七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十分露骨地说英国的殖民地，包括印度、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必须继续由英国统治，这是大英帝国唯一的责任。”<sup>③</sup>

林语堂认为丘吉尔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表明了英国的观点，即战后亚洲必须继续维持殖民统治。<sup>④</sup>林语堂据此断言，英国一再强调的第二次世界的战略方针“欧洲第一”，即一切为打败德国是殖民主义的阴谋。其目的是打击中国，反对支持中国抗日，从而削弱战后中国在谈判桌上的地位。这样在希特勒被打败后英国就可以高唱到亚洲来“拯救”中国的调子。那么，“被拯救的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主要打败日本的胜利国之一。这样白人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巢穴就会十分安全”。林语堂强调“欧洲第一”这一战略方针的制定完全是上了英国的当，这是英帝国主义的策略。<sup>⑤</sup>

在“亚洲之命运”一文中，林语堂公开批评丘吉尔，说由于英国精心策划，一切都按英国意图在进行，“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英国要关闭滇缅公路和削弱中国，为什么英国要拒绝帮助中国建设自己的空军。从帝国主义的战略观点来看，这些问题就可以一目了然”。林语堂讽刺说：“维多利亚女王的大英帝国缺乏一位有才干的首相和更多有献身精神的官员。丘吉尔辈缺乏洞察力、勇气、远见卓识和较好的政治素养。”<sup>⑥</sup>

除了林语堂以外，中国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权威钱端升和陈朗川教授，也著文批评英帝国主义和英国对日作战不力。此外重庆、昆明、贵阳等地的中国各报，都刊登了反英文章。这些文

---

① Christopher Thorne, *Allies of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8, p. 193.

② 《英、美援华之声，泰晤士报盛赞我五年抗战》，《扫荡报》，1942-6-8（2）。

③ [WO371, PRO], WO 为英国国防部，PRO 为英国国家档案馆，FO 为英国外交部，下为 [FO]；FO371/35689, F3563/10/10, Copy “The Future of Asia”, Lin Yu-tang, 21 March 1942.

④ FO371/35689, 15, FO371/35689, F3563/10/10, Copy “The Future of Asia”, Lin Yu-tang, 21 March 1942.

⑤ FO371/35689, F3563/10/10, Copy “The Future of Asia”, Lin Yu-tang, 21 March 1942.

⑥ FO371/35689, FO371/35689, F3563/10/10, Copy “The Future of Asia”, Lin Yu-tang, 21 March 1942.

章，反对英国“欧洲第一”的战略，要求立即废除列强在华的各种特权，在亚洲实现《大西洋宪章》提出的各项自由权利。中国的反英舆论，使美国公众产生了反英情绪。而美国公众对英国的不满，就引起了英国政府的高度重视。<sup>①</sup>

英国非常重视美国舆论界的态度。这不仅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需要大量美援进行战争，而且战后英国的国家利益和英国的世界利益，也都需要美国的支持。英国需要调整对华政策，以平息美国人的愤怒。

英国政府对中国报界推动的反英运动，万分惊恐。因为英国政府深知英国公众对中国知之甚少。由于两国远隔千山万水，加上交通不便，两国人民更缺乏了解。英国人民主要通过读报来了解中国。所以英国政府对有关中国报界的反英文章十分重视，认为这是中国反对英国的“宣传攻势”。

英国外交部十分焦虑，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官员赫德森警告英国各部门领导人说，这次中国的宣传攻势表明，像若干年前中国发生过的那种“反英运动”又将重演了。他担心这次中国人民反对英国的斗争，会引起像1926至1927年时的那种全国性的“反英运动”。因此他主张调整英国对中国外交，修正英国对华政策。为此，英国外交部把林语堂、钱端升和陈朗川教授的文章，全文复印分发政府各部，要求各部门进行研究，提出对策，以平息中国新闻界的愤怒。同时，英国政府要求驻华大使薛穆提出意见，制定对华宣传战略。

1942年4月13日，薛穆向英国外交部送去急件，分析了这次中国新闻界反对英国的背景。但他认为这次运动，并不是由英国的殖民主义态度所引起的，而是中国引起的。他说，导致这次中国反英运动发生的原因，是中国认为中国在抗战中的地位，要比英国在远东的地位重要，中国把自己在抗战中的作用估计得比其他盟国高而产生的。他说：“在这儿，中国人认为他们比盟国的地位优越。这对鼓舞他们抗日的士气来说，当然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发展下去，就会变得危险，使盟国间的合作越来越困难。”<sup>②</sup>

他认为中国的这种骄傲态度，是受了英国报界及美国报界的鼓舞。英、美报刊一直在赞扬中国在抗战中的贡献与成就。但是薛穆认为中国在抗战中的努力，并不是报刊上宣扬的那样成绩显著。他认为虽然由于供应不足，装备不好，以及部分精锐在缅甸作战之外，中国军队没有很好抗日。

他还指出了国民党军队抗日不力的情况。他说：“第一，是在中国国内近四千英里的战线上，当盟国需要中国军队拖住大量日军兵力时，中国的正规军或非正规军都没有军事行动。第二，中国军队之所以没有被日军消灭，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战斗力，而是因为他们有无限广阔的土地可供撤退。第三，虽然中国军队的人数大大超过日军，但与日军一交手，则必败无疑。第四，由于在中国战场中国军队无所作为，在对日作战中十分消极，因此日军可以从中国撤出大量部队，用于其他战场。”<sup>③</sup>

为了反击中国对英国的指责，他建议英国有关方面要揭露中国抗日不力的事实，最好由英国《泰晤士报》的负责人出面，发表一篇文章，指出中国抗日消极，同时要大吹英国抗日的“战

---

① FO371/35689, FO371/31709/10, F3791/3791/10, China's Position and Attitude, by Foreign Research and Press Service, 12 April 1942.

② FO371/31704; F3187/3187/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27 April 1942.

③ FO371/31704; F3187/3187/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27 April 1942.

绩”<sup>①</sup>。

不过他建议，这篇文章需要略为提到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作战的贡献，然后才去分析中国在其他战区的作战不力情况。最后，这篇文章要指出英军在对日作战中，不是不尽力，而是面临着各种困难。他认为这样一篇文章，将在中国和美国产生对英国有利的影响。<sup>②</sup>换言之，薛穆力图贬低中国抗战的成绩，来作为对中国报界反英运动的反击。<sup>③</sup>

1942年4月27日，他对宋美龄在美国《新纽约泰晤士报》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发表了评论。他认为那篇文章，是不友好的反英宣传。这篇文章主要是吹嘘中国军队，而贬低西方军队对日作战的成绩。宋美龄比较了中国军队与西方军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表现，说从来没有中国军队投降日军的先例，而英军却向日军投降。她说，对比之下，西方应改变对中国人的看法，并修改其对华政策。具体来说，宋美龄要求废除西方在华的治外法权。薛穆认为，这篇文章对英国非常不利，需要消除其产生的影响。

薛穆认为中国人民的反英情绪，是由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以及因为英军不断遭到失败，以及在中国形成的“中国的优越感”混合而产生的。他认为，中国人指责英军对日作战的失败是不公正的，因为他们忽略了“珍珠港事件”后英国在远东所处的不利的战略位置。中国新闻界这次反英运动的发展，已经到了要求摆脱外国束缚、废除治外法权的地步，是非常令人担心的。他极为愤怒地说：“中国不停指责英国的抗日努力，只会引起双方猜疑。”<sup>④</sup>

由于当时薛穆到中国任大使仅2个月，他完全不了解中国，并且以传统的眼光看待中国，因而对中国的态度很不友好。因此，他向英国外交部建议对中国的宣传发动反击，他保证说，英国驻华大使馆会采取一切措施反击中国。同时他还向英国外交部建议说，要制服中国人，最好请美国人出面向中国施加压力。或者在美国新闻界请一些著名的美国人，例如《纽约泰晤士》周刊的专栏作家李普曼等人发表文章，对中国泼冷水。在这些文章中，特别要强调盟国之间的义务。<sup>⑤</sup>

薛穆的上述建议十分幼稚，反映了他还不了解中、美、英三国之间的微妙关系。当时重庆国民政府的反英是得到美国支持的，否则无论在深度、广度上中国新闻界的反英运动不可能那么持久。李普曼本人就曾对英国外交部远东司的代理司长克拉克说，美国人民不会支持英国，而只会支持中国，因为“目前最重要的，是尽一切可能去提高蒋介石的威信”<sup>⑥</sup>。

由于得不到美国的支持，英国外交部只同意薛穆对当时中国新闻界反英运动的分析，而不同意对中国发动一次宣传反击运动。斯科特批示说，中国的宣传是错误的，是在散布对英国在战争中努力的误解和损害英国利益，英国正在受到挑战。但是英国不能反击，因为此次反英攻势，涉及蒋总司令的夫人宋美龄。而宋美龄是一个出色的宣传专家，在美国公众中有很大影响的人物，如果反击将是非常不明智的。

---

① FO371/31704; F3187/3187/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27 April 1942.

② FO371/31616; F2918/4/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13 April 1942.

③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1942年4月13日; FO371/31616; F2918/4/;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13 April 1942.

④ FO371/31704; F3187/3187/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27 April 1942.

⑤ FO371/31704; F3187/3187/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27 April 1942; Minutes by Scott, 26 April 1942.

⑥ FO371/31627, F6518/54/10, Clarke to Seymour, 12 September 1942.

他特别告诉薛穆，说英国外交部已经与《泰晤士报》进行联系，要求该报刊登反击文章。但是《泰晤士报》不愿那样做。因为《泰晤士报》不愿在中国军队正在缅甸抗击日本侵略军时，去贬低中国军队抗日的成绩。<sup>①</sup>

英国外交部的另一位官员克拉克，在得知《泰晤士报》不愿出面发表攻击关于中国抗日的文章后，就说薛穆关于在《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反击中国的建议，不过是“沧海中之一粟”，于事无补。而且当前正值中国军队在缅甸艰苦奋战，去贬低中国抗战的功绩一定不得人心。<sup>②</sup>正相反，克拉克认为要改进两国关系，应该写一些东西，从正面肯定中国抗日的成绩；还要发表一些文章，强调在中国进行的游击战，已经大大地支援了盟军在其他战场的战斗。<sup>③</sup>

1942年4月22日，克拉克写信给英国宣传部部长，说绝不要请《泰晤士报》发表文章反击中国报界的反英运动。<sup>④</sup>他也不同意请有影响的美国人去做中国人的工作。他指示英国驻美国大使，要直接与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对话，请中方谅解。<sup>⑤</sup>

由于英国外交部不同意薛穆的建议，薛很快改变了观点。他完全接受了克拉克的意见。从此他不再主张暴露中国军队在抗日中的黑暗面，而一味主张歌颂光明面。这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的转变对后来事件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影响。

例如1942年7月10日，中国中央社英文版发表了一篇题为《日本在华使用了全部兵力》的文章，全面评价中国的抗日战争。英国驻华大使馆武官格里蒙斯戴尔准将，于7月20日向英国国防部做了汇报。他认为这篇文章再次反映了中国人的骄傲。在他写给国防部军事情报处的报告中，他强调这篇文章是“中国人自吹自擂”的文章，是想造成一种中国军队英勇无比的假象。<sup>⑥</sup>他说中国发表的战争公报根本不顾事实真相。这种做法对将来中英、中美的合作是有害无益的。因此他建议：“应该在英国和美国尽快开始宣传反击，要中国人认识到他们的牛已吹破了。”<sup>⑦</sup>

他还建议说，为了使中国对盟国在其他战线取得的成就有所印象，应该安排中国总参谋部人员访问其他各个战线。<sup>⑧</sup>英国政府认为，由于当时中国新闻界的反英运动仍在高峰，格里蒙斯戴尔提出的英国反击的建议，肯定会进一步恶化双边关系更加火上加油。英国政府为郑重起见，就在各部进行讨论是否执行格里蒙斯戴尔的建议。英国外交部特别去电重庆，征求薛穆的看法。这次，薛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

在回答英国外交部的电文中，薛穆只同意邀请中国有关人士，即用恰当的方式邀请中国参谋部人员访问欧洲战区。但是他不同意在英国和美国开展反击中国的宣传运动。他认为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為了证实中国并非反法西斯的主力。如果只为这个目的而与中国互相攻击是不值得的，将在中国会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因为当时不仅没有，而且缺乏英、美给予中国的任何援助的迹象。这样做，只会使中国更仇恨英国。而且从中国知识界在反英运动中留有余地的态度看来，只要应对得当，中英关系是可以改进。

---

① FO371/31704, F3343/3187/10, Foreign Office to Chungking, 5 May 1942.

② FO371/31616, F2918/4/10, Minutes by Clarke, 27 April 1942.

③ FO371/31616, F2918/4/10, Minutes by Clarke, 17 April 1942.

④ FO371/31616, F2918/4/10, Minutes by Clarke, 17 April 1942, and 22 April 1942.

⑤ FO371/31704, F3343/3187/10, From Foreign Office to Washington, 4 May 1942.

⑥ FO371/31617, F5950/5/10, Brigadier to War Office, 29 July 1942.

⑦ FO371/31617, F5878/5/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29 July 1942.

⑧ FO371/31617, F5878/5/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29 July 1942.



至于中国是否自吹自擂的问题，薛穆认为，从中国报界发表的一系列主要文章来看，特别是从近两个月以来的《大公报》的文章来看，中国人在看待他们自己的战争努力上，是有正确态度的。他说，有影响的中国人并不认为中国是反法西斯轴心国的主要力量。薛穆还说，最重要的是美国人根本不会参加这种反华攻势。没有美国的支持，英国的反华宣传是没有意义的。至于中国中央社英文版自吹自擂的文章，薛穆认为那是中国军方发言人惯用的方式，一方面是“面子”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激励中国人民继续抗战”，英国不必去计较。<sup>①</sup>

薛穆说盟国不应忽视中国正式的官方公报，从重庆发表的任何战报，英国都必须小心地对待。如果中国发表了夸张的报导，只要在英国国内给予正确引导即可。<sup>②</sup> 英国外交部不应小题大做，而应顺其自然。最后薛穆建议说：“根据上述考虑，我建议英国驻华大使馆不应对格里蒙斯戴尔的报告采取任何行动。”<sup>③</sup>

英国外交部仔细考虑了薛穆的建议，于1942年9月1日回电，说他们完全同意薛穆的看法。并且外交部把他们的观点告诉了国防部。外交部认为不宜发动对华宣传战，最好的办法是提醒英国新闻界要他们注意指出中国报道的不实之处。外交部强调说：“驻华大使薛穆建议，不应采纳格雷蒙斯戴尔的建议。”

在给国防部的公文中，英国外交部还分析了英国国内新闻界对中国新闻报道的反映。他们认为除一两家报纸外，基本情况是好的，令人相当满意。因为大多数报纸，只限于转载由中国官方发言人发布的战报。英国外交部的看法是，无论国民党官方的报道是真是假，只要不是无端对英国的重大挑衅，英国方面没有理由不转载这些报道。至于英国驻华武官格雷蒙斯戴尔说中国人太傲慢，这种感情可以理解。但是从政治观点看问题，他建议的发动宣传攻势以贬低中国的抗日努力，是不可取的。正确的办法是给中国人大量的新闻，让他们知道英国在各个战区作战的功绩。<sup>④</sup>

英国国防部极为勉强地接受了外交部的建议。1942年9月3日电告格里蒙斯戴尔，要他仔细看一下薛穆7月29日的电报。英国政府已经决定不对中国发动宣传战，因此不采纳他的建议。英国政府的这一决定，避免了中英关系可能的进一步恶化。英政府做出上述决定，当然有多种考虑。最重要的考虑之一，是当时中国强烈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如果英国想成功地签订一个有利于英国的新约，两国间必须要有一个较好气氛，要消除中国的反英情绪。此外，英国政府还担心对中国的攻击会导致美国的反对。

英国政府决定不发动对华宣传反击的决定，得到了美国的好评。但美国认为这还不够，建议英国在对华问题上应该更加主动。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温德尔·威尔基于1942年访华。在他访华期间，做了大量报告和讲话。他同情和赞扬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尤其是他强调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结束帝国主义的统治。他的讲话，引起了英国的不安。

薛穆为此安慰英国政府，说威尔基的这一观点，在某些人看来是针对英国的，但他认为不过是原则性讲话而已。而且要与美国辩论谁是帝国主义是不聪明的。他说：“我不能完全肯定威尔基的讲话是指些什么，但我觉得不应该把他的话当成对英国的指责。而且当人们要把这句话付诸实践时，真正的困难就会出现。”因此薛穆建议无论美国人说什么，英国都不要去理会。

---

① FO371/31617, F5878/5/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29 July 1942.

② FO371/31617, F5878/5/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29 July 1942.

③ FO371/31617, F5878/5/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1 September 1942.

④ WO208/391, 15A F5863/5/10, Scott to Winterborn, 1 September 1942.



相反英国应该赞扬中国在抗战中取得的成就，从而达到鼓励他们进行抗战的目的。他于1942年10月7日写信给英国外交部助理次官莫里斯·彼得逊，说：“对中国在抗战中的表现，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赞扬，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我深信美国广大人民正是如此高估中国抗战的。而且在英国日益增多的人们也正在这样想。我看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武器，激励中国抗日的士气，使中国人不会对日妥协。”<sup>①</sup>

同时薛穆认为在颂扬中国时会出现一些偏差，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要求只赞扬可赞扬的东西，那纯属空想。英国外交部基本上同意薛穆的看法。英国不仅没有掀起反华宣传攻势，反而时有赞扬中国在缅军队战绩的文章发表。英国的这种策略收到了效果。中国报界反英运动的调子降低了。

1942年8月19日中国政府通知薛穆说，英国不断抗议中国报界的反英运动的确过了头，不过现在已经开始停止。事实上薛穆在8月中旬，已经看到中国反英斗争即将停止的迹象。例如他注意到1942年8月19日《大公报》登载的一篇反英文章，就受到了新闻检查，大部分内容都被删去。<sup>②</sup>他注意到，就连宋美龄本人也感到有改善中英关系的必要。1942年10月10日，在国民政府的国庆节，她邀请薛穆会谈。薛穆在会见宋美龄时，向她递交了一笔英国援华救济金。这样，会谈就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此后，中国报界的这次反英运动就告结束了。<sup>③</sup>

但是薛穆的观点，特别是关于英国政府应赞扬中国抗日成绩，以激励中国人民坚持抗日的建议，并没有真正为英国政府接受。英国外交部次官彼得逊1942年12月14日写信给薛穆，不指名地批评了他。他首先说10月份以来收到了薛穆的几封信，一直没有回信的原因，主要是他已经完全知道英国政府的观点，所以不必重复。但是，他向薛穆指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薛穆于10月7日提出的“不分青红皂白地赞扬中国的抗日”，是鼓舞中国人民抗日的最强有力的因素。彼得逊不同意这种做法，并不无讽刺地说：“但愿您是对的，如果不是这样解释，您的建议就完全没有意义。”彼得逊说，虽然英国没有指责中国官方的战争公报和自吹自擂的新闻，但是英国已经谨慎地暗示事情并非如此。中国人自吹自擂，并不仅仅是中国人“要面子”，而是他们要借此贬低英国。因此，彼得逊说英国在反击宣传方面做得不够。

第二个问题，是中英关系并没有改善，更谈不到令人满意。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说明。第一个例子，是英国购买中国的生丝作降落伞，但是中国提出不合理的价钱。第二，是中国利用了英国在付给英国舰船上工作的中国水手的工资上出现的困难，而反对英国。中国水手要求加工资，但英国船主不给。彼得逊认为这是中国人闹事。他宣称：“要真正改善两国关系，我们就必须在远东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他的这番话完全是炮舰外交的腔调。他根本不尊重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他也没有看到世界形势已经变化，中英关系已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人民任人宰割的时代已经过去。他的无知和帝国主义态度在下列话里暴露无遗，他说：“越用枪炮对付中国人，我们就越不需要向他们做让步。”<sup>④</sup>尽管彼得逊是主管外交部远东司的助理次官，是薛穆的上级，但薛穆并不接受他的批评。他认为彼得逊的看法错了。1943年1月12日他给彼得逊回信，提出不同看法。

关于第一个问题，即英国购买中国的生丝作降落伞的价格问题，薛穆说并非中国不愿与英国

---

① FO371/31679, F7397/54/10, Seymour to Peterson, 7 October 1942.

② WO208/376, China, 142 (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19 August 1942.

③ FO371/31627, F7680/54/10, Seymour to Peterson, 16 October 1942.

④ FO371/31627, F7916/54/10, Peterson to Seymour, 14 December 1942.

合作，而是通货膨胀。薛穆认为中国提出的生丝价格是合理的。虽然价格比过去偏高，但英国商人们说高得买不起无疑是夸张的说法。因为英镑对法币的汇率是固定的，由于法币贬值，造成一些问题。但是英国人买一磅丝还是只要八元法币，实在很便宜。因为按本地价格，八元法币只能买五磅猪肉或差不多四磅白糖。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政府远离生产丝的地区，不能用行政命令管理这些地区的生产，所以不能规定物价。如果由于通货膨胀的原因，价钱提高了而抱怨的话，那就只好不买生丝了。<sup>①</sup>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在英国船上工作的中国水手，由于工资低，物价上涨而要求加工资的问题，薛穆认为那不是问题，而是合理的。他承认这是一件棘手的事，但如果英国向前看，这个问题也可解决。他说大英帝国有五亿人口，“由英国人自己开自己的船的时代，就快到了”，不必雇中国水手事情也就完了。<sup>②</sup>

薛穆的这封信不可能也没有引起英国政府的重视。英国政府中的高层决策人物对中国的不满日益加剧。1943年英国政府内再次展开了关于如何报道中国对日战争问题的争论。

格雷蒙斯戴尔准将关于开展对华宣传战的建议，虽然被英国政府否决，但是在英国官员中却弥漫着对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有的人仍然希望展开一场对华宣传攻势。国防部新闻负责人雷恩给格雷蒙斯戴尔写了一封绝密的个人信件。他说尽管薛穆的建议，阻止了英国开展一场反击中国的新闻战，但他鼓励格雷蒙斯戴尔设法掀起这样一次宣传攻势。他特别叮嘱格雷蒙斯戴尔，绝对不能让他的信被第二个人看见。因为此信如果外泄，肯定会引起混乱与动乱。他告诉格雷蒙斯戴尔说，反击中国一事并未结束，国防部完全同意格雷蒙斯戴尔的报告和建议。但是他说由英国或美国的时事评论员发表反击文章是空想，而且无助于中英合作。在这一点上，外交部与国防部观点相同。

雷恩还说蒋总司令1942年极不友好地介入印度事务，使英国政府各部门大为震惊。这就比多年来国防部警告要提防中国，更能使英国官员们清醒。雷恩认为不仅政府部门，而且军队都对新闻自由感到头痛。所以在处理反击中国对英国的攻击一事上，应该谨慎小心。雷恩向格雷蒙斯戴尔保证，国防部和外交部正在做大量工作去影响新闻界。事实上英国政府已通过各种方式，使英国新闻界把中国在抗战中的地位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他举例证明英国政府的努力已经初见成效。

例如英国《每日电讯报》，把中国报道的中国军队把日军打败并进行追击这句话，打上了引号。他认为这就是反击中国的一个良好的开端。他还向格雷蒙斯戴尔保证，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他说国防部正与英国外交部及英国宣传部政治战委员会一同行动，研究对华宣传问题。他希望因此出现现实主义的报道，从而停止英国报道远东时“显得内疚和爬行主义的态度”<sup>③</sup>。

雷恩安慰格雷蒙斯戴尔，说他写此信的目的，是防止由于外交部同意薛穆的看法而使格雷蒙斯戴尔感到被冷落。他保证，只要格雷蒙斯戴尔有任何反华行动，都将得到国防部完全的支持。雷恩甚至说，一个人不可能在印度军队中服役20年后，还赞扬英国的新闻自由。他侮辱性地讲，应该如何对付中国人，即：“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我们的格言是‘杀牛的方法很多，何必一定要抓住尾巴才动手’，如果一种办法不行，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sup>④</sup>他主

---

① FO371/35737, F948/25/10, Seymour to Peterson, 12 January 1943.

② FO371/35737, F948/25/10, Seymour to Peterson, 12 January 1943.

③ WO208/391; G. W. Wren to M. I. Grimsdale, 3 September 1942.

④ WO208/391; G. W. Wren to M. I. Grimsdale, 3 September 1942.

张用其他手段反对中国，而不必一定要以硬碰硬的方法，去反击中国。

在英国政府内，怀有雷恩这种想法的人很多。但是从政治效果考虑，英国政府不得不小心行事。例如英国外交部大部分官员虽对中国的反英态度极为不满，但无可奈何。外交部官员乔治·布雷南拟了一份备忘录，抱怨说“中国使英国处于进退两难之中，并正在利用这种形势。”布雷南写道：“事实上，英国在对日作战中是比中国强大和积极的伙伴。尽管双方是盟国，但是各种义务都由英国承担。令人气恼的是，英国反而得采取一种对中国道歉、迎合和讨好似的态度。布雷南认为由于运输的困难，英国不能运送战略物资援助中国，因此就只好用讨好来弥补这一点。克拉克同意布雷南的观点，并补充说：“我们必须继续目前的方针。总的来看目前只要口头上吹捧中国，就能维持目前的关系。”<sup>①</sup>由于这些官员的阻挠，英国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实践中仍然仅限于口头支持。而且这种口头支持也是经过反复讨论，才勉强决定的。

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倾向于肯定和赞扬中国在抗战中的努力。但他一再强调：“我们应该赞扬应该歌颂的东西，而不应赞扬根本不存在的的事情。”<sup>②</sup> 他的观点得到英国政府宣传部门的支持。

英国海外宣传计划委员会制定了《英国对华宣传计划》。在这个计划中，英国海外宣传计划委员会强调了薛穆的这一观点。该计划的第四条认为，在英国国内也要搞好关于中国的宣传，要让英国人民了解中国和远东。该委员会强调，任何涉及中国的宣传，都必须要以促进抗日情绪为准则。这份计划分析了英国与中国的关系，指出整个英国对中国缺乏兴趣和了解。<sup>③</sup>

这份计划承认，广大英国人民是同情中国的。如果中国知道英国人民的这种感情，就可以克服反英情绪，特别可以消除中国认为英国在远东，仅仅是为了保卫英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战的印象。所以，应该发展这种英国人民同情中国的感情。但是该委员会认为，目前英国对中国的同情是不够的。英国对远东和对中国的了解是错误的。英国人民有支持中国的，有反对中国的，但是大多数对现代中国一无所知、毫不关心。

在他们概念里的中国，仍然是长期以来历史上形成的偏见，例如认为中国是“黄祸”、“邪恶的东方人”、“杂技场”，等等。而有的人则仅仅把中国看成做生意的地方，传教士和慈善机关活动的地方。还有一部分人则是从抗战以来才开始关心和了解中国。该计划说“有的人认为中国的抗战是正义的，还有的人相信了中国的宣传，这就导致他们认为应该支持中国，认为中国是由毫无瑕疵的光环包围着”<sup>④</sup>。

该委员会认为上述观点都不正确。要改变上述看法，最好让英国人民继续同情中国的抗日战争。因此，这份计划建议，对华宣传应有三个目标：

第一，让英国人民知道中国是一个重要盟国，利用目前英国人民对中国的同情心去促进英国在远东的利益，去巩固英国决心在远东战场取得胜利的決心，巩固英国人民的斗志。

第二，让英国人民了解远东问题，了解中国和其他各国的利益，作为发展令人满意的中英关系的基础。

第三，通过使英国人民同情中国，引起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去支持英国在中国进行的宣传。最

---

① FO371/31627, F7756/54/10, Minutes by Clarke, 16 November 1942.

② FO371/35737, F948/25/10, (Seymour to Peterson), 12 January 1943.

③ WO208/399, S/1740, Overseas Planning Committee "Plan Propaganda to China, IV. Home Publicity Aspects", 17 February 1943.

④ WO208/399, S/1740, Overseas Planning Committee "Plan Propaganda to China, IV. Home Publicity Aspects", 17 February 1943.

后英国海外宣传委员会提出了对华宣传的口号：“共同的战争，共同的战线，共同的胜利。”<sup>①</sup>

制定这份文件的目的，虽然是维护英国的利益，但这个计划对中国是少有偏见和比较友好的。然而这份文件下发到各有关部门后，反应却不相同。英国驻华大使馆武官格雷蒙斯戴尔准将就有不同看法。也许他自恃有英国国防部的支持，就企图改变由英国海外宣传委员会制定的这一方针。他建议英国应该停止这种感情用事的计划，停止对中国军事成就的歌颂。相反，应该努力让英国公众认识当前中国形势的“真实情况”<sup>②</sup>。

英国宣传部驻印度德里的远东局负责人巴特勒，一接到格雷蒙斯戴尔的报告，就立即向伦敦作了报告。同时驻德里的英国对外宣传控制局，在该局的考桑将军请求下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但是会议在做决议时十分审慎。会议决定在考桑将军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要先查清是否格雷蒙斯戴尔将军曾经与驻华大使薛穆讨论过他的报告，薛穆是否同意他这样做？<sup>③</sup>

经多查证，确认在格雷蒙斯戴尔将军向德里报告之前，曾给薛穆看过他的报告的复印件，薛穆不置可否。但薛穆说他本人并不想这样做，不会写这样的报告送上去。这表明他并不赞同格雷蒙斯戴尔的报告。因此巴特勒向上级报告说，鉴于薛穆的态度如此，目前不宜采纳格雷蒙斯戴尔的建议<sup>④</sup>，而且考桑将军建议伦敦不必再给新的指示。

巴特勒对英国海外宣传计划委员会的计划不满意。他特别批评了这个计划的第四条，即“国内宣传问题”。他说在这一条款的三个内容中，有的有问题。这三个内容是：“第一要让英国人民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盟国的重要性，并同情中国的抗日战争，其目的是使英国人民关心远东事务，下定英国在远东战场必胜的信心；第二是树立对中国和对远东其他国家的正确看法，作为将来发展令人满意的中英关系的基础；第三是使英国人民同情和关心中国人民的抗战，目的是使他们支持英国的对华宣传。”

巴特勒认为这三个内容，总的来说是要让英国公众树立对中国的正确看法，这与格雷蒙斯戴尔所说的“教育公众去认识中国目前形势的真正状况”应是一致的。但是该条款的第一个目标的效果完全不是这样，而是误导公众。它使整个英国人民认为中国人民及其抗战是用完善无瑕的光环包围着的。巴特勒认为第二个目标也不令人满意，因为太过于感情用事地赞扬中国人民。如果目前还这样赞扬中国，这肯定只能起到误导英国公众的作用。

他警告说：“这种危险仍在增长。”<sup>⑤</sup>他质问英国政府，为什么不敢向英国公众报道有关中国的实际情况。他认为必须而且也应该说出真相，至少不应该宣传不实之事。当然巴特勒的用心并非是要去揭露蒋介石政府消极抗日、曲线救国等等黑暗面。如果是这样当然很好。但是巴特勒等人的动机是贬低中国、抬高英国，以便在中国和远东推行殖民政策。特别是害怕中国得到西方武装以后成为远东军事大国，就会对英国的殖民主义政策构成威胁。

所以巴特勒引用考桑将军的话说：“目前对中国拍马屁的态度，已发展到英国公众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给中国调拨更多的军用物资的地步。这纯是从政治观点看问题，而非从战略观点看问题。”他建议英国宣传部抛弃“海外宣传计划委员会”的对华宣传计划而另外制定一项内容完

---

① WO208/399, S/1740, Overseas Planning Committee "Plan Propaganda to China, IV. Home Publicity Aspects", 17 February 1943.

② FO371/35689, 67/26/43, P. D. Butler to H. V. Redmen, 1 July 1943.

③ FO371/35689, 67/26/43, P. D. Butler to H. V. Redmen, 1 July 1943.

④ FO371/35689, 67/26/43, P. D. Butler to H. V. Redmen, 1 July 1943.

⑤ FO371/35689, 67/26/43, P. D. Butler to H. V. Redmen, 1 July 1943.



全相反的计划。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在处理国内对华宣传的问题上，我们应奉行一条完全不同于‘海外宣传计划委员会’的路线。”

他还自我辩护说，在报刊上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并不意味着是攻击中国政府。因为这只表示从中国得到经过正确观察的新闻，而不是按习惯反映国民党的观点来观察中国。<sup>①</sup> 据他看来中国没有好的宣传机构。例如最近中国政府发言人公布的中国“全国生产工作”会议的内容完全是“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sup>②</sup>。

巴特勒的意见并非完全错误。例如当英国宣传机构今天宣称“中国政治上正日益联合”，而第二天国民党军队就攻打八路军。接着报上还刊出国民党军队某著名将领，率领几千国军投靠南京傀儡政权的消息。又如当在报刊上大肆宣扬中国粮食增产时，而很快又报道在河南省出现令人吃惊的饥荒，而且是1937年以来最为严重的。类似矛盾的报道，比比皆是。<sup>③</sup>

不过巴特勒的观点是片面的。从抗日战争的角度出发，英国应鼓励中国人民进行抗战。在揭露国民党妥协的同时，也要正确报导和评价国民党的抗战。英国政府内部分官员是认识到这一点的。

薛穆不同意巴特勒的看法。他于7月13日写信给巴特勒加以说明。他说：“是歌颂还是揭露中国政府的抗战，一直是人们议论的大问题。英国军方是倾向揭露中国抗日的黑暗面。薛穆首先同意巴特勒的下述观点，即不能误导英国公众。宣传中国并未取得的胜利和并不存在的事情是很危险的。”<sup>④</sup> 他主张实事求是地加以报道。薛穆说他完全同意英国海外宣传计划委员会的计划，即让英国人民真正了解中国。

但是他并不认为英国舆论界在中国问题上对英国公众进行误导。他认为揭露黑暗面是应该的，不可能因为揭露了中国抗日黑暗的一面，英国人民就不会同情中国了。他认为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因此应该给予歌颂。他说在过去的8个月中，中国克服了重重困难撑过来。首先是摆脱了令人吃惊的孤立状态，与国外建立了联系。还克服了通货膨胀带来的危机，克服了饥饿和种种天灾人祸，这些都是十分明显的成就。

薛穆说：“他们的士气比我曾在1942年初审慎地预言的要高得多。”<sup>⑤</sup> 他还说：“目前的宣传实际上还没有完全反映出中国的真实情况。如果反映了，肯定会增加英国人民对他们的同情。当然这些报导不应该包括不实之词，例如中国的百万军队正把日军驱赶入海等。”<sup>⑥</sup> 最后薛穆强调说：“任何调整对华宣传政策都要避免使中国人感到灰心丧气。”<sup>⑦</sup>

从上述分析看出，薛穆所代表的继续鼓励国民政府抗战的想法，是英国对华宣传的主调。在他的信中，薛穆表达了他对英国海外宣传委员会对华宣传计划的赞同。这封信在送交外交部的同时，也送给了英国政府各有关部门。善于看风使舵的巴特勒见薛穆的观点没受到上级反对，于是就在1943年8月2日，写信给英国宣传部负责人雷德曼表明他的观点已经转变，同意不再发动对中国的宣传攻势，揭露中国抗人的“黑暗面”。

---

① FO371/35689, 67/26/43, P. D. Butler to H. V. Redmen, 1 July 1943.

② FO371/35689, 67/26/43, P. D. Butler to H. V. Redmen, 1 July 1943.

③ FO371/35689, 67/26/43, P. D. Butler to H. V. Redmen, 1 July 1943.

④ FO371/35689, F3881/10/10, Seymour to Butler, 13 July 1943.

⑤ FO371/35689, F3881/10/10, Seymour to Butler, 13 July 1943.

⑥ FO371/35689, F3881/10/10, Seymour to Butler, 13 July 1943.

⑦ FO371/35689, F3881/10/10, Seymour to Butler, 13 July 1943.



他首先很得体地表明自己原来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说：“不难发现，驻华大使薛穆同意我的观点，即向英国公众灌输在中国事实上不曾发生过的事情是十分危险的。”然后他同意薛穆的观点，即英国公众是可以信赖的。他要向英国公众致敬，因为他们同情中国遭受到的痛苦和遇到的困难。接着巴特勒发表了与以往不同的看法。他说 1939 年以来的事实说明中国人民正在饱经困苦，因此对中国局势应该高度重视。

他甚至说：“毕竟中国军队设法独立进行抗战已经六年。由于目前中国在军事上处于弱小的地位，在内地几乎没有什么工业，要指望中国在军事上取得伟大胜利是不可能的。”他的结论是：“我们既要忠实地报道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又不要直接批评中国政府。还要小心报道在中国进行抗日的各种力量，包括在前方和后方的抗日力量。这样逐渐地在英国公众中树立起真实的中国形象。”他强调不应该攻击中国政府。<sup>①</sup>他说，如果英国的报刊杂志和电台都攻击中国，那就会被轴心国利用，认为是盟国分裂的象征。<sup>②</sup>这样，通过讨论，在对华宣传问题上英国官员的意见基本取得一致。这就使中英关系的改善成为可能。从 1943 年底至 1944 年 8 月，中英关系没有出现大的波折。

英国政府为了英国利益，必须使国民政府继续抗战。为此目的要避免攻击国民政府，即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的黑暗面。但是矫枉过正，英国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一直避免批评国民党政权，客观上是帮了国民党的大忙，使英国人民不了解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真面目，其后果是严重的。例如在 1944 年底至 1945 年初，中外记者团访问了延安。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斯图亚特·基尔德在访问延安之后，写了一篇文章批判国民党政权。当时中外记者团成员都分别访问了延安的政府、军队部门及老百姓的家庭。他们把延安与国民党统治区作了比较，发表了大量歌颂延安，揭露国民党统治区黑暗的文章。

薛穆向英国政府建议，说基尔德的文章必须经过新闻检查，否则不能在英国各报刊登。他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制止中外新闻界对国民政府的攻击。因为这只会被日本的宣传机器加以利用。<sup>③</sup>薛穆还说西方新闻界已开始被激怒了，因为他们发现过去大肆吹捧的中国在抗战中取得了胜利是没有根据的。而这些吹捧文章正是他们自己刊登的。不过薛穆仍然主张不要攻击国民党政府。

他说：“我同意不要继续引导西方公众相信中国是抗战的主力。但是目前反对中国政府的宣传攻势似乎太过头了，这只会向日本宣传机构提供炮弹。”<sup>④</sup>英国外交部完全同意薛穆的看法。<sup>⑤</sup>上述事实充分说明英国政府在处理对华宣传问题上，主要从英国利益出发，所以不能处理好如何既要歌颂中国抗日取得的成就，又揭露国民党政权对日妥协，以及抗战不力的这方面的问题。

英国关于对华宣传的计划，是其在坚持“欧洲第一”战略下，改善与重庆国民政府关系的一种努力。这个计划的通过，取得了一定效果，英国各报纸在这个宣传计划指导下，歌颂了中国人民的抗战，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紧张的中英关系。

因此，1942 年 12 月英外长艾登在下院就中英关系发表声明时说，1942 年中国人民反对英国的斗争已经平息，中英关系已经非常令人满意。但是即将爆发的重庆国民政府的反英斗争，却证明了如果英国不改变其“先欧后亚”战略并彻底地放弃殖民主义政策，中英关系将不会真正改

---

① WO208/399, 6A, Butler to Redmen, 2 August 1943.

② WO208/399, 6A, Butler to Redmen, 2 August 1943.

③ WO208/399, FO371/41613, F2316/159/10, Seymour to Eden, 14 May 1944.

④ WO208/399, FO371/41613, F2316/159/10, Seymour to Eden, 14 May 1944.

⑤ WO208/399, FO371/41613, F2316/159/10, Seymour to Eden, 14 March 1944.

善。

#### 四、重庆国民政府反对英国“先欧后亚”战略的斗争

1943年1月，罗斯福、丘吉尔等在北非卡萨布兰卡召开军事会议，再次确定了以欧洲战场为重点的战略。这一战略，忽视了亚洲战场，遭到重庆国民政府的反对。蒋介石不仅批评英国，而且也批评美国，认为他们没有军事常识，不知道如何制定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最佳战略。他认为先打败日本，更有助于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蒋介石曾在其日记中写道：英、美领导人“皆设先解决德国而后对倭，此为最无常识之军略。英国丘吉尔此次亲访华盛顿，其目的全在要求美国主力集中大西洋而放弃太平洋之决战。而美国政府对此种最大关键，漫无方针，一任英国之玩弄，可危极矣。”<sup>①</sup>因此他指示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争取美国人民的同情，反对“欧洲第一”的战略。

宋美龄的访美，受到了美国人民热烈的欢迎。美国还专门为她的到访，铺了红地毯，从白宫门口，直到大厅，隆重欢迎。宋美龄小时候曾在美国读书，受过良好的美国教育，能说一口纯正的美国英语。她的发言，使美国全国人民感到非常亲切，认为是“自己的女儿回家了”。她利用了这种有利的条件，在美国开始了卓有成效的反对英、美“先欧后亚”战略的活动。

1943年2月12日，蒋介石致电宋美龄，具体指示其应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宣传亚洲战场的重要性。他告诉宋美龄，在演讲时要特别强调以下观点：“今后世界重心将由大西洋移于太平洋，如欲获得太平洋永久和平，必须使侵略成性之日本，不能再为太平洋上之祸患。”<sup>②</sup>蒋介石还要宋美龄尽量游说美国有关方面，以改变美国的“先欧后亚”战略，将其战略重心转移到太平洋方面，首先打击日本侵略势力。宋美龄于是寻机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丘吉尔1943年3月21日晚发表的广播演说，给宋美龄在美国反对英国“欧洲第一”战略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在这次演说中，丘吉尔在谈到中国时说：“吾人可击败希特勒，余作此语，即表示希特勒及其作恶之力量，将被粉碎，了无余存，然后吾人终将前往世界之另一方面，惩处贪婪残暴之日本帝国，拯救中国于长久磨难之中，解放吾人本身及荷兰盟友之海外领土，并使日本对于澳洲、纽西兰及印度海岸之威胁，永远解除。”<sup>③</sup>

丘吉尔还说：“吾人必须希望三大胜利国家之团结，确能无负其最高之职责，且彼等不仅将顾及其本身之福利，亦将顾及一切国家之福利与前途。”<sup>④</sup>他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看成是“三大胜利国家”所取得的，完全不提中国和其他国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与作用。在他提出的战后成立国际组织来安排世界的设想中，就只有英、美、苏“三大胜利国家”，完全把中国和其他国家排除在外。

他的讲话完全与事实不相符合。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已达6年，对世界反法西斯

---

<sup>①</sup> 《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20日。转引自王建朗：《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第107页。

<sup>②</sup> 杨天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宋美龄与丘吉尔（上）》，《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4日，GB07版；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一），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791页。

<sup>③</sup> 《中央日报》，1943年3月23日，第2版。

<sup>④</sup> 《英相播讲战后问题，盼即会商世界机构，击败德国后惩处暴日》，《重庆大公报》，1943年3月23日第1张第2版；杨天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宋美龄与丘吉尔（上）》，《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4日，GB07版。

战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丘吉尔的演说完全无视这种中国人民长期、英勇抗战自救的历史，却以高傲的姿态声称将在击败德国后到东方去“拯救中国”，恢复殖民统治。这种典型的“先欧后亚”论，对于渴望得到国际协同作战的中国军民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打击。丘吉尔关于由美、英、苏协商成立联合国，“总揽一切”，处理战后问题的建议，把中国排除在外。这一建议，对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来说，也极不公平。它不仅反映出英国一贯轻视、排挤、敌视中国的态度，而且反映出英国将企图继续其传统世界政策的立场。

中国对丘吉尔的讲话非常不满。中国的态度，可从蒋介石的反应窥见一斑，1943年3月24日，蒋介石在其日记中写道：“丘吉尔前日演词，专以先解决欧战为唯一算盘，而称英、美、俄为三大战胜国家，实无视我国与轻侮亚洲之观念毫无改过，更无觉悟。”<sup>①</sup>

3月28日，蒋介石又在其日记中写道：“丘吉尔前日演词，专以先解决欧战为唯一算盘，而称英、美、俄为三大战胜国家，实无视我国与轻侮亚洲之观念毫无改过，更无觉悟。”<sup>②</sup>愤恨之余，他终于认识到：“我国一日不能自强，则任何帝国主义亦一日不能消灭，如此人类永无自由解放之日。”<sup>③</sup>他立即指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反对丘吉尔的讲话。他同时指示宋美龄要专门发表演说，以驳斥丘吉尔的谰言。

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宋美龄于3月22日晚在芝加哥发表演说。她以国际联盟在过去反对法西斯的工作中，奉行着殖民主义政策开始，进行批评丘吉尔的讲话。她说：“过去每一共同努力之失败，在其固有之弱点，即袭用老套把戏，互相妒忌，各谋私利。”她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虽然标榜“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但实际上成为巩固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体系的工具。

她不点名地、但却尖锐批评了丘吉尔关于要成立战后世界机构，主宰他国事务的帝国主义做法。她说：“有若干人士之主张，对于战后各民族更密切之合作，不啻树立障碍，而犹自以为高明。”宋美龄提出：“良心告诉吾人，为防止将来之毁灭与屠杀计，不应专着眼于本国之福利，而应兼顾其他民族之福利也。”<sup>④</sup>在这里，宋美龄不仅批评了丘吉尔的殖民主义和利己主义，而且提出了任何参加战后国际组织的国家，都要“不应专着眼于本国之福利，而应兼顾其他民族之福利也”的主张。她的讲话，表明了中国对战后成立联合国的原则立场。

在演讲前，宋美龄曾先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请罗斯福收听自己的演讲。当演讲结束后，她又主动征询罗斯福的意见。罗斯福为她的这种信任所感动，当即表示他与宋有“同一感想”。罗斯福这样的人，一言既出，当重如泰山。这一表态，对重庆国民政府来说，不能不感到欢欣鼓舞。

而美国人民更支持宋美龄的讲话。纽约、芝加哥和各地的报纸纷纷发表文章，宣传宋美龄的主张，它们强调了宋美龄的观点：“以后全世界各国不得专顾一国本身的利益，而应以全人类利

---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3月24日。胡佛研究院藏；转引自杨天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宋美龄与丘吉尔（上）》，《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4日，GB07版。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3月24日，胡佛研究院藏；参见杨天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宋美龄与丘吉尔（上）》，《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4日，GB07版；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3月28日；转引自杨天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宋美龄与丘吉尔（上）》，《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4日，GB07版。

④ 《蒋夫人在芝加哥运动场发表演讲讲词》，《战时外交》（一），第812~815页；杨天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宋美龄与丘吉尔（上）》，《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4日，GB07版。

益为制，努力益使防止战争之再发，维持永久之和平。”<sup>①</sup>美国舆论对中国的支持，反过来又对美国当权者产生了影响。

宋美龄是一位很有心计、讲究工作方法的人。为了得到美国人的支持，她联络了美国上下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及各委员，请他们出面表态，就欧亚先后、战后中国务须列入四强及亚洲和平与中国关系等问题发表意见。在宋美龄的强有力的攻关工作之下，美国国务卿赫尔表态支持宋美龄。赫尔告诉宋美龄，罗斯福正设法邀请美国“行政负责人”发表演说“对付英国”<sup>②</sup>。

3月25日，美国国会民主党领袖麦克卡麦克发表演说，支持宋美龄的讲话。他说：“当此必须击败希特勒纳粹主义之际，远东之重要性亦不容忽视，该处有残酷且居心恶毒之敌人与吾人对峙，吾人之英勇盟友中国，亦在世界战争中之另一战场奋斗。击败希特勒诚为首要问题，然吾人亦不能容许一种印象存在，即击败日本乃吾人考量中之次要问题。余深知容许此一印象存在，则其全亚洲尤其中国人民灰心未有逾于此者，远东方面必须以勇猛不怠及日益用力之态度从事作战。中国之自由独立乃美国人民所重视者。”<sup>③</sup>

他强调：“中国于胜利之后，参加和平会议与国际会议，其地位非以一获救之儿童之地位参加，而自有其正当之地位。世界之未来和平须由美、中、英、苏四国维持。任何和平会议，如无蒋委员长领导之中国代表与其他联合国家之代表以平等之条件发言，则会议永远不能成为完善。”他明确声明：“我们不能存有击败日本为次要之观念，中国必须出席和平会议，应有他合理之地位，并非为一被救之儿童。中国为四强之一，应决定将来之和平会议。”<sup>④</sup>

在麦克卡麦克之外，其他美国政要，包括乔治·白朗等人也纷纷表态反对英国的“先欧后亚”政策。同日，美国国务卿赫尔本也出面说：“东西轴心均应摧毁，美国不存轩轻之见。”<sup>⑤</sup>

由于美国政治家们纷纷表示不同意丘吉尔的观点，使英国政府感到不安。英国人并不怕中国人的反应如何，但是他们却非常在意美国人对丘吉尔讲话的态度，非常重视美国的态度。英国政府认为必须采取对策，来停止美国人对英国的不满。因此，英国政府指示正在美国访问的英国外交部长艾登出面发表演说，纠正丘吉尔的观点。

3月26日，艾登在马里兰州议会发表演说，强调“整个战争不可分割”。他向中国保证，“英国将协助中国对日本进行作战，直至获得最后胜利而后已”，“且中国在战后之和平期间，将与美、苏、英三国分担完全之责任。”“中国不必怀疑吾人，吾人将不至忘记，（中国）多年以来独立抵抗侵略之经过。”“各联合国家尤其美国、不列颠联合国、中国与苏联在平时与战时应共同

---

① 《蒋夫人自纽约致蒋委员长电》，《战时外交》（一），第841页；此电应为1943年3月24日发，该书误系于5月24日；杨天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宋美龄与丘吉尔（上）》，《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4日，GB07版。

② 《蒋夫人自纽约致蒋委员长电》，《战时外交》（一），第841页；杨天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宋美龄与丘吉尔（上）》，《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4日，GB07版。

③ 《世界未来和平，须中美英苏维持》，《中央日报》，1943年3月26日第2版；转引自杨天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宋美龄与丘吉尔》，《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4日。

④ 《蒋夫人自纽约致孔祥熙夫人电》，《战时外交》，第842页；转引自杨天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宋美龄与丘吉尔（上）》，《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4日，GB07版。

⑤ 《赫尔评丘吉尔演说之严正表示》，《中央日报》，1943年3月27日第2版；转引自杨天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宋美龄与丘吉尔（上）》，《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4日，GB07版。



行动。”<sup>①</sup>

艾登的演说，正是宋美龄所希望的结果。在艾登发表演说的当晚，她就与宋蔼龄进行了一次谈话。在她与宋蔼龄谈及此事时，她说：“以前我国对外人总抱请求、客气态度，以致外人认为老实可欺。丘吉尔经妹驳斥后，艾登在美本不打算演说，其所以突然改变方针者，实因妹芝加哥演词使然。丘吉尔前屡言英、美同种血统关系。现艾登则谓自由乃个人之护照；丘吉尔完全不提中国，艾登则谓中国必为四强之一，实已改变论调。”<sup>②</sup>

27日，宋美龄令秘书在旧金山发表谈话，说：“蒋夫人聆悉英外相艾登在马里兰州发表之演说后，曾谓中国得与彼具有明确思想及诚恳目标之发言人之国家结为盟邦，实引以自豪。”<sup>③</sup>通过这次谈话，宋美龄表达了对艾登讲话的肯定。但是宋美龄非常清楚，一次演说并不意味着英国政府就会改变其多年来对中国的一贯殖民主义态度。她认识到今后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还很艰巨，因此她对艾登的讲话，有所保留的。

关于艾登出面，更正丘吉尔错误言论一事，蒋介石的看法就更特别。他根本不相信英国的对华政策会真正改弦更张。他对英国殖民主义的认识，比宋美龄要深刻得多。他认为艾登的讲话，不过是一种欺骗手段。他在3月28日的日记中，表达了这种看法。他说：“丘吉尔演说遗弃我中国，其对我侮辱可谓极矣，但此为其坦白肺腑之言，实于吾有益。其后艾登虽在美为其修正补充，不过更增英国虚伪欺诈之劣行而已。”<sup>④</sup>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宋美龄进一步争取美国人民的同情。3月28日，宋美龄在旧金山举行记者招待会。会上，她非常艺术而又自然地提出了“珍珠港事变”日军对美国的侵略。她说，“美国已经受到了日本攻击，而没有受到德国攻击。德国对于美国的攻击，迄今尚限于言论而已。”<sup>⑤</sup>她强调，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是19世纪墨西哥战争以来美国领土第一次遭到攻击。从此，美日进入交战状态。宋美龄的这一论点，在美国人民中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煽动起了美国人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许多美国人群情激奋，要求美国国会加大对中国援助的力度。蒋介石非常高兴，记曰：“余妻在旧金山答记者问，而德只以口头反美之语，对美民必发生影响也。”<sup>⑥</sup>

宋美龄陆续在美国报刊上发表的反英文章，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例如，宋美龄认为英国在远

---

① 《中央日报》，1943年3月28日第2版；转引自杨天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宋美龄与丘吉尔（上）》，《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4日，GB07版。

② 《蒋夫人自纽约致孔祥熙夫人电》，《战时外交》（一），第842页；该书将此电系于1943年5月26日，亦误；转引自杨天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宋美龄与丘吉尔（上）》，《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4日，GB07版。

③ 《中央日报》，1943年3月29日，第2版；转引自杨天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宋美龄与丘吉尔（上）》，《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4日，GB07版。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3月28日；参见王建朗：《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第108页。

⑤ 《中央日报》，1943年3月30日第2版，转引自杨天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宋美龄与丘吉尔（上）》，《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4日，GB07版。

⑥ 《中央日报》，1943年4月21日第2版；亦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3月30日；杨天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宋美龄与丘吉尔（上）》，《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4日，GB07版。



东战场上是半心半意的，而对中国的态度则是帝国主义的。她批评说以帮助中国抗战为名被任命到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大商人们是“大班”。“大班”是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分子的代名词，宋美龄使用这一语言，生动地刻画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中国的形象，引起了美国人民的同情。千千万万美国人都为宋美龄的文章感动，愿意帮助中国抗日。<sup>①</sup>

美国朝野对中国的广泛同情与理解，形成了强烈支持中国、重视太平洋战场的舆论。4月14日，宋美龄就在纽约接见记者，建议由美、英、苏、中四大国成立战后世界委员会，处理有关问题。同日，纽约《每日新闻》刊出漫画：宋美龄与罗斯福、丘吉尔共坐，其间有巨大地球仪一具，宋美龄指着地球仪说：“尚有太平洋在。”另有漫画指出，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太少”、“太迟”。

为了支持中国，美国国会议员更纷纷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援助中国。例如17日，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陈德勒发表谈话，呼吁参议院和美国人民共同向罗斯福、丘吉尔施加压力，促进对日采取攻势战，而暂缓对德采取行动。陈德勒称：美国如不将军事力量用于太平洋方面，则中国仍将遭遇重大困难之威胁。<sup>②</sup>

宋美龄在美国的一系列讲话，也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并得到一些英联邦国家的支持。4月19日，澳大利亚外长伊瓦特在美国宣称：“美国已表同意，盟国所受日本威胁最大，解除暴日武装始有安全。”他为此感到高兴。<sup>③</sup>

鉴于上述压力，丘吉尔在表面上不得不改变对中国的态度，表示要重视亚洲战场。19日，丘吉尔在美国两院发表演说，保证英国对日本即取发动“无休止、无怜悯性之战争”，他说：“吾人一息尚存，吾人血管中一日血流不息，则吾人即将发动此种战争。”“现驻印度东部之大批英军与海空军，在对日作战中，必将居于显著之地位。”他并且向中国讨好，保证给予中国以“有效与立时之援助”<sup>④</sup>。

在演说中，丘吉尔再也没有重提所谓美、英、苏三大“胜利国”组建未来世界机构的问题。<sup>⑤</sup>在罗斯福与丘吉尔之间进行的一系列会谈中，罗斯福做出的重视太平洋战场，加强支援中国，和中国联合，共同进攻侵缅日军的一系列决定，丘吉尔都表示了赞成。

4月27日，美国明尼苏达州众议院议员兼众院海军委员会委员梅文玛斯明确提出，联合国必须改变卡萨布兰卡会议确定的战略，须同时认识日本之威胁，立即集中美国军力对付太平洋上的“可怖之危机”。美国在开罗会议上采纳了这种意见，做出了有利于中国的战略决策，即在欧洲战争的同时，要尽早开辟亚洲的缅甸战役，在亚洲打击日本。英国被迫同意这一决定。

这样，中国反对“先欧后亚”战略的斗争，终于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1943年5月27日宋子文致陈诚电：“此次罗丘华府会议，罗已得丘同意，不能专顾欧洲，同时太平洋各方面须向

---

① FO371/35689, FO371/41582, F41223/34/10, Memorandum by E. Barger, June 5, 1944.

② 《中央日报》，1943年5月19日第2版；转引自杨天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宋美龄与丘吉尔（上）》，《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4日，GB07版。

③ 《中央日报》，1943年4月30日第2版；转引自杨天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宋美龄与丘吉尔（上）》，《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4日，GB07版。

④ 《中央日报》，1943年5月21日第2版；转引自杨天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宋美龄与丘吉尔（上）》，《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4日，GB07版。

⑤ 《中央日报》，1943年5月16日第2版；杨天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宋美龄与丘吉尔（上）》，《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4日，GB07版。

日敌攻击。对缅甸有较前更切实之布置，定期执行。”<sup>①</sup>

宋美龄反对丘吉尔的“先欧后亚”论的斗争，以及其出色的外交活动，蒋介石曾给予了肯定。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华盛顿罗丘会议结果对我中国战区之将来作战比前已有进步”，“此乃吾妻赴美最大之效用，比之任何租借案之获得为有益也”。<sup>②</sup>

虽然中国人民和重庆国民政府反对英国“欧洲第一”的斗争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英国口是心非，并没有在实践中改变这一战略，更没有改变与这一战略相关的具体政策。在这些相关政策中，英国对战时中国国际地位的政策，是英国坚持“欧洲第一”战略，为恢复战后英国在远东殖民主义统治而提出的。

## 第二节 英国对战时中国国际地位的否定

### 一、英国对中国世界“四强”地位的否定

中国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2年，已经独立进行了6年的艰苦的抗战，给予了日军沉重打击。中国的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争取了时间。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在欧洲战场，盟军就一败涂地：波兰沦陷，法国无耻投降。而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的军队在亚洲战场立即崩溃，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西方帝国主义的威风荡然无存。此外，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没有参加反法西斯的战争，没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贡献。

中国与这些国家相比，其英勇抗战的壮举，不仅可钦可佩，而且显示出中国是一个难以被征服的世界大国。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角度，特别是从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贡献的角度来说，在1942年，中国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反法西斯战争强国，应该享有战时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

但是英国出于战后殖民主义的考虑，反对给予战时中国大国地位。丘吉尔曾说，英国不欢迎中国进入强国行列。他担心中国的崛起，将促进亚洲各国的独立解放运动，使大英帝国在远东的统治结束。因此，丘吉尔曾对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说，他不能“把重庆国民政府看做代表一个世界大国”，而外相艾登则说，他“不太喜欢中国人能在太平洋上往来无阻的主张”<sup>③</sup>。

1942年6月，英国与苏联订立同盟协定。英国外相艾登在订立协定时发表演说，声称世界人类各民族生命之前途皆取决于美、英、苏三国之合作。这一说法，再次将中国排除于四大国之外。蒋介石对艾登的讲话非常不满，认为艾登“视中国与其他各国为无物。世界人类如依过去英帝国主义侵略之阴谋与其自私自利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之劣性，若再称霸世界，则人类将无噍类矣。若非美国主持公道者，参加此次同盟在内，则中国实羞与为伍矣”<sup>④</sup>。

到1943年后，英国更有意宣传这种思想，刻意贬低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贬低中国的抗日战争。上文已经谈到，在1943年3月21日丘吉尔所作的广播讲话中，他有意不提中国是四强之一，只提三强即英、美、苏。他还谈到在击败德国之后，英国将采取某些措施让军队复员。

---

<sup>①</sup> 杨天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宋美龄与丘吉尔（上）》，《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4日，GB07版。

<sup>②</sup> 杨天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宋美龄与丘吉尔（上）》，《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4日，GB07版。

<sup>③</sup> 转引自王建朗：《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第107页；亦见〔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2、474、556页。

<sup>④</sup> 转引自王建朗：《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第108页；亦参见美国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1942年6月15日。

丘吉尔做讲演前，英国派驻中国驻伦敦军事代表团的默里克·休利特做了专门安排，要中国驻伦敦军事代表团去听讲演。中国代表团在听了广播后，立即提出了强烈抗议。但休利特立即解释说丘吉尔的讲话特指欧洲而已；战争的结果必然是先打败德国。休利特强调说丘吉尔已经解释说让军队复员的原因是不可能大批英国和美国部队调到远东，这是因为距离太远和缺乏交通工具。休利特把上述情况告诉了英国外交部的克拉克。克拉克认为中国方面对丘吉尔的讲话的抗议是不正确的。<sup>①</sup>

但是他觉得应该设法平息中国人的愤怒。因为丘吉尔的讲话会在中国和美国引起极大的后果。他告诉休利特说3月1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对英国外长艾登强调中国应该是世界强国之一，应该参与解决世界问题。克拉克建议：“如果丘吉尔同意的话，我们应立即给在美国的艾登发一封电报，建议他在适当的时候发表讲话，明白表示英国认为中国是世界强国之一。在打败了我们共同的敌人后，英国愿与中国一起解决世界问题。”<sup>②</sup>

丘吉尔接受了这个建议，于3月22日给艾登外长发出一封秘密电报。电文承认在3月21日的广播讲话中，他曾有两三次提到胜利后的世界三强，即英、美、苏，但没有提到中国。因此他理解为什么中国驻伦敦军事代表团听到没提到中国为世界强国后会生气。但丘吉尔说，他立即指出他的讲话是针对欧洲局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必然是先打败德国，然后打败日本。丘吉尔担心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讲话可能会被美国、中国或其他地区的报纸断章取义地转载。而且考虑到罗斯福总统坚持要把中国作为世界四强之一，所以丘吉尔指示艾登在适当的场合说明英国认为中国是四强之一。中国为世界作出了贡献。他建议艾登在马里兰州发表讲话时发表上述观点。<sup>③</sup>

蒋介石对丘吉尔在讲演中有意不提中国是四强之一，非常愤恨。蒋在听了丘吉尔的演说后，立即给予了批判。他在3月27日、28日三天的日记中，接连写道，英国将中国排除于四强之外，“乃以丘吉尔末日将至，否则英国必将遭遇更大之失败也”，“丘吉尔演说遗弃我中国，其对我侮辱可谓极矣……昔之所谓四强者，吾国不过获得其虚誉，而丘乃连此虚名亦不许中国所有而已。但英国对联合国之信约及其屡次之诺言，尤其对大西洋宪章之皇皇宣示皆因此消失殆尽”<sup>④</sup>。

蒋介石批评丘吉尔是言而无信之人。他断言，言而无信的人必将被世界人民抛弃。他说：“英国对联合国之信约及其屡次之诺言，尤其对《大西洋宪章》之煌煌宣言，皆因此消失殆尽。前后如此二人，英国拐骗手段暴露无遗，余断此拐子末日必不远矣。”<sup>⑤</sup>

此时，中英之间正在商讨蒋夫人宋美龄访英问题。作为抗议，蒋介石决定取消宋的访英之行。蒋在致宋美龄电中表示：“访英问题，不必肯定，亦不必答复。观丘吉尔廿一日演词，对世界问题仍无觉悟，对中国观念毫无变更，将来政治似无洽商余地。如吾人此时访英，将被视为有求于人，否则，亦只有为其轻侮，或反被其欺诈耳。”<sup>⑥</sup>

---

① FO371/35739, F1725/25/10, Minutes by Clarke, 22 March 1943.

② FO371/35739, F1725/25/10, Minutes by Clarke, 22 March 1943.

③ FO371/35739, F1725/25/10, The Prime Minister to Eden, 22 March 1943.

④ 《蒋介石日记》，1943年3月27日、3月28日（本周反省录）；转引自王建朗：《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第108页。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3月28日；转引自杨天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宋美龄与丘吉尔（上）》，《南方都市报》，2008年11月4日，GB07版。

⑥ Speech by Anthony Eden, 7th July, 1943, Anthony Best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art 3, Series E, Vol. 7,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7, p. 25.

中国政府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向英国政府提出了抗议。中国外交部次长吴国桢，于1943年3月25日告诉英国驻华使馆的一位官员，说中国对丘吉尔讲话的不满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第一，丘吉尔的意思是中国是战后需要西方援救的国家，不仅不是四强之一而且不能参加战后的世界组织。他也不提中国与正在筹组的亚洲委员会的关系。第二，丘吉尔提出在打败希特勒后要部分撤军。第三，丘吉尔大谈战后问题，而不提如何打败日本。吴国桢说第二、三个问题中国政府还可容忍，但不能容忍其第一种说法。而容忍第二、三点的原因，是因为事实上英国对日作战将主要依靠皇家海军和空军，丘吉尔大谈战后问题亦无可。

在中国的大国地位上，中国得到了美国的支持。美国期望战后取代英国和其他殖民地在远东的地位并希望扶持一个亲美的蒋介石政权。对此，开罗会议前罗斯福的特使赫利（Patrick J. Hurley）来华向蒋介石交底的两句话，就已经非常明确了：“美国反对任何形式的（包括英国人的）帝国主义”，“我们希望一个自由、强盛和民主的中国崛起在亚洲。”<sup>①</sup>

许多英国政府官员认识到，中国的战后地位则是中国人最为关心的也是最敏感的问题，丘吉尔的谈话自然会引起中国人的愤怒。例如薛穆就说，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看到在理论上他们是四强之一，然而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却很软弱的这一矛盾。正因为如此，丘吉尔的讲话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他预见到在此后的几天内报刊上会有很多文章评论这件事。因此他建议英国外交人员应尽力去平息这一事件。

由于3月26日，艾登在美国马里兰发表的讲话中，已经承认了中国是四强之一，加上英国驻华使馆不断向国民政府进行解释和道歉，这样由丘吉尔3月21日讲话中关于中国不是四强之一的说法所引起的中国的愤怒，就暂时平息下来。这一事件，后来被薛穆形容为“茶杯里的风波”。<sup>②</sup>

为了进一步平息中国对英国的不满，英国被迫在1943年7月“卢沟桥事变”6周年时，举办了“向中国致敬”的集会。艾登在会上发表演讲，说什么敌人在不断散布所谓英国不希望看到中国强大的说法“是十分荒谬的”。他相信中国朋友是第一个起来反对这些说法的。他声称：“事实上，大英帝国历来把自己的利益同一个大而统一的中国联系在一起。过去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没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就不可能期望远东的持久稳定。”<sup>③</sup>

但在骨子里，英国并未真正改变对中国的看法，英国仍反对中国是四强之一。蒋介石日记中对此常有记载和评论。例如他说，“英国报纸已公开评论中国非能列为强国之一，并谓中国并非大国，以大国之意义，非仅出土地人口之多寡为标准云”，“英国舆论对我国不利者日加一日，污辱污蔑备至”。<sup>④</sup>

---

① 转引自王建朗：《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第107页；[美]史迪威著，黄加林等译：《史迪威日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版，第239-240页。

② FO371/35739, F1689/25/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23 March 1943; FO371/35799, F2174/254/10, Seymour to Eden, 5 April 1943.

③ 转引自王建朗：《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第108页；《蒋介石致宋美龄电》（1943年3月26日），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一），第818页。

④ 《蒋介石日记》，1944年3月20日、1944年4月1日，（本周反省录）；转引自王建朗：《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第108页。



英国的这种态度，美国是非常清楚的。1943年11月26日，在蒋介石与罗斯福会举行的会谈中，罗斯福曾慨叹地对蒋介石说：“现在所最令人痛苦者就是丘的问题”，而“英国总不愿中国成为强国”。罗斯福对此非常忧虑，他的态度曾使蒋介石大为感动。蒋介石觉得罗斯福的这次谈话，“比上次谈话时更增亲切”。第二天，蒋介石就对霍普金斯赞扬罗斯福：“此次世界大战，如非罗之政策与精神，决不能有今日之优势，英与俄皆无法挽救，故余惟佩其人格之伟大也。”<sup>①</sup>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英国在这个问题上口是心非的态度，正如蒋介石所说：“开罗会议之经历，无论军事经济与政治，英国决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彼对于美国之主张亦决不肯有所迁就作报答美国救援英国之表示；其对于中国存亡生死，则更不值一顾矣……英国之自私与贻害，诚不愧为帝国主义之楷模矣。”<sup>②</sup>

1944年4月18日，宋子文会见英国驻华大使薛穆（Horace Seymour），提出三点询问：“一、英国是否仍认我为一盟邦？二、英国是否发现我曾滥用此种外交特权？三、如各作战国家均以安全为理由，颁布此种办法，是否于各盟邦均不便利？”

薛穆在回答时表示，开辟第二战场关系重大，因只有英、美、苏对欧战负有责任，故对其他国家采取了限制办法。但是中国对这种解释，是非常不满意的，提出了抗议。宋子文指出，不应将中国包括在限制的国家之内，因为“中国亦系对德日作战主要国家之一，为世所公认，与各流亡政府不同”，英国这样做，不但在外交事务的办理上造成困难，“且将予中国人民以极不良之感想”。<sup>③</sup>

4月19日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向英方提交了备忘录，强烈抗议中国被英国列于被限制的国家之中。顾维钧在备忘录中说：“英国政府此举，对于与英一起为自由而战的盟国及未参战国家不加区别，特别是对在此次世界大战中首先奋起抵抗侵略的中国，竟有这等待遇，感到非常痛心！”<sup>④</sup>

但是英国并不理会重庆国民政府的抗议。到1944年6月15日，英外长艾登仍然坚持这种说法。他在该日发表的演说中，声称今后世界和平全赖英、美、俄、法四大强国合作维持，完全把中国排斥在世界强国之外。对此，蒋介石批评说：“此乃英国一贯政策，始终要以法国代中国之地位，不足为怪。”<sup>⑤</sup>他指示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他说：“此乃英国对华有意之侮辱，将置我国

---

① 《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27日；王建朗：《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第115页。

② 《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本月反省录；《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上册，第445页；王建朗：《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第109页。

③ 转引自王建朗：《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第109页；亦参见《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4年4月18日），《战时外交》第一册，第91页。

④ 王建朗：《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第109页。

⑤ 《蒋介石日记》，1944年11月，本月反省录；王建朗：《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第109页。



于联合国四强之外，其后必将有此等恶剧继续演进，余令外交部对英使提出严重抗议”。<sup>①</sup> 在当月的反省录中，蒋再次提及此事，他虽也考虑到可能中国的密码编制在英、美看来尚未精密，故不许中国发密码，但仍认为英国“其用心侮辱有意欺凌，则不可恕也”<sup>②</sup>。

对于英国不愿中国成为四强的原因，蒋介石曾有所分析。他在日记中，分析了英国持此态度的诸方面因素。蒋认为英国担心中美一体削弱其地位，是英国反对中国为四强之一的主要原因：“英国始终不愿我国参加四强之内，其原因乃为我与美国一致，使美国在会议时占多数而英不能控制会议，此其主因。”<sup>③</sup>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重庆国民政府在中国是否是四强之一这个问题上，一直与英国进行斗争，希望英国改变态度。但是重庆国民政府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在英印政府内部拟定的一份有关预测中国战后在亚洲地位的顶极机密文件中，道出了其原因所在。这份文件指出：战时国民政府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努力，对于英国在印度和东南亚殖民统治而言，是一巨大挑战。战时中国对于英国在亚洲殖民统治所可能带来的威胁，事实上并不亚于日本军国主义对于远东地区以及希特勒对于欧洲所带来的威胁。<sup>④</sup> 因此，英国把中国当成了潜在的危险，在太平洋战争中，只要有机会，英国就要千方百计贬低中国，削弱中国的国际地位。

## 二、丘吉尔贬低中国抗日的贡献

为了否定中国是四强之一，英国极力贬低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丘吉尔在许多场合都发表过中国抗日不力的言论，以贬低重庆国民政府抗日的贡献。1944年夏，日本开始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即“豫湘桂”战役）。到1944年秋，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一败涂地。国民党军队在这次战役中的失败，给了英国贬低中国抗战作用的一个机会。

1944年9月28日，丘吉尔发表了题为《战争和国际形势》的讲话，再次否定了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日贡献。在讲话中，他首先渲染了重庆国民政府的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的失败，然后转而对英军在缅甸的战斗自吹自擂，贬低中国在缅甸战役中的贡献。

他在讲话中说，中国国民党军队损兵折将，一溃千里。他说：“我非常遗憾地注意到，尽管中国得到‘过量’的美国援助，但这个伟大的国家由于被七年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所以遭到了严重的军事失败。其中损失了陈纳德的美国飞行大队所需要的无价的飞机场。这些不能不十分令人失望和不安。”<sup>⑤</sup>

丘吉尔的讲话虽然正确指出了国民党遭到军事上的严重失败，但丘吉尔在谈到国民政府得到“过量”的美国援助上，过于夸大事实。而重庆国民政府急于转移国内人民对他们抗日不力的批评，正好利用丘吉尔的讲话去发动一次声势浩大的反英运动。

---

① 《蒋介石日记》，1944年4月18日；转引自王建朗：《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第109页。

② 《蒋介石日记》，1944年4月，本月反省录；转引自王建朗：《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第108页。

③ 《蒋介石日记》，1943年3月，本月反省录；转引自王建朗：《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第108页。

④ 王建朗：《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第108页。

⑤ FO371/41689，F4516/4516/10，War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by Churchill，28 September 1944.

丘吉尔对中国的殖民主义态度和蔑视的言论，也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事实上，中国在这次战役中虽然失败了，但是从战略上说，中国军队牵制了日军的大量兵力，有利于美军在太平洋对日进行的海战和逐岛争夺战，有利于整个盟军在缅甸的战斗，有利于整个东南亚的抗日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失败了的中国军队，又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新贡献。更为不容易的是，重庆国民政府在应对日本发动“豫湘桂”战役的同时，在缅甸与盟军一起发动了缅甸战役。重庆国民政府在这两个战役中，都作出了贡献。

在重庆国民政府的鼓励下，中国新闻界再次发动了反英运动。《大公报》和《扫荡报》等许多中国报纸发表了多篇文章反对英国的殖民主义倾向。这次反英运动的规模与程度，都远远超过了1942年3至10月发动的中国报界反英运动。首先是国民党军方的《扫荡报》发表了题为《自强与外国援助》的社论，驳斥了丘吉尔的讲话。该文详细地引证了美国租借物资分配给各国的比例。在这些美国物资中，大部分给了英国和苏联，中国仅得到2%。据此，该社论指出，“所有明眼人都看得出中英关系从来没有融洽过”<sup>①</sup>。《扫荡报》社论还说“丘相演辞，伤害中国人感情”<sup>②</sup>。

该文指出，抗战开始以来，中国一直在做让步，希望成为英国的好朋友。但是英国的统治者丘吉尔一直在玩弄诡计，恶化中英关系。然后该文历数了英国损害中国人民的所作所为和中国人民的新仇旧恨。例如英国在中国抗战最需要外界援助时关闭了滇缅铁路。为什么英国会对中国如此呢？这篇社论认为，首先，是中国进行了四年半卓有成效的抗日，这就形成了对英国在远东利益的威胁，特别是中国的抗战会激励印度为独立而战。第二，香港的九龙问题是中英关系中的“脓包”，是英国良心上的耻辱。最后，是英国担心战后中国会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成为远东举足轻重的大国。为了反对出现这种结果，所以丘吉尔才尽一切努力来反对中国。<sup>③</sup>

英国政府并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民会如此激烈地反对丘吉尔的讲话。薛穆认为“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情绪激动的浪潮，是深陷其中并且完全反常的公众舆论。这源于中国军事落后的自我认识，也源于对外国批评中国落后的愤恨，并指责外国对中国不充足的军事援助。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丘吉尔的演讲可能不会产生什么反响。但是日本在攻占了河南、湖南，并开始向桂林挺进后，中国公众变得极其敏感和具有攻击性。丘吉尔的‘过量’一词，点燃了他们郁积在心中的愤怒的火花。”<sup>④</sup>

薛穆断定，这是“一种无理性的指责和历史性的谎称运动，仇外情绪从来没有远离中国人。这种极不负责任的社会舆论浪潮必定失败”<sup>⑤</sup>，即他认为这次反英运动完全是因为中国军事上的落后和失败带来的极度绝望情绪和极度仇外情绪所引起的，是一场没有任何理性的反常的运动。

---

① FO371/35739, F1689/25/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23 March 1943; FO371/35799, F2174/254/10, Seymour to Eden), 5 April 1943.

② 《美报评论丘相演辞，谓为伤害中国人感情》，《扫荡报》，1944-10-5（3）。

③ WO208/399, China (142), 8B,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3 October 1944 年 10 月 3 日; FO371/46232, F799/409/10, The Central News), 4 October 1944.

④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7, Far Eastern Affairs, p. 489.

⑤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7, Far Eastern Affairs, p. 491.

英国政府认为中国这次反英运动是错误的和不负责任的。薛穆于10月2日向英国政府报告“丘吉尔的讲话在中国广为登载”。重庆的中央社发表文章说所有的观察家都对丘吉尔使用“过量”一词来描述美国对华援助一事表示困惑不解。薛穆认为是小题大做，双方是误会。但由于美国根本不同意丘吉尔所说中国得他们的“过量”援助，所以重庆国民政府感到有人撑腰，反英文章更为尖锐。

但是，与英国政府的看法不一样，英国民众比较公正地看待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丘吉尔的讲演，引起了英国各报纸对中国战事的注意。英国一些报纸对丘吉尔的演讲给予了全文报道，英国报界中的“各左翼报纸亦以显著地位刊载”。许多英国人并不同意丘吉尔的观点，一些报纸还特别指出了中国军队抗战中的装备的确落后和不足的事实。如在《泰晤士报》发表的一篇社论中，“强调日军最近于桂省蠢动之重要性，末称，美国舆论咸以焦灼之心情注视此一实力悬殊之战争，盖中国军备仍配备欠佳也”。

《伦敦每日先驱报》军事评论员在文章中，也强调日军在广西进行的攻势之重要，对中国和远东战场的极大威胁，并赞扬中国战场上虽然目前的溃败是事实，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军队都是软弱不堪和腐败无能的，“该报并刊有中国南部之简明地图，作者强调日军建立路上道路，打通东南亚与华北之可能性……并称华军于衡阳之战，努力作战，惜未取得长期据守”<sup>①</sup>。

这场中国的反英运动，还得到了美国报界的理解和支持。美国《纽约时报》对丘吉尔演讲的评价是“发现其欲取好吾人之成分多于伤害中国人感情之意”、“中国之被封锁已达七年，其补救办法大部为更多外来之援助，但外来之更多援助，仍不可能，吾人之希望，中国之希望，皆为其援助能及时抵达”。

《纽约前锋论坛报》在头版，刊载美国政府发表运华租借物资之数字报告，详细列举了中国政府所得到的援助，其数量少得可怜。《华盛顿邮报》政治评论记者诺佛认为：“重庆以其盟友未能以彼急需之军用物资及协助予以支持而发出严正声明，吾人对此殊难不给人以同情……此目前环境，前途危机重重，若请中国人民及其领袖泰然自若，镇静应变，亦强人所难亦……但目前中国处境坎坷，美人应勿漠视中国目前之严重情势，亦勿存一时之自满，及早以一切可能协助，运往中国，乃一切盟国本身之福。”<sup>②</sup>

关于缅甸问题，丘吉尔在9月28日的讲话中说，他看过许多美国报纸，感到问题严重，对英国的报道失实。美国报刊上的文章表明美国人民完全错误理解了英国在缅甸对日作战的努力，他们不了解在蒙巴顿勋爵领导下的英军在缅甸取得的胜利。美国一些重要部门甚至认为英军1944年的在缅战役实际上失败了，或至少是处于僵持状态。英军在缅的行动不值一提。相反盟军在缅甸的胜利，例如收复了一些城市，完全是乔治·史迪威将军领导的美国和中国军队取得的。

丘吉尔说美国人的上述看法根本就不对，那些胜利是英军取得的，而不是中美军队取得的。丘吉尔的上述讲话贬低了美国和中国军队对缅甸战役的贡献，抹杀了他们的成绩，所以引起了美国和中国共同愤怒。史迪威将军甚至主张美国政府应采取行动澄清事实。

美国总统代表赫尔利将军于10月1日晚与薛穆进行了一次谈话。薛穆从这次谈话中得到的印象是美国军方和中国军方，都对丘吉尔抹杀中国和美国在缅甸部队对日作战的贡献感到愤怒。美国在东南亚的参谋长史迪威将军要求美国应就这个问题发表宣言。但是赫尔利劝阻了史迪威将

---

① 《美报评论丘相演辞，谓为伤害中国人感情》，《扫荡报》，1944-10-5（3）。

② 《美报评论丘相演辞，谓为伤害中国人感情》，《扫荡报》，1944-10-5（3）。

军。赫尔利强烈反对英、美在缅甸问题上发生争论。赫尔利说美国政府不允许史迪威将军发表任何宣言。不过他说中国政府可能发布类似宣言，说明中国军队在缅甸的贡献和他们遭受的损失。

接着中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于10月2日发表宣言，对丘吉尔的讲话进行评述，“以正视听”。这篇文章指出，实际上分配给中国东部军队的物资，还不够英、美军队的一个师用一个星期，而中国东部军队面对十个日本师，靠的是抗战决心来对抗日军的优势兵力和火力。中国真正得到的帮助，是来自陈纳德的“英雄的极其有效的空军”。但是这支空中力量毕竟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弱小。

至于美国从印度空运到中国的物资，大部分被美国在华空军拿去使用，中国军队几乎什么也没得到。而中国在缅甸的军队虽然得到了美国物资，但大部分用到缅甸战役苏汶河战线的中国部队身上。他们为取得缅甸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中国军队把美援物资及其他物资大量用于缅甸战役，所以当日本军队在中国本土发动这次战役时，中国本土军队的军需物资就十分贫乏，导致中国军队的失败。然而丘吉尔“沾沾自喜”夸耀的英军在缅甸取得的胜利，主要是中国军队取得的；在苏汶河盟军打败了日军十个师，但这是由于中国军队首当其冲顶住了日军的攻击，才保证了盟军胜利。

在缅甸北部，也是中国军队对日军发动进攻而取得胜利的。虽然这些军队是史迪威将军训练的，但事实上毕竟是中国军队使整个缅甸战役取得了伟大胜利。纵观全局，虽然空中力量是美国的第十和第十四航空大队，但在缅甸北部和整个苏汶河战线地面部队的80%是中国军队。这次战役中国军队伤亡达五万人。

最后这篇文章严正宣布：“我大胆地预言当重写历史的时候，在缅甸战役中作出贡献的各国都将名垂青史。历史将揭示，当中国本土面临日军严重进攻时，中国毫不犹豫地为了英属缅甸的抗日大业奉献出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这篇文章在中国广泛刊载，引起强烈反响。中国人民纷纷批评英国贬低中国军队在缅甸贡献的做法，各报也严厉批评了丘吉尔的讲话。<sup>①</sup>

中央社记者走访了在重庆负责租借物资的官员，为反驳丘吉尔的信口雌黄提供了有力证据。根据记录，中国得到的租借物资仅为2%，而英国却得到70%，应该是“过量”的美国物资给了英国。而中国得到的2%，也完全用于在印度受训和到缅甸打日本的中国军队。根据上述统计数字，中央社记者再次强调，由于英国一再坚持而通过的“欧洲第一”战略给中国带来的损失。由于这一方针，远东战场不受重视，大批美援分配给英国和欧洲，中国未能得到应有的援助。因此中央社记者再次呼吁美国立即给予中国援助。<sup>②</sup>

在英国政府内部，也有人担心丘吉尔的讲话会损害中英关系。如蒙巴顿勋爵的政治顾问丹尼，多次向英国政府报告蒙巴顿对这个问题十分关注。蒙巴顿还亲自给丘吉尔写信。他很担心中国人民的反英情绪，可能影响到在缅甸北部战斗的中国军队的士气。他特别担心影响到苏汶河战线的中国军队。这些部队是蒋介石应英军的特别要求而派去的。

蒙巴顿建议说英国政府应该尽早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表明英国对中国军队在缅甸的巨大贡献是十分感谢的。这样做将会改善双边关系。蒙巴顿还给丘吉尔在重庆的代表怀亚特将军写信，要他尽力向蒋介石解释和表达英国的这种友好态度。

但是英国政府并不认为这次严重事件是丘吉尔蓄意挑起的。他们认为丘吉尔并非有意贬低中

---

① FO371/41689, F4516/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3 October 1944; WO208/399, China 142 (x) 8B,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5 October 1944.

② WO208/399, China 142 (x) 8B,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5 October 1944.



国军队而提高英军的影响。薛穆认为这次中国反英事件完全是误解。部分原因是由于对“过量”援助一词断章取义的解释。或许这是由英语翻译成中文而引起的错误。“过量”一词本应为大量，而非“过分”的意思。

很明显薛穆是在做文字游戏。不管“大量”或“过分”，都是指国民党军队得到许多美国援助但仍然吃败仗。但是薛穆承认中国方面的有关声明是合情合理的，合乎事实的。他也主张要强调中国军队在缅甸的贡献，这样才能消除中国对丘吉尔讲话的不满，从而平息这场风暴。<sup>①</sup>

英国外交部认真研究了整个形势，并于10月9日电询薛穆，征求他对平息中国愤怒的办法。外交部在电文中说，英国政府不拟出面发表公开声明纠正丘吉尔的讲话。因为这样做的后果，无异于承认在缅甸作战完全靠中国军队与美国军队。他们问薛穆是否可以对这次中国政府的反英活动不闻不问，让它自动平息？如果从政治上考虑不闻不问的后果将不堪设想，那么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来平息这一事件？英国外交部还想了解怀亚特将军是否已与蒋介石谈话，谈话的结果如何。<sup>②</sup>

外交部还提出一个办法来维系中国在缅甸军队的士气，即让蒙巴顿上将访问他们，并由英国政府发表文告，要求中国军队继续在缅甸作战。<sup>③</sup>薛穆回电说必须认真对待此事，否则中国军队是不愿在缅作战的。目前虽然中国军队仍在苏汶河战斗，但他们并不想在那儿待下去。他们希望与中国本土恢复联系。在缅甸北部的中国军队从战略出发，或许可能留在那儿。但他们也不愿在日军大举进攻中国本土时，还留在缅甸。因为当时日军正在中国本土大举进攻，中国方面有可能把在缅军队调回国内。

薛穆还指出中国认为英军在缅甸战役中不是进攻而是防御，主要成绩是中国军队取得的。因此要解决目前中英之间存在的问题，就必须肯定中国军队的功绩。他还认为要平息中国的反英情绪并不困难。因为中国政府的目的之一是借机向美国要求更多的援助。如果他们得到援助，事情就好办了。他说丘吉尔抹杀中国军队在缅甸抗日的成绩使他们气恼，但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让公众知道他们在中国东部的军队只得到非常少的美国援助。薛穆说根据最权威人士的消息，自1941年以来，中国总共只收到五百吨美国物资。薛穆认为，如果给了中国援助物资，中国政府的这次反英运动不会延续很久。

他认为这次运动虽然声势很猛，但后劲小。主要原因是这次运动的目的，正如要求中国重开滇缅公路一样，是希望得到什么东西。所以只要做一些工作即可平息。

因此薛穆建议，在恰当时机由英国政府发表声明肯定中国军队在缅甸的贡献。但这个声明不能作为丘吉尔首相发言的注释，因为那样不能令中国人满意。他还建议蒙巴顿上将最好亲自慰问在缅甸北部的中国军队。英国外交部和总参谋部都同意薛穆的看法，并决定采纳他的建议。

战时内阁秘书霍利斯说，不要丘吉尔发表任何声明以弥补他9月28日的讲话，等蒙巴顿访问在缅甸北部的中国军队后，再商讨下一步怎么办。10月12日，总参谋部写信给丘吉尔汇报了薛穆的建议和霍利斯的看法。总参谋部认为在蒙巴顿访问缅甸北部的中国军队时应发布特别嘉奖令表扬中国军队。让公众注意到中国军队在缅甸的贡献。<sup>④</sup>

这是英国为了让中国军队继续留在缅甸战斗而被迫采取的手法。但同时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

---

① WO208/399, China) 142 (x) 8B,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3 October 1944.

② FO371/41689, F4652/4516/10, From Foreign Office to Chungking, 9 October 1944.

③ FO371/41689, F4652/4516/10, From Foreign Office to Chungking, 9 October 1944.

④ FO371/41689, F4905/54/10, For Prime Minister from Chiefs of Staff, 12 October 1944.



提出抗议，要求结束反英运动。通过软硬兼施，英国政府达到了目的，中国政府作了让步。10月13日中国外交部次长吴国桢告诉薛穆，他会告诉中国宣传部长，停止新闻界的反英运动。吴国桢说目前反英运动的声势已经慢慢在停息。

同时薛穆认为这次反英运动也不得不停止，因为“中国政府现在与俄国关系不好，而且与美国在许多问题上有不同看法。我真奇怪他们居然会选择这种时候向我们发起反对运动。”<sup>①</sup>10月14日蒙巴顿上将慰问了中国在缅甸北部的军队，并发出给蒋介石和中国东南亚军队总指挥的信。这就缓解了双方矛盾。由丘吉尔讲话引起的风波最终解决了。<sup>②</sup>到10月19日薛穆向英国外交部汇报说他发现现在蒋介石心情很好。<sup>③</sup>

值得一提的是薛穆向英国政府报告了中国共产党对丘吉尔讲话的反映。他说中共在重庆的报纸一直保持缄默，是中国唯一没有参加反英运动的报纸。英国政府认为薛穆的报告反映了中英关系的复杂性和中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尖锐性。<sup>④</sup>

为了反对英国，重庆国民政府采取了“联美制英”的方略。这是因为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支持中国抗日。但是为了美国在华利益，美国希望战后在中国建立一个美式民主的亲美政权。因此，美国出于与英国争夺远东的需要，对英国坚持殖民主义的顽固态度不满。美国人曾在各种场合流露出这种不满。例如罗斯福曾对宋子文表示，丘吉尔“不能脱离十九世纪思想”<sup>⑤</sup>。他已经预见到战后美英在处理殖民地问题上的分歧，罗斯福甚至对他的顾问表示：“我们战后将会同英国发生的纠纷，也许比目前同德国发生的纠纷来得大。”因此，美国在反英问题上，也期待中国的支持。<sup>⑥</sup>

一些美国政要也表现了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观点。威尔基在10月5日与蒋介石的谈话中表示，中美合作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当设法打消英国之帝国主义政策，盖英为帝国主义者之领导，苟战后而英国仍能保持其殖民地，荷、法等国继起效尤，无从阻之矣。中美两国应有勇气担当此事”。他表示：“盟国必将取得胜利。在有关战后问题的讨论中，美国将尽力协助中国，使中国在讨论中有平等发言之权。然英国不肯放弃其帝国主义之政策，已为我等所熟知，欲其自动就范，势不可能”，“因为英国一旦放弃其殖民地，便只剩下英伦三岛，无法再与其他三强争论短长。”<sup>⑦</sup>威尔基在回美国后的演讲中，也大谈反对帝国主义。罗斯福对此评价说：“他的想法很好，但只是说出来有些太早。”<sup>⑧</sup>

美国政要的观点，使重庆国民政府“联美制英”的方略有了实现的可能。这是中国人民反

---

① FO371/41689, F4759/4516/10, From Foreign Office to Chungking, 13 October 1944.

② 3 FO371/41689, F4777/4516/10, From Supreme Allied Command South East Asia to Foreign Office, 14 October 1944.

③ WO208/485, China 124, From Chungking to Government of India, 21 October 1944; FO371/41689, F4759/4516/10, From Foreign Office to Chungking, 19 October 1944.

④ O371/41689, F4759/4516/10, From Foreign Office to Chungking, 13 October 1944.

⑤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3年6月)(日期不详)，吴景平、郭岱君编：《宋子文驻美期间电报选（1940—1943）》，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203页；王建朗：《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第112页。

⑥ [美] 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第612页。

⑦ 《战时外交》第一册，第762~768页。

⑧ [美] 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第514页。

对丘吉尔 1944 年 9 月 28 日讲话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的反对下，英国对中国抗战贡献的贬低行为，不得不有所收敛。

### 第三节 英国实施“先欧后亚”战略的策略

#### 一、拖延缅甸战役

为在华实施其“先欧后亚”战略，英国采取了与中国消极合作抗日的策略，其具体策略，是拖延缅甸战役（1942—1944），以及在英国援华问题上制造障碍。

缅甸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军方认为：“缅甸作为南方重要地区的北翼根据地，不仅具有必须确保的战略地位，而且还具有对中国方面来说切断援蒋公路、对印度方面来说促进其脱离英国的重大的战略意义，所以大本营开战伊始就迫切希望进入缅甸全域作战。”<sup>①</sup>当时中国的抗战，主要依靠滇缅公路作为战略物资的补给线。如果缅甸为日军占领，这条补给线就会被切断。因此，滇缅公路的畅通，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英国也知道滇缅公路对中国的重要性。但是英国关心的不是中国的抗战，而是英国的利益。因此，为了保住在远东的利益，英国在滇缅公路问题上向日本让步。1940 年 6 月 19 日，日本要求英国关闭滇缅公路。英国于 1940 年 7 月 18 日，关闭了滇缅公路，并延续了 3 个月。滇缅公路的关闭，使战时中国对外交通中断。

滇缅公路的关闭，是丘吉尔对日妥协政策的必然产物。他认为日本军队只敢去攻打中国，而不敢打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1939 年 3 月 25 日他写信给张伯伦说，日本根本不可能打新加坡，因为日本离新加坡太远，正如日本离纽约一样。1941 年 10 月 20 日，他告诉英国内阁国防委员会，说他想日本不会打马来亚。1940 年 8 月 11 日，丘吉尔在致电澳大利亚总理解释英国为什么要关闭滇缅公路 3 个月时承认：“我们极力避免与日本作战。”<sup>②</sup>英国前首相张伯伦也认为关闭滇缅公路“使我们摆脱了一场严重危机”，即避免了与日本的严重冲突。<sup>③</sup>

在“珍珠港事变”前 4 天，他还认为日本怕英、美，不可能打东南亚。他命令海军部不必做准备，只采取抑制政策。因为预先没有准备，所以当日军进攻英国在远东殖民地时，英军节节败退。

由于英国的远东殖民地大部分丢失，故缅甸之存亡立即变为英国最为关心的大事。只有坚守残余的缅甸领土，才可以确保印度，使之成为战后重建英国远东殖民地的基地。但是英国军队的力量，不足以保卫缅甸。只有中国军队的帮助，才能保卫缅甸。

早在 1941 年，英国就意识到一旦英国卷入与日本的战争，就需要中国的帮助来保卫缅甸。因此，在 1941 年春，就曾邀请中国军事考察团到缅甸、印度和东南亚考察，商谈保卫缅甸的事宜。中国由于为了保证滇缅公路畅通，保证中国西南运输线的安全，派出了以商震为团长的军事考察团，对缅甸、印度和马来亚进行了 3 个月的考察，提出了中、缅、印共同防御草案，要求中国军队早日入缅。但是英国害怕中国军队入缅，会唤醒缅甸独立的意识，因此迟迟不允许中国军队入缅。只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无力保卫缅甸时，才请求中国出兵缅甸。<sup>④</sup>但这时为时已晚。如果中国军队早日进入缅甸，就可能阻止日军的进攻。

---

① [日]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 472~473 页。

② [英]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二卷下，第三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5 年版，第 645 页，转引自马振犊：《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第 267 页。

③ 马振犊：《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第 267 页。

④ 萨本仁、潘兴明：《20 世纪的中英关系》，第 237 页。

1942年初,日军入侵缅甸。在英军要求下,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入缅。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在师长戴安澜率领下,在缅甸同古地区与日本激战,缓解了日军对英军的压力,使英军得以退守缅甸南部。但是英国担心中国军队深入缅甸南部,会影响英国的殖民利益,因此英军不仅不配合中国军队的战斗、万般刁难中国军队的行动,而且不援助中国军队,导致缅甸保卫战在1942年5月底失败。戴安澜将军战死缅甸,中国远征军一部分退回国内,另一部分退到印度。<sup>①</sup>

缅甸保卫战失败之后,中国远征军在印度得到美军训练,武器装备大大提高,战斗力空前提高。同时中国政府加紧了准备,希望尽早发动一次缅甸战役,收复缅甸,以保证滇缅公路的畅通和安全。但是当中国政府向英国提出反攻缅甸战役的要求后,却遭到了英国拒绝。丘吉尔认为缅甸收复与否,对英国来说没有多大意义,英国的作战目标是在欧洲,不在亚洲。

然而由于美国担心缅甸的失守,会危及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因此支持中国关于发动反攻,收复缅甸的要求。1942年7月18日,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代表美国提出了发动反攻缅甸的计划。由于这个计划是美国提出的,英国不好拒绝,在表面上同意。但是英国却以种种借口,拖延发动缅甸战役。丘吉尔说他对“在北缅甸进行一场吃力而无实际利益的战役不感兴趣”<sup>②</sup>。他还认为,支持中国作战与扶助中国对战后的英国非常不利,他说:“中国战后之强盛或即大英帝国远东厄运之开始。”<sup>③</sup>

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美国再次提出要求开始收复缅甸的战役。英国被迫同意。会议制订了“安纳吉姆方案”,计划最迟在1943年11月实施缅甸战役。但是由于英军1943年1月,在孟加拉湾对日军发动了进攻。由于英军在孟加拉湾对日军发动的进攻准备不够,遭到失败,“安纳吉姆方案”被迫暂停。<sup>④</sup>

1943年5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中英、美3国参加的“三叉戟会议”上,英国提出反对发动缅甸战役的意见,声称英国将把重点放到北非。在远东,则放弃缅甸战役,转而进攻新加坡。<sup>⑤</sup>

1943年8月,在魁北克会议上,美国再次要求发动缅甸战役,经过激烈争吵,丘吉尔最终同意反攻缅甸。但是英国仍然不肯支持在缅甸北部发动反攻,而主张在缅甸南部发动反攻。因为占领缅甸南部,有利于英国反攻新加坡。

从政治观点看,英国只想维持缅甸的局面,以便在战后恢复其殖民统治。因此重开滇缅公路对英国并不重要。但是从军事观点来看,中国要求重开滇缅公路意义十分重大。一方面中国亟待运进抗日物资,另一方面中国的出口货物也亟待从滇缅公路运出。中国军方认为滇缅公路的重开必须由一次成功的缅甸战役来实现。这次战役打败在缅日军就可以减少日军对越南和中国云南省的压力。因此中国要求英国在缅发动一次对日战役。

1943年10月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勋爵到重庆,19日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举行会谈,讨论了缅甸局势。蒋介石坚决要求应配备绝对优势的海军在孟加拉湾及缅甸附近海面,以配合缅甸战役。蒙巴顿当时答应,但事后并不兑现。丘吉尔则继续反对在缅甸进行大战役。他相信缅甸战后会落入英国之手<sup>⑥</sup>,他指示暂把缅甸问题放下。他强调英国不应“选择一个错误的地方

---

① 萨本仁、潘兴明:《20世纪的中英关系》,第238页。

② 马振犊:《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第268页。

③ 马振犊:《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第285页。

④ 马振犊:《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第289页。

⑤ 马振犊:《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第289页。

⑥ Britain and China, 1941-1947, Britain, 1984, p. 42.

与日军进行决战”<sup>①</sup>。于是英国一直拖延不肯在缅甸发动战役。

在 1943 年 11 月的开罗会议上，英国再次为反攻缅甸与中国讨价还价。由于英国的反对，在不久之后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反攻缅甸的计划被彻底推翻。就这样，缅甸战役被一拖再拖。

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在决定英国是否参加缅甸战役的问题上，起了重要作用。太平洋战争初期，薛穆反对发动缅甸战役。他多次向重庆国民政府说缅甸战役并不重要。他这样建议的主要原因，是低估了缅甸战役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作用，也忽略了它在中英关系中的重要性。例如在 1942 年 9 月 16 日，他写信给英国外交部助理次官彼得逊，分析中英之间存在的问题。他说英国在中国的印象越来越糟。在双方有争论的问题中，重要的问题有印度独立问题、通过西藏运送抗战物资到中国的问题和贷款问题。他谈了许多问题，但却没有提到缅甸问题。<sup>②</sup>

他甚至认为重开滇缅公路在当时并不重要，他说：“中国人热望立即进行缅甸战役，但我们认为重开滇缅公路在目前来说，对中国继续抗战并不是重要的，特别是在目前战争的这种规模上更是如此。”他知道不在缅甸进行战役，会在中国产生极恶劣的影响，但他认为重开滇缅公路并不重要。他说尽管当日军在云南进攻中国而英军在缅甸无所作为，以及从印度到中国的空运路线不通，会严重影响中国军队的士气。但是中国军队的士气仍然高昂，而且目前是自从日军主力从中国东部撤走，及中国军队自从在缅甸大败以来，中国军队士气最高昂的时期。因此他推论说只要空运线路能开辟，而且日军的进攻保持在目前水平，那么不重开滇缅公路也没什么关系。

很明显，薛穆的观点是片面的。当时中国缺乏工业基础，大部分武器依靠从国外运入，即使印度到中国的空路能畅通，但由于日军的干扰以及各种条件限制，空运补给能力是有限的，远远不能满足中国军队的需要。中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大部分依赖这条公路。滇缅公路的畅通对改善当时中国恶化的经济情况至为重要。然而薛穆对此不以为然。

1943 年 1 月，宋子文访问英国，以寻求解决中英之间的分歧。但薛穆则借此机会批评中国。他说英国应该反击中国对英国的经常性批评，因为这些批评是根据不完全的知识和不存在的事实。英国应该反对中国干涉并非属于中国事务的做法，即中国不应该干涉英国是否愿发动缅甸战役。至于关闭滇缅公路，那只是英国的事情。

他抱怨说：“中国干涉印度独立问题和要求重开滇缅公路是干涉英国事务的两个最典型的例子。”他甚至抗议说：“坦率地在两个盟国间交换意见是一回事，但是经常蓄意贬低英国在对日战争中的努力则是另一回事。”<sup>③</sup>

但是英国政府内一些官员已经看到了重开滇缅公路对中英关系的重要性。例如英国驻新德里专员麦当劳就说：“如果英国想在中国恢复威信的话，英国就必须尽早重开滇缅公路，以确保物资运往中国。”<sup>④</sup> 宋子文访英虽然没有在重开滇缅公路等问题上有所突破，但却再次明白地告诉了英国政府中国要求立即重开滇缅公路的愿望，这就促使英国部分官员认真去考虑这个问题。

到 1943 年，薛穆的观点有了改变，主要是他日渐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1943 年 5 月 5 日，薛穆向英国外交部汇报说，中国人对英国的态度冷漠，对战争的前途感到消沉，因为他们感到抗战还要持续多年。因而他们更倾向于批评英国，认为英国作战不力。上述情况加上通货膨胀以及

---

① Britain and China, 1941-1947, Britain, 1984, p. 42.

② FO371/31677, F7307/54/10, Seymour to Peterson, 16 September 1942.

③ FO374/35737, F1161/25/10, Seymour to Clarke, 27 January 1943.

④ WO208/376, Chi 142 (0), cutting From News Chronicle, 21 October 1942.



交通运输的恶化，使中国比任何时候都希望重开滇缅公路。因此他希望英国政府尽早开始缅甸战役。<sup>①</sup>

薛穆观点的改变，可能是受驻华大使馆参赞台克曼影响。台克曼是薛穆的主要助手和中国问题专家，1937年他关于中国历史的专著就已在英格兰出版。他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并主张英国应尽早重开滇缅公路。1943年5月31日台克曼直接向英国外交部做了汇报。他说美国的史迪威将军对于收复缅甸有很大信心。美国人的态度引起了中国人民对英国猜测。他们认为英国并不愿意重开滇缅公路，因为英国不愿看到中国被武装，在战争中变得强大。台克曼向英国外交部建议说，中国人民的这种怀疑只有通过行动才能消除。

他认为如果英国仍然迟迟不开始缅甸战役，这种怀疑只会加深。而且即使英国同意开始缅甸战役并与罗斯福及美国参谋部达成共识，只要英国不采取有力措施打击日军，这种猜测就不可能消除。台克曼的上述报告是真实而有远见的。<sup>②</sup>

他们的报告使英国外交部再次讨论了这件事情。但是英外交部仍然采取拖的办法。1943年6月克拉克建议丘吉尔即将在议会的发言中强调以下几点：

“（1）世界各国的利益要求我们采取最有效最迅速最可行的办法完全打败日本。（2）采取各种方式援助中国，重建中国的力量极其重要。（3）毫无疑问在日本和其他地方，人们正在猜测盟军将对日军进行打击的时间和地点，但在这些问题上去满足敌人的好奇心是冒失的。”这个给丘吉尔准备的发言稿，前两点似乎很动听，但最后一点就使他的讲话成空话了。因为英国并不准备确定“对日军进行打击的时间和地点”，因为“在这些问题上满足敌人的好奇心是冒失的”。<sup>③</sup>

事实上英国根本不准备在缅甸打击日本人。因为他们深信盟军击败日本后，在谈判桌上缅甸一定会划归英国。克拉克于1943年8月9日写了一份题为“宋子文访英”的备忘录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宋子文访英提出缅甸战役的问题。虽然丘吉尔在与宋会面时说：“重开滇缅公路仍然是我们的政策。”但是克拉克写道：“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人与宋子文讨论具体的计划。因为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根本没有打败日本的计划。”<sup>④</sup>

从1943年6月开始，薛穆关于重开滇缅公路的建议增多，使英国外交部认为重开滇缅公路在中英关系中的确是一个问题。例如6月24日薛向英国外交部报告，说每一个中国人最大的希望都是重开滇缅公路及改善其他可能的交通运输情况，他们亟待空援。薛强调说：“要改善中英关系，我认为在这些方面我们应立即采取行动。否则其他办法都不行。”<sup>⑤</sup>然而丘吉尔及其战时内阁的主要成员，并不想改变英国关于拖延在缅甸发动战役、重开滇缅公路的计划。

但是美国政府要求盟军尽早在缅甸发动战役。由于美军飞越喜马拉雅山的空运尝试失败，只能改为沿喜马拉雅山边缘绕着飞往中国。但这样一来就容易遭到日军飞机的袭击，损失惨重。因此美国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重开滇缅公路。这就要求早日发动缅甸战役，击溃缅甸的日军。在1943年12月的魁北克会议上，由于美国的强烈要求，英国被迫同意尽快开始缅甸战役。但是虽

---

① FO371/31852, F2837/2837/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31 May 1943.

② FO371/31852, F2837/2837/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31 May 1943.

③ FO371/35800, F3269/254/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24 June 1942.

④ FO371/35741, F4283/253/10, Memorandum by Clarke, 22 August 1943.

⑤ FO371/35800, F3269/254/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24 June 1942.

然英国政府答应尽快开始免得战役，但却迟迟不采取行动。

这样，中美军队只得自己开始了缅甸战役。事实上，从1943年10月开始，中美军队就已在一些地方进攻缅甸日军。到1944年3月，中美开始了缅甸战役。<sup>①</sup>只是在这种情况下，下，英国才被迫于1944年5月不情愿地参加了缅甸战役。正如丘吉尔在写给威尔逊元帅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极不赞成将来在缅甸的丛林里进行大规模的战争。”<sup>②</sup>

在中美军队节节胜利的情况下，英国才开始重视缅甸战役。但英国作战的重点是在缅甸南部，北部的战斗完全靠中美军队。1944年8月3日，中美军队攻占了缅甸北部重镇密支那。这个重镇的获得，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盟军获得了一个未来陆上作战的前进基地，为美国向中国空运提供了一个中途站。此后，著名的“驼峰”空中运输，就不再需要飞越危险的喜马拉雅山了。

也正在这个时候，英国在缅将军蒙巴顿提出建议，要求进行进攻缅甸首都仰光的大规模作战计划，该计划代号为“吸血鬼”。但是，丘吉尔不是要英国军队自己去打仗，而是要求美国在派一个或两个师到缅甸去进行战斗，而英国军队则留在欧洲打德国。他的建议没有被美军采纳，于是英国不得不中止“吸血鬼”战役的计划。1944年10月5日，他向蒙巴顿上将发出了中止“吸血鬼”战役计划的命令。<sup>③</sup>

缅甸战役的开始，使中英之间的分歧暂时得到缓和。但是在援华问题上，英国仍然一直在制造障碍，尽可能拖延对华援助。

## 二、在援华问题上制造障碍

抗日战争以来，迫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压力，以蒋介石为首的重庆国民政府参加了抗战。在1941年前，应该说重庆国民政府在抗日中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但是鉴于当时中国缺少工业，军队装备差，急需英、美援助。因此在当时来说，援助重庆国民政府抗战，也就是援助中国抗战。但是在援助中国抗战问题上，英国态度消极，重庆国民政府与英国在这个问题上也进行了长期谈判与斗争。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对华5千万英镑贷款问题。英国在对华5千万英镑贷款问题上，制造障碍，使这笔贷款迟迟不能到位。

1941年12月，蒋介石向英国政府要求一笔一亿英镑的贷款，向美国政府要求五亿美元的贷款。其理由是他要求英、美给中国人民的抗战提供心理上的刺激，同时恢复人民对中国法币的信心。蒋告诉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他想让这笔贷款在人民中发生重大影响，并用以提高中国军队的士气。接着他又告诉于1942年2月接替卡尔的新任驻华大使薛穆，他要求英国政府认真考虑这笔贷款。因为这一要求正如“一幅挂在墙上的图画”，是用来激励中国人民抗战的。<sup>④</sup>

当时英国财政困难，不愿提供如此巨大的一笔贷款。但是他们误会了蒋介石的话，以为蒋提出这一要求只是作为“挂在墙上的画”，并不真正希望得到。而且英国政府认为如果英国加以拒绝，就会对中英关系产生不良影响，英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会进一步下降。因此英国政府

---

① 马振犊：《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第290-292页。

② [英]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六卷，第四分册，第900页。

③ [英]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六卷，第二分册，第251页。

④ FO371/31620, F7669/7/10, From Foreign Office to Sir Pratt, 11 November 1942;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p. 49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19页。

认为答应下来，但不一定要真给这么多贷款给中国。

在与美国进行磋商以后，英国政府宣布向中国提供五千万英镑的贷款。此决定于 1942 年 2 月 3 日正式宣布。同时双方还就军火租借协议达成谅解。但是英国对使用这笔贷款加了许多限制性条款，规定这五千万英镑贷款只能在战时用于战争目的，其含义是只准中国政府使用这笔贷款在使用英镑的国家和地区购买战争所需的物资。如果中国政府十分需要它用以支持法币，英国不反对使用其中的一千万英镑去作这一用途。

然而由于美国政府宣布给予中国的五亿美元贷款在使用上没有任何限制，就使中国不满英国的贷款条件。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要求英国给中国的贷款也不应有任何限制。但是，英国不同意。于是从 1942 年 4 月到 1944 年 3 月双方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直到 1944 年 5 月才达成一个协议，英方作了一些让步。英国同意中国政府使用这笔贷款中的一千万英镑去支持中国银行发行货币，又同意可用一千万英镑印发可在英镑区国家战时使用的钞票，二千万英镑在使用英镑的地区和国家购买战争物资，其余一千万可用于其他目的。该协议于 1944 年 5 月生效，但是在漫长的谈判中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

首先是英国虽然答应给这笔贷款，但却根本不愿给钱。英国强调蒋介石宣布要这笔钱时，只说是一种激励中国人民的象征，因此英国宣布给这笔贷款也只是一种象征，不愿真的给钱。然而蒋介石在英国宣布给中国贷款后，一定要钱，并要足五千万英镑的贷款。为此英国外交部长艾登约见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提出抗议。顾回答说，他完全理解英国方面的想法，但强调中国经济状况恶化，急需这笔贷款。

薛穆认为蒋介石在贷款问题上的态度几近欺骗，但是他认为中国在抗战的艰苦斗争中，的确需要外界的支持。所以他建议英国政府应该给中国这笔贷款。

至于贷款条件，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来取得一致意见。他的这一观点的形成，是受到美国影响的缘故。例如他与罗斯福总统的行政助理和赴华特使卡里就英国对华贷款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卡里告诉薛穆，如果中英双方关于贷款问题的谈判失败的话，可能对中英关系产生很严重的后果。如果英国仍然坚持原有条件的话，看来中国方面会退出谈判。卡里于 1942 年 8 月 1 日强调说，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步步紧逼，希望英国早日给予这笔贷款。既然英国和美国在给中国贷款之前的磋商中认为给予中国贷款是为了鼓舞中国继续进行抗战，以防蒋介石对日妥协，那么现在唯一正确的处理办法是完全给蒋介石这笔贷款。<sup>①</sup>

1942 年 9 月，孔宣称，由于走漏了消息，说英国将同意使用英国贷款以支持中国银行发行货币，所以他正在受到各方压力要求他宣布这一决定。但是他认为在未能与英国签订共同协议前不能这样做，因为英国提出的贷款条件是不能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薛穆向英国政府建议英国应该让步，同意中国的要求。他认为否则孔祥熙不会接受。贷款问题的失败将影响到战后中英关系的发展，他建议英国至少应降低条件，使孔祥熙能够宣布英国给予这笔贷款的协议生效。薛穆还认为因为英国条件比美国给予贷款的条件苛刻，所以要中国同意这些条件确有困难。<sup>②</sup> 薛穆分析说孔祥熙的策略是把责任推到英国身上，特别是把中国物价高涨的责任推给英国。

孔祥熙宣称因为英国贷款条件苛刻，中国不可能接受这些条件，因此他就不可能用这笔贷款去支持法币。但是他强调这笔贷款，是唯一可以制止中国通货膨胀的来源。薛穆说他不同意孔的说法。但是他向英国外交部提出警告，说蒋介石一定会相信孔祥熙的话，认为英国正在阻碍中国

---

① WO208/376, CHI 142 (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1 August 1942.

② FO371/31620, F6381/7/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9 September 1942.

政府努力克服通货膨胀的计划。<sup>①</sup> 因此英国方面应尽快努力突破谈判僵局。薛穆建议应立即拿出一千万英镑，用中英两国政府的共同名义在英国银行或中国中央银行立户，作为目前孔祥熙所需要的贷款去支持中国的法币。薛穆还进一步建议说如果这笔数目还不够，还应在两国政府共同同意的基础上，给予额外贷款以制止中国的通货膨胀。<sup>②</sup>

薛穆的上述建议对于稳定中国货币，从而直接帮助中国的抗日将是十分有益的。然而英国政府并不接受薛穆的建议，因为英国政府关心的不是中国而是英国的贷款条件。关于用一千万英镑的贷款作为后盾支持中国的法币，英国政府内部意见不一致。虽然外交部官员布雷南和远东司司长克拉克最后基本同意薛穆的看法，但是以伊迪为首的财政部官员们却不同意，而且开始布雷南也是不同意薛穆的看法的。

在接到薛穆9月2日的电文后，布雷南批示说：“（a）除非双方签订了贷款协定，否则这笔钱不能拿出。（b）甚至在签订协议以后，我们也不会向美国政府一样把这笔贷款完全放到中国的中央银行。”英国财政部认为最好是用中、英两国的名字存入银行。英国政府担保可先给一千万英镑贷款给中国。<sup>③</sup>

因此布雷南指出要等英国财政部对目前谈判的提案提出看法后再说。<sup>④</sup> 据此，远东司司长克拉克指示薛穆，要他告诉蒋介石英国的上述态度。但是克拉克坚持说要打破谈判的僵局，中国方面必须采取主动。<sup>⑤</sup> 薛深知中国方面的态度是坚持要由英国做出让步，所以他认为此事非英国采取主动不可，否则不可能达成协议。于是他继续向英国外交部建议英国应该做出妥协，与中国达成协议。正在此时，中国政府又提出新要求，即请英国政府把五千万英镑中的三千万英镑给中国政府作为战时发行货币的基金。当然，英国根本不予考虑。

英国政府的条件，仍是只准中国把这五千万英镑的贷款，用于战时在使用英镑的地区和国家购买战争物资，如用不完的，可在战后经两国政府协商后再行使用。<sup>⑥</sup> 在这种双方互不退让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达成协议。于是薛穆再次建议英国应该紧急行动，允许中国使用一千万英镑贷款支持中国的法币。

英国外交部原则上同意薛穆的建议，但英国财政部仍不同意。财政部主管官员伊迪爵士写信给外交部助理次官主管远东司务的彼得逊说：“财政部不知道薛穆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是否他想建议把五千万英镑全部无条件地贷给中国？”彼得逊于1942年9月22日回答，他赞成薛穆在贷款问题上的经济方面的考虑，但不同意薛穆关于这一问题在政治上的看法。

尽管彼得逊承认，如果让蒋介石继续认为英国要为阻碍中国改进国内局势的努力负责，那是十分危险的。但是他同意财政部关于不能向中国让步的意见。<sup>⑦</sup> 于是外交部指示薛穆说，他的建议从经济角度考虑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英国认为中国实际上并不需要这样多的钱。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而提供一千万英镑的贷款，那么中国就用不完。剩下的钱，中国就会在战后继续使用，这就失去了帮助中国抗战的意义。

---

① FO371/31620, F6381/7/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9 September 1942.

② FO371/31620, F6381/7/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9 September 1942.

③ FO371/31620, F6381/7/10, Minutes by Brenan, 11 September 1941.

④ FO371/31620, F6381/7/10, Minutes by Brenan, 11 September 1941.

⑤ F6381/7/10, From Foreign Office to Chungking, 15 September 1942.

⑥ FO371/31620, F6597/7/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15 September 1942.

⑦ FO371/31620, F6597/7/10, Peterson to Eady, 22 September 1942.



为了安抚蒋介石，英国外交部指示薛穆，要讲究策略和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要避免造成一种英国不愿提供这笔贷款的现象。薛穆要直接与蒋介石谈话，要十分清楚地说明英国是十分愿意提供贷款，并乐于做任何对中国有益的事。即使双方谈判没有进展，双方没有签署合同，中国可以在任何时候按英国提出的条件使用英国的这笔贷款。同时在双方讨论签署协议时，可以讨论在适当的条件下，中国可使用这笔贷款中多达一千万英镑的数目去支持法币。但是其余的只能在使用英镑的地区和国家购买东西。英国外交部还要薛向蒋介石表明，为什么英国不能在战时承担战后帮助中国的义务，但同时说明这不会妨碍英国在战争结束前帮助中国。<sup>①</sup>

在接到这份指示后，薛穆没有立即向中国转达，相反提出了对这份指示的看法。他向英国外交部指出，如果能让中国立即得到这五千万英镑贷款中的一千万英镑，这些钱一定能派上很好的用场。而且现在给了一千万英镑给中国，就把中英关系放到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基础上，这是改进双边关系必不可少的代价。这也是他在前几封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的动机。接着他坚持说：“我仍然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中国可以使用一千万英镑的贷款以解决她最紧急的问题。”薛穆说他对贯彻外交部指示的结果是悲观的。即使他与蒋介石开诚布公地谈了英国的考虑，澄清了问题，他也担心孔祥熙会在幕后反对英国的提案。<sup>②</sup>

经过研究，英国外交部同意薛穆的某些看法，中国可以用一千万英镑为担保去支持法币，但英国希望事先知道有关情况以及发放支持法币的贷款的条件。<sup>③</sup>然而中国仍然不同意英国的这一让步，中国希望完全自由的支配英国所给的五千万英镑的贷款，而不仅仅是一千万英镑。英国政府拒绝了中国的要求。

薛穆对此十分忧虑，他认为如果在贷款问题上没有进展的话，“这个长在中英关系上的毒刺，仍然是对发展双方友好和睦关系的阻碍”。中英双方在谈判中各自坚持自己的立场，使五千万英镑贷款问题成为恶化中英关系的一个潜在的危险。虽然到1944年5月2日双方签署了一个有关协议，但双方的分歧仍然存在。而且双方的分歧越到临近战争结束，就越趋激烈。分歧的焦点在于当对日战争结束后，这五千万英镑如果没有用完，能否转为存款以供战后继续使用。中国要求战后继续使用这笔贷款，薛穆给予支持；但是英国财政部仍然反对。而英国外交部则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去讨论这个问题是无益的，这个问题留待战后再说。不过英国外交部从两国关系的发展，特别是从英国战后对华贸易出发，支持薛穆的观点。

1945年2月20日薛穆给英国外交部长艾登写信：“我们应尽可能让中国对英国敞开大门，尽可能使中国购买英国货物，以确保英国商业在华的发展。”1945年7月7日英国外交部决定同意中国战后继续使用未曾用完的五千万英镑。英国外交部认为英国的生存依赖于对外贸易，而英国需要开拓市场，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如果战后中国使用未曾用完的贷款从英国订货，特别是从英国进口重要物资，用于铁路建筑、公共事业设施及企业的发展，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会起重大作用。发展的中国将成为英国的出口市场。

因此英国外交部的结论是：从长远的观点看，无论从友谊或长期贸易关系看，如果允许中国按英国的条件战后继续使用未用完的贷款，一定会收益无穷。但是贸易部和财政部考虑到战后英国经济的紧张情况，坚持不让中国战后继续使用未用完的贷款。<sup>④</sup> 财政部强调战后英国无力在经

---

① FO371/31620, F6717/7/10, From Foreign Office to Chungking, 9 September 1942.

② FO371/31620, F7031/7/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9 September 1942.

③ FO371/31620, F7031/7/10, From Foreign Office to Chungking, 31 October 1942.

④ BT.112560, Seymour to Eden, 21 February 1945; Treasury Minutes, 9 July 1945.

济上支持国民政府，心有余力不足。中英间关于贷款问题的争论，最后以国民政府失败告终。

抗战时期英、美对华贷款态度上的不同，对中国人民心理上的影响是不同的。美国 1942 年给了中国五亿美元的贷款，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巨大支持。因为这笔贷款稳定了当时的货币，对制止通货膨胀、支持法币、稳定中国经济都起了重大作用。<sup>①</sup> 英国也给了中国五千万英镑贷款，但由于态度勉强并附加了各种条件，直至抗战结束，仍为如何使用这笔贷款争吵不休。因此，在中国人民心目中，英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就打了折扣。英国的对华战略和策略，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已经恶化的两国关系变得雪上加霜。

---

<sup>①</sup> 张宪文著：《中华民国简史》，郑州：河南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76 页。

## 第四章 战时英国的对华殖民主义

### 政策及其失败

#### 第一节 英国对我国西藏、新疆和东三省的

##### 殖民主义政策

##### 一、英国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

在太平洋战争时期，英国希望中国抗战，以承担远东战场的压力，从而使英国专心欧洲战场与德国的战争。但是出于战后恢复在远东殖民统治的考虑，英国对拥有庞大陆军的中国抱有强烈的戒心，因此千方百计减少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英国最担心的，是唯恐中国影响扩大，影响战后英国殖民统治的重建。为此，英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分裂中国的殖民主义政策。其中之一，是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因此，英国不断策动藏人独立，摆脱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控制。

而日本为了打击中国，采取各种措施拉拢西藏地方政府，也企图使西藏独立。日本支持西藏独立的目的是，利用西藏从西南方向遏制中国，阻断西方对中国抗战的物质援助。事实上在1942年底，由日本所扶植，由印度、西藏的亲日反英分子与周边团体所组成的“第五纵队”，已深入到藏南、印北边境。如果日本的阴谋得逞，中国西南抗日大后方就会腹背受敌，中国的抗日战争就会处于困境。为此，国民政府同英国进行了斗争，粉碎了英国分裂中国的阴谋，同时使日本在西藏的阴谋计划成为泡影。<sup>①</sup>

西藏自古是中国的领土。关于这一点英国政府也不得不承认。在英国外交部1943年7月23日准备的一份关于西藏问题的文件中曾说：“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已由大量文件所证实。”<sup>②</sup>

但是为了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英国却另搞一套。英国政府在一份题为“近代中国的亚洲帝国”内部文件中，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在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与宗主权上大做文章。英国首相丘吉尔说：“没有谁反对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sup>③</sup>丘吉尔不谈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却大谈宗主权，就是想把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事实抹去。

英国认为西藏的战略价值极其重要，是“保卫”印度的一个重要地区。为使印度免受俄国和中国的“侵略”，必须由英国控制西藏，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一个“西藏国”作为印、苏中三国之间的缓冲国。这在1940年1月英国政府外交秘书长卡罗的备忘录中，有明确的记载。所以，英国一直反对中国在西藏直接行使管理权。<sup>④</sup>

虽然有部分英国官员认为不宜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但他们的意见没有被英国政府所采纳。例如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参赞台克曼，由于看到了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的伟大力量和潜力，又比较了解中国人民强烈要求统一祖国的民族主义精神，于是预见要分裂中国，在西藏建立独立国家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于1942年5月曾向英国外交部建议：“由于中国收回西藏

---

① 林孝庭：《二战时期中英关系再探讨：以南亚问题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5（4），第39页。

② FO371/46280，F4220/4220/10，A Copy Memorandum；Modern China's Asiatic Empire，31 July 1945.

③ FO371/46280，F4220/4220/10，A Copy Memorandum；Modern China's Asiatic Empire），31 July 1945.

④ FO371/46213；W. P. (43) 267，Memorandum；Status of Tibet by Foreign Office，23 June 1943.

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英国应该修改其对西藏的政策。”<sup>①</sup>但英国外交部却不接受这一建议，继续推行其分裂中国的阴谋活动。

英国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其做法首先是控制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政府，要它们独立行事，不服从中国中央政府的管辖。然后英国向西藏地方政府许诺，在战后的条约中，英国将迫使中国同意西藏独立。在英国支持下，西藏地方政府成立了所谓“外交局”，意为独立做准备。其次，英国处处阻碍国民政府收复西藏的努力。例如1940年6月，当英国屈服于日本压力，曾一度封闭中国的对外通道——滇缅公路时，中国政府计划修建一条由印度经由西藏，通往中国内地的中印公路，用以运输国外援华抗战物资。但是英印政府却授意西藏地方政府反对，不准许国民政府派遣的勘测人员入境。<sup>②</sup>

同时，英国还向西藏地方政府提供军事援助。1943年11月，英国政府决定向西藏当局售步枪子弹500万发，山炮弹1000发。1944年2月，西藏地方当局又向英国订购高射炮等物。3月6日，西藏代表阿旺坚赞、罗桑札喜、土登参烈等携带藏产重礼，晋见蒋介石，祝贺蒋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蒋在谈话中严厉批评西藏当局私自向印度购买武器的行为。<sup>③</sup>

鉴于此，蒋介石决心要立即收复西藏，恢复中央对西藏的控制权，以利抗日战争的进行。1942年10月，在研究废除不平等条约时，蒋介石决定乘机要求英国政府“取消西藏关系之不平等特权”<sup>④</sup>。同时蒋介石决定，在1943年10月前，派兵进驻西藏东北部的昌都，在保持军事压力的前提下，“用政治方法解决西藏问题”<sup>⑤</sup>。

1943年4月，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在英国支持下，下令停止汉藏之间的“驿运”。这就大大影响了中国与国外的贸易交通线，影响了援华抗日物资的运送。蒋介石非常着急，当即命令青海马步芳的军队开向青藏边界，同时研究对策。

1943年5月4日，英国大使薛穆拜会中国外交部次长吴国桢，对中国军队的调动表示“关切”。薛穆声称：“中国军队已由西宁开至青海南边，西藏当局深感不安，希望中国政府能表示并无此事实，以便转告西藏当局，令其安心。”吴国桢当即表示，一国内部军队的调遣，实与另一国无关。至于一国之中央政府与地方接洽事件，无论其友国如何友好，亦无友国代为转达之必要。吴国桢希望薛穆，不要再提此事。但是薛穆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抗议。<sup>⑥</sup>

---

① FO371/4621; W. P. (43) 267, Memorandum: Status of Tibet by Foreign Office, 23 June 1943.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0月25日，参见杨天石：《蒋介石正告丘吉尔：“藏事为中国内政”——蒋介石日记解读之二》，《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8日，GB07版。

③ 杨天石：《蒋介石正告丘吉尔：“藏事为中国内政”——蒋介石日记解读之二》，《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10日，RB15版。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0月25日；杨天石：《蒋介石正告丘吉尔：“藏事为中国内政”——蒋介石日记解读之二》，《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8日，GB07版。

⑤ 《外交部致蒋介石呈》(1943年5月8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版，第592~593页；《蒋介石日记》，1943年5月8日；参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314页；亦参见杨天石：《蒋介石正告丘吉尔：“藏事为中国内政”——蒋介石日记解读之二》，《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8日，GB07版；亦参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⑥ FO371/35755, F2418/40/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11 May 1943.



蒋介石亲笔在外交部报告上批示说：“西藏为中国领土，我国内政决不允许任何国家预问。英国如为希望增进中英友谊，则勿可再干涉我西藏之事。如其不再提时，则我方亦可不提；如其再提此事，应请其勿遭干预我国内政之嫌，以保全中英友谊。”对此，蒋介石在5月8日日记中写道：“英大使劝我青海军队停止对西藏用兵事，严词拒绝！”<sup>①</sup>

到了5月12日，蒋介石在重庆召见西藏驻京办事处主任阿旺坚赞，向阿旺坚赞提出了5项要求，希望西藏地方政府遵照办理。这5项要求是：1. 协助修筑中印公路；2. 协助办理驿运；3. （中央政府）驻藏办事处商办事件直接与噶厦商量，不经“外交局”；4. 中央人员入藏，凡持有蒙藏委员会护照者，须照例支应乌拉；5. 在印华侨必要时须经西藏内撤。同时蒋介石向阿旺坚赞施加压力，说：“如西藏能对此五事遵照办到，并愿对修路、驿运负保护之责，中央军队当不前往，否则，中央只有自派军队完成之。”蒋还说：“中央绝对尊重西藏宗教，信任西藏政府，爱护西藏同胞。但西藏必须服从中央命令，如发现西藏有勾结日本情事，当视同日本，立派机飞藏轰炸。”<sup>②</sup>同时国民政府准备立即在西藏修筑一条公路，以便从印度运进战略物资。

蒋介石的做法遭到英国的强烈反对。英国驻华大使薛穆数次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反对在西藏修公路，反对中国政府在西藏邻省驻兵。而蒋介石则指示中国外交部，要坚决反击英国对西藏问题的干预

国民政府在坚决反对英方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中，希望美国出面阻止英国分裂中国的行动。而美国出于鼓励中国抗日的考虑，不支持英国分裂中国的做法。因此当英国大使馆将西藏问题向美方做通报时，美国政府对英方立场不表支持。5月15日，美国国务院在回复英国大使馆的备忘录中指出：“美国政府始终考虑到这一事实：中国政府一直声明它对西藏的宗主权，中国宪法亦把西藏列入中华民国领土范围之内。美国政府从未对中国政府的这些举措提出过疑问。美国政府认为，目前讨论西藏地位问题不会导致有益的结果。”<sup>③</sup>

1943年5月，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应邀参加太平洋会议。5月20日，丘吉尔在太平洋会议上发言，他特别提到西藏问题。丘吉尔说：“近闻中国有集中队伍，准备进攻西藏之说，使该独立国家大为恐慌，希望中国政府能保证不致有不幸事件发生。”由于丘吉尔不仅干预中国出兵西藏的问题，而且还把西藏称为“独立国家”，公然无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干涉中国内政，所以出席该会议的宋子文立即反驳道：“我没听说有这个消息，西藏也不是首相所说的独立国家。中英间历次所订条约，都承认西藏为中国主权所有。”<sup>④</sup>会后，宋子文致电蒋介石，汇

---

① 《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57页；亦参见杨天石：《蒋介石正告丘吉尔：“藏事为中国内政”——蒋介石日记解读之二》，《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8日，GB07版。

② 《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57页；杨天石：《蒋介石正告丘吉尔：“藏事为中国内政”——蒋介石日记解读之二》，《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8日，GB07版。

③ FRU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atets), 1943, China, p. 630.

④ 张建魁、路琰、许陈静：《蒋介石日记破解历史谜案》，《齐鲁晚报》，2009年6月1日，《今日济南》，C21版；亦参见 <http://paper.dzwww.com/qlwb/data/20090601/786935343334/pdf/qc2101.pdf>。

报了会上关于西藏问题的斗争。<sup>①</sup>

蒋介石对此非常愤怒，5月22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时指出：鉴于丘吉尔称西藏为独立国家，“将我领土与主权，完全抹煞，侮辱实甚。不料英国竟有如此言动，殊为联合国共同之羞辱”。他要宋子文询问罗斯福：根据《大西洋宪章》，“美、英两国不寻求领土和其他方面的扩张，不承认法西斯通过侵略造成的领土变更”的宣言，罗斯福“对于丘言作何感想”、“如何处置”？<sup>②</sup>在给宋子文的指示中，蒋介石明确表示：“西藏为中国领土，藏事为中国内政，今丘相如此出言，无异于干涉中国内政，是即首先破坏大西洋宪章，中国对此不能视为普通常事，必坚决反对”。<sup>③</sup>

蒋介石对英国的做法非常愤怒，认为是帝国主义的行径。他在1943年5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昨日傍晚，接宋电称：华会廿一日会议中，丘吉尔突称‘西藏独立国，中国在此获得空军接济之时，不宜对藏用兵’……此诚帝国主义真面目暴露，不仅为流氓、市侩所不为，而亦为轴心、倭寇所不齿。”<sup>④</sup>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宋子文向罗斯福表示了中方对英方的不满，表示中国方面不能接受英方对西藏的任何提议。在罗斯福的回答中，明显是支持中国政府立场的。他说，他曾问过丘吉尔为什么要提出西藏问题。丘吉尔表示，英国并无占领西藏的企图。罗斯福于是向丘吉尔说，西藏是中国帝制时代的一部分，现在仍是民国的一部分，西藏问题与英国无涉。丘吉尔则露出了干预中国西藏问题的面目，说什么中国政府在西藏无实权。罗斯福则说：“中国政府有无实权，与英国有何关系？”这就使得丘吉尔无言以对。<sup>⑤</sup>在丘吉尔与罗斯福的回答中，就已经可以看出丘吉尔的花言巧语和对中国西藏的祸心。

罗斯福在与宋子文的谈话中，认为丘吉尔说话“殊不得体”。罗斯福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罗斯福却告诉宋子文，“千万勿因此酿成意外”。他希望中国政府对此事保持克制态度，使西藏事情妥善解决。罗斯福的态度影响了宋子文，他担心重庆国民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反应过度，会得不到美国支持。

因此，他向蒋报告说：“关于西藏事，在此危急之时，务请避免冲突。文观察英方将来对于西藏交涉，必能让步。英国已失数百年之积蓄，故希望战后中国建设获得一部贸易也。且及时开

---

① 张建魁、路琰、许陈静：《蒋介石日记破解历史谜案》，《齐鲁晚报》，2009年6月1日，《今日济南》，C21版；亦参见 <http://paper.dzwww.com/qlwb/data/20090601/786935343334/pdf/qc2101.pdf>。

② 《委员长渝来电》，1943年5月23日，宋子文文件，61-2。胡佛档案馆藏

③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3年5月22日），《宋子文驻美期间电报选（1940—1943）》，第191页。

④ 张建魁、路琰、许陈静：《蒋介石日记破解历史谜案》，《齐鲁晚报》，2009年6月1日，《今日济南》，C21版；亦参见 <http://paper.dzwww.com/qlwb/data/20090601/786935343334/pdf/qc2101.pdf>。

⑤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3年5月）（日期不详），《宋子文驻美期间电报选（1940—1943）》，第194~195页；参见杨天石：蒋介石正告丘吉尔：“藏事为中国内政”——蒋介石日记解读之二，《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10日，RB15版。

辟公路，如无英方合作，亦恐无益于事。”<sup>①</sup>

蒋介石对宋子文的态度很不满意，当天即电宋子文，明确要求他“向罗总统严重表示，英国在事实上已首先破坏大西洋宪章”。并且他要求要强调这种观点。他说：“首先二字，应特注重”。25日，蒋此指示宋子文，要求他“关于西藏问题，不能轻忽，应照前电对罗总统严重表示，使其注意。如罗总统有勿因此发生意外之语，则我更应申明立场主权为要”<sup>②</sup>。

罗斯福考虑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再次表示了支持中国对西藏的立场，他继续给英国施加压力。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鼓励国民政府抗日，美国不愿在西藏问题上得罪国民政府。例如，在1943年4月，西藏地方当局向美国战略情报局驻藏人员，提出购买无线电发射设备的要求。美国情报局拟表同意，但国务院表示反对。国务院助理国务卿伯尔（Adolf Berle, Jr.）在致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万（William Donovan）函中说：“中国人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从未采取过无视或反对中国上述观点的行动。就战争全局而言，中国政府的态度对美国和各盟国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此，在我们同西藏当局的任何关系中，或者在我们可能通过西藏当局所采取的任何行动中，应该避免无缘无故地或粗心大意地触犯中国政府。”美国国务院建议，应首先研究向西藏提供这些设备是否会触及中国的敏感问题。只有在认定不存在这一问题的情况下，才可以考虑提供设备问题。<sup>③</sup>

但美国对西藏也是有野心的，美国也企图染指西藏。1943年罗斯福总统派了两名代表带着给达赖的亲笔信去了西藏，企图与西藏地方当局建立直接联系。因此，西藏问题上，虽然战时美英的政策有较大的差异，美国持比较谨慎的政策，不希望在西藏问题上触犯中国，但美国既不支持西藏在战时独立，也不支持中国收回西藏。

由于美国的上述态度，重庆国民政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向英国妥协，做了让步，不再出兵西藏，也不在西藏修公路了。就这样，西藏问题被悬挂起来。在抗日战争期间，英国没有达到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目的，而重庆国民政府也始终无法恢复行使对西藏的主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sup>④</sup>

## 二、英国对我国新疆的反动政策

英国对中国新疆早有野心，企图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是英国的传统政策。但是从清朝开始，英国在新疆的活动就不断遭到失败。民国时期，英国在新疆活动频繁，企图以新疆为据点，反对苏联，并扩大英国在该地区的影响，以削弱中国的力量。因此在珍珠港事变前，英国不但在远东地区对日本采取容忍妥协的立场，而且为了抵消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与苏联之间的密切往来所产生的影响，同时对大英帝国在中亚地区的传统势力遭受苏联驱逐的趋势予以反击，英国还曾经考虑暗中与日本军部，在新疆进行全方位的军事情报交流合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出于自身的安全，决定支援中国的抗战。1937年8月21日，中华民

---

<sup>①</sup>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3年5月23日），《宋子文驻美期间电报选（1940—1943）》，第191~192页；参见杨天石：蒋介石正告丘吉尔：“藏事为中国内政”——蒋介石日记解读之二，《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10日，RB15版。

<sup>②</sup>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3年5月23日、25日），《宋子文驻美期间电报选（1940—1943）》，第192页；转引自王建朗：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第109页。

<sup>③</sup> FRUS, 1943, China, p. 629.

<sup>④</sup> FRUS, 1943, China, p. 629

国政府主席特派外交部长王惠宠、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鲍格莫洛夫，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郑重声明“两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苏联明确表示了要“将两国现有之友好关系巩固于简单而永久的基础之上”，要确实拟行“双方担任之重责”。<sup>①</sup>

这样，双方关系日益密切。但是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的联系，主要是经过新疆进行。中国国民政府的数个代表团先后路经新疆的迪化（即今之乌鲁木齐），前往莫斯科访问。为了抵抗日本势力进逼中国西北边疆，从而危及苏联在中亚的利益，斯大林慷慨给予蒋介石军事武器装备和财政上的援助，并开辟了从新疆到苏联的国际运输通道。这就使大批战时物资则由陆运的方式，从中亚经北疆运往中国西南。由于日军于1938年10月占领广州并封锁中国大部分海上运输线，由西南大后方经甘肃、新疆通往苏联中亚的运输路线，就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国际交通要道。<sup>②</sup>

英国在新疆的活动，不仅遭到中国国民政府的反对，也遭到新疆地方政府的反对。借此东风，地方军阀盛世才统治的新疆省政府，开始了对英国在南疆的传统势力加以打压。自1937年起，在南疆各地，就开始了反英宣传活动。许多来自英属印度的侨民和商人，不断地因间谍罪和反新疆政府罪而被拘捕，其财产亦被南疆地方官员没收。当时英国驻喀什的外交官员，不但无法在新疆开展活动，甚至连他们的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也发生了问题。<sup>③</sup>

苏联势力在中亚和中国新疆地区的扩张，使英国政府非常担心其在南亚次大陆的殖民统治会因此受到严重威胁。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更使英国在新疆的活动直接受到影响。因此英国政府决定采取措施，恢复和加强英国在新疆的活动。1939年冬天，英国内阁决定强化在新疆原有的情报网，特别是以英国驻喀什的总领事馆为中心，开展间谍活动。

英国甚至决定要与日本勾结，以对抗苏联与中国在新疆的合作。例如在1939—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这段时间内，英国甚至已经决定在不让蒋介石和美国政府知悉的前提下，“答允日本军方一再提出的与英国展开情报合作的要求，彼此交换有关苏联在中亚和新疆活动的情报资讯，以对抗共产党势力对远东地区和印度所可能造成的威胁”<sup>④</sup>。

面对这种严峻的局势，重庆国民政府不得不加强对新疆的控制。1943年蒋介石把盛世才调到重庆担任农林部长，从而成功地直接控制了新疆。此外，重庆国民政府还采取了各种措施，防止英国在新疆的活动，挫败英国分裂新疆的各种阴谋。这样，英国在新疆的活动受到了遏制。中国确保了中央政府对新疆的主权，并确保战时中国通过新疆与苏联联系的国际运输通道的安全。

### 三、英国对我国东三省的殖民主义政策

东北三省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有一个时期曾经被分为四省，所以国外也有人称东四省。1931年9月18日事变后，东北三省被日军侵占，并建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自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坚决要求战后收回

---

①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料选辑（1931—1945）》，第71页。

② 林孝庭：《二战时期中英关系再探讨：以南亚问题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5（4），第35页。

③ 林孝庭：《二战时期中英关系再探讨：以南亚问题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5（4），第36页。

④ 林孝庭：《二战时期中英关系再探讨：以南亚问题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5（4），第37页。



被日军占领的东北三省。这种要求完全是合理的、正义的。

但英国希望战后在中国东北获得利益均沾的好处，就蓄意采取含混的态度，反对中国提出的收回东三省的合理要求。同时，英国害怕东北归还中国后，会在亚洲引起殖民地人民要求完全的独立与解放的连锁反应，损害英国殖民利益。英国把本国殖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因此英国政府在中国的东三省问题上，奉行殖民主义政策。

中国重庆国民政府多次申明战后要收回东三省，并要英国发表类似的宣言，表示支持中国的这一立场。但是英国政府却不愿这样做。在接到中国的要求后，英国外交部专门讨论了这件事情，并做出了结论。英国外交部认为，任何涉及中国对东三省收复问题的专门宣言，都会引起连锁反应。因为其他的盟国为了各自的利益，也会提出收回被日军占领土地的要求。<sup>①</sup> 因此，英国不愿做任何承诺，以便战后能不受约束，从而保证英国重占香港。<sup>②</sup>

基于上述考虑，英国处心积虑地否定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并欲造成事实上东三省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印象。例如，在英国、印度、伊朗出版的地图上，都标明东三省、西藏和蒙古是独立于中国的国家。这些地图上标明东三省是“满洲国”，而且在外交场合和文件中，英国干脆称东三省为满洲。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几次强烈抗议，但是英国一直都置之不理。

在东三省问题上，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官员们有与英国外交部不同的看法。薛穆对英国政府否定中国对东三省主权的做法极为担心。他十分了解中国人民对东三省的的感情。他认为东三省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处理不慎就会引发中国人民反英的怒潮。事实上，英国驻华使馆的主要官员，都认为东三省应归还中国。在他们向英国外交部汇报中国人民关于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时，英国大使馆认为废除治外法权时，应包括在东三省废除治外法权。<sup>③</sup> 但是，对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建议，英国政府不与考虑。

1943年1月初，中英在东三省问题上争议公开化。在关于战后东三省是应归还中国还是由列强安排的问题上，重庆国民政府与英国进行了斗争，捍卫了中国的尊严。1943年1月初中国收到了一份来自华盛顿的报告，说英国出席在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关系学术讨论会的代表团提出了一个方案，大意是战后东三省由俄国托管。日本在东北的工业，包括南满铁路，都应该保留给日本。中国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愤慨，向英国驻华大使馆提出了抗议。

英国驻华大使薛穆感到事态严重，向英国外交部做了报告。他说中国因收到这份报告而对英国非常不满。薛穆要求英国外交部表态，加以澄清。<sup>④</sup>英国外交部于是电询英国驻美大使、前外长哈里法克斯，要求从英国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团处查清此事并立即回答。哈里法克斯回电，说这件事情是由赫利侯爵在太平洋关系讨论会上的发言而引起的。赫利说：“我们赞成恢复中国在满洲的主权。但是由于满洲工业的发展，完全靠日本人。所以是否可以考虑战后在安排满洲的前

---

① FO371/35737, F535/25/10, Minutes by Clarke, 30 January 1943.

② FO371/35737, F535/25/10, Minutes by Clarke, 30 January 1943; FO371/53681, F2979/757/10, Minutes by Kitson, 1946年2月28日。

③ FO371/35737, F535/25/10, Anti-British Feeling in Ahina, 26 January 1943; FO371/35836; F2349/1667/10, Seymour to Eden, 23 September 1943; FO371/35797, F3420/206/10, Aldington to Scott, 2 July 1943; Scott to Aldington, 15 July 1943; F1167/1167/10, Minutes by Brenan, 31 March 1943; FO371/31657, F2757/828/10, For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4 April 1942.

④ FO371/35793, F134/134/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1 January 1943.

途时，一方面终止日本对满洲政治上的控制，另一方面让日本继续在那儿进行工业生产。”他还说：“大家都同意日本必须归还 1930 年以来侵占的领土。但是应该有余地考虑是否允许日本人战后在满洲继续从事经济活动。”<sup>①</sup> 实际上，赫利侯爵并不主张完全恢复中国在东三省的主权，并处处留下余地为列强侵略中国做准备。

英国外交部没有提出具体意见。虽然“太平洋关系学术讨论会”是非政府组织，但赫利侯爵是代表英国出席“太平洋关系学术讨论会”的，并且担任团长。因此他的发言，在中国被视为代表英国国家的主流观点。

薛穆在看了英国外交部给他的有关电文后，十分焦虑。他再次向英国外交部建议说应消除中国人民的顾虑。他说：“中国对国外的任何有关中国的提议都十分敏感。即便是非官方的建议，说满洲不会完全回归中国，或者说日本人在满洲的工业不能完全转交给中国，都会使中国人十分不安。”他强调说：“任何类似的建议在中国都会引起新闻界的激烈反响。”<sup>②</sup>

薛穆并没有夸大事实。针对赫利的讲话，不仅中国官方，而且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反对英国的阴谋，坚决要求战后收复东三省。位于昆明的中国国立大学教授、国际关系问题权威钱端升先生，就此事写了一封信给英国著名政治家、议会领袖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先生。钱端升先生在信中表达了全中国人民要求收回东三省的决心，并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民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钱端升先生说，由于赫利事件使中国人民“进一步怀疑英国的立场，英国是否会反对无条件把东三省归还中国？中国人民的这种怀疑是一直存在着的”。他希望英国政府，特别是保守党领导人，应该公开发表宣言，表明支持战后把东三省归还中国。<sup>③</sup> 钱端升教授还写信给另一位英国著名政治家西塞尔，重申了中国收复东三省和台湾的权利。<sup>④</sup>

这些信都转到了英国外交部，由外交部远东司负责处理。但远东司官员明白表示，英国绝不会满足中国的要求。斯科特在信上批示说：“东北三省及台湾的前途必须留待战后和平会议来处理。”<sup>⑤</sup> 远东司司长克拉克批示：“我们的总政策是在战争结束前避免任何关于领土调整的协议。这是我们在谈判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时拒绝中国要求收回九龙的原则。”<sup>⑥</sup>

克拉克的话暴露了英国对中国东北三省政策的利己主义动机。尽管东三省一直不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但是由于英国想长期霸占香港，并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所以反对中国收回被日本占领的任何土地的要求。英国的这一态度，还涉及把台湾归还中国的问题。如果英国同意战后让日本把东三省归还中国，就怕中国同时要收回香港和西藏。这表明克拉克的原则是殖民主义性质的。

因此尽管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官员们主张战后东三省应回归中国，但英国外交部拒绝给予支持。同时，英国驻华大使馆的主张，引起了英国外交部对他们的不满。据顾维钧称，由于英驻华大使薛穆过分同情中国，英国外交部曾考虑撤换他。<sup>⑦</sup>

对英国的殖民主义态度，中国人民坚决反对。1943 年 11 月 22-26 日，美、英、中三国首脑

---

① FO371/35793, F202/134/10, Form Washington to Foreign Office, 10 January 1943.

② FO371/35689, F588/10/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27 January 1943.

③ FO371/35737, F1040/25/10, Chien Tuansheng to Stafford Cripps, 3 December 1942.

④ , FO371/35737, F1040/25/10, Chien Tuansheng to Stafford Cripps, 3 December 1942.

⑤ FO371/35737, F1012/25/10, Minutes by Scott, 22 February 1943.

⑥ FO371/35737, F535/25/10, Minutes by Clarke, 22 February 1943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 21 页。

举行了“开罗会议”。在开罗会议上，重庆国民政府在战后中国的统一与领土完整问题上，与英国进行了斗争。蒋介石亲自出马，智斗丘吉尔。在斗争中，蒋介石采取了“联美制英”的策略，并取得了成效。

为了争取美国的支持，1943年5月23日晚和25日下午，蒋介石和美国总统罗斯福进行了两次长谈。双方就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达成若干共识。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关于中国的领土主权问题。在中国要求下，罗斯福同意：日本用武力从中国夺去的东北各省、台湾和澎湖列岛，战后必须归还中国。这次谈判，为《开罗宣言》关于把东三省、台湾和澎湖列岛回归中国的内容打下了基础。<sup>①</sup>

美国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根据罗斯福的指示，起草了《开罗宣言》初稿。在初稿中，霍普金斯明确表示了美国的态度：“被日本人背信弃义地所窃取的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和台湾，应理所当然地归还中国。”25日，美方正式打印的草案文稿中将上述文字中的“日本人”改为“日本”。然后，霍普金斯将起草的《开罗宣言》草稿先送给中国代表王宠惠及蒋介石过目，然后交给中、英、美三方官员讨论。<sup>②</sup>

但是英国从战后重建其远东殖民统治的角度出发，反对中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反对霍普金斯将起草的《开罗宣言》草稿。11月26日，中、美、苏、英四大国举行讨论会。中国出席讨论会的代表是王宠惠、美国是霍普金斯和驻苏大使哈里曼，英国代表则是外交大臣艾登和外交副大臣贾德干。在对《开罗宣言》草案的讨论中，中英代表进行了非常激烈的争论。

英国代表贾德干说，宣言草案中对日本占领的其他地区都提“应予剥夺”，唯独关于满洲、台湾和澎湖，写明了应“归还中华民国”。他建议，为求一致，将满洲、台湾和澎湖也改成“必须由日本放弃”。中国代表王宠惠立即反驳道：“全世界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而引起的，如果《开罗宣言》对满洲、台湾、澎湖只说应由日本放弃而不说应归还哪个国家，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将疑惑不解。”他坚决反对贾德干的修改意见。

贾德干辩解道，草稿中的“满洲、台、澎”之上，已冠有“日本夺自中国的土地”的字样，日本放弃之后，归还中国是不言而喻的。王宠惠据理力争，他说：“外国人对于满洲、台、澎，带有各种各样的言论和主张，英国代表想必时有所闻，如果《开罗宣言》不明确宣布这些土地归还中国，而使用含糊的措词，那么，联合国家共同作战和反侵略的目标，就得不到明确的体现。《开罗宣言》也将丧失其价值。”<sup>③</sup>

由于双方僵持不下，美国与苏联代表的意见，就显得非常重要。美国代表哈里曼表示他赞成王宠惠的意见，而苏联代表原则上也支持中国政府观点，这就使贾德干陷于孤立。结果，英国没有达到就宣言草案这一实质问题进行修改的目的。英国只是对美方草案作了一些非实质性的文字

---

① 陈须隆：《开罗宣言》的历史真相与国际法效力——纪念《开罗宣言》发表六十周年兼驳《开罗宣言》无效论，《光明日报》，2003年11月29日；参见 <http://gb.cri.cn/41/2003/11/28/105@8371.htm>。

② 陈须隆：《开罗宣言》的历史真相与国际法效力——纪念《开罗宣言》发表六十周年兼驳《开罗宣言》无效论，《光明日报》，2003年11月29日；参见 <http://gb.cri.cn/41/2003/11/28/105@8371.htm>。

③ 陈须隆：《开罗宣言》的历史真相与国际法效力——纪念《开罗宣言》发表六十周年兼驳《开罗宣言》无效论，《光明日报》，2003年11月29日；参见 <http://gb.cri.cn/41/2003/11/28/105@8371.htm>。

上的改动，将宣言初稿此段文字表述为：“被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特别是满洲和台湾，应归还中华民国”，这样就删去了美方文本中语气较强的“背信弃义”和“理所当然”两个词组。后来，丘吉尔本人又对宣言草案文字进一步做了修改，将文中的“特别是”改为“例如”，又在“满洲和台湾”两个地名后，加上了“澎湖”。<sup>①</sup>

修改后的《开罗宣言》草案，得到了中、美、英三国首脑一致同意。但是由于斯大林没有在开罗，因此还要等到不久即将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听取斯大林的意见后，《开罗宣言》才能最后定稿，并公开发表。

11月30日，在德黑兰会议期间，丘吉尔引用了《开罗宣言》有关日本归还其侵占领土的一段话，询问斯大林的意见如何。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完全支持中国的立场。斯大林回答称他“完全”赞成“宣言及其全部内容”，并明确表示：这一决定是“正确的”，“朝鲜应该独立，满洲、台湾和澎湖等岛屿应该回归中国”。<sup>②</sup>

就这样，《开罗宣言》获得顺利通过，并公开发表。重庆国民政府反对英国分裂中国的斗争，取得了巨大成绩。《开罗宣言》不仅使英国分裂中国东北的阴谋破产，而且从法理上确认了台湾和澎湖等岛屿是中国固有的领土。

但斯大林在中国东北问题上，采取了自私自利的沙文主义政策。他企图在战后延续老沙皇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权利。1945年2月4日，美、英、苏三大国举行雅尔塔会议。斯大林要求把原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取得的权利完全转移给苏联。罗斯福为了让苏联出兵东北，减轻美国对日作战的压力，同意了斯大林的要求，签署了秘密协议。对此，蒋介石十分痛心。他在1945年2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见罗、丘、斯里海会议（作者注：因雅尔塔地处里海附近，也称里海会议）第一次公报，一如所预料，其果与英、俄协议牺牲我乎？”十多天之后，蒋介石通过各种情报，确认雅尔塔密约牺牲了中国东北。他又激愤，又无可奈何，只好在日记中连续多日大骂罗斯福，以泄心头之恨。<sup>③</sup>

在中国东北领土问题上，重庆国民政府坚决维护了中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但是由于自身软弱无力，只能依靠美国和苏联的力量。然而美国和苏联与英国一样，并不会真正为中国打算。雅尔塔会议对中国的出卖，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战时英国的对华殖民主义考虑，在各方面都有表现。在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上的表现，也非常明显。

## 第二节 英国关于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的政策

### 一、1942年10月9日前英国关于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的政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面临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的问题。虽然英国签署了1943年1月

---

① 陈须隆：《开罗宣言》的历史真相与国际法效力——纪念《开罗宣言》发表六十周年兼驳《开罗宣言》无效论，《光明日报》，2003年11月29日；参见 <http://gb.cri.cn/41/2003/11/28/105@8371.htm>。

② 陈须隆：《开罗宣言》的历史真相与国际法效力——纪念《开罗宣言》发表六十周年兼驳《开罗宣言》无效论，《光明日报》，2003年11月29日；参见 <http://gb.cri.cn/41/2003/11/28/105@8371.htm>。

③ 张建魁、路琰、许陈静：《蒋介石日记破解历史谜案》，《齐鲁晚报》，2009年6月1日，《今日济南》，C21版；亦参见 <http://paper.dzwww.com/qlwb/data/20090601/786935343334/pdf/qc2101.pdf>。



11 日中英《关于废除治外法权的新约》<sup>①</sup>，但是从这个条约废除的全过程来看，英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是被迫的，而且无时无刻不在企图保持英国在华的侵略权利。虽然这个条约废除了英国在华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受到中外人士的广泛称赞，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宣布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然而英国仍占有香港和九龙，不平等条约中一些问题仍留待战后谈判解决。<sup>②</sup> 因此这个条约并未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平等。

在这次谈判中，中英双方围绕着废除不平等条约中的“通商”、“最惠国待遇”、“沿海贸易和内陆航行权”、“双重国籍”、“外国领港员”和九龙等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复较量。国民政府要求“一刀切”，干净、彻底地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收回九龙。

英国虽然迫于形势不得不进行谈判，但又力图保留尽可能多的特权。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英国坚持顽固立场，软硬兼施，既拒绝讨论九龙问题，又虚伪许诺战后再行讨论，迫使国民政府签订了新约。虽然如此，但由于 1943 年中英关于废除治外法权条约的签订毕竟从法理上宣告了不平等条约的结束，因而具有深远历史意义。

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从 1842 年以来，中国人民进行了前赴后继的斗争。孙中山先生在遗嘱里也强调了这一点。北洋政府也曾与列强为此交涉。南京国民政府自 1927 年以来，采取了许多措施以废除不平等条约。由于北伐战争和大革命的余威，英国被迫于 1928 年交出了武汉、九江租界，又在南京国民政府要求下，开始修约谈判。1931 年中英开始了废约谈判。由于九一八事变，英国中止了这一谈判。1937 年后，中国军队取得了震惊世界的平型关、台儿庄等战役的胜利，国际地位提高。为了争取主动，英国政府于 1939 年 1 月 14 日给中国政府发出照会，表示愿在战后与中国谈判废除不平等条约。此后，英国首相丘吉尔和外长艾登分别于 1940 年 7 月 13 日和 1941 年 6 月 11 日在下院发表讲话，重申了上述观点。

然而中国政府怀疑英国的诚意，要求彻底废约。1942 年 2 月蒋介石的访印，目的之一也是通过支持印度的独立运动，促使英国远东殖民地的解体，从而迫使英国放弃在华特权。在蒋推动下，中国新闻界于 1942 年 3 月至 10 月开展的抨击英帝国主义的运动，也要求立即废除不平等条约。其中以 4 月至 5 月间宋美龄在美国的活动最为引人注目。她连续撰文指出英国在远东作战不力，继续以帝国主义态度对待中国。她还批评以抗战名义到英国驻华大使馆工作的“大班”们。<sup>③</sup> 宋的言论在美国人民中引起巨大反响，使得英国政府不得不予以重视。

英国政府内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英国在华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过去。英国驻华大使馆武官米拉报告了美国驻华武官的看法：“英国一战以来保持的貌似强大的泡影已经破灭。如果继续以高傲的态度对待中国，认为中国人是劣等民族，那就会犯下巨大错误。这不仅会影响战时合作，亦将使英国失去战后在华贸易的机会。”<sup>④</sup> 这使英国政府看到立即改善中英关系的重要性。由于英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软弱，不能给蒋介石大量战时援助，英国只好忍痛废除治外法权及一些特权，以平息中国人民的反英情绪，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关系。

但是英国政府内在废约的时间、废约程度等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出现了两种观点。以首相丘吉尔和外长艾登等人为代表的上层官僚主张部分废约，而且要等到军事形势发展到有利于英国时才提出废约，认为这样才能保住在华利益。另一种观点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及部分中下层外交官

---

① 1943 年 1 月 11 日，中美在华盛顿签定了废除治外法权的条约。

② FO371/53561, F2294/10, Semour to Eden, 19 January 1943.

③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IV, (London, 1975), p. 491.

④ FO371/31704, F3187/3187/10, Minutes, 30 May 1942.

为代表，主张干净、彻底、立即废除不平等条约。但这种观点不为英国政府采纳。

由于薛穆来华前是英国外交部助理次官，主管远东和中国事务，他了解中国人民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民族感情。在担任驻华大使期间，他与周恩来、邓颖超、宋庆龄、林伯渠等人交往甚密。在周恩来等人影响下，薛穆认识到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无论什么党派在中国执政，不平等条约都必将被废除。因此他主张立即废除不平等条约。鉴于此，英国外交部于1942年3月征求他对废约问题的看法，并要他回答下列问题：“如果英国提出通过谈判来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会有什么反应？会感恩戴德呢还是认为英国是处于虚弱？在谈判中应以何种策略捍卫英国在华利益？”<sup>①</sup>

薛穆于4月4日回电详细回答了上述问题。他说：“我们应该立即行动，干净彻底地废除不平等条约。虽然由我们提出废约会不可避免被中国看成是软弱的表现，但这绝对不可以成为阻挡我们立即废约的理由。”他建议在谈判中不要提出过多要求和附加条件，那样做只会使谈判复杂化。他强调说：“当今中国只接受在乎等基础上的盟国之间的谈判。否则他们宁可不谈。”他反对通过保留一些特权来维护在华利益，而主张通过发展双边贸易，建立平等互惠关系来发展英国利益。

他甚至建议不宜使用“自卫”、“捍卫”等字眼，以免引起中国反感。<sup>②</sup>英国外交部大部分人员基本同意他的看法。然而政策研究处的乔治·扬却曲解薛穆的意思。扬说他读了薛穆的报告后，得到的印象是薛穆认为立即废约是英国软弱的表现？因此认为目前不是废约的最好时机。<sup>③</sup>薛穆在他的报告中已经反复说明目前就是恰当时机，无论什么时候废约，都不会给英国造成损失。以贸易为例，英国在华公司不过二十来家，大多无事可干。如果英国不立即行动，恐怕被美国抢先。他引用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亚利尔在中国的讲话加以证实。亚利尔说：“西方各国应该立即归还从中国抢占的租界、土地，包括满洲和台湾。”<sup>④</sup>

这次薛穆得到英国驻美国大使、前英国外长哈里法克斯的支持。他同意薛穆的分析，主张立即废约。但外长艾登仍然不同意。他说在目前情况下提出废约<sup>⑤</sup>肯定会被看成是英国软弱的表现，收不到预期的效果。他认为要“等到英军在对日作战中转败为胜时才能提出废约问题”。他还强调要争取与美国一同提出废约问题，依靠美国力量，英国才可能在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他指示哈里法克斯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要求，希望美国政府能在废约问题上与英国一致行动。美国政府表示同意。<sup>⑥</sup>

英国的这种态度令中国政府更加怀疑英国在废约问题上的诚意。蒋介石明确指出：“要么‘一刀切’，不留尾巴；要么就不谈。”<sup>⑦</sup>在他眼中，不平等条约已不存在，要紧的是收回香港、九龙。事实上，西方列强在华特权已随中日战争的爆发而消失。一方面是日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列强根本无法在沦陷区行使治外法权及各种特权。另一方面由于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与西方国家没有外交关系和正式交往，西方列强不可能在这些地方享有特权。在国统区，国民

---

① FO371/31657, F2757/828/1, Foreign Office to Chungking, 9 March 1942.

② FO371/31657, F2757/828/10, For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4 April 1942.

③ FO371/31657, F2757/828/10, Minutes by Young, 8 April 1942.

④ FO371/31657, F2757/828/10, For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7 April 1942.

⑤ FO371/31657, F2918/828/10, Form Washington to Foreign Office, 12 April 1942.

⑥ FO371/31657, F2757/828/10, Form Foreign Office to Washington, 20 April 1942.

⑦ FO371/31657, F6761/828/10, For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20 April 1942.

政府也毫不客气，采取措施收回和限制列强在华特权。例如财政部成立了关务处，收回了英国把持近百年的海关之权。国民政府颁布了战时法令，限制外国人在华活动。国民政府对违反中国法令的外国人一律逮捕。

在贵州省贵阳市，当局以间谍罪逮捕了两名从香港来的英籍欧亚混血华人，并把他们投入监狱，使英国驻华大使馆爱莫能助。<sup>①</sup>在昆明，当局传讯了英国缅甸兄弟钢铁公司在华代理人麦凯，审理该公司所欠中国人款项一案。<sup>②</sup>对此，英国财政部负责英、美对华贷款事务的专员奈梅耶哀叹道：“整个不平等条约体系，包括治外法权，已经不存在了。”<sup>③</sup>然而认识到英国在华特权已经消失是一回事，要面对现实从法律上废除不平等条约又是另一回事。在这个问题，英国外交部还算开明，主张在有利于英国的情况下废约。但是英国其他各部均反对立即废约，有的部还根本反对废约。如贸易部要求只有在英国商业利益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才能废约。

丘吉尔本人的态度也是一个影响因素。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提到他公开反对在中国和亚洲实现《大西洋宪章》，并声称要让英国旗在香港上空高高飘扬。1942年8月他对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在未考虑成熟之前我不会同意给亚洲人实践大西洋宪章的机会。我们也有我们的传统，只要我在白厅一天，我就要坚持这些传统和维护大英帝国。”他的所谓传统不过是炮舰政策和侵略扩张而已。他的态度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sup>④</sup>

如此看来，要在废约问题上有所突破，必须有外力的推动。这股力量来自美国。美国在利益均沾、机会均等的幌子下，在中国享有各种特权。但是美国没有直接占有中国领土。一方面美国企图通过废约来激励蒋介石坚持抗战，防止日、蒋、汪合流。此外美国还担心日本抢先在汪伪政权辖区宣布“废除治外法权”，因为日、伪自1937年以来，一直在安排“废约”问题。<sup>⑤</sup>美国人民在废约问题上同情中国的。

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于1942年9月15日专程到英国，走访了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克拉克。他要求英国在战争结束前废除不平等条约。他还要求英国要宣布把香港归还中国。克拉克同意可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是不同意归还香港。克拉克说：“香港的未来取决于两点。第一，战后中国国内状况。第二，由美英中苏四方磋商。”这里克拉克所指的“中国国内状况”是在暗指用老借口不归还香港。因为1931年前英国惯用的借口是“只有中国统一，有一个能维持法律与秩序的中央政府时，才能谈废除不平等条约。”李普曼知道英国人不想把香港归还中国，于是说：“美国人民认为香港与新加坡不同。香港从地理位置上看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不能拖延不还。”克拉克诡辩说：“在全体英国人的心目中，香港属于英国。我们占领香港时，它只是一个荒凉的小岛。今日繁荣的香港完全是我们建设起来的。”<sup>⑥</sup>

这使李普曼感到扫兴和不快。然而美国政府决定立即废除在华的治外法权。1942年9月15日美国向英国建议立即与中国谈判废约，英国表示同意。于是双方就有关事宜进行磋商。同时英国政府要薛穆去试探中国此时对废约的态度，并对1931年草约进行审核，看哪些条款在目前情

---

① FO371/31679, F3190/3190/10, For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27 April 1942.

② FO371/31679, F3751/1689/10, From Seymour to Eden, 1 April 1942.

③ FO371/31657, F3190/828/10, Foreign Office Minutes, 30 April 1942.

④ PREM/3740, WSC to FDR, 9 August 1942.

⑤ 日本于1943年1月9日与汪伪政权达成尽早废除不平等的协议。

⑥ FO6518/54/10, Clarke Minutes, 15 September 1942.

况下仍能保留。<sup>①</sup>薛穆于9月26日回答,说中国现在对废约不感兴趣。除非“一刀切”,否则不谈这个问题。很明显,如果英国借废约为名,行保留在华特权之实,那么在废约谈判中,双方斗争将十分剧烈。对此英国做了充分准备。

10月9日英国政府口头通知了中国驻伦敦大使馆即将废约的决定。10月10日英、美联合向国民政府正式宣布了谈判废约的决定。中国对英、美此举深表惊诧,激动万分。蒋介石于当天下午4时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政府要员亦表态表示欢迎英、美废约决定。他们认为中国取得平等地位,恢复国权的一天到来了。蒋介石指定外交部长宋子文,外交次长吴国桢、王宠惠等人为谈判代表。但他们哪里知道即将开始的谈判是何等艰难。

## 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和九龙问题

香港是英国的王冠殖民地,是除印度之外最重要的殖民地。英国的既定方针是不把香港归还中国。为长期占领香港,九龙新界也不能交还中国。早在1931年6月20日香港总督就建议说:“不仅九龙城,而且整个新界,从经济上、战略上看对香港来说都是绝对需要的。所以不能交还中国。”<sup>②</sup>

在由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主持撰写的1931年英国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草案中,又明确规定上海租界可以归还中国,而香港绝对不能归还。克拉克于1942年10月20日重申这一方针。他说:“根据蓝普森爵士1931年6月20日的建议,我们不能把九龙还给中国。我们不必给予任何理由,只通知中国政府九龙问题以后再说。”<sup>③</sup>

中国政府则坚决要求收回九龙。早在1942年7月15日,中国外交次长傅秉常约见英国驻华大使馆官员安德鲁斯,要求收回香港,但遭到英国政府的拒绝。<sup>④</sup>

英国宣布要通过谈判放弃在华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后,又明确宣布香港不在谈判归还之列。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理查德·劳于10月14日在下院回答是否把香港归还中国这个问题时说:“不还。我们提出的废约只是废除治外法权。”<sup>⑤</sup>英国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是十分顽固的。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克拉克在一份绝密文件中指示:“如果美国支持中国收回香港,英国绝不能屈服于美国压力。”<sup>⑥</sup>10月24日英国提交了谈判草案,拒不归还九龙。

英外交部政务次官劳的10月14日讲话传到中国后,舆论大哗。中国人民立即提出抗议,谴责英国的帝国主义行径。中国政府顺应民意,于1942年11月23日提出了要求归还九龙的谈判草案。不过这个草案同时也反映了国民政府的软弱。草案只提要求归还九龙,不提香港。但是即使如此,英国也拒绝讨论。因为双方都十分清楚,九龙的得失实质上关系着香港的未来。

薛穆开始时希望英国政府不要与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发生冲突。他建议把香港还给中

---

① FO6761/828/1, From Seymour to Eden, 26 September 1942.

② FO317/15, F5900/256/10, Lampson to Henderson, 22 October 1942; F7204/828/10, Foreign Office to Chungking, 22 October 1942.

③ FO317/15, F5900/256/10, Lampson to Henderson, 22 October 1942; F7204/828/10, Foreign Office to Chungking, 22 October 1942.

④ FO317/15, F5900/256/10, Lampson to Henderson, 22 October 1942; F7204/828/10, Foreign Office to Chungking, 22 October 1942.

⑤ FO371/35679, F123/10/10, Memorandum by Foreign Office, 14 October 1942.

⑥ FO7822/828/10, Minutes by Clarke, 20 November 1942.



国。<sup>①</sup>但是薛穆受到外交部申斥，严令他在谈判中拒绝讨论九龙问题。外交部内甚至有人说他像一个中国代理人而不像英国在华代表。<sup>②</sup>英国外交部于1942年12月5日发给薛穆一份机密电报，文中指示：“不要在目前的条约谈判中考虑新界问题，这与废除治外法权无关。1898年条约已经说得十分明白，九龙新界是英国扩大的领土，这与租界是两回事。你应通知中国政府九龙新界不在讨论之列。”电文还提到若谈判形成僵局时将如何处理的问题，指出届时薛穆应该按如下的内容告诉中国政府：“在盟国胜利后，英国将寻求远东的重建。为了远东的持久和平与秩序，要求所有有关国家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届时英国会与中国讨论在租借有效期内九龙新界的安排问题。”<sup>③</sup>从此薛穆奉命行事，不再提归还香港问题。为什么英国如此坚决地拒绝讨论九龙问题呢？

在一份名为《目前中国形势与英、美对华政策备忘录》的绝密文件中，英国外交部说了不归还九龙的理由。这份文件说香港殖民地由三个地区组成。第一是香港岛，由1842年《南京条约》割让英国；第二是香港对面的九龙半岛的一部分，由1860年的《北京条约》割让给英国；第三是九龙新界，由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给英国99年。九龙新界包括大陆的一部分及邻近230多个小岛屿，总面积约405平方公里。英国租借九龙新界的第一个原因是“防卫和保护香港殖民地”，第二个原因是九龙是香港供水的主要来源。<sup>④</sup>

英国拒绝讨论九龙问题的做法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反对。著名作家林语堂在美国著文对此加以批判。他说英国从殖民主义立场出发，拒绝谈判归还九龙，并采取了耍赖的办法。丘吉尔不仅拒绝归还九龙，声称“英国立国的唯一目标，就是要获得殖民地”，而且还公开要求美国不要插手香港问题。真是狂妄之极。但是林语堂认为丘吉尔的阴谋不会得逞。他说蒋介石已经明白宣告中国不是侵占他国领土，而是要收回自己的领土。这是合理合法的。<sup>⑤</sup>

林语堂警告英国：“即使中国政府不打算与英国兵戎相见，但是中国人民为了收回香港是不惜与英国一战的。中国的五百万士兵在对日战争中流血牺牲，不是为了让英国重新占有香港这个英国从鸦片战争中掠夺来的战利品和号称英国王冠上第二颗最明亮的钻石的。”<sup>⑥</sup>英国拒绝讨论九龙问题的蛮横举措，也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反击。宋子文在谈判中寸步不让，坚决要求收回九龙。他在每次谈判中都重复这一立场，并以此作为签约的先决条件。吴国桢则具体地阐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民族感情，并且从法律的角度力争收回九龙。他说香港和九龙都是由不平等条约引起的问题，既然谈判废约，当然要涉及九龙。不归还九龙，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就不完全，中国政府亦无法向人民交待。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使谈判几成僵局，条约迟迟不能签订。

相反，中美在华盛顿的谈判进行得十分顺利。主要原因是中美之间没有九龙那样棘手的问题；再者美国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横行中国，已经不必借助不平等条约。所以美国在废约问题上显得大度。美国希望中美、中英条约能同日签订，故对中英双方都施加了压力，希望早日打破僵局。不过美国政府并未要求英国把香港归还中国。因此真正受到压力的是国民政

---

① FO371/31665, F7916/54/10, Seymour to Eden, 26 November 1942 年.

② FO371/35679, F123/1/10, From Foreign Office to Chungking, 25 November 1942.

③ F7822/828/10, Foreign Office to Chungking, 5 December 1942.

④ FO371/46211, F4171/186/10, Memorandum, 7 July 1941.

⑤ FO371/35689, F3563/10/10, The Future of Asia, 16 May 1943.

⑥ FO371/35689, F3563/10/10, The Future of Asia, 16 May 1943.

府。但是国民政府并未立即妥协，仍然坚持收回九龙的立场。<sup>①</sup>

面对僵局，英国政府改用另一办法替代拒绝讨论九龙的立场。英国外交部要中国在签订条约之后，向英国提出一个照会，内容是“虽然九龙不在目前废约谈判的讨论之中，但是中国保留战后再提出九龙问题的权利”。那时英国政府则回文表示“同情”中国的这一要求，“愿在战后收到中方要求时加以考虑”<sup>②</sup>。

由于这个办法并没有承诺战后一定会把九龙归还中国，因而再次遭到宋子文拒绝。于是英国转而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决心迫使中国在条约谈判中放弃九龙问题，迫使中国不得不按英国的条件办事。它一方面威胁说如果中国坚持要收回九龙，英国将放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打算，不再与中国签约；另一方面由薛穆出面，私下向顾维钧许诺，说英国政府战后一定会把香港归还中国。薛穆要顾去游说宋子文和蒋介石。<sup>③</sup> 顾维钧当时任中国驻英大使，回国述职以备咨询。他与艾登及薛穆有长期的工作关系和交往，对英国人的诺言深信不疑。由于他是老资格外交家，所以他的话在中国外交事务上有一定分量，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次谈判的进程。他多次向宋子文谈了他本人对中英谈判的看法，主张按英国条件办事。

开始宋子文不接受顾维钧的意见。在12月14日谈判会上坚决表示如果不收回九龙就宁可签条约，使这次谈判不欢而散。<sup>④</sup> 吴国桢在请示蒋介石后，于12月21日召见英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台克曼，坚决要求收回九龙，希望英国再次考虑中国的这一立场，但仍被拒绝。<sup>⑤</sup> 后来薛穆提出如果中国对租借条件不满意，可以讨论，但不肯能讨论归还九龙问题。这种企图使中国为了租借条件而放弃收回九龙的建议被宋子文拒绝。

尽管如此，宋子文仍抱着侥幸心理，希望英国在最后时刻改变想法，归还九龙。但是他不知道正是在12月21日英国战时内阁已正式授权薛穆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宣布英国政府的正式立场：“九龙不在当前条约谈判讨论的范围之内，但是英国准备在战后讨论这一问题。”<sup>⑥</sup> 在12月25日这次最为重要的谈判中，吴国桢据理力争，指出九龙问题属于不平等条约范围。宋子文立即插话希望薛穆能明白吴国桢所指的是什么。薛穆说他当然明白。于是薛穆最后摊牌。他说：“既然如此，中国政府应先发照会给英国，说明九龙虽然不在当前谈判的内容之中，但中国保留战后提出这个问题的权利。”他说如果中国这样做了，英国政府会同意以后再考虑这个问题。

这样谈来谈去英国都是那句老话：战后再说。虽然宋子文口头上仍然坚持不解决九龙问题绝不签约的立场，但这时他的决心实际上已经动摇了。会后他在外交次长王宠惠家里召集会议，商讨对策。顾维钧也出席了会议。会上顾维钧认为要在条约与九龙之间进行取舍。他提出了所谓又能体面退让又不放弃九龙的原则，那就是接受英国政府的立场，即中国同意九龙不在目前谈判的范围内，但中国保留战后提出讨论九龙问题的权利，而英国同意战后在收到中国要求讨论九龙问题的照会后加以考虑。

---

① FO371/35679, F123/1/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29 December 1942.

② FO371/31665, F8482/828/10, From Foreign Office to Washington, 29 December 1942.

③ FO371/371665, F8482/828/10, From Foreign Office to Washington, 29 December; Eden to the United States Change D' Affairs, 29 December 1942.

④ FO371/35679, F123/1/10, Records, 14 December 1942.

⑤ FO371/35679, F123/1/10, Records, 14 December 1942.

⑥ Christopher Thorne, *Allies of A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 New York, 19768, p. 51.

顾维钧还强调说：“如果不签约，英国很可能发表一项声明，说他们原来的提议是废除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而且已就此草拟了条约达成了协议。但中国提出并一再坚持归还九龙，并坚持以废除九龙租借权为签署条约的条件。”顾维钧上述话，明显有不实之处，因为双方并没有草拟一致的条约，更没有达成协议。否则何必一再谈判无法打破僵局呢？顾维钧为了劝说宋子文等人还说：“英国还会解释说它并非不愿讨论这个问题，但目前九龙不在英国手中，因此建议战后胜利再行讨论。英国发表了这样一个声明，就可凭世界舆论来评价是非了。”

顾维钧担心如果这样英、美就会不废除不平等条约了，因为“英、美舆论认为中国收回九龙是为在敌人占领下的领土问题进行争吵”。顾维钧说九龙是香港问题的一部分。“而后者是事关原则的领土调整问题，英国认为这类领土应在战后根据情况，通过与其他盟国协商来解决。如果现在提出这个问题，盟国之间就会产生意见分歧，从而损害盟国之间的团结。再者所谈的领土仍在敌人手中，因此这种争论只是空谈。”<sup>①</sup>显然顾维钧上述对英国政策的估计是错误的。英国的真实态度是谈判中拒绝讨论九龙问题，战后也不会把香港、九龙归还中国。

宋子文等人正一筹莫展，不得已同意放弃收回九龙的要求。当晚由吴国桢草拟了一个备忘录交蒋介石审批。在见蒋前，顾还建议用以下两点去说服蒋介石：第一，谈判破裂将意味着盟国团结的破裂；第二，在中国对苏关系中需要英国。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终于接受了顾维钧的意见。但他亲笔批示：“英国要宣布归还九龙租借地。”<sup>②</sup>

不过宋子文还是为收回九龙作了最后的努力。他于12月28日召见薛穆和台克曼。宋说他无法说服同事和中国政府接受英国关于战后再讨论九龙的主张。由于中国人民决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希望在当前谈判中一刀两断。因此除非英国政府答应或表示战后愿意归还九龙，否则中国政府不能签约。薛穆对此表示遗憾并将上述观点报告了英国政府。到此时为止，薛穆仍然不相信国民政府会最后同意签约。他忧心忡忡地汇报说：“如果我国政府不做某种表示愿意终止九龙租借权，中国政府是否会签约仍然令人怀疑。”<sup>③</sup>

然而老谋深算的英国政府并不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宋子文则以为英国早已多次答应在签约后的换文中给予归还九龙的保证，所以没有想到英国政府没有正式回答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而且他在12月28日对薛穆和台克曼的讲话一方面是做给蒋介石看的，另一方面是最后碰一次运气而已。因为条约的签订势在必行，宋子文被迫结束了在九龙问题上与英国的争论。<sup>④</sup>

谈判中双方还就其他问题进行了斗争。有的达成了协议，取得了谅解。有的迫于形势，英国放弃了在华特权。例如英国要求保留单方面的“最惠国待遇”，中国则坚决要求取消。宋子又说由于中国经济落后，不能丢掉保护自己的贸易和工业发展的政策，中国必须对贸易进行控制和垄断。由于中美正在进行的谈判中取消了这一条，英国无能为力单独保留这一条款。英国政府明白无法使美国把这一条款写进中美新约，因此英国才被迫取消了这一要求。有的则留待战后谈判解决。例如英国要求保留“通商”这一条款。中国则表示由于《南京条约》上“通商”一款象征着不平等，所以必须废除。至于通商的具体问题留待战后签订《中英商约》来解决。由于中国

---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71~173页。

② FO285/1/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14 December 194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73页。

③ FO371/35799, F807/254/10, Seymour to Eden, 11 February 1943.

④ FO371/35681, F807/1/10, Seymour to Eden, 1 January 1943.

强调战时中英之间实际无商可通，贸易停顿，所以英国也只好同意战后再说。<sup>①</sup>

双方还在沿海贸易和内陆航行权等问题上进行了斗争。中国坚决反对外国船只在中国内陆航行，英国政府则提出如果这样中国船只也不能在缅甸内河航行，因为缅甸是英国殖民地。最后双方妥协，各自保留对对方船只关闭任何港口的权利。<sup>②</sup>

1943年1月11日中英正式在重庆签约。蒋介石对条约的签订并不高兴，因为中国并没有收回九龙。在出席签字的庆祝会上，英国驻华大使薛穆注意到蒋介石脸色阴沉，心情非常不好。在条约签定后，中国仍然要求收回九龙。签约当天，宋子文就向英国政府提交了照会，要求保留战后收回九龙的权利。但是薛穆回答说该照会已转交英国政府，其余无可奉告。结果是英国连回文也没有给。签约后的换文中更无英国答应战后讨论九龙问题的字样。这再次表现了英国政府的狡猾，为日后赖账埋下了伏笔。<sup>③</sup> 尽管如此，宋子文、顾维钧等人还是抱着幻想，希望战后英国能归还九龙。然而事情的发展证明谈判中英国答应战后讨论九龙问题只是一种欺骗。英国根本不准讨论九龙问题，更不会归还香港。

### 三、1943年条约签订后的英国对香港政策

新约签订后墨迹未干，英国即宣布战后不归还香港。1月14日英国殖民地大臣在议会回答问题时强调，英国王冠殖民地香港的地位并不因为新约的签订而改变。英国外交部远东司中国处处长布雷南说，签约并不意味着事情结束。虽然中国会不停地向英国施加直接和间接的压力要求收回九龙，但九龙绝不可以还给中国，“保住九龙，就是重获香港的第一步”。<sup>④</sup>

为了表明英国不会把香港归还中国的决心，从1943年2月起，英国政府指示其在华公司一律要在香港注册，而不能到其他英国殖民地注册。此时英国已经从珍珠港事件后的惊慌中镇定下来，开始考虑战后远东殖民地的重建问题。以下的事实和言论充分暴露出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的本性并没有什么改变。签约后在英国刮起了一股歪风，认为英国不应该废除不平等条约。殖民部官员普拉特写了一份备忘录，其中认为签订1943年条约是一个错误。他胡说治外法权不是外国强加给中国的，而是中国自己发明的。远在签订不平等条约前，中国官员为了省事，就让在华的外国人自己管理自己。中国官员只与外国人中的头领打交道。这在不平等条约签订后演变为治外法权。<sup>⑤</sup>

中国希望利用美国来压英国归还香港。但是美国并不主张无条件把香港归还中国，而是在把香港归还中国后，使之成为一个“自由港”。因此在1943年6月，罗斯福向宋子文提出了当中国获得主权后，香港开放为自由港的建议。具体来说，就是英国自动将香港交回中国，中国则自动将香港九龙一部或全部划为自由港区，在该区内不征任何捐税。罗斯福认为“英国经营香港百年，中国宣布自由港，可保全英侨民一部分权利，此乃中国为建设世界之贡献”<sup>⑥</sup>。罗斯福要中国宣布香港为自由港，已经侵犯了中国主权。但宋子文却不敢反对。

---

① FO371/35681, F512/1/10; FO371/35681, F852/1/10.

② FO371/35681, F852/1/10.

③ FO371/35681, F285/1/10, Seymour to Eden, 12 January 1943.

④ FO371/35681, F285/10, Minutes), 14 January 1943; FO371/35681, F671/1/10.

⑤ FO371/35686, F3719/1/10, Pratter to Clarke, 14 January 1943.

⑥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3年6月，日期不详)，《宋子文驻美期间电报选（1940—1943）》，第202~203页；亦参见王建朗：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2109页。



1943年11月下旬，英、美、中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议。这是中国利用美国支持，迫使英国退让的一个机会。在最初的考虑中，重庆国民政府曾准备提出香港问题。在11月14日的日记中，蒋还表示准备在会上提出此事，“港九问题，归还政府为自由港”。然而，考虑到没有胜算，经过反复的斟酌之后，蒋介石不准备在开罗会议上主动提出香港问题，而决定“以留待日后解决为宜”<sup>①</sup>。为了避免与英国发生争端，蒋介石还决定，所有有关中英之间的争端问题，不在开罗会议上提起。蒋在拟定与丘吉尔谈话的议题时，决定“除与中美英有共同关系之问题外，皆以不谈为宜，如美国从中谈及港九问题、西藏问题、南洋华侨待遇问题等，则照既定原则应之。但不与之争执，如其不能同意，暂作悬案”<sup>②</sup>。

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在与蒋介石会谈时曾提出香港问题。蒋介石表示，希望罗斯福先与英国商量此事。罗斯福同意了。但是罗斯福并不是无条件地主张香港归还中国。他希望中国收回香港后，“中国自动划香港九龙之一部或全部为自由港，在该区内不征收税捐”<sup>③</sup>。蒋介石不得不表示同意。罗斯福在与斯大林谈话时，也谈到了他对香港战后命运的这种看法。但当罗斯福向丘吉尔提出，为了鼓励中国抗日，作为一种“良好的愿望”，希望英国战后放弃香港，但立即遭到丘吉尔拒绝。丘吉尔还说了以下臭名昭著的话：“我当英国首相的目的，并不是要主持大英帝国的解体。”<sup>④</sup>

罗斯福劝丘吉尔说，香港的居民90%以上都是中国人，而且十分靠近广州，所以应该把香港还给中国。但丘吉尔愤然回答说，只要他还是首相，他就不会让大英帝国解体。<sup>⑤</sup>丘吉尔后强硬地表示了他的立场：英国“不想获得任何新的领土或基地，而只想保持他们已有的东西。除非通过战争，否则就别想从英国这里夺取任何东西”。<sup>⑥</sup>在英国的这种强硬态度面前，香港问题再次被搁下。

英国对香港的帝国主义立场，在英国国内根深蒂固。不仅丘吉尔不愿归还香港给中国，英国政府内的其他一些官员也不愿把香港归还中国。他们的态度，正如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贾德干所说：“任何放弃香港的做法，都将导致影响及其深远的后果，即不仅影响我们在远东的地位，而且影响我们在全世界的地位。”<sup>⑦</sup>

丘吉尔的顽固的殖民主义立场，使蒋介石痛恨不已。11月25日，当蒋介石与丘吉尔会谈后，就在当天的日记中充分表达了这种感情。他在日记中把丘吉尔的帝国主义形象，刻画得非常淋漓尽致，他说：丘吉尔所谈，“皆为余所厌闻者，而彼乃津津乐道约一小时之久……而其思想与精神气魄以及人格则决不能与罗总统同日而语。英狭隘、浮滑、自私、顽固八字尽之矣”<sup>⑧</sup>。

---

① 《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关于开罗会议中我方应提出之问题草案》（1943年11月），《战时外交》第三册，第500页。

② 《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15日，参见王建朗：《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第108~113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5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4页。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14页。

⑥ Bohlen Minutes, 29th Nov., 1943, FRUS, 1943, Cairo and Tehran, p. 554.

⑦ 萨本仁 潘兴明：《20世纪的中英关系》，第275页。

⑧ 《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27日，参见王建朗：《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第115页。

英国的顽固立场也使美国颇感为难。11月26日,在与蒋介石的会谈结束后,罗斯福对蒋慨叹说:“现在所最令人痛苦者就是丘的问题”,“英国总不愿中国成为强国”。他在说这些话时,“颇有忧色”。这就使蒋介石大为感动,觉得罗斯福“比上次谈话时更增亲切”。因此,第二天,蒋介石就对霍普金斯表示了他对罗斯福的钦佩之情。蒋介石说:“此次世界大战,如非罗之政策与精神,决不能有今日之优势,英与俄皆无法挽救,故余惟佩其人格之伟大也。”<sup>①</sup>

开罗会议的斗争,使蒋介石对英国殖民主义外交的认识更加深刻。蒋介石曾回顾说:“开罗会议之经历,无论军事、经济与政治,英国决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彼对于美国之主张亦决不肯有所迁就作报答美国救援英国之表示;其对于中国存亡生死,则更不值一顾矣……英国之自私与贻害,诚不愧为帝国主义之楷模矣。”<sup>②</sup>

英国顽固坚持其对香港的政策。1944年3月31日,原香港政府官员史密斯甚至写信给英国《旁观者》杂志,颠倒是非地说:“我们要提醒读者,是中国官员们自己在1841年把香港割让给英国的。他们以为疟疾或其他疾病会使我们英国人从中国沿海撤走。但他们错了,英国人坚持下来并顶住了由中国政府挑唆的对香港的封锁,使香港由一个在1841年仅五千人的小渔村变成一个在1937年前人口已达六十万人的繁华城市。”<sup>③</sup>

英国官方认为,战后香港问题的关键不是讨论,而是武力。英国外交部在1943年的一份机密文件中写道:“最重要的问题是武力收复香港,用武力维系大英帝国的统一。英国国旗必须在不受阻碍、不受歧视的情况下在香港重新升起。中国政府必须在香港问题上与英国合作。”<sup>④</sup>这就清楚表明,英国仍然乞灵于炮舰政策。外交部官员布拉克勃说:“英国在远东作战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收回失去的殖民地。”<sup>⑤</sup>连一向同情中国的薛穆也改变立场,说如果用武力收复香港,那么一切争论就都不存在了。<sup>⑥</sup>

为了重占香港,英国政府行事十分缜密,他们曾反复研究到底哪一种方案最适合香港。1944年7月10日,英国政府再次对香港未来的几种方案进行比较,排除了联合国共管、中英共管等方案,确定了“战后恢复英国殖民统治,绝对不允许半点讨论”的方针,并决定必须用英国武装力量独立收复香港。<sup>⑦</sup>为此英国准备用海陆空军及预备部队协同作战,不惜一切代价攻占香港。英国从1944年开始训练接管香港的行政人员,要求有关人员学习中文,同时向香港派遣了大批间谍以配合军事行动。<sup>⑧</sup>为了应付国际舆论,英国外交部要求统一对外宣传口径:“香港是在英国手中失陷。由于事关英国国家荣誉,故应由英军收回并恢复其战前状态。”<sup>⑨</sup>

到1944年11月,英国已初步做好了战后抢占香港的准备工作。1945年3月3日,英国外交

---

① 《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27日,参见王建朗:《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第115页。

② 《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27日;参见王建朗:《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第115页。

③ FO371/758639, F1657/1505/10, Letter to the Editor, 3 March 1944.

④ F3273/1879/10, Far East Memorandum, 23 March 1943.

⑤ FO371/75837, F1803/1505/10, Far East Memorandum, 23 March 1943.

⑥ F8837/409/1, Far East Memorandum, 23 March 1943.

⑦ FO371/75839, F13676/1061/10.

⑧ F5341/1505/10.

⑨ FO371/46751, F4008/1007/10.

部再次重申武力抢占香港的重要性：“如果武力收复香港，我们面临的各种问题就基本解决了。而如果由盟国勉强把香港交还我们，那么在很长时间内我们都会遇到麻烦。”<sup>①</sup> 此时由于欧洲战场的胜利，英国得以抽调大批兵力加强远东，大大地加强了英军攻占香港的能力。1945年8月23日，英国新外长贝文宣布在香港接受日军投降的准备工作已安排就绪，11月19日英军完成对香港、九龙的军管。至此英国完全背弃了战后谈论九龙问题的诺言。<sup>②</sup>

英国重占香港是得到美国支持的。1943年7月13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霍贝克就说：“尽管美国人民同情中国，希望香港回归中国，但美国政府是站在英国一边的。”<sup>③</sup> 1943年9月21日英驻美大使哈里法克斯汇报说：“霍贝克的看法是美国不仅不能对英国施加压力，而且要支持英国恢复对香港的主权。这样可以使香港成为联合国在太平洋地区集体安全的基地。”<sup>④</sup>

1945年3月麦克阿瑟将军发布了著名的战后第一号命令（No. 1. Order），让英军到香港和九龙接受日军投降。他剥夺了中国军队受降的权利。1945年8月13日后，美国同意在香港与英军合作。<sup>⑤</sup>

蒋介石却不同意这种安排，他坚持要由中国到香港接受日军投降。他说，按照盟军方面的规定，香港日军划归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受降。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敕”，宣布日本投降。丘吉尔以香港是割让地为由，坚持要派英国海军到香港受降，这使得蒋介石非常着急。1945年8月1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英军舰已驶到香港海附近，有重占香港之企图。”蒋介石于8月18日，任命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司令长官张发奎为接受广州、海南岛和香港日军投降的受降官。8月28日，张发奎报告，其下属一部已向香港推进。到8月30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下令，要张发奎派新1军军长孙立人为广州、港九地区受降官。<sup>⑥</sup>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为了准备内战，重庆国民政府的军队未能及时占领香港，这就使英军占领香港成为可能。

蒋介石知道，他无力和丘吉尔抗衡，无法一举收复香港。但他仍然坚持在中国对香港的主权。因此他被迫做了一些让步，即由中国派代表到香港接受日军投降。而英国不同意中国人在香港受降，于是蒋介石就考虑以中国战区司令的身份，委派英国人作为中国的代表，到香港受降。<sup>⑦</sup>

3天后，英国一位海军上将受降特使的身份到达香港，拒绝蒋介石给他的“委派令”。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怒斥道：“英国欲强重占香港，不许我接收，并拒绝我委派军官接收香港之

---

① FO1331/409/10, Memorandum), 3 March 1945.

② FO371/75839, F13676/1061/10

③ FO371/35740, F3561/1, Halifax to Eden), 13 July 1943.

④ FO371/35842, F4382/138/G., Halifax to Horace), 21 September 1943.

⑤ FO371/46751, F5066/283/10.

⑥ 萨本仁 潘兴明：《20世纪的中英关系》，第275页。

⑦ 张建魁、路琰、许陈静：《蒋介石日记破解历史谜案》，《齐鲁晚报》，2009年6月1日，《今日济南》，C21版；亦参见 <http://paper.dzwww.com/qlwb/data/20090601/786935343334/pdf/qc2101.pdf>。

指令，痛愤不已。”<sup>①</sup>

英国占领香港的行动非常迅速。事实上 1945 年 8 月 14 日，英国政府就命令东南亚盟军最高指挥官英国人蒙巴顿派舰队准备强占香港。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收复香港的行动中非常迟缓，英军抢先占领了香港，并于 9 月 1 日成立了香港军政府。而蒋介石则坚持其主张，委派英国军官代表中国到香港受降。8 月 27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余委托英军官接收香港之主张，必须贯彻，可代表余——中国战区统帅接受香港日军之投降。”<sup>②</sup> 这样双方僵持不下。

丘吉尔和蒋介石僵持到 9 月 1 日，眼看 9 月 2 日同盟国接受日军投降的日期迫近，而且英国已经事实上占领了香港。于是丘吉尔做出让步，同意蒋介石委派英国军官受降。这只不过是给蒋介石一个面子而已。蒋介石大喜，在其日记中写道：“是公义必获胜之又一证明。唯英国侮华之思想，乃为其传统之政策，如我国不能自强，今后益被侮辱矣！”<sup>③</sup> 蒋介石收复香港的目标未能实现，但得到了一点下台阶的借口，于是就禁不住乐哉斯夫！

但是应该指出，由于国民党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把主要精力放在战后内战的准备上，对英外交因而妥协。其目的无非是寻求英国支持其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而且在 1944 年底至 1945 年初，在日本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斗中，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国际威望一落千丈。因此对外不再高唱收复香港的调子，也不再提重新讨论九龙问题。国民政府只得容忍既成事实，以换取英、美在即将到来的内战中支持他们。

综上所述，英国于 1943 年与中国签订废除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的新约是迫于形势。在谈判中，英国玩弄花招，对中国施加压力，拒不归还香港与九龙。随着它在远东力量的恢复，英国背弃了战后讨论九龙问题的诺言，武力抢占香港。虽然国民政府要完全彻底地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收回九龙，以捍卫民族利益。但是，一方面由于本身的软弱，另一方面又对英国抱有幻想，所以在英国的软硬兼施之下，被迫放弃了收回九龙的要求。因此 1943 年废约谈判和新约的签订具有很大局限性。这个条约仍然具有不平等条约性质的一面，仍属于修约范围。正如毛泽东于 1943 年新约签订后评论的那样，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不能靠外国政府的恩赐，而要中国人民的斗争。<sup>④</sup>

1943 年条约虽有上述不足之处，但是它废除了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毕竟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胜利。因为它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前赴后继英勇斗争的结果，所以条约签订后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连陕甘宁边区政府也放假以示庆祝。继 1943 年英、美与中国签订新约后，西方各国相继宣布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不平等条约。因此 1943 年中英、中美之间签订的废除治外法权的

---

① 张建魁、路琰、许陈静：《蒋介石日记破解历史谜案》，《齐鲁晚报》，2009 年 6 月 1 日，《今日济南》，C21 版；亦参见 <http://paper.dzwww.com/qlwb/data/20090601/786935343334/pdf/qc2101.pdf>。

② 张建魁、路琰、许陈静：《蒋介石日记破解历史谜案》，《齐鲁晚报》，2009 年 6 月 1 日，《今日济南》，C21 版；亦参见 <http://paper.dzwww.com/qlwb/data/20090601/786935343334/pdf/qc2101.pdf>。

③ 张建魁、路琰、许陈静：《蒋介石日记破解历史谜案》，《齐鲁晚报》，2009 年 6 月 1 日，《今日济南》，C21 版；参见 <http://paper.dzwww.com/qlwb/data/20090601/786935343334/pdf/qc2101.pdf>；亦见佚名：《蒋介石五大谜案》，文章来源：《环球人物》<http://kw.luckup.net/dy wz/ShowArticle.asp?ArticleID=44693>。

④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 1969 年版，第 986 页。



条约是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蒋介石在香港和九龙问题上与英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例如他曾说战后武力收复香港。在《中国之命运》中，他强调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港、九。他把这一点列入了国民党党纲，因此引起英国高度重视。英国外交部详细审阅和研究了有关报告及《中国之命运》一书。<sup>①</sup> 蒋介石还提出了有关香港法律地位的两个概念：“主权”和“拥有”。他认为当时英国只拥有香港，但主权属于中国。<sup>②</sup> 因此当麦克阿瑟将军宣布英军前往香港受降时，蒋介石才会立即提出抗议，说香港属于中国战区。他是盟军中国战区最高司令长官，理应由他指派军队去受降。虽然他的抗议毫无结果，但是毕竟他坚持了香港是中国领土的基本原则，为后来中国收回香港消除了许多麻烦。在这些方面，对蒋介石是应该给以肯定的。<sup>③</sup>

1943 年中英废除治外法权条约的签订暂时缓和了中英关系。蒋介石发表讲话认为这个条约是中国人民斗争的结果，也是英、美对人类自由、平等的贡献。蒋介石为此给丘吉尔去信表达了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对英国签订这个条约的感谢。丘吉尔回电说：“我们将永远记住条约签订的这一时刻。这个条约为中英关系翻开了新的篇章。”<sup>④</sup>

英国《泰晤士报》热情地评论说在华治外法权的结束，标志着“炮舰政策”的结束。英国外交部认识到 1943 年条约的签订是中英关系的转折点，从此双方关系将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薛穆也说国际关系进入新的一页。<sup>⑤</sup>

《泰晤士报》认为：“中国目前已经准备好了为胜利所承担的作用，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所起到的作用……在建立和维持东亚即将到来的新秩序中所起到的作用。一个辉煌的未来正在向中国走来。”<sup>⑥</sup> 在《泰晤士报》看来，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应该取得与其他国家一样平等的权力，在国际社会中以平等的一员，起到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应该所起的作用，所以废除不合时宜的旧条约就成为势在必得的。

中英新约签署后，英国报界认为这会对中国民心 and 士气起到极大的鼓舞作用。1 月 13 日的《泰晤士报》社论中指出：“战胜敌人当务之急，以中国艰苦卓绝的抗战，取得英、美明确承认恢复主权，其抗战精神将更为强大。”<sup>⑦</sup> 英国报界普遍认为中英新约有示范的作用，会带动其他国家以中英新约和中美新约为标准，与中国订立新约，放弃在华特权，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每日电讯报》的社论称：“英勇而不可征服之爱国心，乃为一个国家伟大之表征，则中国人民确已赢得此项荣誉，中英中美新约之积极系为记录一项也已完成之事实，即中国于联合国中，属于完全平等地位。在现状之下，治外法权之继续存在，虽仅属名义而无实际，但足以

---

① FO371/35824, F4382/138/G, From Foreign Office to Horace, 21 September 1944

② FO371/35824, F1830/1505/10, 及 F1657/1505/10.

③ FO371/75839.

④ The Times, 13 January 1943, FO371/35680, F244/1/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11 January 1942.

⑤ 张伟林省：《中华民国简史》，台北：1958 年版，第 152 页；The Times, 13 January 1943, FO371/35680, F244/1/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11 January 1942.

⑥ Christopher Thorne, *Allies of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8, p. 196.

⑦ Christopher Thorne, *Allies of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8, p. 196.

妨碍联合国之精神。”<sup>①</sup>《泰晤士报》社评中说通过废约，“联合国在远东的主要目标是尽快建立一个独立有权威的中国，什么都不能阻挡联合国这种合作并取得胜利的结果。”<sup>②</sup>英国报界还高度评价这一事件是中英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泰晤士报》社论中指出：“此间……所作之决定，应受双重之欢迎。盖不待胜利之日即已承认中国之国格，此次所缔新约，结束旧时代开创新纪元。”在中英两国关系中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sup>③</sup>

英国报界对中英废约谈判中和新约签订后，英国对归还香港所顽固坚持的强硬的帝国主义立场，大多数报纸采取了装聋作哑的态度，对香港问题极少发表自己的看法。不过也有例外，这个例外是唯一的：1943年3月11日的《观察家报》上发表了一篇女记者伊瑞恩·沃德（Irene Ward）的文章，呼吁英国政府应该将香港归还中国。<sup>④</sup>

伊瑞恩·沃德的文章受到了英国其他报纸和中国新闻界的高度关注。中国中央新闻社以摘要的形式发表了她的文章，《扫荡报》在社论中，高度赞扬她在香港问题上的观点“富有远见。特别是她在香港问题上所坚持的态度，她认为英国最终要归还香港和九龙给中国。社论认为她的观点是唯一的可能会对中英相互理解和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带来新的飞跃的有价值的见解”<sup>⑤</sup>。

1943年条约签订后中英之间的关系，除了上文所说因丘吉尔讲话引起风波之外，一般没有大的曲折。双方维持半冷不热的关系。重庆国民政府对英国不归还九龙十分不满。蒋介石对此耿耿于怀，并说他在1943年有几件事尚未完成，其中之一即是未能收回九龙。而英国由于被迫放弃在华特权，对国民党政权更是不满。

国民党与英国的矛盾由来已久，不是轻易可以调和的。例如1942年底，英国议会代表团访华，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派了便衣特务化装为清洁工人监视议会代表团驻地，这就引起英国的强烈不满。英国根据其传统“分而治之”的政策，在中国国内寻找可以取代国民党的力量，试图推翻蒋介石政府，英国与重庆国民政府的矛盾加剧。

---

① 《英报评论新约，盛赞总裁必胜信念》，《扫荡报》，1943-1-14（2）。

② Christopher Thorne, *Allies of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8, p. 193.

③ 《英报评论新约，盛赞总裁必胜信念》，《扫荡报》，1943-1-14（2）。

④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7, Far Eastern Affairs, pp. 274-275.

⑤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7, Far Eastern Affairs, pp. 274-275.

## 第五章 战时英国对重庆

### 国民政府的政策

#### 第一节 英国与重庆国民政府

##### 一、充满矛盾的英国政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政策是矛盾的。一方面，英国接受重庆国民政府是中国合法政府的事实，肯定国民党抗日对英国的积极意义，因此支持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日战争；但另一方面，英国仇恨重庆国民政府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态度，恐惧蒋介石扩大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因此英国反对美国在战后让中国成为世界“四大警察”之一的建议；同时，英国对国民党的专制和腐败不满。因此，英国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援助，是半心半意的，并不断批评重庆国民政府，揭露重庆国民政府的黑暗面。

英国的这种政策，导致双方关系不断恶化。蒋介石因为英国给予重庆国民政府的援助比较少，加上英国在战时还推行殖民主义政策，所以他对英国相当不满，蒋介石与丘吉尔的关系不断恶化。而英国对蒋介石也极其不满，觉得蒋介石顽固，难于合作，希望寻找一个能代替蒋介石的人物，从而改善英国与重庆国民政府的关系。

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国民党，曾经是一个革命的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国民党在对外关系上，奉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在北伐战争中，全国人民高呼“打倒列强”的口号。在北伐中，中国收回了汉口、九江等地的租界。英国对这些事态的发展，充满忧虑和仇恨。但是由于大英国帝国的衰落，所以无力干预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由于美国承认并支持南京国民政府。因此英国也被迫承认了南京国民政府。但是从一开始，英国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就不融洽，双方充满矛盾与斗争。

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开始蜕变。到蒋介石担任国民党领导人时，国民党的革命性已经丧失。迄今为止所能搜集到的资料证明，从1942年至1946年，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进行独裁统治。蒋介石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镇压国内民主力量。对外则执行亲美政策。国民党党员垄断了政治、经济、军事及各种部门的各种职务，他们把维护国民党一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有利于英国在欧洲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战争，因此，肯定了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日立场。但是同时英国也担心国民党在日本引诱下，与日本妥协，退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如果发生那样的事情，对在欧洲作战的英国来说，就非常不利。英国根本无力在亚洲战场与日本周旋，因此英国尽管对重庆国民政府非常不满，但是也只好在表面上敷衍重庆国民政府。这样英国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

1941年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已经丧失锐气，基本上是与日军对峙。而日军忙于太平洋战争，希望招降国民政府。因此日本在军事上也未曾对国民党军队发起重大进攻。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944年夏。由于人民与国民党统治集团之间有很大裂隙，人民贫困，不满情绪日增，反抗国民党压迫的斗争日益激烈。但是重庆国民政府自从“珍珠港事变”后已经认识到由于英、美的参战，日本的失败只是个时间问题，所以重庆国民政府也不会对日投降。这从抗日战争开始以来国民党一直没有公开对日宣战，直至英、美对日宣战后，重庆国民政府才对日宣战这一稀奇古怪的现象看出来。

重庆党政府处处保存实力避免对日作战，以便战后从事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同时国民党对英国、美国进行讹诈，以对日妥协相威胁，索取更多的援助。而中国的抗日，对整个远东大局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至关重要。因此尽管英国不满蒋介石政府的所作所为，但希望国民政府

能继续抗战，这样在对蒋介石政府的关系中做了一些让步。例如 1943 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考虑之一，就是激励蒋介石继续抗战。

但是英国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却日益加深。而重庆国民政府由于投靠了美国，对日渐衰落的大英帝国抱着轻视态度，因此双方的关系充满矛盾斗争。

英国政府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在远东战场，非常消极，执行着“欧洲第一”的战略方针，没有制定一次对日作战的计划。后来，英国虽然发动了缅甸战役，但那是在美国的压力和中国强烈要求下进行的，所以英国抗日不力。英国在远东抗日消极的原因，主要是自日军袭击珍珠港后，英国已经不担心太平洋战争的胜负，因为美国的参战使日本的失败已成定局。丘吉尔在“珍珠港事变”后就说他松了一口气。但是英国在欧洲对付德国，已经感到吃力，在远东战场，就需要中国坚持抗日。为了维持远东大局，英国希望国民党政权能抗战。但是由于蒋介石政府抗日不力，而且为了得到英、美的援助而经常威胁要与日本妥协，所以英国对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威胁感到头痛。

整个英国对国民党的政策，是既批评又奉承。丘吉尔对蒋介石又是轻视又是嘲骂，但却又不得不在一些公开场合对蒋介石阿谀奉承。英国驻华大使薛穆一方面批评重庆国民政府在政治上是独裁和不民主的，另一方面又不断歌颂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日功绩。1943 年 8 月他向英国外交部汇报了重庆国民政府的不民主，并以国民党的新闻检查为例加以说明。他说国民党政权对新闻检查的程度十分厉害，不仅删改、禁登文章，还对作者进行迫害。他说：“新闻检查制度是国民党限制人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一个方面。这种制度是由秘密警察来配合执行的。”<sup>①</sup>薛穆还就这一问题作了广泛的调查。与他交谈的许多中国人以及许多外国人都担心，如果目前国民党的这一倾向发展下去，可能会在战后成为法西斯主义。但是另一方面，在公开场合，薛穆却经常夸奖国民政府的抗日贡献。<sup>②</sup>

英国政府对薛穆的报告感到满意。为了了解国民党政府的动向，英国外交部要求在薛穆在每月的汇报中，要加强对国民党政策的汇报。薛穆这样做了。在他的月度报告中，薛穆对国民政府的批评不断升级。当时由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以及美国的压力，国民党开展了所谓的“民主运动”。薛穆给予了这种“民主”以尖锐的批评。1943 年 9 月 6 日至 13 日，国民党中央举行了第五次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会上国民党高唱战后将在中国实行宪政，从而给人民民主权利的调子。但是蒋介石立即对宪政加以说明：他说在实现各党派平等的同时，国民党应该继续努力实现三民主义和担负重建中国的领导责任。蒋介石强调从国民党的历史和革命任务来看，国民党应该比其他各党更负有责任。

薛穆认为上述话是坚持独裁的一段自白。他断定国民党仍然要坚持独裁。因为从蒋介石的这番话看来，国民党并不想在实行所谓“宪政”时，放弃在国家事务上的垄断和统治地位。国民党可能会允许其他各党派参加政府。但是他们顶多只能处于少数党的反对派地位，不能真正有效的参加和管理国家大事。<sup>③</sup>

对于国民党玩弄“民意”，用“参政会”来粉饰门面，薛穆给予了嘲讽。薛穆认为国民党一党专政是不会改变的。在评论 1943 年 9 月 18 日至 27 日举行的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时，薛穆认为“国民参政会”的作用只是名义上的。他于 1943 年 10 月 4 日向英国外交部的书面报告中

---

① FO371/35689, F4480/10/10, Seymour to Eden, 5 August 1943.

② FO371/35689, F4480/10/10, Seymour to Eden, 5 August 1943.

③ FO371/35779, F5184/74/10, Seymour to Eden, 21 September 1943.



给予深刻分析。他说国民党虽然召开参政会，但是却极力避免其既定政策受到会议的反对或受到会议的批评；因此国民党希望参政会接受“既成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参政会除了接受国民党的政策外，别无选择。所以薛穆讥讽参政会为“橡皮图章”，除了批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制定的政策外，根本没有其他功能。

虽然薛穆说他不清楚整个参政会的进程如何，例如在通过任何决议之前是否允许进行讨论；或者国民党的政策是否得到与会委员们的支持。但是他指出：“毫不怀疑，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是利用参政会作为最有用的喉舌来宣传自己的观点，通过自己的政策。因为国民党可以宣称它得到人民的支持。但是如果这些观点出了问题，则推给参政会，国民党可以否认或不负责任。”英国政府完全同意他的分析。<sup>①</sup>

1944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在对日作战中惨败，受到全国人民的批评。这是国民党政权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似乎准备做点样子，在政治上对人民做一点让步。于是于1944年9月又召开了国民参政会议。由于军事上的失利，蒋介石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做了一些让步，许下了一些谎言，如战后要给人民民主等。然而到10月份，蒋在闭幕上的讲话却完全相反，他闭口不谈组织民主联合政府。

薛穆评论说，蒋介石在参政会上做的一些让步，完全是外界压力所致。国民党领导人并没有洗心革面。尽管这次会议国民党在一些问题上作了让步，但是薛穆认为他对这些让步是否能实现并不乐观。他认为要预言国民参政会的作用还为时过早，但是实质上它“仍然只是一个空谈机构”<sup>②</sup>。

当然薛穆的看法纯从西方观点看问题，事实上国民党并未做什么让步。在这次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上，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废除国民党的寡头统治，彻底改变误国政策，驱逐国民政府中的失败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挽救国家危局。9月15日，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参政会上报告了四个半月来国共谈判的经过和失败的症结，正式提出了立即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提出“召集各党派、各抗日队伍、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代表，开国民会议”，组织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10月10日，周恩来又进一步阐明了召集各方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这一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但蒋介石则不予理睬，并极力压制广大人民立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

鉴于此，薛穆认为抗战以来蒋介石所享有的人民普遍的支持已经消失。但是由于薛穆的局限性，他既看不到国民党很快被推翻的命运，也不认为在中国有谁能取代蒋介石。他说尽管重庆国民政府中的民主派的处境已经得到了改善，但他们仍不足以取代蒋介石。<sup>③</sup>不过薛穆指出，蒋介石做的让步只是暂时的，一旦日军的军事压力减轻后，其反动政策就会恢复。<sup>④</sup>

对国民党本质有比较深刻认识的人是英国驻华大使馆参赞李约瑟博士。当时李约瑟担任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负责工作。他认为国民党政权已经不再考虑如何努力打赢对日战争，也不关心战后中国的工业化。国民党关心的是一党私利。因为国民党代表了几千年来统治中国的官僚绅士阶级

---

① FO371/35779, F5540/74/10, Seymour to Eden, 4 October 1943.

② FO371/41582, F4776/34/10, Seymour to Eden, 4 October 1943.

③ FO371/41667, F3308/127/10, Seymour to Eden, 28 June 1944; FO371/41615, F4609/159/10, Seymour to Eden, 6 October 1944年; FO371/41582, F4776/34/10, Seymour to Eden, 3 October 1944.

④ FO371/41582, F4776/34/10, Seymour to Eden, 3 October 1944.

的利益，还代表了后来在沿海城市出现的银行买办阶级的利益。薛穆十分同意李约瑟的这一看法，并且把这一看法向英国政府做了报告。<sup>①</sup>

薛穆认为如果中国要有根本性的进步，必须要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上有根本的变化。由于国民党只是嘴巴上讲民主，靠国民党不可能给中国带来民主。因此薛穆把希望寄托到中国民主同盟身上。他希望民盟和中国人民把争取民主的斗争从理论上转到实践上，要在全中国范围内行动起来争取民主。<sup>②</sup> 至此为止，薛穆仍然没有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并不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把民主带给中国的希望。

薛穆对蒋介石不满，但是他试图在国民党要人中去寻找可能替代蒋介石的人物。经过比较，他认为宋子文开明一些，因此主张支持宋子文。1944年12月宋子文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薛穆认为这是中国政治进步令人鼓舞的一个迹象。紧接着宋子文的地位又进一步加强，他很快取代了孔祥熙担任中央四行联合董事会副总裁。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职位，因为蒋介石本人担任该董事会的总裁。他虽然完全肯定“蒋介石总司令并不会放手让宋子文去办事，特别是在政府的行政事务上更是如此”；但是，他认为“宋子文并非一个傀儡式的人物”。他断定宋子文会想办法去取得权力，争取独立自主。他相信宋子文会逐渐站稳脚跟。因此他主张英国应该给宋子文有效的支持，使宋子文在中国的內政、外交上真正发挥作用。<sup>③</sup> 薛穆向英国政府建议说必须给宋子文所有的必要支持。如果宋子文真正有了实权，他一定会倾向于改善中英关系。

英国政府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接受了这一建议。<sup>④</sup> 1945年7月26日宋子文当选为行政院长，行政院副院长和秘书长分别由翁文灏和蒋梦麟担任。这使薛穆感到十分高兴，他直接写信给丘吉尔报告了这一消息。薛穆认为从行政院里清除了国民党内的顽固分子意义极其重大。不过他认为行政院的一切大事最终仍然是蒋介石在定调子。因此他感到遗憾。<sup>⑤</sup> 但是英国对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长所产生的希望很快消失，对国民党政权彻底失望。

1945年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国民党坚持独裁，拒绝联合政府，并动员国民党全党力量准备内战。到1946年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国民党内的右派在会上占优势。他们咆哮着要打倒政协会议，要打倒政协会议的民主团结精神，打倒政协会议中赞助民主团结方针的国民党代表。

薛穆于3月12日报告说，国民党第六次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是为了恢复国民党内的顽固分子的地位，并使国民党对全中国的统治合法化的会议。他使用了“反动派”和“顽固派”这些词汇去描写何应钦、戴季陶和其他顽固分子。他断言中国不会再有民主。由于国民党坚持“五院制”，这反映了国民党内顽固派已经胜过了民主派。

国民党内的反动派认为这是他们的胜利，民主潮流和政治改革已被他们阻住了。但是薛穆认为这届中执委的宣言和决议，只是一种天鹅临死前的哀鸣。<sup>⑥</sup> 上述分析表明，以薛穆为代表的英

---

① FO371/41616, F5920/159/10, Seymour to Eden, 22 November 1944.

② FO371/41616, F5920/159/10, Seymour to Eden, 22 November 1944.

③ FO371/46209, F449/186/10, Seymour to Eden, 2 January 1945.; FO371/46209, F1221/186/10, Seymour to Eden, 6 February 1945; FO371/46209, F1340/186/10, Seymour to Eden, 13 February 1945; FO371/46209, F1761/186/10, Seymour to Eden, 2 March 1945.

④ FO371/46211, F4375/186/10, Seymour to Churchill, 4 July 1945.

⑤ FO371/46211, F4375/186/10, Seymour to Churchill, 4 July 1945.

⑥ FO371/53670, F5406/384/10, Seymour to Bevin, 21 March.

国驻华大使馆官员们，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方针政策是不满的，他对中国的民主事业是同情的。不过同情归同情，薛穆和英国政府并没有给中国民主力量以支持。这是英国与蒋介石在蒋访印以后形成的默契，出于互不干涉彼此国内事务的一种考虑。更重要的原因是英国认为国民党不会很快垮台，因此要给国民党政权以支持。

由于英国国内对国民党政权的了解，主要通过英国驻华大使馆的报告来观察。薛穆对国民党政权的评价，对英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薛穆的工作多次得到英国外交部的肯定。

在经济上，薛穆对国民党统治区的状况十分悲观。他认为中国的财政危机和通货膨胀主要是由国民党的政策所致。国民政府不断发行纸币，使货币贬值，购买力下降，引起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他的估计是客观的、有根据的。1945 年 7 月 19 日，他向英国政府提供了一个统计数字，反映了 1945 年 4 月中国主要城市与 1937 年物价的比率。这个表格是根据自由市场的零售价索引编成，是由中国农民银行公布的：

城市	时 间	上海率（%）
	1937 年 1 月—7 月	1
昆明	1945 年 4 月—7 月	411
西安	1945 年 4 月—7 月	158
兰州	1945 年 4 月—7 月	79

续表

城市	时 间	上海率（%）
贵阳	1945 年 4 月—7 月	309
成都	1945 年 4 月—7 月	154
雅安	1945 年 4 月—7 月	160
重庆	1945 年 4 月—7 月	151

他还提供了另一个表格，反映 1944 年 4 月到 1945 年 1 月零售价的上涨率：

城市	时 间	上海率（%）
	1944 年 4 月	1
昆明	1945 年 4 月	6.1
重庆	1945 年 4 月	5.1
贵阳	1945 年 4 月	8.1
其他各地	1945 年 4 月	3.5 倍以上

由于物价上涨和沉重的苛捐杂税，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过着悲惨的生活。在 1945 年 4 月薛穆向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国四川省北部的 26 个县都发生饥荒，二千万人在饥饿的边缘。<sup>①</sup>

薛穆还注意到抓壮丁对中国农村的破坏作用。早在 1942 年 8 月他就指出中国的农业生产和经济生活已经被征兵时不时采取的抓壮丁的办法干扰了。<sup>②</sup> 这种情况发展到 1945 年就更糟了。除抓丁外，还有沉重的实物税，要向军队缴纳食物及各种苛捐杂税。<sup>③</sup> 但是薛穆认为引起中国经济恶化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的政策不好，而政治上的腐败则加剧了经济的恶化。他以 1945 年 7 月国民政府的“黄金丑闻”为例加以说明。<sup>④</sup> 此外国民政府贪污腐败十分严重。如财政部前直接税税务司长毛平方（Mao Ping—fang）被控贪污了一千万元的政府资产。

薛穆的报告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极大重视。根据薛穆的报告，英国政府认为国民党不再认真抗战，希望国民党内的民主派能取代蒋介石以便改善中英关系。英国外交部的许多官员都同意薛穆对国民党的看法。例如 1943 年 9 月 17 日，英国外交部的赫德森说国民政府所宣称的所谓“宪法”、“民主”，都是虚伪的，是做样子来欺骗英、美舆论。<sup>⑤</sup> 1945 年 9 月 12 日，英国外交部在一份政策备忘录中指出，李约瑟博士的分析是正确的：“国民党坚持维护一党专政，这个政权的

① FO371/46209, F2366/186/10, Seymour to Eden, 4 April 1945.

② FO371/31679, F6031/1689/10, Seymour to Eden, 4 August 1942.

③ FO371/46209, F2366/186/10, Seymour to Eden, 4 April 1945.

④ 事情是国民政府财政部决定提高黄金价格，但决策人之一事先把这消息透露给至亲好友。由于这一消息外露，引起了抢购黄金的风潮，加剧了已经存在的财政危机。

⑤ FO371/35689, F4480/10/10, Minutes by Hudson, 17 September.



权力基础是地主阶级。”<sup>①</sup>而英国总参谋部则怀疑如果国民党政权不改革，那么它能否再存在下去都是问题。<sup>②</sup>于是英国政府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态度，就是维持半冷半热的关系，静观中国局势的变化，再决定对华政策。这种态度，引起了重庆国民政府的不满，在许多方面都执行反对英国的政策。

## 二、蒋介石访问印度与英国的对策

重庆国民政府反对英国的政策，突出表现在支持印度和亚洲各国的独立上。从抗日的需要出发，蒋介石希望亚洲各国都能积极抗战。为了鼓舞亚洲人民的抗日，蒋介石希望英国战后给予印度独立，并允许韩国、泰国以及越南等国战后独立。蒋介石的这些主张，刺激了英国殖民主义者，起了英国的强烈不满。但在蒋介石的活动中，最让英国人头疼的，是1942年蒋介石访问印度。

印度以甘地（Mohandas Gandhi）和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为首的印度国大党（The Congress Party），不仅反对日本的侵略，而且更反对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但是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英印政府没有征求印度人民的意见，就向日本宣战。这种不尊重印度人民的做法，引起了印度人民的反对。但是甘地与尼赫鲁的做法，使蒋介石对印度抗日的前景深感忧虑。

蒋介石认为，印度抗日与否，关系到中国的抗日大局。1940年秋蒋介石在重庆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会谈时，就曾谈道：日军在东南亚势如破竹的攻势，将会对尼泊尔、不丹、锡金和西藏造成骨牌效应，并使西南中国严重暴露在敌人的威胁之下。

1942年初，印度激进民族主义分子在博斯（Subhas Chandra Bose）的领导下，公开与日军合作并对抗英国殖民统治。博斯等人当时手中曾握有一支“印度国民军（Indian National Army）”，接受日本的军事武装援助，并且在沦陷后的新加坡和仰光等地，替日本政府扮演维持当地秩序和政治宣传的积极角色。

1942年前，印度在抗日问题上不与英国合作，还有一个深层原因，即印度要求借抗日之机，摆脱英国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而英国政府则以抗战为借口，拒绝了印度人民的要求。为长久霸占印度，英印当局玩弄“分而治之”的老把戏，挑动印度教和穆斯林教世仇，以阻挠印度独立。印度的独立，将使英国失去战后在远东重建英国殖民地的基地，并会引起连锁反应。蒋介石对此看得很清楚。他从反英角度出发，同情印度人民的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

这种情况，使蒋介石非常不安。他希望鼓励印度抗日，从而巩固中国西南边境地区的安全，保证西方援助中国抗日运输线的畅通。为此，他期望美国介入，促成印度局势的转变。1942年1月初，蒋便请罗斯福总统转达丘吉尔，要确保印度及南洋西方的各殖民地积极参加抗日，而不要为日本所煽惑，甚至于发生叛乱，“否则，各殖民地最后必被敌国利用倒戈，此比军事计划更应注重也”。蒋介石多次要求宋子文提请罗斯福总统注意印度问题。<sup>③</sup>但是罗斯福对此并不在意。

1942年8月，英印矛盾激化。印度国大党人发起不合作运动，英国就逮捕甘地（Mohandas K. Gandhi）等国大党领导人。蒋介石对英印当局的做法非常不满，他说：“甘地、尼赫鲁被捕

---

<sup>①</sup> FO371/46213, F747/186/10, Memorandum by the Foreign Office, Far Eastern Department, 12 September 1945.

<sup>②</sup> FO371/46215, F10436/186/10, Memorandum by the Chiefs of Staff Committee, 10 November 1945年11月.

<sup>③</sup> 《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2日，参见王建朗：《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第113页。

入狱，英国昏庸异甚。”<sup>①</sup>蒋介石认为事态严重，于是急电罗斯福，指出印度局势如此发展，“势将成为同盟国在远东之极大挫败，而予全盘战局以极险恶之影响……而同盟国在此战争中所公认之目标，将不再为世人所重视，其揭示之主义，亦将失精神上之意义”。蒋介石主张释放甘地等人，鼓励印度人民抗战。他在电文中指出，“同盟国应不辞任何代价，将保证各种族自由、正义之诚意，以实际行动昭告于世界”。他再次希望美国出面干预英国的做法，从而改变印度局势。<sup>②</sup>

罗斯福将蒋介石的信件转给了丘吉尔，但丘吉尔断然拒绝盟国干涉英印事务。蒋介石认为美国的努力还不够。1942年10月，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访华时，蒋介石向他表示了他对美国的失望：“远东10万万人民视美国为其领导，为其黑暗中惟一之明灯”，但美国的态度很使人失望，“其最使印人失望者，其争取平等与自由之奋斗，竟未能得美国人民同情之响应”。蒋介石希望美国保证战后三年内印度获得独立，“在此三年期中，作移交政权的准备”，以避免混乱。这样，美国在印度的财产与投资亦会得到保障。<sup>③</sup>

威尔基赞同蒋介石的观点，双方相谈甚为融洽。对此，蒋介石曾有记载，他说：“彼对英国帝国主义深为嫌恶，以为其非由东方撤退，则东方各民族无法独立，甚洽余怀也。”<sup>④</sup>

不久，宋美龄赴美访问。蒋介石要求宋美龄在与罗斯福谈话时指出：“印度如果一日不能独立，则世界和平与人类平等仍不能实现，故印度在战后必须使之独立，但可有一过渡时期与办法，勿使英国失却体面，缅甸亦然。南洋各民族应明言训政年限，二十年内扶助其独立。”<sup>⑤</sup>

蒋介石不仅希望美国出面，改变印度的局势，而且自己也想方设法，希望改变印度的局势。在1942年底，重庆国民政府获得了各种机密情报，证实了由日本所扶植，由印度、西藏的亲日反英分子与周边团体所组成的“第五纵队”，已经深入中国的藏南与印北边境。这些情报认为，印度政局如果持续不稳，将致英国殖民统治的垮台。如果那样，恐将影响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治动向，而一旦拉萨方面决定改与日本合作，则中国西南大后方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其安危将受到严重威胁。因此蒋介石决心要访问印度，劝说尼赫鲁与大局为重，与英国团结抗日。同时，他要求英国许诺战后给予印度独立。

为此目的，蒋介石希望访问印度，说服印度国大党领袖，如甘地和尼赫鲁等人，参加同盟国阵营抗日，而不要为日本所分化利用。蒋介石当时不但向英国政府要求，前往甘地故乡、同时也是印度国大党大本营的瓦尔达（Wardha）访问，而且为了赢得国大党人士的好感和支持，蒋介石还要求英属印度政府不要安排他下榻印度总督豪华气派的官邸，而是安排他进驻一般的平民旅

---

① 《蒋介石日记》，1942年8月10日，参见王建朗：《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第113页。

② 《蒋介石日记》，参见王建朗：《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第113页。

③ 《蒋介石与威尔基谈话记录》（1942年10月5日），《战时外交》第一册，第760~761页，参见王建朗：《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第113页。

④ 《蒋介石日记》，1942年10月5日，参见王建朗：《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第113页。

⑤ 《蒋介石日记》，1943年10月24日，补记，参见王建朗：《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第113页。

社。他还希望印度总督欢迎他的官式排场，能够愈简单朴素愈好。<sup>①</sup>

最近学术界有研究成果表明：“对于蒋介石提出的访问印度的要求，伦敦决策高层普遍表示欢迎，认为这将有助于扭转中国人民对于英国先前亲日的负面印象，同时也可以让蒋介石有机会体验到英国对华的友好态度。”<sup>②</sup>但是丘吉尔却反对蒋介石的访印。据说，“丘吉尔本人对于蒋介石夫妇提出的诸项请求，特别是前往瓦尔达与甘地会谈，以及婉谢英印政府的住宿安排，私下却感到十分不悦；在蒋介石一行准备启程飞往印度的前夕，丘吉尔亲笔拟了一封措辞与口吻甚为突兀的信函，除了希望蒋介石一行接受英印政府的住宿安排之外，还要蒋好好思考，一旦他执意前往瓦尔达会晤甘地等国大党人士，对中英两个战时盟邦的合作关系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丘吉尔还特别提醒蒋介石，印度国大党的不合作主义对英殖民母国与战时中国所带来的麻烦和危害是相等的”<sup>③</sup>。

然而丘吉尔的这封信，被印度总督林里资哥（Lord Linlithgow）等人给扣了下来，没有转呈蒋介石。林里资哥给英国政府报告说：“这封措辞强硬的信函，如果交给了蒋介石，将会给蒋介石造成极为不良的印象。而如果不让蒋介石一行在印度会见国大党人士，将会使蒋介石产生‘被玩弄了（being tricked）’的感觉。因此，他建议改为由他本人代表首相与战时内阁，向蒋介石口头传达丘吉尔的劝告。”<sup>④</sup>

印度总督的报告，使丘吉尔十分恼火。他一方面质问林里资哥，蒋介石凭什么认为若见不到甘地，就会觉得有被英国政府所“玩弄”的感觉？他严厉斥责说：“林里资哥已在浑然不觉当中，使蒋介石成为英属印度政府与印度国大党之间争执的最后‘仲裁者’。”他认为这种做法大危险，“将是大英帝国最为不幸的事情”。<sup>⑤</sup>

虽然丘吉尔最后在信中勉强同意，不再追究印度总督与驻华大使擅作主张的责任，也不再把他的信转交让蒋介石。但他下令，英印政府必须尽一切可能，阻止蒋介石前往印度会晤甘地。他想禁止蒋介石访问印度。但是蒋介石的这次访问，经由美国空军安排，美军在印度有基地训练中国和美国军队，所以英印当局无法禁止蒋介石访问。

1942年2月4日至2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开始访问印度。在印度期间，他发表讲话，指出英国政府应当立即给印度人民自由，由印度国大党领导建立自治政府。蒋介石在德里期间，还是会见了尼赫鲁。蒋又到加尔各答与甘地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谈话。蒋介石表示了他对印度独立运动无条件的支持。甘地深受鼓舞，向蒋介石全面介绍了他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甘地表示一定要继续领导印度人民进行斗争，直到赢得最后胜利。

在蒋介石访问的最后一天，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在加尔各答电台读了一份书面讲话。在这份

---

① 林孝庭：《二战时期中英关系再探讨：以南亚问题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5（4），第39页。

② 林孝庭：《二战时期中英关系再探讨：以南亚问题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5（4），第39页。

③ 林孝庭：《二战时期中英关系再探讨：以南亚问题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5（4），第40页。

④ 林孝庭：《二战时期中英关系再探讨：以南亚问题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5（4），第40~41页。

⑤ 林孝庭：《二战时期中英关系再探讨：以南亚问题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5（4），第39页。

讲话稿中，蒋介石向全印人民表达了他对印度人民渴望自由的同情，并向印度人民提出两点建议：首先，英国应尽快给予印度人民“真正的政治权力”；其次，印度人民在争取自由的同时要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用蒋介石的话说是“印度人民争取自由之努力，不应与彼等正全心全意参加之世界范围内反对‘侵略战线’之斗争相冲突”。他的讲话，在印度引起了强烈反响。

蒋介石支持印度反对英国的斗争并不以此为限。他返回中国后，立即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信，向罗斯福建议，要美国向英国施加压力。他提出由美、中两国来担保印度的独立。开始，罗斯福对此建议十分感兴趣。但是当罗斯福向丘吉尔提出这一问题时，却遭到了丘吉尔激烈的反对。面对顽固的丘吉尔，罗斯福放弃了这一想法。<sup>①</sup>

访印归来，蒋介石非常失望，他批评英国当局说：“惟英人则顽固不化，非到黄河心不死，殊为可叹，此事非联合中美两国共同对英劝告，使其速下决心不可也。”蒋介石认为：“英印关系破裂乃为大局与我东亚最不幸之事，英国政策顽拙，宁为敌占而不愿归还印民，其用心不正，惟有自害自受而已。”<sup>②</sup>英印当局对蒋介石的访问更是十分恼火，作为对蒋介石访印的回答，以及为了向全世界表明英国坚持维护在印度的统治地位的決心，英印政府再次逮捕了甘地和尼赫鲁。这种做法引起了重庆国民政府的抗议，英国政府又不得不向重庆国民政府解释，以求得到重庆国民政府的谅解。这件工作，主要有薛穆来完成。

从3月份到7月份，英国新任驻华大使薛穆受英国政府之命，向中国政府解释英国在印度问题上的立场。8月之后，又是为英国逮捕印度国大领袖辩护。根据英国政府的指示，他说逮捕国大领袖是完全合理的，非常必要的。因为甘地的不合作运动，是导致印度抗日崩溃的一个阴谋。他诡辩说，把甘地和尼赫鲁逮捕，完全是为了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而决非只保护英国在印度的利益。他说如果日前的英印政府突然倒台，势必导致全印之混乱并影响抗日。

薛穆还企图证明，逮捕甘地和尼赫鲁等国大党领袖，是得到印度人民支持的。他强调说，逮捕甘地等人，是得到印度参事会全体成员完全同意的。当然这种解释并不能令蒋介石满意。因为该委员会的成员中有7个印度人。但只有4个英国人。蒋介石根本不同意薛穆的上述解释，他认为这是强词夺理。蒋介石认为，试想怎能希望参事会这样一个英印政府机构，做出反对英印政府的决定呢？蒋介石不仅提出了怀疑，还进一步指出，即使英国给予印度独立后在印度引起混乱，那也绝不意味着印度就会向日本投降。印度人民绝不会“前门驱虎”而“后门引狼入室”。蒋介石强调，印度人民绝无在赶走英帝国主义之后，又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理。因此，他认为薛穆的说法毫无道理。

蒋介石指出英国逮捕国大党领袖的动机，完全旨在保护英国在印度的利益。蒋介石申明，他在印度问题上的立场，绝对不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而是从原则立场出发，从同情印度人民渴望自由的理想出发。

但是英国继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而蒋介石出于各种考虑，也尽量避免与英国发生正面冲突。在一次与薛穆的会谈中，蒋介石委婉地说，希望在同情印度人民要求独立这一点上，英国与中国一样，双打不要发生分歧。但是薛穆却说：“同民会议之领袖已在有意无意之间为日本工具矣。”蒋介石立即驳斥：“余不信彼等旨受敌人之利用。即以尼赫鲁为例，本绝无使彼动摇之可

---

<sup>①</sup> Llewellyn Woodward,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IV, (London, 1975), p. 491.

<sup>②</sup> 《蒋介石日记》，1942年2月26日；1942年3月，本月反省录；参见王建朗：《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第113页。



能。”薛穆再讲一步说：“此言固确，然国民会议领袖发动之罢工等风潮，扰乱治安，并阻碍政府之种种业务，倘不制止，必造成不堪设想之后果。”而蒋介石则曰：“目前现象实为拘禁国民会议领袖后自然之反响。我人如仔细分析印度人民之心理，则就目前为止，此项运动尚为纯粹之民族运动，绝未受日本之影响。”但是薛穆仍然坚持说：“本人亦无指此项运动受日本影响之意，惟国民会议之措施，却有助于日本。”薛穆费尽心机竭力为英国拒绝给印度独立而辩护。

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旨在争取民族独立，而太平洋战争虽然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并不排斥印度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太平洋战争的反侵略性质，必将促进亚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在他们的斗争下，无论是日本、美国、英国、法国，还是荷兰在亚洲的殖民统治，都将被推翻。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已被战后的历史证明。薛穆从英同殖民主义者的立场出发，当然听不进这些话，他千方百计为逮捕甘地和尼赫鲁等国大党领袖辩护。他说国大党领导的罢工破坏了生产，因而也就破坏了抗日，所以必须逮捕。

由于英国坚持不给印度独立，也不承诺战后给印度独立，并以逮捕国大党领导人来镇压国大党运动。因此中英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取得一致的看法。蒋介石于是再次提请美国人调解。他说：“余意惟有美国出面调解之一途。美国迄今尚未公开表示其立场。倘能邀请美国出为调人，印人或不致反对。我联合国实应促成此举。”但这一想法立即遭到薛穆的反对。他说美国的卷入也即是第三者的卷入，只会使事件复杂化，因为不可能会有三方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

薛穆之所以反对美国调解，是因为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英、美既有合作又有争夺。在许多问题上美国都反对英国，特别是在殖民地问题上美国企图排斥英国，因而标榜反对英国殖民主义，以图控制和影响整个亚洲。

在薛穆反对美国干涉的情况，蒋介石又向英国政府直接提出了忠告。他向薛穆说：“盖余以为英国用妥协之精神、准予印度全部之自由与独立，余信三十年内印人必不能完全脱离英国之范围，而英国在印之势力实际仍可继续存在，盖印人欲于短时间内，使英国在印之政治、经济、工业势力全部撤离，实为绝对不可能旨之事实。故余以为，英国尽可以恢然大度之姿态换取印度人民之好感，实无迫其铤而走险掀起革命浪潮之必要，若使印度不得不用革命方式取得自由时，则英人在印之势力自然崩溃，不能继续存在。”<sup>①</sup>但薛穆认为上述话不可思议。他完全不清楚蒋介石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他觉得根本无法去改变蒋介石在印度问题上的立场。

正当英国束手无策的时候，薛穆送报英国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却使英国政府有了对付蒋介石的办法。这份备忘录是由英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布思拜所写。布思拜提到：“从法律上说，国民党并不对其邻国是否从列强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感兴趣，也不关心印度少数民族的利益。正如他们根本不尊重本国的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一样。”<sup>②</sup>

于是英国政府决定用中国共产党这张牌，去打蒋介石。应当指出，英国并不关心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只是欲以此为炮弹打击蒋介石而已。1942年8月18日，英国外交部指示薛穆，要求薛告诉蒋介石：“目前中国政府关于印度问题的行为，是明显与去年英国政府在国共斗争最为激烈

---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编，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续编：抗战时期对外关系》，第20辑第2编，《中英关系》，台北：1983年版，第476~481页；FO371/31691；F6535/2428/10，薛 Seymour to Caroe，112 1942 August；Memorandum by Booth-by，17 August 1942.

②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编，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续编：抗战时期对外关系》，第20辑第2编，《中英关系》，第476~481页；FO371/3169；F6535/2428/10；Seymour to Caroe，12 August 1942. Memorandum by Booth-by，17 August 1942.

时采取的态度相反。当时英国对国共斗争不仅没介入，也没公开评述。”丘吉尔首相也于8月26日送给重庆国民政府一封信。丘吉尔强调，不干涉盟国的内部事务，是盟国关系间最明智的准则，“英国一直尽力尊重中国政府处理内政的权利。当国共斗争最为激烈时，英国能够自我克制，对国共间的分歧不予评论”<sup>①</sup>。

蒋介石把丘吉尔给他的这封信看成一个巨大威胁。因为对蒋介石来说，他真正的敌人不是日本侵略者，也不是外国殖民主义者，而是中国共产党。他看得很清楚，日本侵略者会被盟军打败，外国殖民者迟早也得退出中国。唯独中国共产党是他实现法西斯独裁的障碍。如果西方不支持他的反共事业，蒋介石就会寝食难安。因此，为了取得英国的支持以进行他的反共事业，蒋介石立即决定在印度问题上让步。他于是抛弃了所谓的“原则”立场，向英国妥协。9月23日，蒋介石告诉薛穆，他已决心不再管印度独立与否的事情，此后也不会再说什么了。薛立即向英国外交部做了汇报，说蒋介石已把此事放下。这样，英国政府才放下心来。

此事虽以蒋介石的妥协而告结束，但蒋介石的反英态度，加深了以丘吉尔为首的一大批英国官员对蒋介石的反感和不满。这在中英关系的发展上罩上了阴影。更为重要的是英国对华政策仍然充满殖民主义色彩，因此遭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反对。这就使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英关系充满了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与斗争，居然发展到英国曾经有过刺杀蒋介石的阴谋。

### 三、英国与暗杀蒋介石的阴谋

近年来，学术界对抗战时期国民党军统档案、重庆国民政府公报（1942—1944年）部分卷宗、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研究所二战史料以及英国二战时期部分已解密军政档案等，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发现，英国为了使中国出现亲英政府，除了物色替代蒋介石的人物外，还曾制定了刺杀蒋介石的计划。<sup>②</sup>

开罗会议前，丘吉尔召集了英军参谋长伊斯梅上将、陆军情报部长卡尔格特中将等人开秘密会议，制定谋杀蒋介石的计划。会后，指定英国驻华大使馆陆军副武官查尔斯上校全权负责、相机行事。不过，为了万无一失，并预防计划不成而产生恶劣影响，这个计划对英国外交部和英国驻华大使薛穆都严加保密。<sup>③</sup>

查尔斯立即组成特别行动小组，准备实施暗杀计划。暗杀计划，主要是制造空难，使蒋介石死于赴开罗的途中。但是国民党的保安工作做得很好。由于抗战时期英国与国民党政府关系不好，戴笠的军统特务不准英国、印度空军地勤人员接近蒋介石的座机，英国人不好下手。为了完

---

① FO371/31691.5797/2792/10, Form Foreign Office to Chungking, 18 August 1942; FO371/31672, F6122/54/10, Message to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from Prime Minister, 26 August 1942.

② 王炳毅：《二战盟友要痛下毒手——英美策划谋杀蒋介石内情披露》，《青年参考》2007年10月30日，亦见青年文摘电子版，[http://qnck.cyol.com/content/2007-10/30/content\\_1937849.htm](http://qnck.cyol.com/content/2007-10/30/content_1937849.htm)；参见张建魁、路琰、许陈静摘自《环球人物》杂志，见齐鲁晚报，2009年6月1日，引自；亦参见 <http://paper.dzwww.com/qlwb/data/20090601/786935343334/pdf/qc2101.pdf>。

③ 王炳毅：《二战盟友要痛下毒手——英美策划谋杀蒋介石内情披露》，《青年参考》2007年10月30日；参见张建魁、路琰、许陈静摘自《环球人物》杂志，见齐鲁晚报，2009年6月1日，引自；亦参见 <http://paper.dzwww.com/qlwb/data/20090601/786935343334/pdf/qc2101.pdf>。

成这个任务，查尔斯开始收买中国空军军官。开罗会议召开前，查尔斯从伦敦弄回三枚最新式的微型高爆炸力定时炸弹，打算在兰姆加尔机场放在蒋介石的座机里。但重庆国民政府对蒋介石的保卫措施非常严密，警卫人员警惕性也很高，还有两名有上校军衔的军统特务带领一队卫兵团团围住座机，不准任何人走进。因此，中国空军军官不能走近蒋介石的坐机。<sup>①</sup>

英国人很快注意到，美国 14 航空队很得蒋介石政府信赖，有两名美国上尉机械师还被请来协助中国机械师检修飞机。于是查尔斯等人希望美国人帮忙，从中做手脚。1944 年 2 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英国驻华使馆副武官查尔斯上校，要求美国航空部队情报处长莫瑞特上校和他的助手金斯利中尉，帮助他完成谋杀蒋介石的计划。

查尔斯向莫瑞特说明了英国谋害蒋介石的原因：“我们准备很快就下手除掉蒋介石，扶助几位比较有影响而又坚决主张抗日的国民党领导人上台实行集体领导。帮助他们改组政府，抓牢军队，清除何应钦等亲日分子，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抗日战争早日取得胜利……蒋介石早就不得人心。他对日作战三心二意，稍有机会就打算妥协，不惜出卖盟国。我们电台几次截获过重庆拍往南京日军总部的密电，呈送我们政府。要不，我们英国下不了这决心。”

当时，莫瑞特并不同意，因为中、英、美是盟国，抗日是第一要务。谋杀一个盟国首脑非同小可，莫瑞特没有华盛顿的指示是不敢对蒋介石采取任何行动的。于是他说：“我和你的看法没有分歧。但我不能不提醒你，这样干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弄不好反而会给日本人帮忙。东京电台就常挑拨我们两国与中国的关系。再说，蒋介石拥有举足轻重的力量，多数将领都听命于他。至于你提到的集体领导的设想，我看不易行得通，弄不好是混战，是很可怕的自毁大局的内乱。”由于没有莫瑞特的支持，英国刺杀蒋介石的阴谋难于得逞。<sup>②</sup>

但是使英国人万万料想不到的是，在开罗会议后，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做出了暗杀蒋介石的计划。不过罗斯福的计划不仅对英国保密，而且也对其在华官员保密。罗斯福之所以要暗杀蒋介石，其考虑与丘吉尔不同。在开罗会议后，到开罗参加会议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向罗斯福汇报工作，谈到不能与蒋介石合作的事情。罗斯福认为既然不能合作，那就干脆干掉他。<sup>③</sup>

罗斯福的表面借口是从抗战大局出发，认为暗杀蒋介石有利于抗战。但是实际上是蒋介石的许多主张与罗斯福的设想根本不同，不利于战后美国在远东的扩张。特别令罗斯福头疼的是，蒋介石并不听从美国人的指挥，动辄大骂“帝国主义”。具体的冲突，就表现在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上。<sup>④</sup>

---

① 王炳毅：《二战盟友要痛下毒手——英美策划谋杀蒋介石内情披露》，《青年参考》2007 年 10 月 30 日；参见张建魁、路琰、许陈静摘自《环球人物》杂志，见齐鲁晚报，2009 年 6 月 1 日，引自；亦参见 <http://paper.dzwww.com/qlwb/data/20090601/786935343334/pdf/qc2101.pdf>。

② 王炳毅：《二战盟友要痛下毒手——英美策划谋杀蒋介石内情披露》，《青年参考》2007 年 10 月 30 日；参见张建魁、路琰、许陈静摘自《环球人物》杂志，见齐鲁晚报，2009 年 6 月 1 日，引自；亦参见 <http://paper.dzwww.com/qlwb/data/20090601/786935343334/pdf/qc2101.pdf>。

③ 李桂权：《罗斯福曾打算干掉蒋介石》，载《历史知识》1988 年第 5 期，转自马振犊：《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第 284 页。

④ 王炳毅：《二战盟友要痛下毒手——英美策划谋杀蒋介石内情披露》，《青年参考》2007 年 10 月 30 日，亦见青年文摘电子版，[http://qnck.cyol.com/content/2007-10/30/content\\_1937849.htm](http://qnck.cyol.com/content/2007-10/30/content_1937849.htm)。

在武装八路军问题上，史迪威坚持要武装八路军抗日，这是正确的。蒋介石坚持反共的立场，反对武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抗日，是反动的。但双方矛盾的激化，并不止这一件事。在其他问题上，例如在指挥中国战区的盟军问题上，战后远东的安排上，中国的国际地位上，蒋介石与美国都有矛盾。

蒋介石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他希望战后摆脱英、美的控制，获得真正的独立，这在蒋介石日记中，都有反映。例如，在4月13日和4月30日，蒋介石先后在日记里大骂美国总统罗斯福“卖华”、“侮华”，“畏强欺弱，以我中国为牺牲品之政策，实为其一生政治难涤之污点”。而罗斯福则认为蒋介石“太固执、太自私，一点儿不顾大局”<sup>①</sup>。

在抗战中，中英、美是盟国，蒋介石需要英、美援助进行抗战。但是在抗日的战略与策略上，蒋介石与美国存在分歧。美国人还瞧不起中国，史迪威名为蒋介石的参谋长，是蒋介石的下级。但是在许多问题上并不与蒋介石商量，擅自做主。

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在缅甸战役上有充分的暴露。蒋介石面对日本的侵略，战线长，武装装备不好，感到抗战非常吃力。但是为了保卫缅甸，蒋介石抽调了其装备精良的部队，组成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美国将军史迪威身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属于蒋介石指挥。但是史迪威在缅甸发动对日军的攻势，在使用中国军队上，没有请示蒋介石。军队是蒋介石反共的本钱。史迪威擅自动用中国军队，造成中国军队的损失，这当然犯了蒋介石的大忌，就激化了双方的矛盾。蒋介石认为：“史迪威对我在缅甸军队亦掉头不顾，对余无一请示，亦无一报告，独自径避印度，此实出于人情之外。”<sup>②</sup>平心而论，蒋介石的抱怨不是没有道理的。

1943年6月28日，史迪威又拒绝将罗斯福的海军兵力表交给蒋介石。这种目无上司，不尊重蒋介石的做法，引起了蒋介石的强烈不满。因为蒋介石毕竟是中国战区司令，有权节制史迪威。因此，蒋介石对此意见极大，说：“此人无常识、无人格，实难令人想象者，阅之痛恨。余令商<sup>③</sup>前往斥责，彼方将此件随函送来，但仍未完全。史迪威之愚顽、卑陋，实世所罕见；美国有此军官……岂不怪哉！”<sup>④</sup>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造成了中国自开战以来最大的危机。

开罗会议后，史迪威带着罗斯福的绝密指令返回中国，并着手具体制定暗杀蒋介石的计划。1944年初，蒋介石宣布要到缅甸和印度，视察中国驻缅、印的远征军。史迪威感到这是天赐良机，于是制定了刺杀蒋介石的计划，称之为“蓝鲸行动”。其计划与英国此前的计划一样，是制造空难，让蒋介石机毁人亡。该计划的内容是：由美国航空队秘密破坏蒋介石的座机，当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脉时，发动机就会突然发生故障，机上所有人不得不弃机跳伞。此时，机上人员将

---

① 王炳毅：《二战盟友要痛下毒手——英美策划谋杀蒋介石内情披露》，《青年参考》2007年10月30日，亦见青年文摘电子版，[http://qnck.cyol.com/content/2007-10/30/content\\_1937849.htm](http://qnck.cyol.com/content/2007-10/30/content_1937849.htm)。

② 张建魁、路琰、许陈静：《蒋介石日记破解历史谜案》，《齐鲁晚报》，2009年6月1日，《今日济南》，C21版；亦参见<http://www.qlwb.com.cn/display.asp?id=409128>。

③ 指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

④ 张建魁、路琰、许陈静：《蒋介石日记破解历史谜案》，《齐鲁晚报》，2009年6月1日，《今日济南》，C21版；亦参见<http://www.qlwb.com.cn/display.asp?id=409128>。



会发现，机舱内所有的降落伞都已坏掉。这样就可以不漏痕迹地除掉蒋介石。<sup>①</sup>

尽管有人想谋杀蒋介石，但国民党特务机关并不是饭桶，他们为保卫蒋介石，也采取了严密的措施。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对英、美刺杀蒋介石的计划，有所觉察，并向蒋介石作过报告。据记载，1944年2月下旬，戴笠曾向蒋介石报告说：“委座，卑职想说件事。眼下，查尔斯经常与重庆的盟军使团几名军官联系碰头，又指挥他手下情报人员四处活动。前几天，据内线耳目报告：查尔斯特为邀约14航空队的情报处长莫瑞特上校到英国大使馆密谈到深夜，不知谈了些什么，迹象却很可疑……”。<sup>②</sup>

但蒋介石不相信美国会暗杀他，他对戴笠说：“雨农（戴笠的字），你的神经太过敏，我就不信英国人想暗算我，除非他们失去了理智。乱猜疑是不好的。至于美国人就更不可能，史迪威虽说脾气不好，又主观、傲慢，常与我争执，闹得关系紧张，但他是个堂堂君子，不是阴谋家。你还是要多多提防中共和日本那边……”由此看来，蒋介石在个人品质上，还是有非常坦荡的一面。<sup>③</sup>

侥幸的是，由于此时日本军队发动的豫湘桂战役，已经打到贵州独山，战事非常危急。情况不允许蒋介石离开重庆。蒋介石忙于指挥战役，因而改变视察计划，不去缅甸视察了。这样“天衣无缝”的“蓝鲸行动”就没有实现。不久，罗斯福的“3个月期限”到期，刺杀蒋介石的指令自动解除了。<sup>④</sup>

关于刺杀蒋介石计划的取消，还有一种说法，即“日军在中国又发动了豫湘桂新攻势，而太平洋战局亦很快有了发展，罗斯福认为目前能‘使中国团结一致的唯一人物’还是蒋介石，故下令史迪威停止了这一阴谋”<sup>⑤</sup>。

事实表明，英国一直不满意蒋介石，并且双方矛盾的发展到了丘吉尔要下令暗杀蒋介石的地步，甚至美国也有暗杀蒋介石的计划。这充分反映了英国、美国与国民党关系的紧张，严格地说，在抗日战争中暗杀蒋介石，不仅将会破坏中国的抗战，而且将反映出英、美不顾国际关系准则：在与中国合作抗日的过程中，凌驾于中国之上，谁不听话，就暗杀谁，这是帝国主义者惯用的阴谋手段。因此，暗杀蒋介石的计划，反映了英国和美国的帝国主义对华政策。

不过，尽管英国对重庆国民政府非常不满，但是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时期，英国需要维持与重

---

① 马振犊：《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第284页；张建魁、路琰、许陈静：《蒋介石日记破解历史谜案》，《齐鲁晚报》，2009年6月1日，《今日济南》，C21版；亦参见 <http://www.qlwb.com.cn/display.asp?id=409128>。

② 王炳毅：《二战盟友要痛下毒手——英美策划谋杀蒋介石内情披露》，《青年参考》2007年10月30日，亦见青年文摘电子版，[http://qnck.cyol.com/content/2007-10/30/content\\_1937849.htm](http://qnck.cyol.com/content/2007-10/30/content_1937849.htm)。

③ 王炳毅：《二战盟友要痛下毒手——英美策划谋杀蒋介石内情披露》，《青年参考》2007年10月30日，亦见青年文摘电子版，[http://qnck.cyol.com/content/2007-10/30/content\\_1937849.htm](http://qnck.cyol.com/content/2007-10/30/content_1937849.htm)。

④ 王炳毅：《二战盟友要痛下毒手——英美策划谋杀蒋介石内情披露》，《青年参考》2007年10月30日，亦见青年文摘电子版，[http://qnck.cyol.com/content/2007-10/30/content\\_1937849.htm](http://qnck.cyol.com/content/2007-10/30/content_1937849.htm)。

⑤ 李桂权：《罗斯福曾打算干掉蒋介石》，载《历史知识》1988年第5期，转自马振犊：《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第284页。

庆国民政府半冷半热的关系。为了维持这种关系，英国就必须援助重庆国民政府，以支持其抗日。但英国政府又不愿意向重庆国民政府提供大量援助。这样，英国援助重庆国民政府抗日的问题，又成为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大问题。

## 第二节 英国政府援助重庆国民政府抗日的政策

### 一、英国援助重庆国民政府抗日政策的确立

尽管英国多数人认为国民党腐败，并且不满意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并且担心国民党军队在日本引诱下，退出战争、停止抗日，因此主张给以中国援助，以“激励中国抗日”。但在是否应该援助重庆国民政府抗日的问题上，英国政府官员一直争论不休。同在其他问题上的立场一样，英国驻华大使馆由于比较了解中国情况，感受到中华民族不甘外侮，发奋图强的精神。他们还认为为了鼓励重庆国民政府抗战，应该给予重庆国民政府援助。

英国外交部出于政治考虑，支持英国驻华大使馆的观点。但是英国总参谋部从中日军队双方的表现分析，认为援助中国也没有什么用，中国军队不断打败仗，因此不必援助中国。而丘吉尔等殖民主义者则从英国的殖民主义利益出发，反对给中国援助，以免战后中国变成远东强国，成为英国称霸远东的阻力。

为了争取英国政府援助中国，薛穆对国民党军队自1937年以来的抗日努力是给予肯定的。他认为1938年的台儿庄大捷，1939年9月长沙战役的告捷，以及1939年底至1940初国民党发动的对日军的冬季攻势，都说明国民政府是抗战的。但是他指出，从1940年开始，国民党对日作战就不断失败，到1941年后国民政府就再也没有有效地抗击日本侵略者。

薛穆指出1940年以后，国民党军队的消极抗日和中国战局的情况，并没有立即为人们所认识。国民政府之所以还能幸存下来，没有被日军打垮，主要原因是日本正忙于侵略东南亚，日本海军正在太平洋作战。这一切就使日军减弱了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进攻，一直没有发动大规模的战役。而国民党军队也无力发动进攻，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抗日战线是沉寂的。

薛穆报告说，日军为了平息在中国的战争，以腾出手来侵略别处，正用各种方式招降国民政府，企图瓦解国民党的斗争。因此日军大肆吹嘘自己的优势，以恐吓国民党。而国民党营垒已经开始分裂。汪精卫集团于1938年12月投敌叛国，1941年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通过了《促使重庆屈服的工作方案》，决定“运用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利用作战的成果，乘机促使重庆国民政府屈服”。

薛穆的报告，不是空穴来风。由于太平洋战争初期英、美在太平洋战场的暂时失利，蒋介石大失所望，觉得英、美这个靠山不一定可靠。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诱降下，蒋介石有对日妥协投降的可能。中国共产党曾多次向全国人民指出这种情况，要人民警惕日、蒋、汪合流。但是蒋介石对日妥协活动的真正目的，不是投降，而是要威胁英、美，希望从英、美得到更多的援助，加强自己的力量。例如1942年1月，国民党发言人对美国记者发表谈话称：“中国对日作战牺牲重大，如再不援助，中国便单独媾和。”

国民党发言人在1942年1月的讲话，对西方是一种战略讹诈：如果英、美不给予蒋介石援助，特别是不给他向英、美所要的贷款，他就要投降日本。<sup>①</sup>蒋介石的讹诈政策取得了成效，西方各国也十分担忧这个问题。因为蒋介石如果投降日本，将对西方的利益产生直接的危险。于是英、美分别宣布给予重庆国民政府五千万英镑和五亿美元的贷款。

---

<sup>①</sup> Gabriel Kolko, *The Politics of War: Allied Diplomacy and the World Crisis of 1943-1945*, (London, 1969), p209.

英国政府正是相信了蒋介石会投降日本，才同意给予中国贷款，以鼓励蒋介石抗战。但是英国对蒋介石的讹诈政策十分不满，不甘心痛痛快快给出这笔贷款。这就导致双方旷时持久的谈判。

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的看法却与众不同，他认为蒋介石不会投降日本。他举例加以证明：例如1942年2月当蒋介石访问印度时，重庆到处弥漫着失败主义论调。某些派别和集团到处散布谣言，扰乱人心企图向日本投降。德国从中帮助，进行调停。德国特使陶德曼甚至从印度支那半岛赶到昆明会见蒋介石，为日本充当说客。同时国民党的云南和广西省政府则向中央政府请愿，要求与日本达成和平协议。

据此，薛穆认为蒋介石不会投降。他向英国政府报告说，自从他担任驻华大使以来，特别是蒋介石从印度返回重庆后，就很少听到这些谣言和失败主义论调了。这证明蒋介石要投降的传言是无稽之谈。<sup>①</sup>这是薛穆到任以来的第一个评价国民党投降日本与否的关键性报告。但这一报告并没有打消英国政府的顾虑。英国政府并不完全赞同薛穆的看法，仍然认为蒋介石有投降日本的可能。<sup>②</sup>

1942年8月，英国总参谋部派驻华盛顿的官员接到美国军方给他们的报告。这份报告对重庆国民政府军事情况的分析，使英国总参谋部感到情况十分严重。美国军方认为，重庆的抗战努力，不论在士气上还是物质力量上都在不断减弱，国民党对日作战的努力正在缩小。美国军方在报告中指出，由于英、美军队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失败，特别在东南亚的撤退，加上没有任何给予中国援助的迹象，就大大削弱了重庆国民政府抗日的决心。美国军方估计，如果不立即增加对华援助，即使蒋介石仍然当权，重庆国民政府也会停止抗日。这些报告转到英国外交部后，引起了英国外交部极大的忧虑。<sup>③</sup>

于是英国政府希望听取薛穆的意见，要他对这个问题进行评估。最重要的问题是回答，在一年内，重庆国民政府是否还能继续有效的抗日？在这一年过去后，蒋介石在重庆国民政府中的地位是否会发生变化？英国政府要薛穆从下述几个方面来回答：

- a) 蒋介石在重庆地区以外的统治是否能保持？
- b) 哪些党派赞成对日妥协，达成和平，以便能掌权？
- c) 中国有影响的人物中赞成继续抗日的百分比是多少？赞成与日本谈判的又占多少？
- d) 重开滇缅公路，是否是使中国继续抗日的实质性问题？如果认为重开滇缅公路并不会比在仰光陷落前给中国运进更多援助物资的话，英国应该采取何种步骤，去加强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
- e) 中国的通货膨胀，是否达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这种经济状况对蒋介石的个人地位，是否会有影响？
- f) 原来忠于蒋介石的部队和指挥员，特别是在云南、广西、湖北与日军对峙的军队是否仍然忠于蒋介石？他们的士气与中国部队进入缅甸以前相比如何？”

在收到外交部信件的当天，即1942年9月5日，薛穆即送上两份内容丰富、篇幅很长的报

---

① FO371/31679, F3751/1689/10, Seymour to Eden, 2 April 1942; FO371/41582, F4256/34/10, Seymour to Eden, 5 September 1942.

② Llewellyn Woodward,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IV, London, 1975, pp. 479-482.

③ FO371/31679, F6229/1689/10, From Foreign Office to Chungking, 30 August 1942.

告，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回答。虽然他对国民党军队在对日作战中的表现很不满意，但是他得出的结论与美国军方的结论不同。他认为美国军方对中国时局的分析过于悲观。他同意下述观点，即只要陆路运输问题不解决，中国军队在装备上就仍然十分缺乏和低劣。而且由于英、美的不断失败动摇了重庆国民政府的信心，所以大量给与中国援助是极其必要的。但是如果形势在未来一年内不发生意外，驻华使馆全体人员认为，中国的抗日不会崩溃。只要日军继续保持目前侵华的规模，而盟军在中东和印度不遭受重大失败，以及中国的农业收成能保证食品粮食的供应，那么国民政府就不可能停止抗日。<sup>①</sup>

政治上，薛穆认为蒋介石在重庆的地位是稳固的，在重庆以外地区蒋介石的地位正在改善。尽管云南省地方政府一直与重庆离心离德，但是中央政府的控制正在加强。薛穆的结论是：“除非国民党抛弃了抗日政策，否则蒋介石个人对日本的抵抗倾向和他的地位都是不会被动摇的。”他清楚地表明蒋介石地位的稳固与否取决于他是否抛弃抗日的政策。所以蒋介石会消极抗战，甚至暗地与日本勾结，但是名义上蒋介石会坚持抗日。薛穆认为在中国没有什么重要的党派赞成妥协投降。虽然人们经常提到一些主张妥协的人的名字，但这些人的看法并不为人们重视和采纳。总之，妥协投降派只限于进行地下活动，因此也不可能对有影响的赞成妥协投降的人作出占多少百分比的估计。由于在当时情况下主张妥协的人非常之少，所以更无法做出估计。

但是薛穆指出，虽然中国政府不会投降日本，但是也不会积极抗日。无论英、美给予中国多少援助，除非日军在中国境外受到重挫，从而削弱了在华兵力，中国军队是不会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国民党军队只有在相信自己不会遭受重大损失时，才可能对日军发动大规模的战斗。他估计说，针对日本目前规模的进攻，中国军队会继续目前微弱的抵抗。但是如果英、美给予中国空军支持，那么国民政府的抵抗会变得更为有力。<sup>②</sup>

在送走上述报告后，为慎重起见，薛穆又与美国驻华大使会谈，向后者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经过仔细的讨论之后，当天下午6点55分，薛穆又向英国外交部作了补充汇报，他强调了中国大使的意见。美国大使说中国对日本的抵抗比过去要微弱得多，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军队的指挥员们不愿消耗已经不多的军火。据此，薛穆强调说，为了使国民政府继续抗战，英、美必须向他们提供足够的物质援助。虽然中国政府需要援助的程度被夸大了，而且他们的要求过份了，但是必须给他们提供援助。<sup>③</sup>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尽管薛穆对国民党抗战的表现深为不满，但是希望国民政府继续抗战，因此主张援助中国。同时他对国民政府抗日的评价和估计，也是基本上合乎事实的。他对国民政府的估价并不高，但是他并没有贬低重庆国民政府在抗日中的作用和贡献。在汇报中国的情况时，他还是比较公正的和实事求是的。他特别强调了蒋介石的作用，认为在中国的抗战中，蒋介石的领导作用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看法虽然略为片面，即未能看到如果蒋介石不抗战，自有别人领导抗战，例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会坚持抗战直至取得最后胜利；但是在当时情况下，推翻蒋介石的统治，就意味着中国的混乱。各种势力的斗争，就会表面化，那就根本

---

① FO371/31679, F6316/3487/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11: am, 5 September 1942.

② FO371/31679, F6316/3487/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11: am, 5 September 1942.

③ FO371/31679, F6316/3487/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6: 55pm, 5 September.



不可能指望中国会在抗日上有多大作为。

薛穆的这句话确有一定道理。如果蒋介石对日投降，重庆国民政府就会停止抵抗，而且会使国民党分裂。所以蒋介石能领导国民党抗日，总是一件好事。蒋介石的政策是消极抗日，但一直没有投降。直到1944年9月，日本仍然在招降蒋介石。日本电台宣称日本侵华，不是反对重庆国民政府，重庆不是日本的敌人，日本政府早已放弃以重庆为敌的政策。虽然日本不得已要打败重庆国民政府的军队，但日本愿向中国人民伸出友谊之手，愿与中国人民一起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从而摆脱英、美的奴役和束缚。<sup>①</sup>但是这种宣传并没有起作用。1944年底，日军对国民党发动了大规模的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在日本进攻和打击下，节节败退，一溃千里。尽管如此，国民党还是没有投降。这件事本身，就雄辩地说明，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动摇。

但是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给中国的抗日战争带来巨大的损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例如在1944年4月至12月初，国民党军队丧失了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的一部分，丢掉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使六千多万人民陷于日寇铁蹄之下。在这次大溃败中，中国人民生命财产所受的损失更是无法统计。但是对国民党军队在中国抗日战争作出的贡献，也不应抹杀。按毛泽东同志的估计，从1941年至1943年，国民党抗击了不到40%的侵华日军和不到10%的伪军。<sup>②</sup>国民党抗击了“40%”的侵华日军和“10%”的伪军，这本身也是抗日。所以薛穆对蒋介石的估计基本是合乎事实的。

由于薛穆的报告，使英国政府对重庆国民政府抗日的情况有了较深入的研究。1942年6月丘吉尔写道：“如果中国停止抗战，我们将面临巨大困难。因此，目前我们面对的最大问题是防止蒋介石停止抗日的危险。”<sup>③</sup>外长艾登于8月通报中国情况时向内阁阁员们说：“重庆国民政府抗日，主要是靠蒋介石的领导和他对人民的成功的鼓舞。”他对蒋介石如何鼓舞人民做了解释。他说，蒋介石对人民的鼓舞，主要取决于他从英、美收到援助的多少。这就需要英、美“不断密切关心和支持中国的抗战”<sup>④</sup>。

艾登明显地受到了薛穆的影响，并企图说服其他阁成员关心和支持中国的抗战。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克拉克，在阅读了薛穆的汇报后，作出如下评论：“目前中国军队抗击了装备精良，数量庞大的日本军队。这是我们在反对日本的心理战中最有力的心理因素。中国的抗日抵制了日本对亚洲的可能的征服，而且削弱了日军在其他战区的潜在的军事力量。这还使日军不能在征服中国后，把军队调走去攻打其他国家。由于中国守住了国土，就为英、美联军在将来对日作战提供了空陆基地。同时中国的抗日严重地打击了日本国内甚嚣尘上的侵略气焰。中国顽强地反对日

---

① FO371/41582, F4256/34/10, Seymour to Eden, 5 September 1944.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44页。

③ Christopher Thorne, *Allies of A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 London, 1978, p. 192.

④ Christopher Thorne, *Allies of A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 London, 1978, p. 192.

本‘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口号。”<sup>①</sup>这样，英国援助中国抗战的政策，基本就确立起来。

## 二、英国援助重庆国民政府抗日政策的反复

尽管英国政府确立了应该援助中国的政策，但是英国政府对援助重庆政策的实施，却非常缓慢，并且经常出现反复。对此，英国有识之士非常着急。其中，薛穆主张尽可能地立即援助中国。他的这种观点，直到战争结束都没有动摇过。1942年他就向英国政府建议，对中国的援助应该毫不犹豫地进行。<sup>②</sup>到1945年，他还在说：“朝前看，我们应当在支持中国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sup>③</sup>。

但是英国政府并不接受他的意见。这主要因为，英国政府对重庆国民政府的反英倾向十分不满。由于“珍珠港事件”后最初几个月，英、美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不断失败，使英国威信一落千丈，而中国自从1937年抗战以来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虽然中国军队装备差，缺少武器弹药，但是却在台儿庄、平型关等战役中打败了日军，这就使中国威信提高。由于有了这种对比，所以英国人认为这就在中国人中创造了一种优越感。又由于中国人民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主权，使英国更加不安。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在远东，这是英国极其不愿看到的事情。薛穆本人也有这种看法。

他于1942年4月1日曾向英国外交部汇报说：“中国人还认为欧美帝国主义在亚洲横行霸道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中国将作为亚洲的主要强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对亚洲的干涉，并领导亚洲的复兴。”他说：“这种倾向是一种僵硬甚至难以忍受的对英、美、荷兰等盟国的高傲的态度，反映了中国明显的缺乏合作精神。而且中国对待盟国正在向他们提供的援助毫不感恩。”他认为中国的这种态度会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在亚洲引起许多问题。

不过薛穆仍然主张给中国援助。他很有远见地说：“但必须首先取得胜利。故目前最首要的问题，是想法使中国继续抗日。”<sup>④</sup>

在这种情况下，薛穆向英国政府建议说只要重庆国民政府在抗日这个主要问题上没有倒退的迹象，英国就不应该太计较中国人自以为比欧洲人优越的倾向。只有这样才是明智的。所以英国应该抓紧时机，集中力量去满足中国政府关于要求英国帮助修路，给予财政援助和其他援助的要求。当时英国正在和重庆国民政府讨论修筑一条从印度到中国的公路。薛穆认为这是当务之急，应当立即解决。他认为如果这条路修通了，中国就可以从西方得到援助，从而增强中国的抗日力量。

薛穆还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采取一些措施去促成增加对中国的援助。例如他主动与印度政府商量，是否可以考虑扩大已有的从印度至中国的马帮运输队的规模。这支马帮是从印度运送最急需的战争物资到中国的运输队。同时这支马队还担任中国的进出口运输任务。薛穆还建议，从伊朗到俄国再经过俄国横跨亚洲的大铁路到西伯利亚铁路，以及通过其他公路给中国运送援助物

---

① FO371/31716, F5112/5122/10, China's War Potential: Estimate, 12 June 1942; FO371/46209, F387/186/10, J. I. C (45), War Cabinet Intelligence Subcommittee, The Value of China in the War against Japan, 11 January 1945.

② FO371/31627, F6626/54/10, Seymour to Peterson, 31 August 1942

③ FO371/46209, F458/186/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17 January 1945.

④ FO371/31679, F3751/1689/10, Seymour to Eden, 1 April 1942.

资。同时，要考虑开辟经新疆至中国西北的空运路线。<sup>①</sup> 总之，薛穆强烈要求给重庆国民政府更多的实际援助。

在是否支持薛穆的建议、给予重庆国民政府援助的问题上，英国政府各部，以及外交部内意见不一。例如在外交部内，中国处处长布雷南在 1943 年 11 月 3 日的一份绝密备忘录中反对无条件给中国援助。他污蔑中国人是剥削别国的最善于讨价还价的人。“如果我们越不给他们援助，他们就会要求更迫切。结果他们就越不尊重我们。”他的结论是：“所以目前最重要的是不能无条件给中国援助。”<sup>②</sup>

但是布雷南的顶头上司远东司司长克拉克，却赞同薛穆的观点，主张给重庆国民政府援助。他说：“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无论中国是消极抗日还是积极抗日，由于他们的抵抗，牵制了日军，就援助了西方。所以西方国家欠中国太多。”他强调英国必须继续执行支持中国抗日的政策。<sup>③</sup>

但是英国对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军事战略价值，并不重视。这就影响了英国对中国的援助政策。美国政府在 1944 年以前把中国看成对日作战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因此援助重庆国民政府，在战略要点修了许多飞机场，准备在打击日本本土时使用。然而英国从来没有以中国为基地打击日本本土的计划。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即使在缅甸、英国，也没有制定过打击日本的计划。英国认为在击败德国后，日军一定会被英、美联军击败。

丘吉尔本人在援助中国抗日问题上，把英国的态度概括为一句话：“我们不愿意仅仅是为了安抚中国人而做蠢事。”<sup>④</sup> 丘吉尔的动机带有强烈的帝国主义感情，他反对中国的强大，轻视中国人。他还对美国同情中国强烈不满。他不断讥笑“中国自认为会在战后起主导作用”的说法。他认为美国宣布中国与英国、美国、苏联一样是平等的世界强国的原则是不正确的，他拒绝发表中国是四强之一的宣言。实质上，如果英国援助中国，中国的军事力量就会强大，这是丘吉尔所不愿意的。<sup>⑤</sup>

但是由于薛穆强烈希望援助中国，他的建议具有很大说服力，外交部不得不考虑，并把不同观点进行比较，加以平衡。英国外交部完全同意薛穆对中国局势的分析，即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会停止。因此，1943 年 7 月，他们在总结英国对华基本政策时说：“为了尽可能快地打败日本，使中国继续抗战是最为关键的事。”<sup>⑥</sup> 英国政府虽然这样说了，但是一直没有积极给中国援助，更没有真正把援助中国当成一种需要认真贯彻的政策，正所谓“口惠而实不至”。

### 三、英国援助重庆国民政府抗日政策的结束

到 1944 年 7 月后，日军大举进攻平汉线。由于日本军队装备精良，而国民党军队装备较差，所以尽管中国军队英勇战斗，但是仍然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重庆国民政

---

① FO371/31679, F3751/1689/10, Seymour to Eden, 1 April 1942.

② FO371/31627, F7756/54/10, Policy Towards China, 3 November 1942.

③ FO371/31627, F7756/54/10, Minutes by Clarke, 16 November 1942

④ Christopher Thorne, *Allies of A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 London, 1978, P. 304.

⑤ Llewellyn Woodward,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IV.*, London, 1975, p. 522.

⑥ Christopher Thorne, *Allies of A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 London, 1978, p. 306.

府告急。只是在这时，英国政府才把援助中国的问题真正提上了日程。但是经过英国政府各部门的认真研究，英国政府决定还是不能给予重庆国民政府大规模的援助。

日本军部在1944年初完成了“*Ichigo*”（“第一计划”）的计划。这一战役第一阶段的目的是打通从河北到武汉的交通线。第二阶段是占领从湖南至越南的广大地区，从而将中国与越南的交通线连接起来。为此，日军集中了40万军队，进行豫湘桂战役。<sup>①</sup>1944年4月18日日军开始进攻，4月22日郑州陷落。5月25日，洛阳被日军占领。到11月底，日军节节胜利，毫无困难地从长沙打倒衡阳，然后到桂林。日军摧毁了为进攻日本本土而在中国修建的供美军使用的飞机场。国民党自己的纪录，是国民党军队伤亡达31万人。这是自1941年以来中国遭受的最重大损失。

1944年12月，中国军事情况进一步恶化，日军进入贵州，准备进攻贵阳。第一周，日军取得明显进展，12月2日占领独山，贵阳危在旦夕。如果占领贵阳，就可能截断昆明至重庆的运输线，沉重打击重庆国民政府。但是日军到了独山就撤退了。其原因是日军打通从湖南、广西、越南交通线的主要目标已经达到。而继续在贵州山区作战，日军困难重重，也感到无此必要。因此日军停止进攻，改为继续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招降活动。

英国政府密切注视着这次危机。日军的进攻开始后，丘吉尔驻重庆的私人代表怀亚特将军，于1944年5月29日向丘吉尔报告了上述情况。他说中国参谋总长何应钦认为情况非常严重，要求怀亚特将军和英国在华部队指挥官尼尔逊上校，立即把这一事实报告英国最高指挥机关。何应钦要求美国增加空军支持。而蒋介石甚至说如果日军的计划完全实现，中国将被迫停止抗战。那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就会无限延长。根据上述情况，怀亚特将军认为，除非给中国军队强有力的空军支持，否则国民党军队将会遭受更为严重的失败，引起最为严重的后果。<sup>②</sup>

但是丘吉尔和外长艾登却很怀疑怀亚特将军这份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艾登认为，形势并不如此严重。这是丘吉尔和艾登一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蒋介石的一言一行所致。艾登于1944年6月1日给怀亚特回电，电文称：“我们这里没有人认为日军的进攻，会像你所说的那样可怕。”<sup>③</sup>但是艾登做事谨慎，并愿通过外交部系统去查明真相。于是他致电薛穆，要求薛查实汇报。艾登特别要薛穆谈谈对怀亚特将军电报内容的看法。他说：“请谈谈您的看法，特别是谈谈这些汇报，是否是中国人向我们施加压力，以索取更多援助的一个手段？”<sup>④</sup>

1944年6月2日，薛穆回电答复了上述问题。他说中国的形势的确是万分危急，中国政府和军队的处境比任何时候都惨，蒋介石和何应钦的警告是真实的。因为当日军开始这次战役时，蒋介石及中国军队是过分自信的，他们自认完全可以打败日军。现在如果不是蒋介石确信真正有危险，他是不会如此快地改变腔调的。薛穆说中国官方预料长沙不久就会陷落。日军的目标是打通和占领整个平—汉—广铁路，并且使美军完全中立。因此蒋介石对怀亚特将军的讲话是非常直

---

<sup>①</sup> His-Sheng Ch'I, *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 Michigan, 1982, p. 74.

<sup>②</sup> *The Private Papers of Sir Anthony Eden*, Vol. 7., F109, FE/44/68; *Wuart Tele For P. M.*, No. 16. A-muse, 19 May 1944; and *Wuart Tele* No. 17, 31 May 1944

<sup>③</sup> *The Private Papers of Sir Anthony Eden*, Vol. 7., F113, FE/44/71, *Eden to Wuart*, 1 June 1944.

<sup>④</sup> *The Private Papers of Sir Anthony Eden*, Vol. 7., F116, FE44/73, *Eden to Seymour*, 1 June 1944.



率的，直截了当的。蒋介石要求空军支援，这是唯一可以改变军事失败的办法。

薛穆向艾登强调说，蒋介石不是利用形势向盟国施加压力以要求更多援助，恰恰相反，如果不向西方要求援助，就无法改变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命运。薛穆的看法，使英国政府真正了解情况。丘吉尔和艾登都同意了薛穆的看法。<sup>①</sup>然而在援助问题上，仍然没有进展。

英国外交部对日军的进攻感到十分忧虑。新任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贝纳特，于1944年10月21日写信给薛穆，提出了两个使英国政府深为不安的问题：第一，是如果日本的这次进攻切断了蒋介石与国外的联系，日本是否还会向昆明或重庆直接发动进攻？第二，是国民党政府政治上很脆弱，是否能生存下去？<sup>②</sup>11月26日，英国政府再次要薛穆估计如果贵阳陷落，会引起什么样的政治后果。外交部的看法是：“如果没有任何有效的抵抗、如果贵阳陷落，那么就会导致重庆国民政府的完全崩溃，整个中国的抗日就会停止。”英国外交部问薛穆，是否有迹象表明国民政府准备迁离重庆。<sup>③</sup>

薛穆回答说，只要日本认真想打，在中国，他们想打到哪儿就可以打到哪儿。如果日军占领贵阳，这当然是对重庆国民政府已经下降的声望的一个更大打击。但是并不会导致国民党政权的立即垮台。不过，此后中国军队就再也不会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了。只有他们确定在付出极大代价后能取得某种胜利时，才可能对日作战。目前已经没有时间去重振中国军队的士气，也不可能指望有强有力的领导产生。所以除非美国立即提供大量援助，否则就会再现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国不断败北的局面。

不过薛穆断言，即便贵阳陷落，国民党也不会投降，国民政府也不会离开重庆。<sup>④</sup>英国其他部门的一些情报和信息也证实了薛穆的看法。例如1945年1月11日，英国战时内阁下属的联合情报委员会，提供了一份关于对中国在豫湘桂战役中抵抗日本的价值研究报告。该文件认为尽管这次战役中国国民党遭到了惨败，但是重庆国民政府仍然不会垮台，中国仍将坚持抗日。这对整个战争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如果重庆国民政府垮台，日本除了直接占领中国领土之外，还会得到下列好处：

“1）日本会宣称这是日本的一个重大胜利，从而增强日本国内的士气和提高他们在东南亚的威信。

2）日本会利用这一机会，不仅在东南亚而且在全世界打击盟国的威信。日本会宣传说盟国未能保护被称为世界四强之一的中国。

3）中国失去了一个能有效组织人民抗战的中央政府，这就使盟国在帮助中国人民时产生巨大的困难。”<sup>⑤</sup>

上述报告说明，他们不愿看到重庆国民政府在日军打击下垮台，而且认为重庆国民政府的继续抗战对西方有重大价值。但是英国政府经过反复考虑，仍然决定不给重庆国民政府以援助。

1945年1月，英国政府曾经考虑过，是否应该与美国配合给中国提供援助。1月2日英国外

---

① The Private Papers of Sir Anthony Eden, Vol. 7., F116, FE/44/73, Seymour to Eden, 2 June 1944.

② FO371/41582, F4857/1929/1, Bennett to Seymour, 21 October 1944

③ FO371/41582, Tele. No. 866 From Foreign Office to Chungking, 26 November 1944.

④ FO371/41582, F5559/1929/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28 November 1944.

⑤ FO371/46209, F387/186/10, F. I. C (45) 10 (0) (Final), The Value of China in the War Against Japan, Memorandum by the Joint Intelligence Subcommittee, 11 January 1945.

交部的布鲁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由于中国政府的军队在日军进攻面前一败涂地，布鲁恩认为：“非常清楚，如果没有盟国的鼓励和援助，中国不可能再继续抗日。”因此布鲁恩要求给中国援助。

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贝纳特，对布鲁恩的提议基本赞同。虽然他很怀疑现在给重庆国民政府援助，对改善中国的状况有什么帮助，而且认为国民党已经到了如此衰弱的地步，是否还值得西方利用已经是一个问题。但是他极为关心中国的抗战。他说如果中国的抗日战争停止，对英国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必须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只要中国继续抗战，就可以最大限度地牵制日军，构成对日军的威胁。他还从战后远东局势进行分析。重庆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将有助于战后远东局势的稳定。

他还认为，考虑到战后英、美在远东可能出现的争夺，英国需要在改善同国民政府的关系上做一点工作。因为美国出于反日的战略考虑，承担着对中国最大的援助。而且一直遵循卡萨拉比亚会议的内容在援助中国。因此，如果英国仍然袖手旁观，不予中国援助，那战后英国无法与美国在远东竞争。所以贝纳特指出，如果让美国独家援助中国，那对战后英国在华利益将是十分危险的。他同意布鲁恩的建议，指出：“我们应尽一切可能援助中国，而且要立即与美国联系讨论共同援华的问题。”<sup>①</sup>

因此，英国外交部立即着手讨论援助中国的细节。当贝纳特征求布雷南的意见时，布雷南说在通知美国政府前，为慎重起见，必须先征求薛穆的看法。布雷南完全同意贝纳特的看法，并且补充说：“虽然战时内阁远东委员会并没有提出什么方案，但是该委员会的成员都希望英、美在中国问题上进行合作。”<sup>②</sup>因此贝纳特给薛穆发出了一封著名电报，这封名为“第二十五号”的电报，成为日后最有争议的电报。围绕这封电报，英国政府内关于是否应该援助中国的辩论达到高潮。

贝纳特于1945年1月11日给薛穆发出了这封电报。在这封电报里，他首先指出必须给重庆国民政府以援助。他认为由于目前的军事危机使中国处于非常危险之中，使中央政府的威信下降到最低点，并且情况还在不断恶化之中。这种情况迫使美国的魏德迈将军和尼尔斯逊将军，正努力去改进中国军队的装备和训练，以及改进有关战争的其他准备工作。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中国军民的士气会因此而恢复，把中国的军事潜力真正发挥出来。这样来达到保卫中国和支援盟国的目的。

而要真正恢复中国抗日的自信心，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贝纳特特别指出，在目前的军事危机过去后，国民政府可能又会故态复萌，而且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如果出现那种情况，盟国才将真正不知如何是好。那么盟国在远东就将面临惨败的前景，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就将影响到远东问题的最终解决。

因此贝纳特建议英国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与美国合作，向中国提供最大限度的援助。他还进一步说明这样做的原因：“第一，尽力避免中国抗战的崩溃是合乎盟国最大利益的。一个弱小、动乱和无组织的中国无论在战时或平时时期，都会影响远东局势的稳定。所以英国应该尽最大努力，去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第二，如果英国在援华问题上仍然无所作为，那不可能不对英国在中国和亚洲的威信和将来的地位，产生不利影响。第三，如果到战争结束时，美国仍然垄断中国事务，那不仅会削弱英国的地位，并将损害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贝纳特认为由于英国财

---

① FO371/46202, F136/136/10, Minutes by Bennett, 6 January 1945.

② FO371/46202, F136/136/10, Minutes by Bennett, 6 January 1945.

力有限，所以对华援助的规模不会大。但是必须让人们清楚地看到英国对中国的关心和给予中国的物质援助。至于军援物资，认为可以从印度拨给。

此外，英国应该帮助改善和发展通往中国的空中运输路线和陆路交通线。他指示英国驻华大使馆说：“如果您们都同意这封电报的内容的话，请提出补充看法及有益的建议。我将提议驻华盛顿大使，根据这封电报的内容与美国政府接触。”他强调要薛穆发表看法提出具体建议，以便能够使他更好地说明问题，使英国更好地与美国合作。这封电报代表了外交部的正式意见。<sup>①</sup>

1月17日，薛穆做了回答。他从总体上同意“第二十五号”电报对中国局势的分析。但是对一些问题，他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在以后的几个月内，中国得到援助、士气恢复之后，除非日军重新大举进攻，否则不可能很快故态复萌又回到老样子去。薛穆为了使英国政府坚定援助中国的决心，对中国人的评价很高。他说美国人发现中国人善于接纳、学习和与美国人合作。不仅在军事上如此，而且在生产军火方面更是这样。当然中国人有这样多优点，并不等于他们就能对打赢目前这场现代化战争做出贡献。但是如果给他们援助，中国军队的情况肯定会大大改善。

薛穆指出中国公众的自信心正在恢复，而且情况越来越好。在中国的外国观察家们总的看法是，哪怕只有一小点援助，都将提高中国人民的士气。因此薛穆的结论是必须援助中国。他说：“从将来着想，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去援助中国。”<sup>②</sup>援助中国是薛穆的一贯立场。由于他的支持，英国外交部就正式向英内阁提出紧急援助中国的计划。

但是这一计划因遭到了英国军队总参谋部的反对而告吹。

英国总参谋部认为外交部对中国形势的估计不正确。他们非常怀疑对华援助是否会产生效果。他们认为援助中国，就会损害英国在其他战场的利益。英总参谋部认为，不仅英国不应该援助中国，甚至美国政府都不应该援助中国。这样援助的结果，只能使中国成为一个潜在的军事大国，而在目前的战争中中国又只能做出有限的贡献。在他们看来国民党政权的倒台，将不会对远东的抗日战争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

英国总参谋部指出：“对中国的援助可能会对中国政府的威信和重振人民士气，有一定作用。但其他作用是否会奏效令人怀疑。从军事上看，中国军队并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中国积弱时间太久，局势不稳，一盘散沙，毫无组织。因此我们只有给他们极大规模的援助才可能产生效果。然而即使中国强大起来，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的价值，从总体上看，与我们援助他们的规模是不相称的。”所以英国总参谋部认为，英国外交部发给薛穆的1月11日的“第二十五号”电报中说对华援助有好处的结论是不正确的。对华援助在实际上，对英国并没有什么好处。<sup>③</sup>总之英总参谋部力图证明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不大。从英国的战略和利益考虑，完全不应该给中国援助。

英国外交部不同意英国总参谋部的意见。但是为了避免在英国政府内部发生进一步争论，英国外交部做了让步。首先撤销了1月11日的“第二十五号”电报。接着，通知薛穆关于援助中国的问题暂时作罢，今后再说。因为外交部要进一步与英总参谋部及其他各部讨论。但是外交部警告总参谋部，要他们看到低估长期政治后果的危险性。英国外交部重申自己的观点，即英国战后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和统一的中国。而重庆国民政府垮台的后果是迟缓和失去实现这一目标

---

① FO371/46202, F136/136/10, From Foreign Office to Chungking, 11 January 1945.

② FO371/46209, F458/186/10, Seymour to Foreign Office, 17 January 1945.

③ FO371/46209, F439/186/10, L. C. Hollis to Bennett, 17 January 1945.

的所有机会。<sup>①</sup>

很明显英国总参谋部不愿援助重庆国民政府，完全是从自私自利的帝国主义立场出发，不愿战后在东方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在英总参谋部的眼里，重庆国民政府就代表中国。他们根本看不到，甚至有意不提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他们连想也没有想到战后中国共产党可以取代国民党，成为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力量。而英国外交部在考虑援助重庆国民政府时，也根本不提援助陕甘宁边区政府。

因为当时国共斗争十分激烈，中国人民要求立即取消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蒋介石却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贝纳特曾就英国对中国内部事务可能进行的干涉，进行过研究。他既主张保持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支持国民党政权，又主张在延安设立领事馆，搞两面派外交。这与贝纳特在给英国总参谋部的电文中所说的“英国战后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和统一的中国”是矛盾的。因此他主张的援助中国，就是挽救国民党政权，给这风雨飘摇的政权打强心针。在这个问题上，薛穆主张不干涉国共斗争。英国如果援助中国，那完全是为了帮助中国抗日和加强英国在中国的地位。总之，最后的结果是，英国未能在抗日战争中给重庆国民政府积极有效的物质援助。

---

<sup>①</sup> FO371/46209, F439/186/10, Bennett to Hollis, 1 February 1945.



## 第六章 战时英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 第一节 英国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变化

#### 一、从传统到现实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经历了从传统向现实的转变。英国非常仇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英国对中国共产党一直持敌视态度。虽然英国对国民党政权也不满，双方存在矛盾并时有摩擦，但英国一直支持国民党政权。从反共的意识形态出发，英国当局对英国国内封锁有关中共的消息，致使英国公众在 1937 年前对中国共产党一无所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由于英国政府对中共夺取政权的潜在力量估计不足，因而不但不注意研究和了解中国共产党，也不想与红色政权建立任何联系。

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情况有了很大改变。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和边区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丘吉尔及英国外相艾登，开始对中国共产党刮目相看。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从敌视转为友好。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国开始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初步接触。英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开始从传统走向现实。英国政策的这一转变，是由两个因素所决定的：

第一是英国与国民党关系的恶化，以及对国民政府的失望。英国不喜欢国民党政权，因此把眼光转向共产党。更重要的是英国需要中国坚持抗战，拖住日本兵力。因为英国的战略优先考虑是在欧洲，因此不愿、也抽不出兵力支援远东战场。但是国民党政权在抗日战争中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丧师失地，随时有投降日本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领导人民进行卓有成效的、艰苦抗战的中国共产党身上。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灵活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一切可争取的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这就不仅使英国朝野有识之士同情中国的抗日战争，也为双方的接触提供了可能性。到 1944 年底，英国对国民党政权越来越失望，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引起了英国的不满。而国民党进一步投靠美国，也加剧了英蒋矛盾。这一切都为英国改善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铺平了道路。

西方人丹乔（D'Anjou）和魏尔曼（Whlmann）、布朗基、威廉·邦得、林·迈可等人，在改善英国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布朗基、威廉·邦得、林·迈可等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北京逃到晋察冀边区，后到延安。在晋察冀边区，威廉·邦得、林·迈可等人受到边区领导人的无微不至的关怀，目睹了边区人民抗日与生活的情况，感到了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的救星。他们到了重庆后，向英国驻华大使馆报道了延安和边区政府在领导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的伟大成绩；报道了延安和边区人民在生活、生产中取得的伟大成绩，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建设中的政策、策略和伟大的成就。而李约瑟作为英国文化委员会驻中国的代表，到延安等地进行了调查研究，也把其调查结果报告了英国驻英国大使馆。他们的报道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极大兴趣，促使英国政府去研究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同时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制定和正确执行了国际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对英国驻华大使馆做了许多工作。这不仅使英国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的了解，也使英国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改善成为可能。这一时期，是英国与中国共产党外交关系的起源，是中英关系史上极其重要的时期。

英国长期奉行扶蒋反共政策。因为英国认为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中国人民反英运动，是由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 1941 年底。虽然克拉克·卡尔于 1937 年任英国驻华大使后，偶尔向英国政府汇报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和国共斗争的情况，但是他具有很深的反共倾向，根本不主张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向英国政府大量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是1942年2月至1946年7月担任英国驻华大使的薛穆爵士。他在向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做了许多赞扬中国共产党的结论；同时提出了英国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应该考虑中国共产党问题的建议。1942年12月29日，他向英国外交部送交了首份关于报道陕甘宁边区的报告。

这份报告是荷兰人布朗基所写。布朗基原是北京电力公司总工程师，在日军侵占北京前夕逃到解放区，然后回重庆。在解放区，他亲自目睹了八路军英勇战斗、打击日寇的战斗场面。因此他认为尽管八路军缺乏武器弹药和后勤物资，但是士气高昂，沉重打击了日军。八路军是一支对日军构成巨大威胁的强大的军事力量，日军必须倾全力来对付。

据他观察，中国共产党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办事，边区政府主要致力于提高人民的生活。例如把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如果农民需要，还向他们发放1%的低息贷款。布朗基还谈了他会见毛泽东的印象。他认为毛泽东的政策是正确的，他十分佩服毛泽东的坚强有力的领导能力。他还发现中国共产党全党上下都一致拥护毛泽东的领导。这时薛穆对中国共产党还不了解。读了这份报告后，他认为布朗基所报告的内容，大部分是中国共产党设计出来摆橱窗、做样子以取悦于外国来访者的。但是薛穆向英国外交部强调说这份报告提供了共产党控制区的社会和组织及政治情况的有价值的情报。<sup>①</sup>

这份报告引起了英国外交部的高度重视。英国外交部开始系统搜集和分析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情报。1943年6月，英国外交部把一份由两个法国人写的关于他们在解放区访问的报告转发给薛穆，要他发表意见。这两位法国人叫丹乔（D'Anjou）和魏尔曼（Whlmann），他们两人在陕甘宁边区居住过两年。他们的看法与布朗基相同，但是更为具体。薛穆读了这份报告后，立即写信给英外长艾登。他认为该报告真实地反映了边区的情况。从这份报告中他得出结论说延安政权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

薛穆说在延安，根本看不见旧中国所常见的腐败、投机、妓女、乞丐和抽鸦片等现象。在解放区和八路军所控制的地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这与国民党统治地区的人民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薛穆认为这些报告证明占解放区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享受着社会福利和经济安全。这在国民党统治区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然后他开始谈对八路军的看法。他认为八路军有严格的纪律，因此受到人民爱戴。农民信赖他们。这也与国统区不一样。在那些地区，农民怕国民党士兵像怕土匪一样。

在谈到土地改革问题时，薛穆认为所有到过边区的外国人都认为边区政府只征合理有限的税，合理分配和使用农业资源，并发行稳定的货币，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政策是成功的。不过薛穆不了解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党，他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执行上述政策解释为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政治上要能存在下去，就必须依赖于农民的友情和合作，所以才对农民友好。

由于薛穆看问题的立场纯粹是西方立场，所以他在分析共产党比国民党的政策要优越时的评论就从主观想象出发。不过他的结论是正确的，他说：“今天在国统区也是这样，国民党政治军事的存在对农民友情和合作的依赖也并不亚于共产党对农民的依赖。因为国统区也与外界隔绝，完全依赖自给自足。”但是国民党却不关心农民的福利，所以薛穆说：“毫无疑问，共产党的土地政策，无论在带给人民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福利上都远远优于国民党。”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薛穆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所作的宣言，即中国共产党已经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在此基

---

<sup>①</sup> FO371/35777, F644/74/10, Seymour to Eden, 29 December 1942.

基础上，他预言：“延安政府将是未来取代国民政府的唯一政府。”<sup>①</sup>

这是一个非常有影响而又有远见的看法。薛穆的观点引起了外交部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在英国外交部内就中国共产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布莱克勃爵士赞成薛穆的观点，他认为：“薛穆报告中的最后一段关于中共将取代国民党政权的见解非常正确。”斯科特先生虽然对中国共产党的成就无话可说，但他挑唆说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是令人吃惊的唯物主义，而且在薛穆的报告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向人民灌输仇恨。斯科特不满地说：“这种手法多么丑陋。”

但是并不是人人都同意他的看法。在英国外交部内最为欣赏中国共产党的人首推乔治·扬。他在1943年5月就根据所能搜集到的资料写了一份有很高价值的文件。这份文件说：“我们不可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人远比国民党人要先进，正如孙逸仙博士领导的革命党比满洲政府先进一样。他们有国民党所缺乏的一种有生命力的哲学和意识形态。如果国民党继续镇压共产党（看来仍然会这样），那么在打败日本后，非常可能发生的第一件事情（也可能提前发生），是新的‘共产党’为代表的‘新中国人’与国民党人之间的内战；即使俄国不支持中国共产党，我个人的看法是少年中国一定会建立一支革命军队。这支革命军队一定会像法国大革命初期的革命军队那样取得震撼世界的胜利。”<sup>②</sup>

到1943年8月30日，乔治·扬再次高度赞扬薛穆的报告。他对中国共产党高度评价，而不同意斯科特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他说：“斯科特先生对在所谓共产党地区用僵死的唯物主义，去描述中国历史的倾向，和灌输对日本人的仇恨的做法感到不满，认为是‘丑陋的’。从有形的白厅的象牙塔顶，或从北京精神的高层，去选择和反对上述的并非中国文化的特征，不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现代中国就要诞生了。我们必须喜欢它或者容忍它。即使我们不喜欢它我们也要学会怎样去容忍她。”这一看法，不仅正确，而且也惊人地正确反映了日后英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另一官员布莱克勃，强调薛穆的观点是相当公正的。即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容易得到人民的支持，而国民党却做不到。对此乔治·扬补充说：“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相信无论他们在伦理上或精神上有何缺点，也无论他们的处境好坏，他们将掌握中国的命运。”他认为这份报告极其重要，应该复印发到政府各部门。<sup>③</sup>

英国外交部的其他官员，虽然不像乔治·扬那样对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充满热情，但他们都很重视这份报告包含的内容。例如从不隐瞒不喜欢中国共产党观点的赫德森宣称，无论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不能算是民主的党，但他却认为这份报告价值太大了。<sup>④</sup>总之以收到薛穆的这份报告为标志，英国外交部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已经从敌视转变为同情。从1943年7月开始用一种新眼光来看待中国共产党人。

除了薛穆继续向英国外交部汇报类似的情况外，其他人也向英国政府做了有关报告。例如英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台克曼于1943年9月报告了他从重庆到新疆途中的所见所闻。台克曼说最近经过中国共产党控制区域的外国人毫无例外地一致赞扬他们在这些地区看到的東西。从其他不同

---

① WO208/318, F3895/254/10, Seymour to Eden, 13 July 1943.

② FO371, F2341/254/10, F894/10/10; Christopher Thorne, *Allies of A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 London, 1978, p. 321.

③ WO208/318, F3895/254/10, Minutes by Young and Blackburn, 30 August 1943.

④ WO208/318, F3895/254/10, Minutes by Hudson, 30 August 1943.

来源的消息也证实了西安流传着的大家都熟悉的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言论。<sup>①</sup>

威廉·邦得和林·迈可写的报告及外国五人记者团访问延安的报导，进一步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邦得和林迈可原来都是燕京大学物理学教授，在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的当天从北京逃往解放区。他们首先经过晋察冀边区，受到聂荣臻将军的热情接待。他们对聂荣臻将军的风度、流利的法语都留下了深刻印象；然后他们到了延安。邦得在延安工作了两年，而林·迈可则在延安工作了近四年之久。他们担任延安电台的无线电首席技术顾问。林迈可在1940年曾经担任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官员，所以他们的报告更受到英国政府的重视。

他们的最新报告证实了所有外国观察家们对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好评。薛穆在读了邦得的报告后说：“邦得同意人们的普遍看法，即中国共产党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成功。特别是在动员农民参加八路军，减租减息，廉政建设，信仰自由，普及教育及建设民主政府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功。正如其他人一样，邦得也强调正是这种政策使共产党领袖们赢得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拥护。人们不能不对这些人的观察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对中共政府的报道都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长期居住中国的、相当有观察能力的人。”

薛穆还指出他很有兴趣地注意到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的确有抗日统一战线的存在。当八路军从晋察冀边区赶走日本人之后，他们重建了原来由日本人支持的国民党组织。但是这些国民党组织与重庆没有任何联系。所以薛穆说邦得在报告中用了“各党派”一词去描述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是精确的，并且正如邦得不止一次所指出的那样，中共统一战线的解散将造成日本侵略者入侵。但是毫无怀疑重庆国民政府正在破坏中共的统一战线。因此薛穆总结说由于中共真正实现了他们的政策，这就使所有观察家看到了他们真正合作抗日的精神，这就与人们在重庆所看到的一切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sup>②</sup>

林·迈可的报告偏重于对边区政府的“三三制”的描述，以及对边区经济结构的报道。在林迈可看来，中国共产党所采用的“三三制”是一种民主政府。他对“三三制”的描述如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保证可以在任何选举中当选全部名额的三分之一的足量候选人。如果选举后共产党超过三分之一，多余的共产党人就自行辞职。其余三分之二由非党人士和国民党的代表组成。这样来组成由共产党支配的三三制政府。”林·迈可接着报告了延安政府的经济结构及在经济上取得的成果。

这些报告与所有外国观察家们的看法大同小异。但是在报告中国共产党战后经济重建计划时，林迈可补充说：“我与朱德进行了谈话，并与成仿吾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谈话和讨论。朱德将军关于战后重建的计划是由政府控制公共事业，重要的工业部门以及私营和合作企业。”朱德是八路军总司令及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人之一。朱德说战后的首要任务是大力改善交通运输、通讯事业，发展农业和采矿业。这样中国就能在一个时期内出口农产品和原料以交换外国的设备和重工业产品。他强调战后中国的重建以发展交通运输和轻工业为先。<sup>③</sup>

薛穆以其特有的敏锐眼光看到了这份报告的价值。他向英国外交部推荐说：“这份报告提供了关于延安政府各方面过去我们所不知道的详情。例如税收的方法以及三三制的运行。”<sup>④</sup>薛穆也同意林迈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计划反映了他们奋斗目标的想法。但他不同意林迈可对中共

---

① WO208/318, F4959/11/10, Seymour to Eden, 6 September 1943.

② FO317/41612, F1546/159/10, Seymour to Eden, 6 March 1944.

③ FO371/41612, F499/35/10, Lindsay to Seymour, 25 November 1944.

④ FO371/46164, F499/35/10, Seymour to Bennett, 9 January 1945.



产党战后经济重建计划的评论。他说中国共产党战后的经济计划听起来动听，但如果要执行，恐怕就会觉得过于模糊了。<sup>①</sup>

但是外交部的赫德森却认为林迈可的报告是合理的、准确的。尽管赫德森觉得林迈可把国民党描述得太过于黑暗，而把共产党涂上了过多的玫瑰色彩，但是在中国将来的任何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都将处于优势。如果他们得到俄国的帮助，那么情况就更会如此。<sup>②</sup> 其他人虽然认为林迈可的报告过于夸张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就，但是他们指不出到底哪儿不实。例如斯科特说：“林迈可是在给中国共产党大吹大擂。不过他的报告也确实有使人感兴趣的东西。”<sup>③</sup>

1944 年底，外国五人记者代表团访问了延安，做了大量有关延安和解放区的报道。这立即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注意。薛穆和英国外长艾登都对此极为重视。在这些记者中，有一位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冈瑟·斯坦因，他在边区住了几个月，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搜集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他以兴奋的心情“完全地直率地”以“很长篇幅”向英国驻华大使馆汇报了他的发现。<sup>④</sup>

薛穆相当重视这份报告。为了强调斯坦因报告的分量，薛穆指出斯坦因的报告，已为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和美国国防部新闻署中国处处长麦克雷肯·费希尔等人的报告证实。上述两人也在延安做了调查访问。因此他们的报告是从实践中来的。薛穆强调上述三位记者都是可靠的、老资格的中国问题专家，因此应该重视他们的观点。<sup>⑤</sup>

首先，关于他们三位对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取得的成就的报道，薛穆认为都是肯定的。他说：“他们有充分理由去证明中共取得的成就，他们没有进行一丁点不利于中共的报道。在对比中共控制区与国统区时，没有一例说明延安比重庆差。他们发现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运转都很正常。在士气上，在人民与领袖，军队和人民之间有一种精神。根据上述三位记者的看法，这在国民党统治区是看不到的。”<sup>⑥</sup>

其次，薛穆强大，上述三位记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看起来都穿得好，吃得饱，他们的精神面貌看起来比在国民党统治区所见的人要好。斯坦因在他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控制的区域有一千六百万人被组织到人民自卫队中，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受到游击战训练。

薛穆在分析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时说：“看到中国共产党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变化和重大意义的同时，我认为他们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处理好了经济问题。”<sup>⑦</sup> 他认为边区政府消灭了剥削压迫和裙带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最巨大的成就。延安政府的低税收政策之所以成功，是生产发展的结果。据斯坦因等三人观察，边区的大多数地区工农业生产增加了 50% 左右。正因为增产，才有可能减税，使农民能得到农业收成的绝大部分，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不仅生产者，而且消费者都被组织起来。这样去改进生产和消费的情况。薛穆也向英国外交部介绍了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极好印象。

他认为在陕甘宁边区的领导人具有惊人的、强有力的个人品格。他预言现在不知名的正在受

---

① FO371/46164, F499/35/10, Seymour to Bennett, 9 January 1945.

② FO371/46165, F4519/159/10, Minutes by Henderson, 6 October 1945.

③ FO371/46615, F4519/159/10, Minutes by Soctt, 5 October 1944.

④ FO371/41615, F5126/159/10, Seymour to Bennett, 9 January 1945.

⑤ FO371/41615, F5126/159/10, Seymour to Bennett, 9 January 1945.

⑥ FO371/41615, F5126/159/10, Seymour to Bennett, 17 October 1945.

⑦ FO371/41615, F5126/159/10, Seymour to Bennett, 17 October 1945.

培养训练的年轻人在将来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他这一预言是很有远见的。当时在延安的青年们后来一直是中国革命的中坚，许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同时薛穆的观察是细致入微的。他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正变得不那么非常讲究意识形态的纯洁。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宣称有九十万党员，而90%是长征以后入党的。由于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中农，因此中国共产党变得“更不无产阶级化和知识化”<sup>①</sup>。他认为这将越来越变得严重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大问题，因而中国共产党要不停地采取措施来克服这个问题。薛穆的这些看法，都非常到位。

薛穆对斯坦因的报告十分欣赏。他特别强调了斯坦因的下述看法：“重庆的反动派和日本人污蔑中国共产党人为‘共匪’。我却认为他们是有崇高理想的有能力的强人。他们已经超出于狭隘的党派理论，得到了比英伦三岛大四倍的地区所有社会阶层的人们的热情合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给我的印象特好。他是一个我从未遇见过的最伟大的中国人。他是可以与世界三强英、美、苏领导人媲美的伟人。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则是人民军队第一流的领袖。值得注意的是外国人都很熟悉蒋介石，但是对他却没什么好评。难怪美国将军史迪威要称他为‘渺小的人’。”<sup>②</sup>

为了全面反映边区的情况，薛穆也报告了陕甘宁边区的教育情况。他认为所有的人的报告，从布朗基直到斯坦因，他们的报告并没有涉及这一问题或不全面。因此他特别注重李约瑟博士的报告。当时李约瑟是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在报告边区的教育上做出了成绩。李约瑟亲自拍摄了边区的教育的一些相片，并对边区教育做了深刻的观察。例如在他拍摄的相片中有位于延安的露天大学的学生在学习几何、生物、植物学及机械学时进行观察与做实验的情况。

李约瑟认为延安的大学在政治上当然不同于中国其他地方的大学，陕甘宁边区的整个教育系统是以延安大学为中心的。李约瑟认为延大是逐步发展起来的。由于当时形势的需要，教育和训练的课程都是短期的、浅显的。但是延安的教育发展很快，特别是在扫盲、提高学术水平上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延安的学校尽管缺乏必要的设备，但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教学工作都受到很大的重视。他的上述看法使薛穆对边区的教育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

英国政府对上述报告的态度是认真的。首先尽可能要进行核实，例如在接到邦得的报告后，英国驻华大使馆指定专人与邦得会面，讨论邦得报告的细节，核实各式各样的问题。<sup>③</sup>同时英国政府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能否在全中国行得通，是怀疑的。例如薛穆在评论邦得的报告时说，邦得的报告谈的只是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因为他在那儿住过两年半。但是他的报告没有谈到其他四个由八路军控制的边区根据地。而且新四军还控制着许多游击区。那里的情况如何，不得而知。

薛穆设想道：“如果邦得有机会访问其他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他的印象恐怕就不会那么好了。而且这些被观察的地区，恰好是适宜于建立共产党政权的地区。”<sup>④</sup>薛穆在对中共作出好评时，总是十分小心地去避免被人认为有“亲共”的嫌疑。他总是预先为自己洗刷，以示他是客观地汇报。例如在报告斯坦因访问延安时说：“我不是想去评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军事上的价值及其前景。我只不过是把那些到过延安的、训练有素的观察家们向我和大使馆其他人的报告，

---

① FO371/41615, F5126/159/10, Seymour to Bennett, 17 October 1945.

② FO371/46164, F60/35/10, News Chronicle Extract, 2 January 1944.

③ FO371/41612, F1546/159/10, Seymour to Bennett, 6 March 1944.

④ FO371/41612, F1546/159/10, Seymour to Bennett, 6 March 1944.

转达给上级而已。”<sup>①</sup>

薛穆申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做法，能否适用于其他地区，仍然是个问题。他说：“尽管我对有关他们成绩的报道留下了印象，例如他们拯救被日机击落的飞行员们。这些飞行员有时会在游击区呆上好几个月。但是我认为很快做出结论，说陕甘宁边区的做法最终会推广到全中国，那是过于草率的。”<sup>②</sup>

应该指出在英国政府中，薛穆对中国共产党是极为关心的。他不失时机地向英国政府报告一切有关的信息。在必要时，他直接向丘吉尔汇报，以引起英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如1945年6月，他接到一份1945年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集。他立即感到它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这次会议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薛穆强调了毛泽东政治报告对英国政府的重大意义。他认为，毛泽东在讲话中一再强调的主题是要成立一个临时民主联合政府。这个政府由各个党和非党人士代表组成，以统一和指导抗日战争并同盟国合作以打败日本。

毛泽东还提出战后建设“新中国”。薛穆认为毛泽东的讲话极其重要，因此他立即直接向丘吉尔报告，并且强调说：“我之所以用相当长的篇幅报告毛泽东的讲话，并不是毛泽东提出了什么新内容，而是因为你关于延安政策的信息不足。鉴于战后中国可能出现的麻烦，以及美国目前正在尽力了解中共，我想你一定想知道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所说的该党的奋斗目标。”这样通过到延安的所有外国人的努力以及薛穆的重视，英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了解。而且薛穆同意斯坦因、阿特金森、费希尔等人的看法：“延安是中国的希望。”

薛穆公开表示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例如1944年10月17日，他建议英国外交部远东司新任司长贝纳特说：“如果以抗战的名义，美国武装了国民党也武装了共产党，那么在日本投降后中国的混乱中，我倾向于支持中国共产党。”<sup>③</sup>但是英国政府并不打算支持中国共产党。其主要原因是英国认为，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取代国民党，统治全中国。不过，在看到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取得的伟大成就后，英国开始研究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 二、从敌视立场到中立的转变

英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经历了从传统到现实的发展，并从对中国共产党的敌视态度过渡到了客观中立的立场。这一变化过程，可以从英国对中国共产党性质的分析中看出。

抗日战争时期，整个西方，包括在华的外国人对中国共产党是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认识不清，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一知半解。原驻华大使、1942年2月改任英国驻苏联大使的克拉克·卡尔，1944年在莫斯科引用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话，说延安政权绝对不是共产主义的政权。<sup>④</sup>斯大林力图向路经莫斯科到中国去的美国总统特使、后来担任驻华大使的赫尔利证明，中国共产党根本不是共产党。

斯大林贬低中国共产党，认为他们是一堆红皮白心的萝卜，或者是人造黄油。这反映了斯大林的阴暗心理。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不受苏联控制。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

---

① FO371/41612, F1546/159/10, Seymour to Bennett, 6 March 1944.

② FO371/41615, F5126/159/10, Seymour to Eden, 17 October 1944.

③ FO371/46168, F4123/35/10, Seymour to Bennett, 26 June 1945.

④ Christopher Thorne, *Allies of A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 London, 1978, p. 44.

斯大林会说，他从不相信这一群村夫和农民会在中国夺取政权，即取得胜利。赫尔利因此就轻视中国共产党人，并认为他们是没有希望的人。<sup>①</sup>

上述看法完全是错误的。这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又使西方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与西方共产党不同。其实布朗基及许多到过延安的人，都已引用了毛泽东的话来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毛泽东曾说，中国共产党并不打算在中国完全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还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布朗基认为，毛泽东的意思是，中国不是不要马克思主义，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的实践加以应用。

布朗基多次说，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不能立即在中国实现。早在1937年，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宣布暂缓执行共产主义的计划，停止反对国民党的一切行动。中国共产党还宣布，接受孙中山博士的三民主义，并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布朗基还认为，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修改和丢弃了过去几年来他们暴力革命的方式，例如消灭地主，没收财产，杀死资本家等。同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努力争取国外对他们的支援。<sup>②</sup>

邦得教授也作了有关报告。他的看法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起源于而且实质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只不过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采用和修改”，以适应中国的条件和需要。邦得相信中国共产党是实行自己牌号的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这种共产主义与苏联有联系，但根本不欠苏联什么，也不受苏联控制。<sup>③</sup> 斯坦因也有类似看法，他说：“中共领导人直率地说，在中国目前这样不发达的情况下，不能立即采用真正的共产主义制度，或像苏联那样的政权。中共要通过三个过渡阶段来实现国家的演进。这三个阶段是民主革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中共坚持，实践已经证明中国今天适宜于民主阶段。”<sup>④</sup>

那么英国政府是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的呢？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的看法基本接近事实，并且完全不同于斯大林、莫洛托夫、赫尔利等人。事实上英国官员们的看法精确而有远见。例如薛穆的看法就是这样。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从两方面进行分析。首先他注意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时的灵活性。他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夺取中国的政权，并把中国建设成为共产主义社会。

1943年7月13日薛穆在写给英国外长艾登的信中，引用了中国共产党在关于解散第三国际的宣言中一段话。中国共产党在宣言中，重申了中国共产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政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科学，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按照中国的具体情况，继续辩证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使抗日战争胜利和建设全中国。”<sup>⑤</sup>

根据这段宣言，薛穆进行推论：“非常清楚，中国共产党绝不会放弃马列主义，而是要根据当前与未来的具体情况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sup>⑥</sup> 在评论法国人丹乔的报告时，他进一步阐述了

---

① William P Head, *America's China Sojourn*, (USA, 1983), p. 180.

② WO208/318, F4959/11/10, Seymour to Eden, 6 September 1943; FO371/41615, F5126/159/10, Seymour to Eden, 17 October 1944.

③ FO371/41612, F1546/159/10, Seymour to Eden, 6 March 1944.

④ FO371/41615, F5126/159/10, Seymour to Eden, 17 October 1944.

⑤ WO208/318, F3895/254/10, Seymour to Eden, 13 July 1943.

⑥ WO208/318, F3895/254/10, Seymour to Eden, 13 July 1943.



上述观点。他提出在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和宣传这一事实。他强调，在有文化的人中就更重视这一点。他特别提到延安大学极其强调学习马列主义，因为未来中国共产党政府的骨干正在这里受训。而对广大群众，例如对农民和战士，中国共产党采用了另一种形势的宣传。这就是反复向他们灌输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在这里，他把 20 年代国共合作时，中国共产党采取的策略与现在的策略做了对比，并把 20 年代中共领导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进行比较。他认为灌输对阶级和国家的仇恨，是中国共产党惯用的唤起民众的典型的革命技巧，使他们团结起来推翻压迫者。这是中国人使用的武器。薛穆指出，在 20 年代，“压迫者”是西方帝国主义，英国是中国的头号敌人。而在抗日时期，压迫者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侵略。他的结论是：但是无论书面，或者口头的宣传方式，以及在一切场合用一切手段猛烈谴责敌人的做法，20 年代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做得都一样。

因此薛穆断言中国共产党仍然忠于他们原来的原则，仍然高举革命的意识形态和使用革命方法。<sup>①</sup> 薛穆强调，中国共产党已经宣布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在红旗下联合起来的各党派组成的“人间天堂”。因此他毫不怀疑，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sup>②</sup>

在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同时，薛穆也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否受苏共操纵，或与苏联境内任何组织有联系的问题，是当时西方十分关注的问题。薛穆认为中国共产党与苏联没有任何联系，延安也没有收到莫斯科的援助。这种看法为所有到过延安的观察家们所证实。因此薛穆大胆地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做了如下推论：“可以肯定地说，在目前中国共产党是自成一类的党。”<sup>③</sup> 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从正统的苏联共产主义的种子发芽成长起来的，其最终目的是实现正统的共产主义。但是在目前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没有外界援助，特别是不受外界干涉控制的坚强的党”。

薛穆根据上述分析断言：“因此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共产主义系统的哲学是舶来品，然而他们却独立地结合本地实际应用这种哲学。因此，中国共产党应属于中国内部政治生活中的反对派或造反派，而不是服从或与苏联有联系的受莫斯科指挥的党。”<sup>④</sup> 上述分析无论在观点上或使用的语言上当然都不完全正确。但是他明白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独立自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并且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运用马列主义。这一看法是正确的。考虑到他在 1945 年提出上述看法，在西方，这是一个惊人的划时代的发现。

根据薛穆的这一发现，英国政府就能制定适合英国利益的对华政策，特别是促进了英国在 1950 年 1 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程。但是薛穆在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进行讨论时，是留有余地的。他说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状况，能延续多久是另一个问题。因为苏联在新疆、蒙古的影响正在扩大，而且正在采取渗透政策积极地在朝鲜和满洲活动。因此，在不远的将来当条件成熟时，不能排除苏联会企图把延安置于他们控制之下，或双方建立联系。薛穆还说，1945 年 8 月签署的中苏条约，规定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只能给中央政府，但并不排除当苏联统治者渴望时与中国共产党签订条约的可能性。

---

① WO208/318, F3895/254/10, Seymour to Eden, 13 July 1943.

② FO371/46215, F10179/186/10, Seymour to Bennett, 11 January 1945; FO371/35801, F3895/254/10, Seymour to Eden, 13 January 1943.

③ FO371/47988, N15123/10674/38, Seymour to Bevin, 5 November 1945.

④ FO371/47988, N15123/10674/38, Seymour to Bevin, 5 November 1945.

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英国外交部对中国共产党性质的看法有两种观点。克拉克认为中国共产党关心的是“中国的农业新思想而不是世界革命”<sup>①</sup>。但是赫德森却不同意，他说：“无论如何毛泽东都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部分。但他们的目标最终，是在中国建立一个与存在于苏联一样的经济、政治制度。但是由于目前中国的落后，其间就必须有一个过渡时期。只要国民党愿让共产党共享政权，中国共产党就准备与国民党合作，直到中国共产党认为条件成熟可以推翻国民党时为止。”<sup>②</sup>

在这种情况下，薛穆的深刻的看法，就对外交部在这个问题上的辩论发生了影响。1944年5月，英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处准备了一份机密文件，题为：“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这份文件反映了薛穆和赫德森的观点，它是英国政府对国共斗争的正式看法。这份文件认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其最高目的是在中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纲领。最为明显的例证是在1937年，毛泽东为抗日统一战线所规定的策略。

毛泽东认为，在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丢掉自己的最高目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要保持独立自主。又如，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建立由所有革命阶级组成的民主政府，在第二步则是建立社会主义。所以英国外交部认为非常清楚，所谓的全国民主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低和直接的纲领。接着就会是推翻资本主义，消灭阶级，实现激进的解放，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以共产主义在中国和在世界各地一样，其最终目的是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sup>③</sup>

这份文件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但是忽略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中国具体情况这一事实，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和外交政策，因而英国政府的政策，仍然是不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某种关系。

薛穆关于中国共产党“自成一类”的提法没有受到重视。直到1949年9月，英国外长贝文才提出类似的看法，其目的是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找出依据。英国是反共国家，正在欧洲与共产主义殊死战斗，只有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是欧洲意义上的苏联式的共产党，那么英国承认新中国才会被美国等反共国家谅解。

英国政府讨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很快就转到讨论另一个相关问题，即中国共产党是否是一个民主党的问题。凡是到过延安的外国人都对中国共产党应用马列主义的灵活性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他们都报告说，他们所遇见的中国共产党人，都使用民主一词来描述陕甘宁边区政府。例如布朗基在会见毛泽东时，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认为要解决国共斗争，最民主的解决办法是实现国共联合。毛泽东告诉布朗基说：“如果中国要实现民主的话，也应该给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席之地。孙中山先生本人就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与共产党合作，并提出了作为他的民主革命纲领的著名的三大政策。”<sup>④</sup> 1

到过陕甘宁边区的外国人都认为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三民主义。以“民权”主义为例，法国人丹乔和魏尔曼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代表性很称赞。丹乔报告说：“在所有村庄实行普选，就能使人民在县、区二级选出自己的最后政府。”他认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而魏尔

---

① FO371/35838, F1893/1896/10, Minutes by Clarke, 27 April 1943.

② FO371/35838, F1893/1896/10, Minutes by Clarke, 27 April 1943.

③ FO371/41613, F2375/159/10, Far East Memorandum, 10 May 1944.

④ 1 FO371/35777, F644/74/10, Extracts, 29 December 1942.

曼强调在选举县、区政府时，农民都去参加，而且特别认真。<sup>①</sup> 荷兰人布朗基则用下面的话来描述边区的民主政府：“从1941年初开始，边区所有的政府部门都由力量相等的三方组成：中共党员三分之一，国民党员三分之一，非党人士三分之一。这个政策执行得很严格。”<sup>②</sup>

但是薛穆认为布朗基的话不准确。他说：“布朗基说在边区政府中国民党员占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是非党人士。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然后他引用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的一篇文章加以证实。这篇文章说上述情况在实践中没有严格执行，事实上在三三制政府中，国民党人只占很小一部分。因此薛穆评论说：“恐怕这样说要合适一些；即中国共产党绝不允许就这种友谊的表示，发展到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国民党的选票超过他们。这种政府实际上是委员会，其大多数成员是共产党员或服从共产党命令的人组成。”<sup>③</sup>

事实上薛穆及布朗基对三三制政策都不清楚。中国共产党的“三三制”中，有1/3是先进模范和群众代表，1/3是开明绅士。这些开明绅士当然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否则双方就没有合作基础。在开明绅士中，包括了与重庆没有勾结的左派国民党员。英国官员由于不了解这些内容，所以对“三三制”表示怀疑。后来薛穆在评论丹乔和魏尔曼的报告时，又说他希望得到更多有关普选权的资料 and 情报。因为英国政府还不清楚选举时是否秘密投票，是否农民被迫在提供给他们的被选举人名字上打勾。<sup>④</sup>

不过薛穆同意在陕甘宁边区至少在名义上人民有了选举权。<sup>⑤</sup> 虽然薛穆有上述偏见，但是他的结论却是赞扬中国共产党的。他说人民可能被允许选举自己的政府。首先是选举“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然后再由“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本地和县政府。因此建立在人民代表基础上的人民政府就在陕甘宁边区建立起来。他所说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因此他赞扬说：“公正地说，这是迄今为止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可能取得的成就。国民党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仍然只是顾问机构，无权选举地方政府。”<sup>⑥</sup> 尽管薛穆是以西方观点看问题，例如他污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政治和军事寡头”，掌握着半独裁的权力。但是他清楚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已被接受和得到人民的拥护。

尽管薛穆对中国共产党民主有所怀疑，但他却认为国民党根本没有民主。他用国民党的不民主去衡量中国共产党是否民主。1944年3月他仔细研究了威廉·邦得报告中有关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报告后向外长艾登发表了他自己的看法：“根据邦得报告中所强调的中国共产党牌记的民主，比国民党的民主要优越，把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的特点记下来是很有帮助的。这可以与国民党的民主对比。”<sup>⑦</sup>

薛穆认为国民党的“民主”是间接代表制。从保到县，有一系列的代表团，是官办的。而中国共产党的县政府是由人民选举，而直接从人民中得到权力的。但是薛穆却怀疑这种在西北人口稀少地区采用的民主制，能否在人口稠密的由国民党统治的地区使用；因为在这些地区情况极

---

① WO208/318, F3895/254/10, Seymour to Eden, 13 June 1943.

② /35777, F644/74/10, Extracts, 29 December 1942.

③ FO371/35777, F644/74/10, Seymour to Eden, 29 December 1942.

④ WO208/318, F3895/254/10, Seymour to Eden, 13 June 1943.

⑤ WO208/318, F3895/254/10, Seymour to Eden, 13 June 1943.

⑥ WO208/318, F3895/254/10, Seymour to Eden, 13 June 1943.

⑦ WO208/318, F3895/254/10, Seymour to Eden, 13 June 1943 年6月13日.

为复杂。<sup>①</sup> 薛穆并不信服这种说法即中国共产党并不通过党去控制政府，但他也不反对这种说法。他力图去解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不直接控制政府，而要通过“三三制”，这是因为根本不必由共产党在后台。薛穆说：“由于领袖们制定了政策，而且这些政策基本上得到贯彻，所以不必要中国共产党人在政协或人民代表大会中保持人数上的多数。也即中国共产党引进了这种民主制后，只需对其进行监督即可。这就与国民党独裁不同。”

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对中国共产党的“三三制”特别感兴趣。他称“三三制”为“有生命力”的新民主，“这种民主比英国的战时民主更好，更少共产主义的味道”<sup>②</sup>。薛穆对“三三制”也感兴趣，但他的评论却不同。他并不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无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以要理解他们的民主，只能通过了解中国的情况，用中国人的想法去解释。所以他说虽然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不是西方民主，但它的重大意义，在于这种民主是卓有成效地为人民拥护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区分西方民主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的；英国外交部的赫德森就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民主，他说：“中国共产党并不比国民党更多地想到民主制度是给反对党派机会的制度。”他说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他们控制了军队和组织群众协会。因此，“在延安国民党并不比共产党在重庆更有民主权利”。而且赫德森认为薛穆的话与邦得的报告有矛盾。薛穆说中国共产党得到各阶层人民的热情支持，但邦得报告说“延安科大”被解散了，主要原因是该校大部分教职工是国民党信徒。所以赫德森给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下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民主的含义，是中国共产党得到贫农的强有力支持。贫农是中国农村的群众。”<sup>③</sup>

在讨论中国共产党是否民主时，薛穆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是肯定的。但是他从未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因此，英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是敬而远之。不过，英国对中国共产党有很好的看法，在涉及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常常表现出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

## 第二节 英国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起源

### 一、英国错失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的时机

尽管英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很好，但是英国却采取了不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官方联系的政策。英国与重庆国民政府有着正式外交关系，无论国民党如何腐败无能，英国都遵循国际法，保持与国民党政府的官方往来，而不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

薛穆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做了比较。他认为国民党腐败和无能，他毫不掩饰对国民党的这种看法。在他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薛穆毫不犹豫地使用“CC系反动阵营”，“腐败”、“无能”、“反动”、“独裁”等词汇去描述国民党。<sup>④</sup> 但是他对共产党的政策及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印象则很好，在向上级的报告中，他都表达了上述想法。他的这种客观精神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使英国政府能较客观地看待中国共产党。他的态度，对战后英国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逐渐改善有着重大影响。但是薛穆并不认为英国需要与延安建立官方联系，这就延缓了英国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

---

<sup>①</sup> FO371/41612, F1546/159/10, Seymour to Eden, 27 March 1944.

<sup>②</sup> FO371/46164, F60/35/10, Gunther Sten's Article in the News Chronicle Extract), 2 January 1944; Seymour to Eden, 6 September 1943.

<sup>③</sup> FO371/41612, F1546/159/10, Minutes by Hudson, 13 April 1944.

<sup>④</sup> FO371/53670, F5406/384/10, Seymour to Bevin, 21 March 1946; FO371/35689, F4480/10/10, Seymour to Eden, 5 August 1943.



系的时间。

美国则比英国积极，希望与中国共产党早日建立联系。但是由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反共、无能，把事情弄糟了。

美国曾经想给中国共产党武器，以便更好地打击日军。因此 1944 年底美军曾派了一个军事观察组到延安。由于中国共产党执行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凡到边区的外国人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还欢迎英、美官员访问延安。因此美国派了由戴卫·巴雷特率领的“迪克西军事代表团”(Dixie Mission) 访问了延安。这个代表团包括军事、外交等人员，于 1944 年 7 月到达延安。对他们的来访，毛泽东很高兴。他对迪克西代表团的一位官员说，他欢迎美国在延安设立领事馆。<sup>①</sup> 巴雷特上校和所有迪克西代表团的成员对延安的成就大为欣赏，赞成改进双方关系。后来毛泽东和朱德都曾提出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的建议，例如 1945 年毛泽东曾打电报给罗斯福表示愿意访问华盛顿。但是罗斯福并没有答复，其原因是罗斯福赴华特使赫尔利在华活动恶化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关系。

1944 年 11 月，赫尔利以罗斯福特使的身份访问了延安，后来他担任了美国驻华大使。但赫尔利是一个两面派。赫尔利在延安时，曾大声赞扬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并说延安是中国唯一有民主的地方。他以罗斯福总统特使的身份，与中共中央达成了关于国共合作的五条协议。其内容是：国共团结，共同抗日，共同建设新中国。<sup>②</sup>

他回到重庆后，遭到蒋介石反对。蒋介石坚决不承认赫尔利与中共中央签订的五条协议。在蒋介石咆哮中，赫尔利居然怕了蒋介石。他撕毁了五条协议，公开宣布扶蒋反共。赫尔利两面三刀的性格，使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更加恶化。尽管毛泽东著名的文章《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发表时间是 1949 年，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关系真正开始恶化的时间是 1945 年 4 月。

在人格上，赫尔利十分低劣。为了炫耀自己，他在向罗斯福报告工作时，说他与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关系极好，十分融洽。在会谈中，他们想谈什么，就谈什么，常常无所顾忌地开怀大笑。<sup>③</sup> 但背后却对薛穆说除了朱德的总参谋长叶剑英外，其他中共领导人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sup>④</sup>

英国方面也有赫尔利式的反共人物，其中的著名代表是丘吉尔和蒙巴顿上将在华代表怀亚特将军。怀亚特将军是一位有经验的军官，但是在政治上却十分幼稚。他不研究中国共产党，也不想了解有关的一切事物。他反对中国共产党，而且从原则上忽视了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他认为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政治中微不足道。他宣布“在中国没有谁可以向蒋介石的统治挑战”<sup>⑤</sup>。

怀亚特于 1945 年重庆谈判期间会见了毛泽东。他不负责任地把毛泽东描写成一个狂人。他说毛泽东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的这些不负责任的说法，在英国产生了不好的影响。<sup>⑥</sup>

---

① Cabinet Conclusions, Cabinet Memoranda, Cabinet Committees and Documents; 1939-45, PRO, London, p. 439.

② The Politics of War, Allied Diplomacy and the World Crisis of 1943-1945, p. 224 页.

③ The Politics of War, Allied Diplomacy and the World Crisis of 1943-1945, p. 224 页.

④ FO371/41582, F5394/34/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17 November 1944.

⑤ Christopher Thorne, Allies of A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 London, 1978, p. 560.

⑥ Christopher Thorne, Allies of A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 London, 1978, p. 560.

驻华大使薛穆既不像赫尔利那样反共，又不像怀亚特将军那样幼稚。虽然他错误地认为毛泽东、朱德、贺龙及另外几个领导人是“政治军事寡头”，但他承认毛泽东等人是有经验的共产党人。在他没有会见毛泽东之前，他的阶级地位使他不可能正确评价毛泽东等人。<sup>①</sup>他觉得所有见过毛泽东的外国人，对毛泽东的描述都太富于传奇色彩，因此他推论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制造了关于毛泽东的神话，把毛泽东塑造成了一个偶像。不过，他力图公正客观地看待中国共产党人。<sup>②</sup>

薛穆对中国的观察比较客观，而且能及时地向英国政府报告一切有可能改善英国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信息。例如他于1944年12月27日，向英国外长艾登汇报了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国际统一战线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指示全党要联合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包括英国、美国在内，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薛穆立即认识到这是改善英国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好时机。但是外相艾登未能及时抓住这个机会，未能意识到这是建立与延安联系的机会。因此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这样英国失去了战时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的最后机会。

## 二、英国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起源

虽然战时英国没有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官方联系，但是薛穆本人却发展了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友好关系。可以说，他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是英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起源。

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薛穆终于有机会亲自会见毛泽东。他们的第一次会面是在苏联驻重庆大使馆，双方进行了友好谈话。薛穆对毛泽东印象很好，他觉得毛泽东待人诚恳，并非如蒋介石抱怨的那样是一位“难于对付的政治首脑。”<sup>③</sup>薛穆十分赞赏毛泽东极其有魅力的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十分佩服毛泽东的个人品格。

9月6日，毛泽东到英国驻重庆大使馆拜访薛穆，同行的还有另外两位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他们是周恩来和王若飞。双方就国共谈判交换了意见。毛泽东介绍了重庆谈判的简单情况，批判了国民党玩弄谈判，欺骗人民，准备内战的和谈阴谋。毛泽东说日寇不仅利用国民党的这种反共态度，迟迟不向八路军投降，而且还在伪军配合下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动进攻。毛泽东举例说，国民党将军阎锡山的部队，还在掩护太原地区的日本军队，使八路军不能消灭他们。

毛泽东强调说，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引起的，它妨碍了将中国人民从日军铁蹄下解放出来。此外，日军迟迟不投降还产生了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影响到战俘的遣返问题。在这些战俘中，包括了被俘的英国战俘。毛泽东说，这种情况在离上海不远的扬州，以及在山东的威海更为严重。<sup>④</sup>薛穆认真地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他认为情况严重，因而一字不漏地向英国外交部做了汇报。这使英国政府对重庆谈判有了深入了解，对国共斗争的复杂性有所认识。毛泽东与薛穆的这次会面对战后英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和中英关系的发展，都有重大影响。

9月7日，英国大使馆设宴招待毛泽东。9月8日下午4时，毛泽东举行盛大招待会，感谢支持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和同情陕甘宁边区的外国友好人士。薛穆及其夫人应邀出席。毛泽东

---

① WO208/318, F3895/254/10, Seymour to Eden, 13 July 1943.

② FO371/41614, F4012/259/10, Seymour to Eden, 15 August 1944.

③ WO208/429, 4A,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16 July 1943.

④ FO371/46214, F8590/186/10, Seymour to Bevin, 5 October 1945; FO371/46214, F9187/186/10, From Chungking to Government of India, 29 October 1945.

发表了讲话，表示对支持中国人民抗日的外国人表示衷心感谢。会上薛穆即席发表了讲话。他说太平洋战争期间英国向中国提供的救济金纯粹是只战时援助，在战后和平时期，英国一定会帮助中国重新建设。上述事实表明毛泽东与薛穆的交往是友好的，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sup>①</sup>

与薛穆交往最多的是周恩来。周恩来给薛穆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周恩来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外交家。早在1942年12月英国议会代表团访华时，薛穆就表现了对周恩来的友好感情。英国议会代表团访华的目的，是了解中国抗战的情况及改善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所以英国议会代表团到达重庆后，完全忽视了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他们只注意与国民政府交往。薛穆觉得不妥，于是特别安排了他们与周恩来会谈，会谈地点在英国大使馆内。通过这次会谈，英国议会代表团对中国共产党有所了解，形成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初步看法。虽然他们认为共产党力量小，在战后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不一定会取胜。但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至少有了一个像周恩来这样诚恳而又有能力的领袖和机敏的外交家。

蒋介石对薛穆安排英国议会访华代表团与周恩来会谈极为不满。于是戴笠派了特务去监视英国议会访华代表团驻地。这就引起了薛穆及英国议会代表团强烈不满，加深了英蒋矛盾，也引起了薛穆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此后在薛穆笔下，戴笠和C. C. 一直是法西斯的代名词。<sup>②</sup>

周恩来在与薛穆的交往中，把我党的方针政策及国共斗争的情况，向薛穆做了介绍。这就使薛穆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较好的印象。1945年2月27日薛穆和周恩来就中国当时的各种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通过这次谈话，薛穆了解到国共谈判的一些内幕，并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周恩来每次与薛穆的会见，都是从工作出发，都给薛穆留下了良好印象。

1946年6月13日，周恩来向薛穆道别，准备回延安。周恩来表达了对国民党政权强烈不满，揭露了国民党破坏国共和谈的行为。同时周恩来说，虽然中国共产党信任马歇尔将军，但是中国人之间的矛盾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这就委婉地表达了不希望美国干涉中国，进行扶蒋反共的活动。周恩来希望在未来的国共斗争中，中国希望外国政府中立。周恩来还说，没有人能指望已经延续了20年的国共斗争，会在和谈中取得结果。

从周恩来的讲话中，薛穆对国共谈判的前景很悲观。他向英国政府报告了周恩来的话，并且说：“他（周恩来）像以往一样，明显地不信任国民党领导人，就像国民党不相信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样。从这次与周恩来的谈话中，我得不出国共和谈会取得成功的结论。至少不可能取得一个较长时间的解决办法。”英国政府同意薛穆的这一看法。

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例如王炳南、张闻天等人，与薛穆也有较多的交往，他们经常到英国驻华大使馆去谈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薛穆在1946年1月曾向英国报告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国民党根本不去实现他们曾许下的非常模糊的诺言，即建立民主政府，国民党也不愿放松对中国政治的牢固的控制。薛穆同意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他说：“毫不怀疑，共产党的上述宣言是真实的。尽管更正确地说，应该是国民党所答应的‘代表制’政府，就是顽固地保留最高行政长官的无限权力。”<sup>③</sup>

相反薛穆对国民党领导人的话不仅听不进去，还常常提出批评。英国与国民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因此薛穆曾尽力维持与蒋介石的友好关系。但是一方面由于英蒋矛盾太深，另一方面也因为薛在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上使蒋介石不满，所以双方的关系并不令人满意。例如1945年8月

---

① 《重庆谈判》，《中共重庆党史编辑委员会编》，第100~110页。

② FO371/35777, F828/74/10, Report on the Political of China, 12 February 1943

③ FO371/53670, F2291/384/10, Seymour to Bevin, 24 January 1946.

15 日蒋介石与薛穆进行了一次有趣的谈话。蒋介石问薛穆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薛穆直率地说从他所能搜集到的、已经出版的资料及访问过延安的记者们的报道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带给了农民福利，受到农民拥护。

薛穆认为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不能算民主政府，但却为人民支持。然后薛穆反问蒋介石，当地人民都拥护中国共产党政府，这是否真实的？蒋介石一听，立即火冒三丈地攻击中国共产党。蒋介石说，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农民，是被迫接受共产党制度，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事实上，没有一个人会说中国共产党做了什么好事。薛穆听后嗤之以鼻。事后他向英国政府报告说，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实事求是的。<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对薛穆态度的友好，也可以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态度中比较出来。赫尔利在中国弄得声名扫地，但他却自吹自擂，大谈他取得的成就。对此，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批判。例如周恩来在延安的一次大会上报告国共谈判情况时，谴责美国背信弃义。周恩来说：“我们怎么能与美国政府再打交道呢？它的大使和我们达成协议并签了字，但一周后又撕毁了协议。”<sup>②</sup>直到 1945 年 11 月他辞职时，赫尔利仍恬不知耻地说他是国共双方都乐于接受的调解者。

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大量资料证明赫尔利背信弃义的事实，并宣布由于不信任赫尔利，中国共产党不再参加有赫尔利在场的谈判。中国共产党认为赫尔利应该回美国。<sup>③</sup>这样赫尔利被迫于 1945 年 11 月写信给杜鲁门总统要求辞职。杜鲁门回答说：“有没有辞职信，赫尔利都应该被免职。”<sup>④</sup>反之，只要不仇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对他们就以诚相待。1946 年 5 月薛穆卸职回国，前欲到北京访问，参观十三陵。叶剑英亲笔下令要沿途的八路军保护薛穆及其随行人员。这张命令现在仍保留在英国剑桥大学丘吉尔档案馆。<sup>⑤</sup>

薛穆夫人文森特女士与中国共产党人也保持着良好关系，她与林祖涵有很多交往。林祖涵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所以薛穆本人对陕甘宁边区也产生浓厚兴趣。薛穆夫人与邓颖超女士也有很深的友谊。邓颖超当时为中共中央驻重庆的代表之一，经常向薛穆夫人介绍延安的情况，揭露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嘴脸。1946 年 6 月当薛穆夫妇回英国时，邓颖超还赠送给文森特女士一幅描写解放区生活的木刻；这幅木刻现在还珍藏在英国剑桥大学丘吉尔档案中心。<sup>⑥</sup>

值得一提的是薛穆夫人与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有持久不衰的友谊。在重庆时，宋庆龄经常邀请薛穆夫人出席有关抗战的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请薛穆夫妇看电影。薛穆夫妇也经常请宋庆龄到家聚会。他们之间的通讯一直继续了几十年，直到宋庆龄逝世。在“文化大革命”中，宋庆龄还给薛穆夫人寄去相片。这些照片，也存于剑桥大学丘吉尔档案馆。<sup>⑦</sup>

薛穆对中国共产党比较友好的态度，是由多方面因素构成的。其中之一是通过与中国共产党

---

① FO371/46213, F6241/186/10, Wallinger to Bennett, 17 August 1945.

② Lindsay M., *The Unknown War: North China 1937-1945*, (London 1975), pp. 87-88.

③ FO371/462/10, F3200/186/10, Seymour to Eden, 8 May 1945.; 1 Lindsay M., *The Unknown War: North China 1937-1945*, London 1978, pp. 87-88.

④ Lindsay M., *The Unknown War: North China 1937-1945*, London, 1978, pp. 87-88.

⑤ Seymour Paper, 4/2.

⑥ Seymour Paper, 3/3.

⑦ Seymour Paper, 4/2.



人接触，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抗战，处处为人民着想。这与他在重庆看到的国民党黑暗统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他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sup>①</sup>

但是薛穆为人谨小慎微，是位照章办事的典型英国外交官。他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主动采取措施，改善英国驻华大使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事实上，他也无权采取措施，建立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的关系。虽然通过他和其他人的努力，英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很好的印象，但是英国政府从一贯的实用主义原则出发，其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不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官方往来。英国政府只承认执政的政府，即只承认国民党政府，而轻视陕甘宁边区政府，不愿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或进行事实上的外交往来。英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只限于民间往来。也正是这种政策，决定了英国政府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对国共斗争采取了不介入的态度。

---

<sup>①</sup> Seymour Paper, 4/2.

## 第七章 战时英国对国共斗争的政策

### 第一节 战时英国对国共斗争的基本政策

#### 一、太平洋战争时期英国对国共斗争的基本政策

太平洋战争时期，英国对国共斗争的态度与美国不同，其基本政策是中立。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公开扶蒋反共。美国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必须依靠蒋介石政府，才能扩大美国在中国和远东的利益。当时美国政府内对国共斗争也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希望美国承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合作抗日，反对蒋介石利用美元打内战；<sup>①</sup>另一种则是支持蒋介石政府反对中国共产党。

但是1944年4月以后，美国右翼势力占了优势，美国对华政策逐步转向扶蒋反共。罗斯福总统本人的态度，就可以说明问题。例如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对蒋介石把大量精锐部队，用于封锁陕甘宁边区表示强烈不满。但是由于考虑到美国必须依靠蒋介石，他容忍了这一事实。<sup>②</sup>但罗斯福逝世后，杜鲁门上台。杜鲁门坚持反共立场，不与中国共产党发生联系。太平洋战争胜利后，特别是特别冷战开始后，美国从反共的歇斯底里出发，反对中国共产党，执行扶蒋反共的政策，支持国民党打内战。而在蒋介石政权被推翻之后，仍然坚持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英国的对华政策则要圆滑得多。英国在制定对华政策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保住和扩大英国在华利益。英国并非不愿干涉国共斗争，而是无力进行干涉。历史上列强对中国政府的干涉，大部分是以英国为首进行的。不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已经是夕阳西下，今不如昔，再也无力干涉中国内政。

从意识形态上看，英国是反共国家。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伟大成绩，并得到英国赞扬，但是英国并不准备帮助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国民党政权投靠了美国，与英国关系日益恶化。所以，英国也不愿帮助国民党镇压共产党。英国希望中国出现一个亲英的政府。在这个政府产生以前，英国对中国政局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政策。英国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在最近的将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而国民党也不可能消灭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最好还是奉行传统的对华政策，即在承认和支持中国中央政府的同时，又与各地割据的政权进行实质性交往。这意味着，将来如果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控制中国政治权力时，英国就会与中国共党政权交往。

英国的上述政策，客观上纵容了国民党政权执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但是应该指出，由于这种政策，又使英国没有介入国共谈判和国共斗争。在蒋介石发动内战后，英国也基本上恪守了中立。而且随着中国局势的发展，英国准备抛弃国民党政权，而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英国政府的上述政策，是其“分而治之”策略在新形势下的反映。

#### 二、战时英国对国共斗争前景的分析

国共斗争由来已久，双方分歧很大，问题十分复杂。这对不熟悉中国情况的人来说，是难于理解的。最初英国政府也并不了解这场斗争的实质及其对中国政局的影响。英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把国共斗争简单地看成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因而英国政府把握不住国共斗争的实质，拿不出相应的对策。后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指出，这个斗争的实质，是中国互相对立的两派，争

---

<sup>①</sup>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中国现代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1980年版，第285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书名、卷数及页码）。

<sup>②</sup>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中国现代史》，第285页。

夺国家政权的斗争。不论此结论正确与否，它却使英国政府认为，国共斗争的关键问题，是争夺国家政权。

薛穆在分析国共斗争问题时，暴露出许多反共反中国人民的思想。他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来观察问题的。薛穆认为既然国共双方都宣称忠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那么这就为他们的合作提供了共同基础。然而两党不仅不能达成协议，进行合作，反而在面对日本侵略时斗得更为激烈，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三民主义问题了。

表面上中国共产党批评国民党是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嘴上讲民主，实际搞独裁。而国民党则污蔑中国共产党分裂割据，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薛穆认为上述指责都不能说明问题。国共斗争不是“民主”与否，或“分裂割据”与否的问题。这些话只是两党互相攻击的借口而已。在他看来，国共斗争的实质是为争夺国家政权。<sup>①</sup>

在具体分析这个问题时，他对国共两党不分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首先他为国民党辩护，他说：“中国共产党指责国民党在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时，缺乏诚意，是半心半意的。这种指责，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有道理的。但是国民党政府所面临的任務，是要在有四亿人口的广大地区建立民主政府，这是不容易做到的。”薛穆认为其原因，是这四亿人中的绝大部分人，无论从所受的教育，或传统上，都还不具备接受宪法和议会政府的条件。

而中国共产党的所谓乌托邦社会，则是建立在人烟稀少的农村地区的。他们没有国民党遇到的问题多，所以可以不负责任地指责别人。<sup>②</sup>他认为，事实上国民党近年来在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已经取得了令人吃惊的进步。他还为国民党实行独裁找借口，他说：“由于战争的需要，国民党采取独裁这一统治形式，是可以谅解的。由于总体战争的需要，正如世界各地一样，迫使国民党政府采取独裁统治形式。”<sup>③</sup>

英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克森（G. V. Kiston），也同意薛穆的观点。他认为国民党在民主的路上已经迈出了步伐。他比较了国民党统治区与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后，觉得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各自控制的地区都实行了三民主义。虽然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相比仍然有差距，但国民党是实行民主的。在地方自治、为人民谋福利和让人民享有平等权利上，克特森承认国民党赶不上共产党。但是他说：“应该承认，在总体战争要求独裁，民主被忽视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已经在实施民主的基础方面取得了进展。”<sup>④</sup>

克森错误地把国民党加强基层政权的法西斯统治，推行新县制的措施认为是民主。他说，国民政府已经发展了县级的地方自治机关，把它作为整个民主制度的枢纽。在政府部门的结构中，省级政府作为本地政府系统首脑的权力已被缩小。现在县政府可以越过省政府，直接与中央联系。于是县就成为中央政府的支柱，成为中央政府与人民联系的纽带。<sup>⑤</sup>他还错误地认为国民党在建立地方政治协商会议上也取得了成绩。克特森只看到表面现象。国民党的新县制规定县为地方自治单位，但实际上县不是自治单位，而是国民党的基础政权组织，国民党通过这个系统来统治人民。这种县制规定：县以下为区，区以下为乡（镇），乡（镇）之下为保，保以下为甲；而乡（镇）长、保长必须“经训练及格者”才能充当。县长则必须是国民党员。从上述规定中，

---

① FO371/35801, F4953/254/10, Seymour to Eden, 6 September 1943.

② FO371/35777, F644/74/10, Seymour to Eden, 29 December 1942.

③ FO371/35777, F644/74/10, Seymour to Eden, 29 December 1942.

④ FO371/35777, F644/74/10, Seymour to Eden, 29 December 1942.

⑤ FO371/35832, F3456/1535/10, Seymour to Eden, 22 June 1943.

根本看不出县是民主的自治单位。

薛穆在为国民党辩护的同时，也批评了国民党反共的做法。例如，他认为国民党指责中国共产党进行“分裂活动”是不实之辞。因为中国共产党专心抗日，没有搞分裂活动。克森也认为这个借口，是蓄意反对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于1942年7月11日召开了中执委和中监委第十次全体会议，会议决议宣称：“绝不允许任何个人和组织在中国拥有军队、盘踞地方，不执行中央命令，制造社会动乱。违者将依法惩处。”根据这个决议，国民党执行了封锁陕甘宁边区的政策，并且在国民党统治区严厉控制中国共产党的活动。<sup>①</sup>薛穆批评了国民党的这种做法。

薛穆在分析了国共之间互相攻击的情况后得出结论。他说由于彼此不信任，不拼过你死我活，斗争不会停止。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妥协都无法达成，国共和谈根本不会有成果。在向英国政府报告时，薛穆是同情国民党的处境的。1942年“七七”事变五周年纪念会上，中共中央发表宣言重申了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表示愿意停止与国民党的争论，合作抗日。

但是国民党的答复是，合作抗日应该包括军事合作。只要八路军继续作为分裂的军队，独立于国民党而行动；控制地盘，那么国民党对共产党宣称的忠诚就感到怀疑。国民党的企图是吃掉八路军。但是薛穆却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表达愿与国民党合作时，总是暗指要国民党实现真正的民主，即给共产党权力。因此，他认为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在“七七”事变五周年纪念会上宣言的答复，是“有一定道理的”<sup>②</sup>。

英国驻华大使馆参赞、英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台克曼（E. Teichman），也认为国共斗争是一种争夺政权的斗争。不过台克曼是欣赏中国共产党的。他指出这种斗争与过去军阀斗争不同。<sup>③</sup>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有新的指导思想、新的政策，与旧式军阀完全不同。台克曼为此写了一份报告给英国外交部。薛穆在这份报告上做了批语，他写道：“我毫不怀疑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推翻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sup>④</sup>

1944年10月，在评价国共和谈的具体内容时，薛穆再次指出谈判不会成功。他说，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提出的要求有三点：第一，立即承认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合法地位，以及让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央政府。第二，收编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为国家军队。第三，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地方自治。国民党政府不仅要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地方自治，还要承认敌后的其他抗日根据地政府。这三点要求是最起码的要求。但是薛穆认为其中的第一和第三条明显是要分享政权。第二条要求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不过在这三条中，立即承认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是最根本的问题。他认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任何谈判都不可能达成协议。<sup>⑤</sup>

薛穆认为由于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顽固，所以国共谈判的前景是悲观的。他说：“蒋介石决心视反对党派为不忠诚的组织，因此他们在战时没有发言权。”这样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就不会被承认。同时，国民党拒绝立即解除党禁和撤除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国民党虚伪地答应，一年后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到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一样，将享受平等地位。

---

① FO371/35832, F3456/1535/10, Seymour to Eden, 22 June 1943.

② FO371/35777, F644/74/10, Seymour to Eden, 29 December 1942.

③ FO371/35780, F5611/74/10, Memorandum by Teichman, 26 July 1943; FO371/46209, F1810/186/10, Seymour to Eden, 13 February 1945; FO371/53687, F7998/757/10, From Nanking to Foreign Office, 27 May 1946.

④ FO371/46029, F1761/186/10, Seymour to Eden, 2 March 1945.

⑤ FO371/41615, F4644/159/10, Seymour to Eden, 16 September 1944.



但是国民党政权立即加以说明，全国代表大会只能采取 1936 年制定的宪法草案为蓝本。1936 年宪法的主要原则不能改变，这个原则是总统责任制。国民党的这个解释，立即遭到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抗议。

中国共产党认为 1936 年宪法，只对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有利。如果采用这个宪法，即将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必然是由国民党操纵。中国共产党宣布拒绝参加这样的全国代表大会。对此，薛穆评论说：“毫不怀疑，中国共产党担心如果不恢复他们的合法地位，一切都是空谈。他们就不会放弃军队和历经艰辛挣得的政治、经济的独立。否则在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时，他们就会遇到很多麻烦。他们就会被迫面对既成事实而得不到丝毫的权利。”<sup>①</sup>薛穆的这一看法是比较中肯的。

英国政府同意薛穆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赫德森批示道：“1936 年草案是国民党草拟的，其根本目的，是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总统负责制国家。这部宪法规定总统之权，根本不受名义上的‘人民主权’干预。”赫德森还认为 1936 年宪法的制定者，还在“权力”和“能力”上大做文章，以图扩大总统权限。所以这部宪法的政治目的，是使蒋介石变成一个没有称号的皇帝。<sup>②</sup>应该说赫德森对国民党 1936 年宪法的评价是说到点子上了。

但是 1944 年夏至 1945 年初，日军展开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迫使蒋介石于 1945 年新年献辞里宣布，全国代表大会将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召开。然而英国政府对召开这样一个大会起什么作用感到怀疑。薛穆说根据中国现存的法律，这样的全国代表大会只能接受已制定好的宪法，确定宪法的生效日期而已。因此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并不意味着国民党训政的结束”。据他看来，只有根据宪法由人民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能行使宪法时，宪政才能实施，中国的训政才真正结束。他赞成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坚持延长训政的批评，即延长训政就是实行独裁。

薛穆还指出，在政治领域内另一个难题是召开全国各党派代表大会。虽然国民党同意召开这样一个大会，但是中国共产党看来不愿参加这样的大会。因为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个会议顶多只起咨询作用，只起顾问作用而不能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这个会议的建议，国民党可以采纳也可能不采纳。<sup>③</sup>

在成立联合政府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要求立即建立联合政府，拒绝参加国民党提议的战时政府。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联合政府，才是废除一党专政的最佳方案，而战时政府的权威是来自国民党的恩赐，因而受国民党控制。薛穆在这一点上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他说，除非由全国人民和全体党派选出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否则要废除一党专政非常困难。他认为训政的最初目的是让国民党训政，直到中国人民已经适合采取民主制度为止。只有当民选的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宪法之下的政府权力时，训政才算结束。

薛穆把他的上述看法向英国政府做了报告。他强调，中国共产党要求国民党立即把政权交给多党会议，在此基础上组成联合政府。但是蒋介石坚决不同意。因此看出国共双方的斗争就集中在政权问题上。

英国政府完全同意薛穆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他们特别重视薛穆 1945 年 3 月 2 日在给外相艾登的报告中提到的一段话。这段话说明了国共两党在成立战时政府问题上的斗争。国民党由于在

---

① FO371/41615, F4644/159/10, Seymour to Eden, 16 September 1944.

② FO371/41611, F1441/159/10, Minutes by Hudson, 31 March 1944.

③ FO371/46166, F1690/35/10, Seymour to Eden, 28 February 1945.

1944年夏开始的豫湘桂战役中一溃千里，丧师失地，遭到全国人民的批评，被迫向中国共产党做了一些让步。其中之一是，成立战时政府共同抗日。国民党允许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到行政院和政府各部门中工作。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加以拒绝。薛穆在报告中这样写道：“中国共产党认为派员到行政院和政府各部门中工作，将受到国民党控制而没有实权。只有成立联合政府管理国家，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sup>①</sup>

通过上述分析，薛穆认为国共斗争是不能通过谈判来解决的，只能通过武装斗争来解决。因此他就明白了为什么在国共谈判中最为棘手的问题，是关于改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的问题。

国民党自1927年以来，一直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抗战中，国民党视八路军、新四军为心腹大患，必先除之而后快。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进攻，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此，英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台克曼曾于1943年9月说：“中国共产党实质上是一个革命党，靠武装力量来反对国民党政府而存在。”<sup>②</sup>薛穆也认为，由于国民党的极端分子企图用武力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依赖于一支强大的军队。<sup>③</sup>英国外交部记录了从1937年以来国共摩擦，及国民党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行动。从1937年至1939年，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西南的五个县，并占领了它们。<sup>④</sup>

英国驻汕头领事还报告说，1939年国民党军队进攻了甘肃与陕西的两个县，双方激战两周，伤亡几百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撤出了这两个县。<sup>⑤</sup>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共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其主要目的是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在1939年5月至1940年2月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派了大批部队包围了陕甘宁边区，并且围绕着陕甘宁边区挖了封锁线。1939年12月国民党军队攻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决死队。1940年春，国民党军队甚至进攻在太行山上的八路军总司令部。

据估计从1939年11月至1940年7月，国民党对共产党占领的地区，发动了124次小规模进攻和63次较大规模的进攻。<sup>⑥</sup>在1941年1月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发动了皖南事变。在1943年开始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除了要求解散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外，其主要目的是消灭八路军。<sup>⑦</sup>英国驻华官员们侦查到了上述情况。英国驻华大使馆参赞沃林杰，多次向上级报告说国民党的目的是要消灭共产党，特别是要消灭八路军。<sup>⑧</sup>

薛穆指出，尽管国共双方在军事冲突的同时又进行着谈判，但是他们都认识到问题的最终解

---

① FO371/46209, F1761/186/10, Seymour to Eden, 2 March 1945.

② WO208/318, F4959/11/10, Seymour to Eden, 6 September 1943.

③ FO371/35779, F5194/74/10, Seymour to Eden, 21 September.

④ WO208/318, Extract From Shanghai Summary by H. M. Consul at Swatow, 4 June 1940.

⑤ WO208/318, Extract From Shanghai Summary by H. M. Consul at Swatow, 4 June 1940.

⑥ 山西社会科学院编：《新民主革命时期大事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4~315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书名、卷数及页码）。

⑦ 山西社会科学院编：《新民主革命时期大事记》，第314~315页。

⑧ WO208/318, 中国 (China) 101 (C), Notes on KMT-Communist Situation, by Wallinger, 25 October 1943.

决要靠武力。关于收编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问题，于是成为国共谈判中的棘手问题。中国共产党谈判代表林彪，在 1943 年的国共谈判中提出，要给中国共产党四个军十二个师的番号，每师一万人。但是国民党则坚持最多只能收编四个军十个师。<sup>①</sup>而且国共双方对“收编”一词的理解是不同的。“收编”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只意味着战功卓著的抗日军队被国民党承认为合法军队，但这些军队的领导权，必须仍然控制在他们手里。而国民党则坚持“收编”，即把八路军置于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管辖之下。

由于双方心照不宣，故在谈判中互不相让，难以达成协议。在这个问题上，薛穆在向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把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他说这一问题的复杂化，主要是中共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主要表现在国共 1944 年谈判中。这次谈判之所以陷入僵局，薛穆认为有三个主要障碍：1) 中国共产党要求立即实行民主，而国民党坚持要延长到战后；2) 中国共产党要求允许他们控制的地区完全自治，并且要解除对边区的封锁，发给中国共产党军队军饷、武器弹药、服装等后勤物资；但是国民党甚至不答应让延安自治；3) 双方对军队问题，即中共军队在目前的规模上寸步不让。在这三个问题中，中国共产党军队收编问题，又是重中之重的问题。

薛穆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什么协议都不可能达成。即使有什么达成协议，也不过是权宜之计。当日本或美国压力减轻，双方矛盾立即会加剧。他向英国外交部报告了双方谈判的情况，指出关键问题是收编中共军队问题。1944 年 7 月 4 日，中国共产党谈判代表林祖涵，写了一封信给国民党谈判代表，说本应给中国共产党 16 个军 47 个师的编制，但是作为一种妥协，中国共产党同意只给 5 个军和 16 个师。这一要求又大大加码了。但是国民党仍然坚持只同意收编 4 个军 10 个师。于是薛穆断定，这可能是国民党不承认在陕甘宁边区以外的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军队和游击队。<sup>②</sup>

在谈判中，国民党政权坚持，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是不应该拥有军队的。因此把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编入国家军队，是达成协议的先决条件。在这一点上，薛穆是同情国民党的，他认为国民党的这一要求完全合乎逻辑。这表明在国共合作的谁是谁非问题上，薛穆是分辨不清楚的。他一会说中国共产党在有意制造麻烦，但一会又说国民党缺乏诚意。从他的态度可以看出，英国并不想支持国共谈判中的任何一方。英国只是尽可能了解国共谈判的情况，以制定相应的对策。这与美国公开干预和企图操纵国共和谈的态度是不同的，英国的政策是不干涉。

1945 年 4 月，薛穆在给英国外长艾登的汇报中说：“看起来国民党一方至少有达成协议的某种愿望。”他引用了“可靠证据”，说明国民党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准备满足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民党应该抛弃党专政和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在把军队交给国家军事委员会上制造麻烦。<sup>③</sup>不过薛穆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知道军队是他们谈判中的最有力的武器。根据中国历史的经验，没有军队就没有一切。所以除非中国共产党在政府中真正有了实权，他们是不会放弃对军队的控制的。<sup>④</sup>

然而薛穆也指出国民党在谈判桌上是不诚实的。例如当中国共产党要求在战时而不是战后建

---

① WO208/318, F4644/159/10, Seymour to Eden, 6 September 1944.

② WO208/485, F4644/186/10, Seymour to Eden, 16 September 1944.

③ FO371/46209, F1340/186/10, Seymour to Eden, 13 February 1945.

④ FO371/46210, F2827/186/10, Seymour to Eden, 27 April 1945.

立联合政府，实施宪政时，国民党不正面回答。薛穆说，他知道国民党实施宪政要到战后，因此国民党没有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国民党采取的方法，是先让共产党钻入圈套，然后再迫使他们就范。<sup>①</sup>

薛穆看到了国共斗争的实质是政权问题，而解决双方矛盾的关键是武装斗争问题。所以早在1942年6月他就预感到国共斗争，必然导致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内战。<sup>②</sup> 他以后对国共斗争的分析也都是基于这一看法。例如在1943年9月1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执委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讲话。他虚伪地说，中国共产党问题纯粹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应该用政治手段加以解决。国民党要实行宽大和克制的政策。他自我吹嘘说他一直执行的是这种政策。

然而薛穆对此讥笑说，蒋介石和中执委都没有提及这个事实，即1943年7月初几个师的中央军已调往西安包围陕甘宁边区。这是蒋介石企图用武力迫使中国共产党妥协的最好例子，而不是宽大和克制的政策。1944年9月16日，蒋介石再次发表讲话，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要无条件服从国民党的领导。这就是要共产党无条件放弃对军队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薛穆认为，周恩来提出的一些问题是“完全合理”的。但是他指出，即使国民党准备承认中国共产党，也不会同意中国共产党拥有十六个师的部队和占有南至广东的中国广大地区，并保留自治政府。然而他又指出，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军队，那就只有俯首听任蒋介石宰割。

到1945年2月，他又评论说，由于国民党对日作战军事上的失败，共产党借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国共合作的代价。然而国民党根本没有半点妥协的想法。因此他断言，虽然谈判继续，但是最后将是没有结果的。<sup>③</sup> 他向英国外交部强调说，尽管美国正在向国共双方施加压力，然而国共双方的分歧太大，要达成协议是不可思议的。<sup>④</sup>

美国政府对国共斗争的分析则不同，美国一直认为战后中国不会有内战。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霍贝克一再说明了这一观点。<sup>⑤</sup> 而英国政府却同意薛穆的看法，认为战后中国一定会爆发内战。但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会维持表面上的联合。例如英国外交部的赫德森说，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暂时联合的部分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与一些省的军事集团结成了联盟，其中包括与陕西军队。如果要攻打陕甘宁边区，这些军队将受命首先与中共开战。而蒋介石驱使他们去攻打陕甘宁边区，只会激起兵变或使各种军阀势力死灰复燃。因此，蒋介石不得不与中国共产党暂时联合。<sup>⑥</sup> 既然英国政府已经得出结论，即战后国共斗争将继续下去。那么战后国共斗争将采取什么形式呢？

## 第二节 英国对战后国共斗争的政策

### 一、英国对战后国共斗争的分析

英国政府认为战后的中国政治将极其复杂。如果美军在中国沿海共产党游击队控制的地方登

---

① FO371/41615, F4644/159/10, Seymour to Eden, 16 September 1944.

② FO371/31679, F4629/1689/10, Seymour to Eden, 4 June 1942; FO371/41615, F4644/159/10, Seymour to Eden, 16 September 1944.

③ FO371/46209, F449/186/10, Seymour to Eden, 2 January 1945.

④ FO371/41582, F4726/34/10, Seymour to Eden, 3 October 1944.

⑤ FO371/41582, F5468/34/10, Seymour to Eden, 3 October 1944.

⑥ FO371/41612, F1625/1594/10, Seymour to Eden, 19 April 1944.



陆打日军，美军就不会仍然生硬地只与国民党军队合作。英国政府对此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到那时，美军会不会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合作？苏联对中国的态度怎样？如果日本投降后，中国仍然分裂，那么美、苏对延安政府的态度如何？英国政府认为上述因素将决定国共斗争的前景，影响中国的命运与前途。<sup>①</sup>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对战后中国是否会爆发内战进行了长期讨论。薛穆认为战后一定会有内战，而赫德森认为不会有内战。赫德森的理由是，如果中国共产党想打倒国民党，他们就会利用抗战期间国民党所处的困难去推翻国民党政权，根本用不着等到战后蒋介石的地位因抗战胜利而巩固后才造反。由于战后国民党政权可以得到大量的美国援助，力量会变得更强大，因此在抗战时期造反成功的机会，远远比战后大得多。在战时，蒋介石的力量因为与外界的孤立和通货膨胀而被削弱，而战后蒋介石一统天下，有强有力的政府和现代化军队，中国共产党能奈蒋介石何？<sup>②</sup>

赫德森的看法，明显地是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影响。美国政府认为，中国战后不会发生内战。例如当时任美国国务院远东司政治顾问的霍贝克在 1943 年 10 月就说了赫德森在 1944 年说的话。霍贝克声称，战后国民党将比共产党强大得多。共产党不可能在国民党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打击下取得什么成就。因此，霍贝克根本不同意战后中国会出现动乱或内战。他认为，在中国各种势力中，最强大的是国民党政权。国民党有武器来源和其他资源，随着时间的过去，它的力量和资源还会增加。在战后国民党将得到美国更多的武器。霍贝克还错误地认为国民党政权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在那种情况下，共产党将如何去战胜力量如此巨大的国民党呢？<sup>③</sup>

而且美国政府认为，蒋介石会用政治手段去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例如 1943 年 9 月 13 日蒋介石发表政策声明，说中共问题完全是政治问题，因此应该用政治手段解决。美国政府认为这一宣言，是国民党主要的和压倒一切的政策。无论解决国共之间的矛盾有多么困难，国民党政权都会尽力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一争端。英国政府十分重视霍贝克的看法，专门记录在案以备参考。<sup>④</sup>

但是无论赫德森还是霍贝克，都没有认识到战后国共斗争会发展到打内战的地步。他们都没有真正了解中国。在抗战期间，具有反侵略传统的中国人民绝对不会容忍国共内战，“西安事变”已为蒋介石的前车之鉴。没有充足的理由，蒋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反共反人民内战。而内战结果，只能促成蒋介石政府的灭亡。战后情况则不同，阶级矛盾取代了民族矛盾。在美国支持下，蒋介石一定会发动内战。至于中国共产党，主张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自然不会出尔反尔在战时首开内战。而战后的情况，就要看国民党的态度了。

薛穆对上述问题的看法就比较清楚。他认为在战时，尽管国共双方态度都是不妥协的，但是国民党不会采取军事行动消灭共产党。如果那样就会引起内战，那将遭到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反对。<sup>⑤</sup>至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薛穆认为除非他们受到挑战，在战时中共是不会向国民党发动

---

① FO371/46210, F2827/186/10, Seymour to Eden, 27 April 1945.

② FO371/35779, F5468/74/10, Addendum, 14 October 1943.

③ FO371/35779, F5468/74/10, Addendum, 14 October 1943.

④ FO371/35779, F5468/74/10, Addendum, 14 October 1943; Heber Feis, *The China Tangle*, (New York, 1953), p. 89.

⑤ FO371/35777, F344/74/10, Seymour to Eden, 29 December 1943.

进攻的。<sup>①</sup> 抗战时期，共产党的政策是抗日。而蒋介石虽然有心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但却不敢冒然发动内战。蒋介石曾经发出指示说：“抗战期间向共产党发动全面进攻，不仅不会解决共产党问题，反而会损害政府的威信。现在进攻共产党，就会落入共产党的圈套。与中共打交道的唯一方式，是仍然采取守势；并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蒋介石强调：“不应该直接向共产党发动进攻，而是采取迂回战术去控制他们。直接的、公开的战争应当避免。”<sup>②</sup>

英国外相艾登和大部分官员倾向于薛穆的观点。1943年7月，当蒋介石调动七个师去包围陕甘宁边区时，国内外都盛传中国内战爆发在即。但是英国政府却认为不会发生内战。英国外交部为此于1943年7月准备了一份备忘录。文中指出，在目前情况下蒋介石不会冒险去进攻中国共产党。因为这样做只会在盟国间产生非常恶劣的后果，从而损害蒋介石的威信。<sup>③</sup>

英国政府同意薛穆的看法，即抗战结束后中国最终会必然爆发内战。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官员布鲁恩爵士，于1945年1月指出：“中国共产党问题，必须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前解决，否则中国会发生内战。”<sup>④</sup> 布莱克勃则说，如果双方达不成协议，那么中国统一的前景就是一片漆黑。根据上述分析，英国外交部于1945年7月7日得出结论：“国共谈判达成协议的前景是暗淡的。内战的危险真实地存在着。”<sup>⑤</sup>

那么如果太平洋战争后中国爆发内战，谁可能赢得内战的胜利？英国公众认为蒋介石会打赢。例如1945年8月28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认为中国的政治统一，只有国民党才能完成。尽管中外舆论都在批评蒋介石，但是没有理由怀疑国民党政权是中国统一的希望。虽然蒋介石遭到人们的指责，说他是半心半意地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但是中国共产党却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统一中国。不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抗战中的贡献如何，特别是在国民党消极抗日时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抗日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对延安政府来说，明显的缺点是缺乏资源和能证明它是中国统一核心的组织。

《泰晤士报》上述说法完全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其推论是如果发生内战，蒋介石一定获胜。《泰晤士报》还认为，由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中国外长王士杰于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条约》，是苏联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签订的。该条约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因此《泰晤士报》作出结论，说由于盟国对蒋介石及其同僚承担的艰苦的统一中国的任务，表示了良好的愿望，因此中国内战的危险大大减小。<sup>⑥</sup>

《泰晤士报》的看法，当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早在1943年，英国外交部的赫德森就有类似看法。但他的观点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坚持说不会有内战，另一方面又预言，万一中国真正发生内战，胜利的一定是蒋介石而不是中国共产党。他提出了国共斗争四种可能的后果：1) 双方达成协议，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2) 国民党用武力镇压共产党；3) 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

---

① FO371/41580, F2804/34/10, Seymour to Eden, 23 May 1944; FO371/41612, F1546/10, Seymour to Eden, 6 March 1944.

② Keiji Furuya, Chi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1981, p. 743.

③ FO371/35778, F4265/74/10, Rekatuibis between Chinese Government and Communists, 22 July 1943.

④ FO371/41582, F5394/34/10, Notes on Possible Questions, 15 November 1944.

⑤ FO371/46209, F2324/186/10, Memorandum on Present China, 21 April 1945; FO371/46211, F4171/186/10, Memorandum by Foreign Office, 7 July 1945.

⑥ The Times, 28 August 1945.

其结果是扩大现有共产党控制的地区或者完全推翻国民党；4) 中国分裂，形成事实上的两个国家。中国共产党控制东北、华北。国民党统治华中、华南。

赫德森认为，由于国共双方互不信任，而且中国又缺乏真正民主的传统，因此要双方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而国民党要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也只是一种奢望。因此他断言：“很明显，国民党一定企图取得第二点，即武力镇压共产党。那么内战就会爆发。”他认为共产党会被消灭，原因是战后国民党政权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重庆国民政府的地位就会非常巩固。因此国民党发动内战就是镇压叛乱而已。它有权根据国际法购买武器。赫德森反复强调，除非苏联干涉，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否则内战的结果是国民党必胜无疑。如果苏联用武器支持中国共产党，那么就会出现西班牙内战的局面，即右派是合法政府而非“左派”。<sup>①</sup>

英军总参谋部联合情报委员会根据各种情况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与赫德森完全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完全是自治政府，“他们能组成统治全中国的政府，而不会被国民党消灭”。英军总参谋部联合情报委员会认为，既然中国共产党能在北方坚持八年抗战，那么他们也就无限期顶住国民党的进攻。除非美国军队替国民党军队守住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保持交通运输线的畅通，并运送部队和供给武器，给蒋军非常积极的支持，否则，蒋介石的军队，就不能打败中国共产党的军队。<sup>②</sup>

英军总参谋部联合情报委员会的估计是接近于事实的。但是，英国内阁既没有接受这种估计，也没有采纳英国外交部赫德森的观点。他们实行的是一条由英驻华大使薛穆提出的路线。这条路线就是不干涉中国内战的政策。因为英国政府相信，在内战中，国共谁也不能消灭对方。1944年3月薛穆就错误认为，如果发生内战，中国共产党不会胜利。这是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在国民党统治区不一定会受欢迎的缘故。他说：“从大使馆已收到的报告来看，中国共产党控制地区的民主政府，是否适合整个中国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在国民党地区条件不同，人口众多。”<sup>③</sup>

1944年11月7日，在回答英国外交部新任远东司司长贝纳特的有关问题时，薛穆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虽然受到人民支持，但是他们不能被称为民主政府。因此就很令人怀疑这种体制，能否在人口众多而又富饶的中国其他地区实行。”<sup>④</sup>甚至到了1946年5月，当中国共产党政权已经在长城以北和东北、热河等地站稳脚跟后，薛穆仍然认为，中国共产党要在这些地区受欢迎是不可能的。他说，尽管在中共长期控制的地区人民欢迎中共，但是共产党要在其他地区实行他们的体制那就成了问题。<sup>⑤</sup>很明显，薛穆低估了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威力和人民对他们欢迎的程度。

但是薛穆也不相信国民党能消灭中国共产党。首先，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而且他们与旧式军阀不同。他们制定了十分明确的共产主义政策，而这些政策受到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欢迎，因此要战胜共产党是极其困难的。其次，中国各地的军阀，例如广西军阀李宗仁及其同伙，一定会给蒋介石制造严重的麻烦。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苏联绝对不会容许中国共产

---

① FO371/35778, F4852/74/10, Minutes by Hudson, 21 September 1943.

② FO371/46215, F10436/186、10, Internal Situation in China, 10 November 1945.

③ FO371/41579, F1627/34/10, Seymour to Eden, 9 March 1945.

④ FO371/41582, F5480/34/10, Seymour to Eden, 7 November 1944; Llewellyn Woodard,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IV. London 1975, p. 529.

⑤ FO371/53687, F7998/757/10, From Nanking to Foreign Office, 27 March 1946.

党被消灭，苏联对中国局势十分关心。<sup>①</sup>

据此，薛穆认为中国内战的结果是出现两个中国。一个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北部和东北部人民政府，一个是国民党控制的华中、华南和西南政权。因此他向英国政府提出建议：“当中国出现那种情况时，英国对华政策应该遵循传统的政策，即当中国分裂时，英国只承认当时的中央政府。即使这个中央政府反对英国在华利益，英国也要支持它。但是在同时，英国政府应该通过在中国各地的领事与各地割据政府，保持事实上的关系。”<sup>②</sup>

这条路线实质上是分而治之的英自传统政策的再现。薛穆所建议的是，英国应该用两面派手法，来对待中国在太平洋战争后可能出现的局势。为了强调战后中国不统一，薛穆特别指出，虽然在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条约中，苏联保证给国民党政权一切支持。但是，当苏联认为支持中国共产党对其有好处时，并不排斥他们与中国共产党订立新的条约。<sup>③</sup>英国政府对此十分注意。在英国外交部一份名为“东北问题”的机密文件中，记录下了英国政府对上述问题的意见：“现在中共已经控制了东北大部分地区。如果国民党军队企图把中共军队赶出东北，苏联将会给予中共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将被迫让步，让中共在东北自治。”<sup>④</sup>

在另一份时间为1946年4月7日的外交部备忘录中，英国政府认为，苏联人正在鼓励中国共产党军队和其他非正规军渗透东北，以填补苏军撤走的真空。“这样就为国民党军队接管东北制造困难。”<sup>⑤</sup>可见薛穆关于苏联将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和英国政府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认为内战后中国将出现南北两个政权的结论，已完全为英国政府赞同。英国对中国内战的态度，于是倾向于中立和不干涉。

## 二、英国对战后国共斗争“不干涉”政策的内容

英国对国共斗争的政策，确立为“不干涉”政策。但是英国对国共斗争的“不干涉”政策，分为二个阶段，有两重含义：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英国“不干涉”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支持国民政府，不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以寻求国共的妥协和在中国组成民主联合政府。这是英国“不干涉”政策的第一阶段，其实质是反对中国共产党；日本投降后至1949年10月是英国“不干涉”政策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英国对国共内战持基本中立的态度，其特点是听任中国局势发展。这一阶段的英国“不干涉”政策，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对这一点，毛泽东同志曾给予肯定。

太平洋战争期间英国的“不干涉”政策是怎样形成的呢？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如上文所述，即英国政府认为，国民政府是受到世界各国支持的中央政府，而且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可能推翻它。如果英国同情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要求国共达成协议，那就会恶化已经出现裂隙的英国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这不仅会损害英国在华利益，还可能招至国民党干涉印度、马来亚等地的事务。

抗战一开始国民党就派了大批干部到马来亚进行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派去了更多干部。这一事实令英国不安，所以英国不愿惹恼国民党政权。另一方面，英国也不相信国民党能消灭共

---

① FO371/35779, F5194/74/10, Seymour to Eden, 21 September 1943; FO371/47988, F1523/10674/38, Seymour to Bevin, 5 November 1944.

② FO371/46166, F1690/35/10, Seymour to Eden, 28 February 1945.

③ FO371/47988, N1532/10674/38, Seymour to Bevin, 5 November 1945.

④ FO371/53687, F7034/757/10, The Manchuria Issue, 10 May 1946.

⑤ FO371/53687, F6323/757/10, The Manchuria Issue, 7 April 1946.



产党，所以冷眼旁观国共斗争。尽管美国多次要求英国支持向国民党施加压力，寻求国共妥协的途径，但都被英国拒绝。英国外交部强调：“我们的经济状况不允许我们这样做。”<sup>①</sup>这是英国持“不干涉”政策的第二个重要原因，也即最根本原因：那就是英国势力在华已经衰落，英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英国有些同情中国共产党的人士，曾建议英国政府采取措施承认中国共产党，不要有偏见。例如在延安访问和生活过的威廉·邦得教授，就曾经两次建议，西方政府应该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在中国实现民主并且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英国驻华大使馆武官米拉，在1943年12月25日汇报国共谈判情况时，也建议说：“如果要使中国继续抗战，就应该向国民党施加压力。否则国共之间的斗争很快会发展成为内战。”<sup>②</sup>

但是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反对向国民党施加压力。他本人是同情中国共产党人的，但是他的殖民主义立场，特别是善于揣摩上级意图的官僚主义作风，使他首先提出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他认为西方不应干涉中国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最好。例如他在把邦得访问延安的报告送交英国外交部时，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建议。他说，现在中国各界人士都在谈论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以促使他们实现民主并与中国共产党实现真正的合作，这种话本身就比由西方施加任何压力要强得多。薛穆认为，如果由西方施加压力，国共双方都是不会满意的。薛穆对中国共产党仅限于同情，对国民党的不满意也是表面的，他的一切考虑是如何维护英国的利益。

1944年10月，薛穆对国内外大量报道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绩，表示十分不满。他认为美国政府向国民党政权施加压力，以使国共谈判达成协议有害无益。他在向英国外交部汇报时说：“访问延安归来的外国人，都一致赞扬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绩。他们把延安与重庆做了比较。这样做，对形势的发展没有好处。”<sup>③</sup>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美国人这种态度的鼓励之下，明显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使国共之间的谈判变得不可能。<sup>④</sup>他要求英国政府对英国《新闻周刊》刊登的、其驻华记者吉尔德所写的两篇严厉批评国民党政权的文章，进行新闻检查，不得再转载。因为这只会鼓励中国共产党提出更高的谈判条件。英国政府同意了他的这个建议。

英国外交部向英国驻美国大使哈里法克斯发出有关指示，并且强调说：“英国政府的政策是不干预新闻自由。不过，其条件是新闻界对国民党的批评，只能限于合理的评论。英国政府鼓励对国共斗争的报道要进行平衡。《新闻周刊》发表的吉尔德的文章，就没有持中地报道中国形势。”<sup>⑤</sup>由此看来，薛穆和英国政府的所谓不干涉国共斗争，实质上是支持国民党。这与美国公开插手谈判，支持国民党吃掉共产党的所谓“联合”没有什么不同。尽管英、蒋矛盾重重，但是英国仍然只支持国民党。

表面上看，这与英国政府经常表现出来的同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不吻合的。但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这是与英国一贯的机会主义外交路线一致的。1849年英国外相巴麦尊就曾说过，英国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恒的、不变的利益。在太平洋战争时期，英蒋

---

① FO371/69546, Foreign Office Memorandum.

② WO208/318, China, 101 (V), Notes on KMT Communist Situation, 25 October 1943.

③ FO371/41612, F1546/159/10, Seymour to Eden, 6 March 1944; FO371/41582, F4630/34/10, From Chungking to Government of India, 7 October 1944.

④ FO371/41616, F5922/159/10, Seymour to Eden, 22 November 1944.

⑤ 书目 15, FO371/41613, F2368/159/10, From Foreign Office to Washington, 22 May 1944.

虽然矛盾重重，但是英国认为国民党政权是中国的合法政府，仍有实力，不易被推翻。所以薛穆说：“国民党政府是西方的盟国，没有理由去颠覆这个政权。”而“中国共产党无论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延安政府也只是中国境内的一个省级政府”。<sup>①</sup>

英国外交部同意薛穆的看法。赫德森补充说：“英、美向重庆施加压力，无论正式压力或非正式压力，要求国民党放弃对中共地区的包围，只可能取得相反的效果。这会使局势达到沸点。”<sup>②</sup>事实上，在具体对待国共双方时，英国只支持国民党政权。在对华援助问题的态度上，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薛穆主张任何给延安政府的援助，都必须通过国民政府而不能直接交给中国共产党人。英国给延安国际和平医院的医疗器械及物品，一律由重庆政府转交。薛穆认为这是符合国际法的。

赫德森不仅同意薛穆的看法，而且补充说租借物资如果在战时运到延安，就会使中国的事态扩大而无法解决。因为这样做就可能使蒋介石确信，他能对付中国共产党的最好办法，就是立即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即必须在国外物资运达延安之前，就把共产党消灭。<sup>③</sup>赫德森认为蒋介石根本不会同意英、美武装造反的武装力量。只要中共继续否定蒋介石的领导，自认为是与国民党一样的合法政府，那么蒋介石就不会同意武装中共。上述看法普遍流行在西方外交界。当时美国驻重庆代办、后为美国驻日本大使的乔治·艾奇逊是同情中共的。他曾同意史迪威的意见，联合中国共产党打日本。但是在援助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也持与薛穆一样的观点。他于1945年12月从东京写信给薛穆夫人文森特说：“我从来没有赞成在没有得到蒋总司令的同意前，给中国共产党以援助。”<sup>④</sup>

英国认为施加任何压力，要国民党让步与中共达成协议的做法，都将损害盟国的对日战争。英国外交部的斯科特说，已经对国民党施加的压力，诸如BBC电台或英、美报刊上的宣传带有偏见，单方面批评国民党，使“中国共产党不愿意再听任何妥协的话了”<sup>⑤</sup>。因为中共在谈判中要价会提高。他确信任何英、美外交方针的改变，都会引起重庆国民政府的愤怒。<sup>⑥</sup>布鲁恩也同意斯科特的分析。他说英、美外交政策上的任何一点变化，或者匆忙的、轻率的对国民政府的任何形式的压力，都只会起副作用而没有任何好处。只有策略地以友好的方式，美好的借口去帮助国民政府才行。例如在抗战这个总目标下，给中国政府援助，帮助他的发展，使之成为一个稳定、繁荣的国家。只有这样英国的帮助才能产生效果。

同时他怀疑美国是否会让英国参加对中国的事务。因为美国想垄断中国。美国是支持蒋介石的，对蒋介石的任何压力都会遭到美国的反对。因此布鲁恩说英、美联合援助国民党是自然的，合乎逻辑的。因为英、美中是太平洋战争中的盟国。他还建议要与俄国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看法。不过他相信俄国在任何时候都会支持英、美对国民党的援助。<sup>⑦</sup>

至于美国对华政策，斯科特说现在已经改变。美国一变对共产党的热情、同情的态度，转而

---

① FO371/41582, F4356/34/10, Seymour to Eden, 5 September 1944.

② FO371/41611, F1338/159/10, Minutes by Hudson, 20 March 1944.

③ FO371/46164, F261/35/10, Seymour to Bennett, 13 December 1944; FO371/41611, F1338/159/10, Minutes by Hudson, 20 March 1944.

④ Seymour Paper, 3/4

⑤ FO371/46209, F1085/186/10, Minutes by Scott, 20 February 1945.

⑥ FO371/46209, F804/186/10, Minutes by Scott, 8 February 1945.

⑦ FO371/46209, F804/186/10, Brune Minutes, 9 February 1945.

十分冷漠。斯科特十分高兴地说，美国不再压蒋介石，不再与中共接触的政策，正是英国一直所执行的政策。<sup>①</sup> 据此亨德森开始讥笑美国政策。他说美国人对延安开始时“太热情”，给予过分赞扬，而当他们最终不得不“冷却”下来的时候，就背上了“背信弃义”的骂名，至少中国共产党会这样指责他们的。他对英国一直支持蒋介石，不与中国共产党接触的政策感到沾沾自喜。<sup>②</sup>

斯科特与亨德森所说的英国和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冷漠”态度，即扶蒋反共政策。在赫尔利到中国前，美国为了利用中国共产党抗日所以主张国共合作。美国甚至准备向八路军提供武器，当然其条件是要把八路军置于美国将军史迪威的指挥之下。但是这一做法遭到了蒋介石的强烈反对。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从未想到战后日本会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伙伴国，相反美国认为中国才是美国的合作伙伴。在权衡利弊之后，美国决心扶蒋反共。1945年4月，赫尔利公然宣称不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此后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就不再是冷淡两字可以形容的了。美国脱下了伪装，公开支持国民党，企图消灭共产党。

但是英国不与中国共产党有正式接触的政策，却实际上反映了英国根深蒂固的仇共心理。美国政府还多少“热”了一阵，而英国政府一直冷漠地对待中国共产党。不过由于英国又不喜欢国民党政权，所以英国对国共斗争的政策就表现为“听之任之”，或曰“中立”。当然英国的这种态度，除各种考虑之外，最重要的是英国缺乏物资和经济能力干预中国事务，英国不愿、也不可能给国民党提供大量的援助。

英国外交部远东司新任司长贝纳特，曾经希望改变对中国共产党的冷漠政策。他于1944年10月21日给薛穆发出一封绝密电报，征求薛穆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他说，英国应该改消极政策为积极政策，关心国共谈判并且要对中国共产党友好。他问道：“如果你同意我们不应该再被动下去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对国民党采取何种形式的压力？”他主张英国要采取行动让国民政府知道，如果国民党想要盟国承认中国政府为世界四强之一，它就必须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要结束目前中国极其不正常的情况，即结束国民党政权用大量精锐部队监视自己的同胞，而不去抗日的局面。贝纳特提议英国不要用威吓手段来达到上述目的。相反只要对中国共产党表示同情和兴趣，那就可以取得预定的效果。不过贝纳特感到为难的是英国缺乏必要的借口去与中国共产党发生联系。因为美国在与中国共产党交往时的借口，是了解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军事力量。因为根据盟国的有关条约，美国承担着对中国抗日的主要战争物资供应工作。这样美国才可能与中国“造反”的一方联系，而不遭致国民政府的轻易反对，英国却没有这种借口。

但是他强调英国在中国的传统政策，是要与中国各派力量进行实质上的接触和保持关系。他说：“英国的政策和实践是当中国只是名义上统一时，我们要与各地方当局打交道。”因此他问薛穆，从英国利益出发，是否应该立即建立与中共的关系？用什么办法才能使国共实现合作？他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他说：“总之，是否应该通过直接接触来发展与中共的关系？我们难道不应该这样做吗？”他补充说，他并非建议在现阶段就往延安派出正式代表团，正如美国那样。但是他希望由一位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官员访问延安，为双方关系的发展奠定基础。这就可以在需要时与中共政权建立永久的、甚至是领事馆关系。这就可以反过来改善英中关系。<sup>③</sup>

---

① FO371/46209, F1156/186/10, Henderson Minutes, 14 March 1945.

② FO371/46209, F1156/186/10, Henderson Minutes, 14 March 1945.

③ FO371/41582, F4857/1929/10, Bennett to Seymour, 21 October 1944.

但是薛穆却不赞成贝纳特的上述建议。他主张维持现状，只在重庆保持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即可，根本用不着派人到延安。他的理由是，这样做会开罪国民党政权。他说虽然国民政府腐败和虚弱，但不会失败。而中国共产党虽然深受中国人民的拥护，但是他仍然怀疑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体制，是否在人口众多和比较富庶的省份能行得通。他断言，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要诞生，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美国的干涉和对国民党援助，即使在地方自治的基础上，中国的统一也不容易做到。而且如果英国进行干涉，压国民党做让步，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那么可能招致蒋介石再次干预印度独立的问题。他还担心苏联为此会做出反应。最重要的是，英国不能不顾国民党政权的反对，在中共地区设立领事馆。<sup>①</sup>

在英国政府内，薛穆是比较同情延安且与中国共产党人有过接触的外交官员。他的意见尚且反对与延安发展关系，这就使贝纳特不得不放弃了在延安设立领事馆的想法。在1944年底，当美国军事代表团到达延安，以及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访问延安轰动中外之时，英国仍然冷眼旁观。贝纳特的建议是太平洋战争期间，英国负责官员的一次绝无仅有的、真正想改善与中共关系的想法。这一建议的取消，使英国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改善，要等到打败蒋介石政权之后。’

1945年2月9日贝纳特主持写了一份政策备忘录。文中揭示了英国采取“不干涉”政策的另一重大原因，即英国政府由于经济力量不够，不能在可见的将来向中国提供大量物质援助。而且美国为了独占中国，也不愿英国参加对国民政府的援助。他说，英国“被迫考虑了是否在目前条件允许的范围内，采取某些行动去影响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人的谈判”。但这一考虑由于薛穆的反对而取消。他重复了薛穆1944年11月7日信的内容。

薛穆的意见是不与中国共产党政权进行正式接触，英国与中国各方的关系应维持在目前水平。贝纳特希望有关人士仔细阅读薛穆的回电，他同意英国无力去“调解”国共谈判的观点。英国没有干预的借口，无端干预会引起国民党政权的不满。因为英国无法影响中国共产党，因此任何英国对国共谈判的影响，都只能是对蒋介石单方面施加压力而已。<sup>②</sup>

不过为了慎重起见，贝纳特于1945年2月16日再次给薛穆去电，要薛穆汇报中国的最新情况。他问道：自从1944年11月7日以来，薛穆的观点是否改变，是否仍然主张英国不干涉国共和谈？<sup>③</sup>薛穆回答说，现在英国更加不宜卷入。由于现在中国局势已经变化，国共谈判陷于僵局。中国共产党的谈判代表已带着国民政府关于谈判的最新提案回到延安。临行前，周恩来暗示中国共产党将反对这些提案。谈判中最棘手的问题，是关于收编中共军队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毫无进展。如果英、美、苏三国想联合起来促进国共之间达成协议，那是枉费心机。因为国民党政权根本不愿苏联参预国共和谈。薛穆还认为根本不可能提出一个为美、苏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sup>④</sup>同时薛穆反问道：“如果把国共斗争变成了盟国之间的论争，那岂不是很危险吗？”如果美国认真地要求英国支持干涉以达成国共之间的妥协，英国要加以拒绝是十分困难的。但是薛穆认为即使英国参加美国的调解活动，也不可能影响国共谈判的结局。<sup>⑤</sup>

薛穆认为在中国不可能有联合政府。因为国民党不会放弃一党专政。他引用了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及其他国民党要员在1945年2月17日的讲话，加以证明。孙科等人说，国家的统一和联

---

① FO371/41582, F5408/34/10, Seymour to Bennett, 7 November 1944.

② FO371/46209, F804/186/10, Minutes by Bennett, 16 February 1945.

③

④ FO371/46209, F804/186/10, From Foreign Office to Chungking, 16 February 1945.

⑤ FO371/46209, F1805/186/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19 February 1945.



合，不可能由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来真正实现。中国要实现真正的统一和联合，需要几个条件。但基本条件之一，是各党派要承认国民党在过去和将来的领导地位，否则没有统一和联合可言。据此，薛穆认为，中国共产党绝对不可能答应在这个条件下组成联合政府。<sup>①</sup>

薛穆的看法加强了英国政府在中国实行“不干涉”政策的决心。英国政府于1945年4月制定了“不干涉”政策，并发出了一份名为《中国共产党问题》的文件。这份文件详细引用了薛穆的观点，强调在中国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真正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案。文件说，英国外交部已经两次征求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对有关问题的看法，但是薛穆两次都反对英国干预中国的国共和谈。第一次薛穆认为除非美国要求，否则英国不应该干预。第二次是在马耳他会议后，外交部提出关于是否由英、美、苏三国共同努力，促使国共谈判达成协议的建议。但是薛穆再次给予否定的答复。<sup>②</sup>

同时这份文件又提出，英国不要太严格地执行“不干涉”政策。英国应该机动灵活，在情况需要时和机会到来时，仍要参加干预国共斗争。现在英国不应该向中国提出任何涉及国共谈判的计划，但是应该通过驻华大使馆向国共双方都施加影响。<sup>③</sup>从这份文件看出，英国政府迫于力量不足，不敢干涉国共谈判。但是英国仍然野心勃勃，只要有机会，仍要插手中国事务。

到1945年9月，英国重申了其对华政策，特别是执行不干涉国共谈判的原则。这是因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访英，英国外交部检讨了对华政策，并为英国外长艾登准备了一份文件，提醒艾登在会见宋子文时应该注意的问题。这份文件要艾登记住：国民党即是中国政府，该政府是得到英、美、苏承认的合法政府。蒋介石既是政府首脑，又是国民党党魁。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不是寻常意义上的共产党，更不是通常所指的政党。他们是自治的政府，可以发展为潜在的全中国的政府。他们有自己的政权和军队，控制着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国西北部地区。他们与旧式的中国军阀们不同，有吸引广大中国人民和外国观察家们的政策。这份文件声称，虽然国民党与共产党双方都自称为民主而奋斗，但双方都不能称为民主。他们实质上是互相对立的两个“独裁”政权。

英国外交部这份文件，揭示了英国政府是反共的，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府是“独裁”政权，故不予支持。这份文件接着说，国共双方都自称有责任去建立民主社会，但是他们对民主有不同的理解，并对把民主实行到什么程度有不同看法。英国外交部这份文件，对国共两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看法到是正确的。它认为国共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主要是由他们代表的阶级而决定。国民党的权力主要来自绅士阶级，即大地主资产阶级；而共产党的权力来自农民。这份文件把国共之间的根本分歧归纳为两点。第一，是由国民党一党专政，或者是组成一个有共产党共享权力的联合政府；第二，是关于控制中共军队问题。<sup>④</sup>

在谈到英国的“不干涉”政策时，该文件追述了外交部曾数次征求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的意见。薛穆反对介入国共斗争。外交部认为薛穆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英国的干预会把国共争端变

---

① FO371/46209, F1805/186/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gin Offic, 9 February 1945.

② FO371/46167, F2464/35/10, The Communist Problem in China by the Foreign Office, 24 April 1945.

③ FO371/46167, F2464/35/10, The Communist Problem in China , Memorandum by the Foreign Office, 24 April 1945.

④ FO371/46213, F7471/186/10, Memorandum " The Communist Problem in China" by Ben-nett), 12 September 1945.

成国际问题，变成三强即英、美、苏之间的斗争。因此这份文件的结论是：中国国内的争端，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sup>①</sup>

这份文件十分清楚地表明，英国口头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取得的成绩，并在一定程度上同情中国共产党，但是实质上英国是不支持甚至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独裁，不民主。尽管他们也认为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但却支持国民党。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英国的“不干涉”政策，实质上是不允许英国同情中国共产党的人士歌颂或报导中国共产党的事迹；也不允许有正义感的英国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这一政策，实际上是听任国民党消灭共产党。这一政策是英国传统机会主义外交路线的延伸。

英国的“不干涉”政策形成于1944年底至1945年初。这一政策不仅为保守党政府采用，也为战后工党政府沿用。1945年新任外相贝文在议会发表宣言，表示英国政府不干涉国共斗争。英国政务次官乔治·劳也于1945年5月3日议审这一政策时，表示了同样的意见。<sup>②</sup>

英国的“不干涉”政策实，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中国共产党认为英国的这一政策，是“分而治之”的帝国主义手法的重演。<sup>③</sup>又由于这一政策没有公开宣布支持国民党政权，也就引起了国民党政权的不满。他们指责英国帝国主义在华殖民野心。甚至有的美国人也不满意英国的“不干涉”政策。例如约翰·戴维斯，就同意中国共产党对英国的批评。他宣称英国反对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或者在国民党领导下实现统一，其目的是希望保留从长江流域至印度支那边境这样一个半傀儡的重庆国民政府。<sup>④</sup>早在1943年底，美国国务院远东司政策顾问斯坦利就说：“美国大多数人认为，英国不愿看见远东在战后出现一个强大和统一的中国。”<sup>⑤</sup>

上述批评只提到了英国政策的主要方面，即英国不愿中国强大统一。但是英国政府内有一部分官员也不希望中国过于弱小。因为四分五裂过分弱小的中国，不利于英国在华利益的巩固和扩大。例如原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克拉克，在1943年10月19日说：“使中国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是英国一个世纪以来的政策。中国越统一和有秩序，中国对它自己的力量就会越有信心。那么我们就更可能和中国保持政治经济上的关系。”克拉克的这席话似乎很动听，而且也近乎事实，但是他忘了或者没有提到另一事实，即英国希望的这种中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必须要顺从英国利益。例如英国就希望这个中国中央政府，像清政府那样，是一个唯洋人之命办事的“洋人的朝廷”，来为英国利益服务。<sup>⑥</sup>

薛穆在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上也颇为典型。他同情中国共产党，不满国民党。但是他却反对歌颂共产党报道共产党的成就，更反对揭露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黑暗统治。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维护英国在华利益。事实上他的思想常常是矛盾的。他经常向英国政府报告国共斗争的情况，

---

① FO371/46213, F7471/186/10, Memorandum "The Communist Problem in China" by Bennett), 12 September 1945.

② 英国政府出版署：《议会记录系列》，1943，第416卷，第1360页。

③ Christopher Thorne, *Allies of A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 London, 1978, p. 547.

④ Christopher Thorne, *Allies of A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 London, 1978, p. 547.

⑤ FO371/35779, F5468/74/10, Addendum, 19 October 1943.

⑥ FO371/35779, F5468/74/10, Addendum, 19 October 1943.

希望国共争端解决，中国能统一。早在 1942 年 8 月他就说国共斗争对国共双方都是不幸的。<sup>①</sup>他根本不能理解在抗日战争最为关键的时刻，由于内部斗争，国民党的大量部队不能用于抗日而用于封锁陕甘宁边区。他曾建议英国政府应该想办法改变这种局面。他在向英国外交部建议对国共和谈不宜干涉的同一个月，又向李宗仁先生说，他作为中国的朋友，一定会尽一切力量去促进国共两党的团结，以实现一个统一的中国去抗击敌人。<sup>②</sup>这就充分表现了他的两面派嘴脸。

薛穆观点上的这些变化，是由于他谨小慎微、忠实执行上级指示而造成的。从个人来说，薛穆由于身在中国，比较全面地掌握国共斗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他同情中国，认为如果在战时国共两党能团结起来，其价值将无比巨大。因此他曾向英国外交部表达了上述观点。然而英国外交部的官员们远在千里之外的白厅，所以仍用传统眼光看待中国。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国共和谈成功对英国有多大利益。如果利益不大，他们是不关心的。所以早在 1943 年初英国外交部就定下了国共斗争是中国内部的事，英国不宜干涉的方针。因为国共斗争不涉及英国利益。正如布鲁恩爵士说：“国共斗争是一个中国国内问题，并不直接涉及盟国的利益。”<sup>③</sup>

所以当薛穆接到上述指示后，立即改变自己的观点。他还提出比外交部更偏激的办法，即连英国记者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都不允许。由于上述原因，薛穆遭到中外人士的批评。然而一旦薛穆被批评，他又会提出一些相反的建议。总之薛穆的思想极其复杂，因此，他对英国对华政策反复出现两面性是有一定影响的。例如 1945 年 1 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攻击英国政府和薛穆本人。赫尔利说，薛穆不愿看见统一和强大的中国。薛穆向上级汇报，说他不屑回答这个问题。但薛穆又建议说，由于赫尔利攻击英国政府不愿看见一个强大的中国，而希望一个分裂的中国，所以英国政府应该发表声明以正视听。这个声明应十分策略地发表，例如在论述太平洋战争局势时，表明英国政府热望中国的统一，并成为世界强国之一。英国愿与一个繁荣的中国保持友好关系。<sup>④</sup>

由于英国的“不干涉”政策，没有公开宣称扶蒋反共，而且实质上是认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将分治中国，所以也引起国民政府官员的不满。在 1945 年 1 月，中国到处都弥漫着传言，说英国希望中国分裂。这就引起了英国外交部的重视。当薛穆的报告送达英国外交部后，远东司司长贝纳特表示支持薛穆的看法。他说：“我们应尽一切力量去抹掉人们认为英国不想看见一个强大的繁荣的中国的想法。”他认为一个弱小、不统一的中国，将会给英国带来无休止的麻烦。他建议外相艾登应该根据薛穆的建议作一个公开讲话。艾登也这样做了。<sup>⑤</sup>

但英国口是心非的机会主义外交，并不因为艾登发表讲话而改变，因为类似的话他们说了不少。早在 1943 年 8 月，丘吉尔和艾登已经公开说他们希望中国统一。<sup>⑥</sup>1946 年升为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的布鲁恩，在 1945 年 1 月时也说，国共之间达成协议是当务之急，一刻也不应再拖下去。<sup>⑦</sup>工党政府首相艾德礼也于 1946 年 6 月 5 日在议会宣称：“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我们极

---

① FO371/31679, F6031/1689/10, Seymour to Eden, 27 August 1942.

② FO371/41616, F5966/159/10, Notes of Seymour's Conversation with Marshall Li Tsungjen, 27 November 1944.

③ FO371/35802, F6692/252/10, Brune to Eden, 6 December 1943.

④ FO371/46232, F409/409/10, 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18 January 1945.

⑤ FO371/46232, F409/409/10, Minutes by Bennett, 19 January 1945.

⑥ FRUS1943, China, p. 54.; P. W. C (L) August 1943, CAB99/26.

⑦ FO371/46209, F804/186/10, Minutes by Brune.

望看见尽快出现一个稳定、强大和统一的中国。”艾德礼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完全依靠于解决存在于国共之间的争端”<sup>①</sup>。

无论英国官员口头上说得怎样动听，但是事实上英国官员们并没有任何措施，去促进双方达成和平协议。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听之任之”，或者说是袖手旁观，伺机而动。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这一政策的实质，是听任蒋介石反共。英国对国共斗争的“不干涉”政策，是从自私自利的立场出发。在大英帝国衰落并面对美苏强大力量的竞争时，英国的对外政策更加审慎，机会主义色彩更浓。太平洋战争后，英国无力支持蒋介石进行大规模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而且美国也不愿英国涉足中国事务。所以英国被迫仍然执行“不干涉”政策。

### 第三节 战后英国“不干涉”政策的实施

#### 一、战后初期英国“不干涉”政策的实施

战时的英国对华政策，对战后中英关系的发展，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可以说，战后初期英国的对华政策，是战时英国对华政策的延续。

战后英国外交政策的两个柱石，是巩固英、美联盟及重建英联邦和亚洲各国的关系。由于英国的世界利益，以及经济重建需要美国支持和帮助，所以英国把英、美联盟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尽管双方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但仅仅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全球战略目标上英、美是一致的。但是由于英帝国衰落，经济力量的弱小不能支持强有力的外交。所以英国不是像美国那样，进行全球扩张，而是进行全球收缩。

英国认为亚洲是英国经济复苏最重要的国外市场之一。英国经济的恢复主要是靠对外贸易。为了能得到在亚洲贸易的机会，所以英国不得不承认亚洲国家的民族独立，并在许多涉及英国利益的事情上被迫做出让步。在对中国的政策上，英国就分外小心。因此，英国比较严格地执行了战时制定的对国共内战不干涉的政策。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发动了大规模内战。美国派了乔治·马歇尔作为特使，到中国进行调解。但是到了1947年1月，他的调解使命失败。

内战第一阶段蒋介石在军事上占优势。他从美国得到大量援助，还得到日伪军大量军需物资。中国人民解放军虽然在人数和装备上都远远比不上国民党军队，但却越战越强，先后打退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内战开始时，蒋军控制了三亿人口的中国广大地区，总兵力超过四百万。而解放区只有一亿多人口，部队不过一百万。但是到1947年11月，解放军兵力增加到280万，而蒋军降到365万。到三大战役后，蒋军失败已成定局。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底蒋介石逃到台湾。

西方各国根本没有料到中国的形势会如此迅猛发展。但是英国政府不仅不惊慌失措，反而有几分欢迎这种新形势的发展。这有下述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是英国政府早已预料到战后中国会有内战爆发，所以并不感到意外。第二是英国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苏联式的党，而是一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党。由于英国与国民党政权关系的恶化，英国愿与任何取代国民党政权的中国政府发展关系。第三是英国不愿失去中国这个巨大市场。不管什么政权在中国建立，英国都会承认这个政权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战后英国面临严重的财政、经济问题，资源枯竭，百废待兴。英国在军事上和外交上都十分虚弱。虽然英国在1947年从印度和巴勒斯坦撤走，但仍然占有广大殖民地。要维持这样广大的殖民地，特别是对付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是英国财力所不及的。所以英国政府最优先的考虑是

---

<sup>①</sup> 英国政府出版署：《议会记录系列》，第423卷，第2038页。



恢复国力。要恢复国力，最重要的是恢复和发展对外贸易。英国在华有超过三亿英镑价值的贸易利益，因此英国绝对不肯失去中国市场。<sup>①</sup>所以英国密切注视中国局势的发展，并小心地执行中立政策。

1945年底，英国政府决定一旦中国内战爆发，英国应该站在局外，执行中立政策。1945年12月，英国参加签订了《莫斯科宣言》，英、美、苏三国宣布，支持国民党政权去统一中国和实现民主，支持中国的各种民主力量参加国民政府，努力制止内部斗争。但是三国外长同时重申了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立场。这个宣言的出发点，是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但是由于三国外长宣布了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立场，因此《莫斯科宣言》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中国共产党人就经常引用这一条款来反对美帝国主义违反莫斯科宣言，实行扶蒋反共的政策。

从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开始，英国就基本上执行着“不干涉”政策。战后英国仍然只承认国民党政权，而不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府。英国表明要支持国民党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取得中国的统一和建设强大、稳定的政府”，其实质是不干涉国民党去消灭共产党。不过在中国的整个内战过程中，英国出于各种考虑，基本上执行了中立政策。正如1948年6月24日英国外交部在总结中国形势时所说：“如果中国目前内战要得到根本的解决，就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任何外界的干涉都是有害无益的。”当然英国政府这样做并非完全是让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问题，而是看到了西方的干涉不会有效果。无论怎样给蒋介石输血和打气，都不能挽救国民党的失败。干涉的结果只能使英国失去与中国共产党改善关系的机会。<sup>②</sup>在国共内战中，当蒋介石急需英、美帮助时，英国仍然坚持中立，这在客观上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

英国的中立政策，表现得比较突出的是英国对国民党实行武器禁运。战后英国虽然国力衰落，但是由于战争的结束，英国在印度等地有大量剩余的战争物资，在中国内战爆发后，英国是否赠送和出售武器给国民党政权，是衡量英国对中国内战交战双方的态度的尺度之一。

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英国曾送了几艘军舰给国民党政府。但自中国内战开始，英国就不再给国民党军火支持。当然英国各个部门在执行这一政策时，其秩序好坏的程度不一，例如殖民地仍然给了极少量武器给国民党部队。不过从总体看，英国没有给国民党大量的武器装备。

1946年8月，美国的马歇尔将军到中国。为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进行谈判，美国政府内部决定不准出口武器到中国。但是这项禁运命令从未公开宣布过。当马歇尔的调处失败后，美国很快恢复了向国民政府出口武器的做法。

英国见美国进行武器禁运，即紧跟上于1946年10月对国民政府进行禁运。但是英国与美国的做法不同。英国政府公开宣布了向国民党政府的武器禁运令，而且坚决执行到底。<sup>③</sup>1947年5月27日，英国外交部重申了武器禁运令：“只要目前中国内战继续进行，英国政府的政策就是不向中国出口武器。”<sup>④</sup>根据这个政策，英国政府拒绝了国民政府数次购买武器的要求，也拒绝了国民政府要求英国有关公司生产炸药和飞机的请求。英国政府还拒绝了英国官员和商人要求解除武器禁运的请求。

1947年5月30日，新任英国驻华大使史谛文向英国外交部建议解除武器禁运令。这是一次检验英国政府是否真正秩序对华不干涉的中立政策的机会。史谛文说，如果不出售武器给国民

---

① FO371/69529, F4329/33/10, Minutes by Denning, 19 March 1948.

② FO371/69535, F8945/33/10, Situation in China, 24 June 1948.

③ FO371/69551, F17498/34/10, 4 December 1948.

④ FO371/63272, F13859/119/10.

府，他们就会埋怨英国政府与美国政府步调不一。他说：“继续向中国禁运武器，使之不能运用到中国内战的政策，虽然能使我们从中得到一些道义上的好处，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向中国提供英国武器有好处。这样可以纠正我们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否定态度，从而取得平衡。这样，还可以使我们得到物质上的好处。”<sup>①</sup>但是英国外交部在经过研究后，并不采纳史谛文的看法，继续执行武器禁运政策。<sup>②</sup>

除了执行“不干涉”政策的原則外，英国政府还有两个考虑。第一是国际影响问题。英国不愿因为向国民党政权提供军事援助，帮助国民党打共产党而成为苏联攻击的对象。第二是出于反共的考虑。这一想法是1949年有英国外交部正式提出的。英国外交部认为，国民党必将失败已经十分清楚，如果解除武器禁运，大批英国武器就会运往中国。而这批武器很快就会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投降而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手中。英国不愿意看见援蒋武器落入中国共产党人手中，因为他们担心这些武器会被中国共产党用来在远东反对英国殖民地和法属印度支那。因此英国一直执行对国民党政府的武器禁运。<sup>③</sup>

但是应该指出，这个武器禁运令并没有严格地执行。1946年7月到1948年3月，英国允许香港作为运输中心转运各国武器给国民党政权。这些武器实际上被蒋介石用来打内战。而且英国的“不干涉”政策，政府各部门执行的情况不一。英国外交部严格执行这一政策，对许多公司申请出口武器和有关的作战物资一律禁止。而英国殖民部直到1948年3月仍允许香港作中转站运送除英国以外的各国武器给国民政府。<sup>④</sup>

在1947年7月英国殖民部允许出售武器和军火给广东省警察部队，其借口是这些武器和军火是给广东警察用于镇压匪帮。英国政府声明这些武器不能用于内战，事实上广东警察运用这些武器绝非仅仅对付土匪，而是对付共产党和进步民主势力。因此在1949年5月，英国外交部承认说：“从理论上讲我们有一条严格禁运的法令。而且这条法令由国防委员会于1948年1月重申，禁止向中国运送武器。但事实上这条禁运令从未严格执行过。”<sup>⑤</sup>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战后英国对华政策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从纯粹反共立场出发。英国的政策是现实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从本质上讲英国是反共的；从殖民主义利益出发，英国不仅反共而且反蒋。因此英国执行不干涉中国内战的中立政策，以便从中得到好处。而且客观条件也允许英国执行这种暧昧的“不干涉”政策；

首先，美国在中国充当老大，企图垄断中国事务。而在中国内战后期，美国对蒋介石的无能深感失望，不仅想换马，而且减少了对蒋介石的援助。众所周知宋美龄于1948年访美争取美援，遭到杜鲁门冷遇就是例子。所以英国坚持武器禁运并不会触犯美国，危害英、美关系。

第二，苏联一再要求英、美遵守1945年12月签署的《莫斯科宣言》，不干涉中国内战。而战后冷战之风横扫欧洲，丘吉尔坚决反共，他把社会主义国家称为“铁幕”，在若干问题上攻击苏联。英苏在欧洲问题上斗争激烈，因此英国不愿在援蒋问题上给苏联以口实。

第三，是中国人民和世界正义的人们坚决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部事务。所以英国的

---

① FO371/63272, F7375/13/10, From Nanking to Foreign Office, 30 May 1947.

② FO371/63272, Scott to Haynes, 3 June 1947; FO371/63272, F8865/13/10, Scott to Haynes, 7 July 1947.

③ FP371/75880, F880/1194/10, Arms for China, 16 May 1949.

④ F371/69551, F18445/34/10, From Colonial Office to Chancery Nanking, 6 December 1948.

⑤ FO371/75880, F6872/1194/10, Memorandum.

“不干涉”政策总算坚持下来。

由于英国在某种程度上执行了“不干涉”政策，所以使英国在政治上得到了许多好处。首先英国没有像美国那样深深“陷入中国事务的泥潭”，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改善留下了余地。

但是在1949年发生了“紫石英”号军舰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使英国与新中国的关系，曾一度出现紧张局面。

除了在1949年4月发生“紫石英”号军舰事件外，中国共产党一直很少公开批评英国帝国主义。而且“紫石英”号军舰事件后，虽然中英两方对这次事件的看法不同，但英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并没有恶化。1988年秋英国伦敦的《当代中国》杂志发表了1950年曾任英国驻华大使馆中文秘书班德雷先生的文章《紫石英号军舰》。

班德雷先生说，1949年4月19日，“紫石英”号军舰是奉英国上海领事之命从上海驶往南京去装载从南京撤退的英国人。这一命令曾请示英国驻华大使史谛文，但是英国外交部和内阁并不知道。当该军舰于4月20日到达距南京60英里的地方时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了战斗。然后英国派了另外三艘战舰前往营救“紫石英”号军舰；经过激烈战斗，“紫石英”号军舰不能动弹，其余三艘军舰逃跑。英国要求让“紫石英”号军舰撤走，双方开始谈判。到7月30日前中英双方仍未达成协议，但“紫石英”号军舰却乘机悄悄逃跑了。

事后，英国首相艾德礼却在议会上说，“紫石英”号军舰于4月20日晨9点，驶达距南京60英里处时，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因此英国被迫还击。丘吉尔甚至在议会上大吵大闹，扬言要派航空母舰到中国报复。但议会讨论的结果是：不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战斗，不扩大事件。因为许多英国有正义感的议员认为，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发动渡江战役的前夕，英国军舰却驶入交战区，无论如何是十分愚蠢的。因此派军舰到南京撤退英国人的决定，是不明智的。

当然班德雷先生的上述观点仅代表英国人的看法，英国议会文件也记载了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讨论。<sup>①</sup>但是中国方面的看法却非如此。毛泽东认为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进行渡江作战时，三艘英国军舰闯入中国的内河长江，伙同其他国民党军舰一起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开火，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死伤252人，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被迫反击。

毛泽东强烈抗议英国军舰的暴行。<sup>②</sup>紫石英号军舰事件，无论英国动机如何，但闯入中国内河，不仅事先不向控制该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说明原因，反而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开火，构成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侵略行动，是英国犯下的罪行。但是由于事态未扩大，因此没有严重影响英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例如英国下院议员韦亚特在议会说：“毛泽东说过，中国共产党人不会忘记英国没有帮助国民党扩大内战。”<sup>③</sup>这样，由于英国基本执行了中立路线，所以中国共产党对他们的态度是比较友好的。“紫石英”号军舰事件并没有影响到中英关系的发展，这场风波很快过去。

1949年3月至4月，英国驻华大使史蒂文森，多次向英国政府汇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的地区，中国共产党对待英国领事馆的态度要比对待美国的好。<sup>④</sup>中国共产党人对待英国商

---

① 英国政府出版署：《议会记录系列》，1943，第464卷，第2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403页。

③ 英国政府出版署：《议会记录系列》，1943，第467卷，第1260页。

④ FO371/75810，F4314/1023/10，From Nanking to Foreign Office，1949年3月23日；F4793/1023/10。1949年3月31日。

人也很好，所以英国认为中国共产党将会让英国商人继续在中国做生意。这一切加强了英国坚持“不干涉”政策，准备抛弃国民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心。

尽管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英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在逐步改善，但是要进一步发展却不容易，主要原因是英国的保守和反共。只有到中国共产党彻底打垮国民党政权后，英国才可能考虑与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外交接触。在此之前英国政府内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问题和新中国的性质问题进行了无休止的争论：即新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还是苏联的傀儡？

## 二、从不干涉到承认新中国

英国战时对中国共产党的分析以及对国民党政府的看法，在战后初期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进一步向与中国共产党友好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使英国确立了承认新中国的政策。

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认识不清楚。他们一般都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由苏联操纵的共产党。但是英国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比较深入而且接近事实。

英国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苏联的附庸。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因此不是、也不可能是苏式共产党。但是这一结论是经过长期的观察与总结才得出的。1945年前，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已经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做了分析，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自成一类的党，中国共产党不受苏联控制。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在实践上却是“地方性的和独立的”<sup>①</sup>。他的证据是中国共产党在宣布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同时，又宣布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薛穆的看法是正确的，很快为英国外交所接受。

在1947年到新中国成立前，英国的上述看法曾经发生过变化。英国政府曾改变了看法，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苏式的共产党。薛穆的继任者，从1946至1949年担任驻华大使的史谛文刚到任，下车伊始就提出了这种看法。他于1946年11月向英国外交部汇报：“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首先是，而且永远是共产主义者。所以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坚决执行党的路线，而且自动地为苏联的利益而工作。”<sup>②</sup>

史谛文前面的话是正确的，但是后面的推论却是错误的。上述话体现出他不了解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毛泽东首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他同时又是中国的民族英雄。民族主义思想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的分量并不轻，他根本不会容忍苏联或者任何其他国家的党干涉和控制中国共产党。

按西方史学家的观点，斯大林的中国政策不是真正为了中国革命的利益，也不是为了世界革命的整体利益，而是他与托洛茨基争夺领导权斗争的产物，因而不合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这种说法无疑是错误的，因为虽然斯大林的中国政策有脱离中国实践的错误，从而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践，但是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并不是与托洛茨基争夺领导权的产物。

事实上从1927年以来，毛泽东一直反对生搬硬套学习苏联以城市暴动为主，夺取全国胜利的路线。毛泽东走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路线。从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奉行着独立自主的路线，不受苏联控制。正因为如此，斯大林才歪曲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说中国共产党人是“一群村夫”，他不相信这“一群村夫”，会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sup>③</sup>

---

① FO371/46216, N15123/10674/38, Seymour to Bevin, 5 November 1945.

② FO371/69527, F2757/33/10,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7 February 1948.

③ William P. Head, America's China Sojourn, USA, 1983, p. 180.



尽管史谛文的看法不完全正确，但是英国外交部转而同意他的看法。因为史谛文战时是英国驻南斯拉夫大使，有与共产党打交道的经验。

到1948年，中国形势发生巨变。史谛文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修改了他在1946年对中国共产党性质所做的分析。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了局势，指出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办法，并且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史谛文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大变化。他着重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

1948年2月2日他向贝文报告说，中国共产党是有中国特色的真正的共产党。他欢呼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政策上的变化。他说毛泽东的新政策是“与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因而他说毛泽东在对待农民的政策上“放弃了以往的错误”，富农不再是“受害者”，而小手工业者和商人，中小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将在中国的未来发挥重大作用。<sup>①</sup> 他汇报说在广大农村和城市，已经按照毛泽东的新政策办事。

根据他的报告，英国外交部认为正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运用了这些政策，所以得到人民支持，军事力量大增。这样顺利攻克了国民党统治的许多地区。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次官丹尼因此推论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只是一个时间问题。<sup>②</sup>

史谛文在他的报告中还指出了中国共产党不是苏式党。他说中国和苏联的文化背景根本不同，“因此，要把中国变成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肯定会是极其缓慢的过程”。他所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实际上是苏式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从未照搬苏联经验，例如在城市，中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未被消灭。史谛文还进一步分析中国共产党不会排斥外国人的原因。他说中国不可能因“铁幕”的缘故而驱逐外国人，因为中国有大批海外华侨，而且中国指望海外华人的汇款，中国还吸取华侨的思想。

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史谛文认为虽然中国南部和中国北部一样，不得不改变其农业的形式，但是即使是最正统的苏联理论，也会承认在中国南方种植水稻的地区不可能实现农业合作化。

史谛文则进一步说中苏之间有很多矛盾，这就使得中苏关系会出现麻烦。他说：“正如苏联1924年对待中国的蒙古一样，苏联对中国新疆的政策明显的要吞并该省的部分地区。在大连，苏联也实行同样的蚕食政策。”<sup>③</sup>

至于英国在华利益，史谛文认为英国的贸易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之下，绝对不会比在国民党统治下糟。他说：“除了对美国之外，中国共产党政府对英国不会比对其他外国更坏。”<sup>④</sup> 因此他建议应该与中国共产党政府建立关系。

但是英国外交部新设立的“中国司”却有不同看法。他们完全不同意史谛文对中国共产党对内政策的分析。例如斯科特说，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工作政策并非“巩固地团结中农”。他武断地说：“这即使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但绝不是他们的实践。”相反，他污蔑中国共产党执行的是一条虽然非常成功，然而比马克思主义更残酷的政策。他提醒所有的人注意，毛泽东本人在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个部分。据此他断

---

① FO371/69527, F2535/33/10, Stevenson to Bebin, 2 February 1948.

② FO371/69546, F17564/33/10, Minutes by Dening, 8 December 1948.

③ FO371/69527, F2535/33/10, Stevenson to Bebin, 2 February 1948.

④ FO371/69527, F2535/33/10, Stevenson to Bebin, 2 February 1948.

言“在对外政策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就是莫斯科政策的翻版”。他并不认为中国共产党把中国变成一个正统的苏式国家，会经历很长的过程。而且他也不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外国商人的境遇会好到哪里去。他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英国的利益将比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要糟。

在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上，虽然他同意苏联对中国有领土野心，但是他错误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敢反对苏联的蚕食。他说：“谁能认真相信苏联会允许中国的任何党派，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其他党派，去干涉苏联在满洲和新疆的战略利益呢？”<sup>①</sup>他完全忽视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传统。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不分青红皂白，对资本主义国家一视同仁。所以，英国的处境不会比美国好。而中国共产党属于苏联集团，中国共产党政权是苏联的傀儡，世界共产主义国家是铁板一块。他的上述分析当然是从僵死的、仇共的方法和态度出发，因此不能客观冷静地看问题。

英国外交部的中国司司长斯卡勒和外交部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次官丹尼转变观点，同意斯科特的意见。丹尼代表外交部写信给史谛文，说英国外交部部长贝文看见史谛文 1948 年 2 月 2 日的电报后，和他进行了讨论。贝文说这封电报对制定英国对华政策并没有帮助。丹尼提醒史谛文说，他 1948 年 2 月 2 日的电文是与他以前的看法互相矛盾的。关于史谛文提议与中国共产党政府建立关系一事，丹尼说，即使预料中国共产党将取得全国胜利，目前也不是讨论英国与中国共产党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同时他还送去一份名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是英国外交部远东司中国处起草的。丹尼要史谛文谈谈他的看法。

当时史谛文不在南京，由参赞蓝来纳执笔回答。由于英国驻华大使馆比较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他们的看法当然比英国外交部要客观一些。史谛文 1948 年 2 月 2 日的电文，无疑代表了整个英国驻华大使馆的意见，所以蓝来纳可以立即答复英国外交部有关问题。蓝来纳本人在思想上是非常反共的，他发表了大量反共言论。但是他却赞同史谛文对中国共产政策的分析，并且他极力为史谛文辩护，对丹尼对他们的批评毫不让步。他说：“在我们的报告中如果有什么前后不一致，或者有前后矛盾的地方，那是中国局势迅速发展的自然反映。局势的变化使我们改变和修改了原有的观点。”

蓝来纳说，史谛文 1948 年 2 月 2 日给贝文的信，强调了中国共产党政策中的一些新因素。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团结中农和允许小资产阶级自由经营工商业的政策，是为了吸引和争取资产阶级和城市其他阶层人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实施这些政策和他们的宣言时，是很精明的。由于上述政策，他们改善了自己的处境。不过，蓝来纳把执行上述政策说成是中国共产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拉拢国民党的天然联盟中产阶级，因为这些人代表了稳定的社会中层。

蓝来纳解释说，史谛文之所以要汇报上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活动，完全是要让英国外交部知道对英国来说，英国在华利益在任何政权之下都要比在国民党统治下稳固。然后蓝来纳陈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的性质。他说关于中国共产党是奉行中国牌记的共产主义或是紧跟苏联模式，完全取决于你怎样去解释。但是他根本不相信从长远的观点看合作化理论，会合乎中国农民的要求。因为中国农民古老而热烈的愿望，是获得自己的土地和取得比自身还重要的整个家庭的稳定。他肯定地说：“把中国变成一个正统的共产主义国家，至少将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当然蓝来纳完全是为英国利益着想来汇报问题的。但他发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的确可以吸引中农和城市中产阶级。他还指出，在中国最腐败的政府是国民党政府。但是蓝来纳对共产主义是仇视的。他曾把共产主义描写成“邪恶的、毁灭性的吃人恶魔”。他希望中国传统的情性和腐败

---

<sup>①</sup> FO371/69527, F2535/33/10, Minutes by Scott, 24 February 1948.

作风，能阉割像共产主义那样充满生机的力量。虽然他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胜利，从长远的观点看，他们从意识形态上出发会不可避免地反对英国；但是英国的利益在中国共产党政权之下肯定比在国民党政权之下有保障。蓝来纳没有具体说明为什么，但是他建议说，在全力反对共产主义的同时，英国不应该无缘无故地向中国共产党政权挑衅，以惹起他们的敌意和愤怒。因为这样做，只会使在中国共产党统治区的英国人遭到报复和损失。英国政府应该避免给英国在中国共产党统治地区的领事们制造麻烦。<sup>①</sup>

英国外交部接到这份报告后，仍然不同意驻华大使馆的意见。他们认为蓝来纳的这份回文，是在通过迂回的方式来为史谛文写给贝文的信辩护。这份报告是要英国政府采取步骤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改善英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但是他们注意到蓝来纳所强调的问题，即在实践上英国应该与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区打交道。

同一天，蓝来纳又给丹尼写了一封信，同时给外长贝文也写了一封信。蓝来纳强调应该使中国共产党人乐于与外国人做生意。<sup>②</sup> 在给贝文的信中，蓝来纳首先强调他对共产主义的反感：“不论中国共产党把共产主义修改到何种地步，以适应中国的具体情况，共产党专政的国家，从根本上来说是仇视非共产主义国家的。甚至在中国独立于苏联以后，也会表露出这种敌意。”<sup>③</sup>

英国外交部对蓝来纳的这个观点是极为欣赏的。他们作了引申，于1948年6月24日写了一份题为《中国局势》的备忘录。该文说：“毫不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事实上首先是共产主义者。他们正在做我们已经熟知的欧洲共产党所做的一切：不仅尽力在整个中国灌输共产主义思想，并且在中国以外的一切地区，结合当地具体情况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宣传以获得对这些地区的支配权。”<sup>④</sup>

由此看出，英国外交部大部分官员是多么固执和具有偏见。在他们看来即使中国共产党独立于苏联，也仍然是他们的敌人。但是到了1949年底，中国形势已经明朗，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特别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考虑新的对华政策。首先为了捍卫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否则英国将失去在中国做生意的机会。这就促使英国官员重新考虑问题。这时贝文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他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而且永远是中国人。”<sup>⑤</sup>

他愿意与中国共产党谈判，承认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不论贝文说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的动机如何，但是他愿意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总是一个进步。在冷战开始，要承认新中国，就要找个借口，说明中国不是苏式共产党。因此贝文的上面那句话就为英国政府承认中国找到了最好的说辞，变为英国搪塞美国的最方便的理由。

薛穆在1945年2月曾经向英国政府建议，如果中国分裂成两部分，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在北，而国民党政权在南的话，英国政府应该执行传统的英国政策。这个政策是，当中国由于内战或其他原因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时，英国要承认和支持当时的中央政府。即使这个中央政府是

---

① FO371/69534, F8032/33/10, Lamb to Denine, 25 May 1948.

② FO371/69534, F8050/33/10, Lamb to Bevin, 25 May 1948.

③ FO371/69534, F8050/33/10, Lamb to Bevin, 25 May 1948.

④ FO371/69535, F8945/33/10, Foreign Office Memorandum, "Situation in China", 24 June 1948.

⑤ The Private Papers of Sir Anthony Eden, Vol. 7. p. 180., FO371/75815, F14109/1023/10, Record of A Meeting Held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Washington, 13 September 1949.

反对英国的，英国也要给予承认与支持。同时英国政府要通过各地领事与分裂割据的地方当局进行交往，保持实质性关系。

这一政策是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指导原则。英国并不喜欢中国共产党人，并且不欢迎新中国。战后执掌英国对华政策的一批人，都相当仇视共产主义。他们承认的只是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这一现实。在 1949 年底，中国的政局正好颠倒过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成为中国大陆事实上的中央政府，而国民党政权逃往和窃据台湾。

虽然英国对新中国怀着戒心，但是英国也不喜欢腐败的国民党政权。1945 年以前在英国外交部工作的乔治·扬，曾做出天才的预见，说中国共产党一定会战胜国民党，新中国就要诞生了。他曾说英国应当欢迎她或者学会容忍她的存在。但战后乔治·扬被调到南斯拉夫工作，并很快病逝。战后英国外交部缺少像乔治·扬这类出色的人才。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是反共的。但是从实际利益考虑，他们就不得不考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年前不论国民党政权如何执行反英路线，英国仍然支持国民党政权。例如 1945 年底，国民党接收大员在上海各地也抢占英国人的财产，引起英国愤怒。战后国民政府与英国关系仍然不太好。但是正如蓝来纳在 1948 年 5 月 25 日说的那样：“我们的利益不是在中共一边。不管国民党有多坏，我们都要站在它一边。”<sup>①</sup>

国民党仍然得到英国支持。不过，纵观蓝来纳所有的报告，他是倾向于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的。他的所有反共言论看来都是虚晃一枪，以免背上“亲共”的罪名。例如 1948 年 5 月 28 日，即他发表“不管国民党多坏，我们都要站在它一边”的讲话三天之后，他向英国外交部建议说：“主动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是必要的。必须认识到在实践上我们迟早要与他们控制的地区打交道。”<sup>②</sup>

这是英国政府内首次提出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的建议。这次他得到外交部的支持。例如斯科特说：“不论在中国由什么政府当权，从长远来看，促进英国与中国的良好关系都是会收到好处的。”<sup>③</sup>的确，进入 1949 年后英国的对华政策开始变化了。英国工党政府开始考虑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首先是考虑承认“华北人民政府”。

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于 1948 年 8 月。1949 年 1 月平津战役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北京、天津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管辖之下。因为天津是英国对华贸易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为了捍卫英国的利益，英国外交部准备在继续承认国民政府的同时，承认“华北人民政府”为地方当局。英国开始通过其领事和其他联系人与中国共产党人联系。例如要求哈蒙为中间人，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哈蒙战时任英国驻华大使馆官员，1949 年时担任英国驻华大使馆公共关系处官员。在“二战”结束时他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英国政府准备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打算，得到外交部法律顾问贝克特的支持。贝克特认为如果拒绝承认有效地控制着绝大部分领土的一个政府，不仅在法律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也会给英国带来很多困难。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应该被承认，至少应承认是他们控制地区的政府。同时英国应该继续承认国民政府是全中国的政府。

他强调，英国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不是英国喜欢这个政权，而是形势发展至此，这是一种合法的承认。最后，如果英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中国共产党人是否会允许不承认他们的国家

---

① FO31/69534, F8032/33/10, Lamb to Denning, 25 May 1948.

② FO31/69534, F8032/33/10, Lamb to Denning, 25 May 1948.

③ FO31/69541, F15483/33/10, Minutes by Scott, 23 October 1948.



的领事馆存在，就是令人怀疑的，正如 1932 年日本对待不承认“满洲国”的外国领事一样。

但是在 1949 年初，英国政府仍然没有预见到中国共产党会取得全国胜利。因此尽管英国外交部在政治上同意法律顾问的意见，他们仍然决定在时间不成熟时，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华北人民政府”。

外交部为推迟承认“华北人民政府”提出了三条理由：“（1）华北人民政府必须被看成是间歇性的政权，它目前正在转变为某种形式的新政权。但是还不知道目前的中央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能否组成某种形式的联合政府。而且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决定他们的首都。”这条理由表明，英国仍然在观望之中。不到国民党政权被彻底打垮，英国是不会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第二条理由是：“根据总的原则，我们不愿意在不适当的时候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因为这容易被人们误认为英国因为在华利益处于危险之中，所以不顾原则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这句话不仅表明英国考虑问题仍然从反共的意识形态出发，而且也表明英国机会主义的外交作风。英国外交部的第三条理由是：“我们只有与其他国家商量之后，才能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sup>①</sup>也就是说要与美国协商以后才行。这充分暴露了英国战后外交紧跟美国政策的情况。

英国外交部把上述内容发送到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此时英国准备十分小心地奉行对西班牙内战时那样的政策，即承认右派为中央政府，但又承认左派战线。英国在意识形态上是反共的；所以英国不愿草率从事，在时机成熟之前，不能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这样可以免被西方认为英国放弃了反共原则。而英国立国依靠外贸，依靠掠夺殖民地。战后英国殖民地开始解体，英国经济更依赖于外贸。所以英国不愿失去在华贸易机会，因此英国又想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渡江战役之后，英国开始认真考虑承认即将诞生的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毛泽东已经表达得十分清楚：中国共产党人愿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承认其他国家。<sup>②</sup>这就为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可能性。

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上英、美产生了分歧。战后美国霸权野心空前膨胀，充当着世界宪兵，在意识形态上把反共作为己任。尽管在美国政府内，例如在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也有一部分官员客观地对待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成绩，他们也相信美国迟早会承认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但是美国当时正刮起反共的旋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坚持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决心奉行与美国不同的方针。

1949 年 8 月 26 日，英国外长贝文召见美国驻英大使道格拉斯。贝文告诉他英国准备执行与美国不同的政策，因为英国的对华政策深受过去历史的影响。接着贝文阐明他和英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看法。他说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并且永远是中国人，他们不可能很快变成苏联式的共产党人。因此他主张不应该反对中国共产党人。他说英国拒绝参加对新中国的封锁。

但是道格拉斯却说美国国务院持相反的观点。美国认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因此美国反对现在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sup>③</sup>贝文坚持他的观点。1949 年 9 月 13 日他又到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讨论英国准备承认新生的中国问题。艾奇逊仍坚持相反态度。贝文于是解释说英国对华政策与美国完全不同，这是因为英国的处境不同——英国在华的商业利益远比美国要大。贝文表示英国准备承认“华北人民政府”。贝文警告说：“如果西方各国仍然顽固不化，

---

<sup>①</sup> FO371/75810, F3305/1023/10, Minutes, 17 February 1949.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350 页。

<sup>③</sup> FO371/75814, F12843/1023/10,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British and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s China", August 1949.

那么中国将被迫投入苏联的怀抱。西方国家当前最重要的是要避免做任何使中国共产党转向苏联的事。”<sup>①</sup>

但是艾奇逊从反共的全球考虑出发，仍然反对英国承认华北人民政府。他说他同意西方的目标，是要鼓励中国与莫斯科的分裂。但他强调如果条件不成熟就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那么将是对中国反共力量的一个打击。因此贝文—艾奇逊会谈没有任何成果。<sup>②</sup>

贝文认为英国应该按自己的政策行事，而不理会美国政府的态度的如何。贝文回国后写了一个意见，他首次指出，不光要承认“华北人民政府”，而且还要把中国共产党政府承认为中国的中央政府。他建议说：“如果国民党能控制台湾或者中国西部，那么就考虑承认国民党为地方当局。”<sup>③</sup>当然这仍然是英国的传统两面派政策。在贝文看来，中国仍然不统一，不过是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央政府，国民党降级为地方政府罢了。

在这条方针指导下，英国官员于1949年9月正式开始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1949年9月20日，英国驻华大使史谛文拜会中国共产党上海外事局局长张劲夫，双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sup>④</sup>。同时英国驻华各地的领事，例如北京、天津及东北的英国领事都开始工作并且与当地政府保持着较好的关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英国加快了承认新中国的步伐，双边关系发展迅速。这是由两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宣布了正确的对外政策，愿意在平等互惠，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础上与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这就使英国政府承认新中国有了可能。另一方面是英国国内外舆论的压力，特别是英联邦国家的压力，迫使英国政府要考虑这件事情。例如印度和一些英联邦国家，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就给了英国政府很大压力。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的合法政府，并且表达了愿意与任何尊重平等、互利，彼此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原则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sup>⑤</sup>当天下午，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给驻北京的外国驻华领事馆和在南京的各国外交使团写信。信中强调了毛泽东的宣言。然后周恩来说：“我认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是必要的。”<sup>⑥</sup>

英国政府对此感到鼓舞。10月5日英国政府通知周恩来，说英国正在研究当前局势，并提议“双方应建立正式的关系”，但是周恩来并没有给予回答。不过英国并没有灰心，加快了其与中国建交的步伐。首先是在英联邦国家内进行了磋商。接着于1949年11月2日至4日在新加坡举行了英联邦国家中国专家会议。会上讨论了与中国建交的问题，与会专家研究了中国局势及其对东南亚和整个远东的影响。讨论的结果是，在1949年底英国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sup>⑦</sup>

---

① FO371/75815, F14109/1023/10, Record of A Meeting Held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Washington, 13 September; FO371/75815, F14109/1023/10, Minutes, 13 September 1949.

② FO371/75815, F14109/1023/10, Record of A Meeting Held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Washington, 13 September 1949; FO371/75815, F14109/1023/10, Minutes, 13 September 1949.

③ FO371/75814, F13272/1023/10,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China, and the Views Of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Kingdom on the Policy to be adopted, 1949.

④ FO321/75815, F14268/1023/10, From Nanking to Foreign Office, 20 September.

⑤ FO371/83284, FC1022/176/10, Minutes by Franklin, 25 January 1950.

⑥ FO371/75815, F14781/1023/10, From Nanking to Foreign Office, 2 October 1949.

⑦ FO371/83284, FC1022/176/10, Recognition, 25 January 1950.

英国与美国在是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上的争论继续着，英国坚持自己的政策，在许多问题上事先没有和美国协商。英国是在采取行动与中国进行谈判后，才告知美国的。例如在1949年10月28日的会谈中，贝文向艾奇逊表示了个人的道歉。因为贝文让英国驻北京领事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送了一个照会，但是事前并没有与美国进行协商。这种做法违反了与艾奇逊达成的协议，即任何一方在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前，都应该事先与它方协商。但是贝文强调他的道歉仅限于发照会一事，他并不因为照会的内容而道歉。这就说明了英、美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仍然有很大分歧。因为在美国看来，贝文要英国驻北京领事送去的那封照会，事实上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言。<sup>①</sup>

英国外交部指示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告知美国国务院，英国认为国民政府不再代表中国，而只代表他们的统治集团，他们控制的地区已经小得可怜。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替国民政府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唯一的选择。英国外交部还认为中国共产党需要与外国进行贸易，因此“从政治上考虑，我们赞成从法律上加以承认。”<sup>②</sup>

英国人民要求立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呼声也很高，其中以英国商人最为积极。例如英国商会从确保能在中国进行贸易的角度出发，强烈要求英国政府立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反对拖延。他们批评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在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上是不正确的。因为美国对任何与共产主义沾边的事情都要反对。英国商会认为美国人已经得了“恐共病”，这是美国政府经过多年不断恶意宣传的结果。英国商会反对艾奇逊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他们向英国政府提出警告：“西方在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上争论不休的、勉强的和拖延的政策，只能越来越把中国推向苏联。这种政策实行的越久，我们所受的损失就越大。”<sup>③</sup>他们强调：“从纯粹实践的观点看问题，拖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正在使我们蒙受损失。”<sup>④</sup>

英国商会的强烈要求，促使英国政府加快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步伐。1949年12月16日英国外交部指示英驻美国大使转告艾奇逊，说英国内阁原则上已经达成协议，要从法律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英国外交部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间初步订在1950年1月2日。

英国驻美大使应该向艾奇逊解释说有许多原因促使英国这样做。因为承认新中国不仅影响到英国在华利益，还影响到英国在香港、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殖民统治。由于在那些地方居住着大量的中国人，如果一直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在这些地方就会遇到麻烦。因为中国共产党会在这些地方反对英国。英国外交部指示说要警告美国，无限期地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能把中国推向苏联。对抗苏联影响的唯一办法是让中国共产党与西方交往，这种交往建立得越早越好。最后英国驻美国大使还应该向美国政府解释，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仅是承认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实，即中国共产党的政府有效地控制着中国。而且英国的这一做法并不会因此削弱英国在东南亚和其他地区反对共产主义的决心。<sup>⑤</sup>

上述指示明确地表示了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为了英国的利益与承认既成事实，而非赞同共产主义。英国决心要把反共事业进行下去。

---

① FO371/75818, F16271/1023/10, From Washington to Foreign Office, 28 October 1949.

② FO371/75810, F16623/1023/10, From Foreign Office to Washington, 29 October 1949.

③ FO371/75829, F16623/1023/10, The Case for Speed Recognition, 7 November 1949.

④ FO371/75829, F16623/1023/10, The Case for Speed Recognition, 7 November 1949.

⑤ FO371/75828, F19057/1023/10, From Foreign Office to Washington, 16 December 1949.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英国终于在 1950 年 1 月 6 日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信中，英国宣布：“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根据这一决定，英国政府撤销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sup>①</sup> 至于台湾，英国将与之保持事实上的联系，把台湾看成地方当局。但是这种联系，并不指事实上的外交关系。英国在台湾的领事仅限于照顾英国在该岛的利益。<sup>②</sup> 这样英国传统的承认掌权的中央政府，发展与分裂的地方当局的实质性联系的政策再次实施。

国外舆论对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事反映不一，有褒有贬。日本的一家报纸明确指出，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揭示了英、美之间的政策分歧。英、美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关系。其他日本报纸都对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欢迎。他们认为这是长期以来预料中的结果，也是英国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日本共产党领导人罗则佳评论说：“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预料之中的事。英国此举一定会对国际形势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将促使 1950 年的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他预言：“英国采取行动从法律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西欧各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天也就很快要到了。”<sup>③</sup>

美国对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应则十分冷淡。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麦克多莫特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承认，英、美之间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上有广泛的分歧。白宫则对这个问题保持缄默。<sup>④</sup> 但是美国政府认为英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并没有对英、美关系造成损害。早在 1949 年 9 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说，美国政府相当理解英国的做法。因为英国在华有巨大的利益要处理，这就决定了英国政府的政策总会与美国不同。而这种不同，不是政策上的不同，而是双方所处的位置不同。艾奇逊还说只要两国的目标是一致的，即使在策略考虑上有所分歧，他认为这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sup>⑤</sup>

艾奇逊的话一针见血地指明了英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是一种现实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政策。这种政策丝毫也没有改变英国政府的反共政策。

事实上美国政府也曾考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只是由于从全球反共策略的考虑和受到国内反共势力的压力，才使得美国政府不愿积极行动。这一延误使美国耗时二十余年才得以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然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评价却不高。英国驻匈牙利大使、前驻华大使馆参赞沃林杰先生报告说，布达佩斯的匈牙利共产党机关报评述道：“伦敦承认毛泽东政府，肯定是为了尽可能挽救英国在华利益。贝文深信英国此举，调和了对英国帝国主义政策十分愤慨的英国工人的阶级觉悟。”<sup>⑥</sup>

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报道是公正和实事求是的。中国舆论认为，英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为了发展英国在中国的贸易。但是英国的对外政策是现实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在乎等互惠的基础

---

① FO371/75827, F18896/1023/10, Memorandum, 18 July 1970.

② FO371/75827, F18896/1023/10, Diplomatic Programme, 6 January 1950.

③ FO371/83284, FC1022/106/10, Tokyo to the Foreign Office, 11 January 1950.

④ FO371/75815, F14109/1023/10, Record of A Meeting Held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Washington, 13 September 1949.

⑤ FO371/75815, F14109/1023/10, Record of A Meeting Held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Washington, 13 September 1949.

⑥ FO371/69540, FC1022/50/10, Wallinger to Foreign Office, January 1950.



上，中英之间的贸易将会发展。

1950年1月11日《大公报》著文评论说：“一个世纪以来的中英关系表现出许多剧烈的变化。”<sup>①</sup>

《世界文化》周刊于1950年1月13日发表署名为苏穆的文章，文章说：“美国援助台湾和英国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篇文章在抨击了美国支持蒋介石窃取台湾，实行反华政策之后，赞扬了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举动。该文认为英国及英联邦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意义十分重大，它标志着英、美对华政策的分歧，也说明西方三国（英、美、法）在亚洲的分裂。文章强调中英关系的建立将给中英两国人民带来发展贸易的前景，英国政府的决定是符合英国人民的利益的。因此中国人民接受英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中国相信英国政府的这一行动会更受到英国人民的欢迎。<sup>②</sup>

1950年1月17日《大公报》再次发表评论员文章，评价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义。该文回顾了英国人民对中国的友谊，认为两国人民的友谊是令人鼓舞的。例如当原英国外交部长西蒙，在日内瓦发言赞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三省时，利物浦的码头工人却在抵制日本船只，拒绝给它们装卸货物。在1939年丘吉尔关闭滇缅公路这一中国战时的生命线时，英国几百万人签名送到唐宁街十号以示抗议。后来当国民党政权发动内战，企图从英国得到武器支持时，英国人民也进行罢工反对。<sup>③</sup>

上述中外舆论表明，英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明智之举，它是英国从太平洋战争以来的对华政策的一个必然结果，为今后中英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对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欢迎的。1950年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率领中国工会代表团访问了英国。即使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英国与中国仍然有某种形式的往来。1954年英国前首相艾德礼，率英国议会代表团访问了北京。

但是由于英国对华政策的机会主义性质，即使完全从英国利益出发，英国也不能独立于美国 and 摆脱反共思潮的影响。在许多涉及中英关系的重大原则问题上英国表现软弱，屈从于美国压力。因此在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中英之间的关系没有进一步发展。直到1972年双方才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英国于1950年1月6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立即要求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英国派出了代表团到北京与中国政府开始了谈判。但是英国仍然在台湾保留了领事馆，这成为谈判中的棘手问题。此外在若干重大问题上，英国在联合国没有支持中国的立场。首先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英国犹豫不决，在私下英国政府一直主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但在正式场合英国不表态。

例如1950年1月13日，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驱逐国民党，取消国民党在联合国的席位而代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在表决时，英国投了弃权票。同时英国在联合国其他组织机构中的代表在涉及类似问题时，也采取了相同的手法。这就引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满。中国开始认为英国执行的是两面派政策。<sup>④</sup> 因此从1950年1月开始，中英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非常微妙阶段。1954年之前英国在华代表团一直没有列入中国政府的在华外交使团名单上。但是中

---

① FO371/83286, FC1022/255/10, Extract From Takungpao, January .

② FO371/83286, FC1022/255/10, Extract From Takungpao, 17 January 1950.

③ FO371/83286, FC1022/255/10, Extract From Takungpao, 17 January 1950.

④ FO371/83290, FC1023/352/10, From Peking to Foreign Office, 20 May 1950.

英仍然保持着接触，在一定程度上发展着贸易关系，甚至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国仍然在北京保留着外交谈判团。然而，双方的关系改进得非常缓慢，

战后，英国延续着战时英国对华政策，即不干涉国共内战，在正式承认实际控制中国政府的政权的同时，与各地方割据势力仍然进行实质性的往来。虽然这是一种传统的英国政策，但在由于英国比较好地贯彻了对华“不干涉”的政策，因此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日益改善，而与国民党的关系日益恶化。

但是英国在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正是由于英国的上述政策，即“在正式承认实际控制中国政府的政权的同时，与各地方割据势力仍然进行实质性的往来”，英国又在台湾淡水保留了领事馆。这种两面派的对华政策，决定了英国不可能进一步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因此虽然英国在 1950 年 1 月 6 日就承认了新中国，但是却没有能与新中国建立正式的大使级外交关系。只是经过长期的谈判，直到 1972 年，英国才得以在北京设立大使馆。由于英国的机会主义外交路线，使中英关系的改善经历了许多磨难。

## 第八章 战时英国与中国进行

### 科学技术合作的政策

#### 第一节 战时英国对华科学技术合作政策的产生

##### 一、英国文化协会驻华办事处的设立

战时的英国对华政策，由于带有恢复战后英国在亚洲殖民的考虑，因此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但是中英之间毕竟是盟国，因此抗战期间的合作始终是主流。在战时中、英合作中，英国对华进行科学技术合作的政策，取得了较大成效。

从传统来说，英国的文化政策，是灌输西方文化思想，培养亲英人才。但是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英成为盟国，改变了这种情况。由于抗日战争的需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不得不在奉行传统文化政策的同时，努力促进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以支持中国的抗战。因此，在战时中、英合作中，中、英科学技术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中、英科学技术的合作，是在英国文化协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英国文化协会的前身，是1934年英国政府建立的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不久，该委员会改名为英国对外关系协会，到1936年，才改名为英国文化协会。从英国文化协会经历的这几个名字可以看出，英国文化协会一开始就是在英国政府的主导下，从事对外交往的一个机构。1936年前，英国文化协会名字的几次更换，体现了它是一个致力于促进英国文化、教育、国际关系在海外发展和交流的机构，是一个英国政府主导下的、推行文化外交的机构。

英国文化协会成立的目的是：第一，使英国人的生活、思想为世界更多地了解，促进与其他国家相互在知识和思想方面的交流，促使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第二，鼓励世界上更多的人学习和使用英语，在科学设备上援助国外的学校，吸引外国学生来英国学习，接受英国工业方面的培训，使其他国家的国民更好地了解英国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使他们能够利用当今英国对科学文化和技术工艺方面的贡献，使他们能够有机会欣赏英国当今的文学、精美的艺术和音乐等英国文化成就，以加强各国之间的科技文化教育方面的沟通和交流。第三，通过文化教育方面的交流活动，以文化为媒介加强英国与自治领和其他国家之间经济上的联系，促进英国海外贸易的发展和繁荣。第四，通过文化教育方面的交流活动，以文化为外交手段，缓解英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促使其他国家的公众理解和支持英国政府的政策，以此作为传统外交的有益补充，最终达到维护英国国家根本利益的目的。

在政治上，英国文化协会隶属于英国外交部。由于外交的需要，英国文化协会接受英国外交的直接领导。因此在组织上，英国文化协会属于英国外交部，具体负责对外文化、宣传部分、科学交流方面的工作。从文化协会诞生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出英国外交部对英国文化协会的领导作用。可以说，没有英国外交部就不会有文化协会的产生。

英国外交部始终控制着文化协会各项政策的制定。如文化协会在刚刚成立的时间中，其关注的重点是，在海外推广英语教学和文化交流活动。但是在1935年，随着希特勒恢复征兵制，突破《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向外侵略的意图和行动更加明显，英国外交部认识到文化协会的政策重点，也应该随着进行调整。于是文化协会开始关注这一组织所具有的政治力量，甚至军事力量。如当时文化协会的主席泰瑞尔（Tyrrel）就说：“我们既要认识到协会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力量，也要关注协会实际上也是一种重要的军事力量。”“现代防御不仅仅包括武器上，也包括消除

误解和促进相互理解上。”<sup>①</sup>

随后英国文化协会在埃及、葡萄牙等国家开展文化活动反击纳粹文化侵略。英国财政部也予以迅速地响应，马上将 1936—1937 年度的资助增加到 15000 英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文化协会更是将自身作为一种对盟国和未来盟国保持友谊和信任的手段，比如英国文化协会后来在中国开设办事处，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这种外交上和政治上的考虑。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英国文化协会采取的每一重大举措都是和英国外交的实际需要紧密相连的，其日常工作也都是围绕着英国外交方针和政策而开展的。

在经济上，英国外交部给予英国文化协会经费资助。从英国文化协会的经费来源上看，文化协会的经费基本上以政府供给为主，几乎所有的经费都是通过议会批准，然后由英国外交部予以投票通过后予以执行，最终得到政府资助。虽然英国文化协会资金来源中还有私人和企业界的赞助等，但是所占比例有限。

从 1935 年，英国文化协会首次接到了财政部资助的 5000 英镑的支持，其后一直接受着经外交部批准的英国政府资助。1936—1937 年度的资助增加到 15000 英镑。1937—1938 年度的资助是 60000 英镑，1938—1939 年度的资助是 130000 英镑。<sup>②</sup> 英国文化协会开展的许多活动都得益于政府对它的资金上的帮助，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英国文化协会在中国开展的许多文化科技教育方面的交流和合作活动，像英国科学考察团访华、以李约瑟为首的在中国成立中英科学合作馆等活动，无不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支持。因此，就英国文化协会来说，来自于政府的经费资助就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一样，在暗中牢牢地控制着英国文化协会的生存和发展，深刻地影响着英国文化协会的决策和活动。

英国文化协会的活动，与外交部密切相连。英国文化协会的建立目的之一，就是把它作为传统外交的有益补充，以开展公众外交或文化外交。而其最终的和最高的目的，同样是出于维护和发展英国国家根本利益。所以从英国文化协会的活动来看，它是与外交部休戚与共的。如 1940 年英国文化协会在本国成立了为盟军士兵和难民提供服务的中心，这是为了配合反击法西斯侵略的重大决策，是为传统的政府外交服务的。又比如，英国文化协会 1938 年在埃及设立了在国外的第一家办事处以来，在欧美许多国家都设有办事处，在亚洲等其他大陆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开设了许多办事处，但是这些驻国外办事处的建立，在事先必须得到英国外交部的同意和批准，并接受外交部驻外机构的领导。

1931 年日本开始入侵中国，严重威胁到了英国在华利益的安全。1937 年以来，随着日本侵略的步步扩大，英国在华利益不断受到损害。“七七”事变后，日本不仅对中国进行着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还对中国进行了空前的文化侵略。日军所到之处，是对中国名胜古迹、文物珍宝、图书典籍、教育机构的摧毁和劫掠，使中华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日本还通过删改学校教材，强制实行日语教育，进行奴化教育；控制新闻媒介，操纵舆论，为建立所谓的包括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甚至澳洲在内的“大东亚共荣圈”而鼓噪。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更使英国在整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面临被彻底摧毁的局面。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损害了英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英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比较主

---

① Philip. M. Taylor, *The Projection of Britain, British Overseas Publicity and Propaganda 1919-193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London, 1981, p. 144.

② Philip. M. Taylor, *The Projection of Britain, British Overseas Publicity and Propaganda 1919-193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London, 1981, pp. 162-169.



动地利用文化为武器，为其对华政策服务。

英国对华文化政策，是其对华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各个国家的文化外交政策的，在本质上无不是为了实现本国战略利益服务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主要国家不同的力量对比之下，在不同的国际格局下，每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包括文化外交政策都要根据这些变化，在保障和发展本国战略利益的前提下，开展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外交联系和文化联系。在实现英国对华文化政策的过程中，英国文化协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还没有现代工业体系，经济力量薄弱，缺乏战争物质。因此，中国的抗战，需要西方发达国家的物质援助。出于各种考虑，英国不愿对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但是英国却非常乐意与中国进行文化合作，希望在文化领域获得中国人的好感。英国从事对华文化活动的目的，虽然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传播英国的文化价值观，是为了维护英国在华利益的需要。但是在客观上，中英文化合作，对增强中国人民坚持抗日的信心，维持中国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文化科学上的联系，增进中英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英国对华文化政策的演变

1943 年，英国文化协会在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开设了办事处，这是英国文化协会在亚洲建立的第一家办事处。该办事处接受英国驻华大使馆的领导，英国文化协会中国办事处的负责人是著名科学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英人民的文化使者李约瑟博士（Dr. Joseph Needham）。

虽然英国文化协会中国办事处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建立的，但是英国政府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就开始主动地考虑以文化外交为手段，来促进中英两国关系的改善。与此前的考虑不同。在 30 年代，英国对华的文化活动，是被迫退还“庚款”，用“庚款”投资所产生的息金，帮助中国文教事业的发。这种考虑，不是出于帮助中国发展文化，而是出于殖民主义的思维、传播英国文化、培养亲英知识分子等。这一政策，更是在重重压力之下的无奈之举。

1930 年 8 月，英国成立“英国远东经济考察团”。英国远东经济考察团是由前曼彻斯特商会会长谭卜森爵士为团长、由英国商界著名人物组成的。该团成立后于 1930 年派团赴华考察。11 月 30 日，代表团到达上海，随后访问了南京、天津等地，直到 1931 年 4 月返回国内。考察团的目的主要有：考察英国在远东的经济商务状况；增进中英两国间的商贸往来；考察退还的“庚款”如何更合理地使用；考察英国在华文化教育状况等。

考察团在中国考察完毕后，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一份总结报告，在报告中指出，英国原来在中国的市场现在很大部分已经被美、日、德这三个国家所夺取，其中日本更是英国在华经济利益的主要争夺者。在报告中，还谈及美国对华贸易的发展，得益于美国政府实行的“庚款”兴学政策，以及用“庚款”资助大量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的影响。该报告建议英国政府，应该注意促进两国之间的文化关系。考察团的报告，开始成为英国政府以文化外交为手段，来改善两国关系的一个考虑因素。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民党政府为了抗日的需要，一开始就把争取英国对华援助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可是，英国对中国的援助采取了消极的态度。但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对在华盛顿会议上所构建的远东体系，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对英国在中国和在远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利益，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英国对华政策开始缓慢改变。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英国虽然仍然不愿制裁日本的侵略，但开始积极调停中日战争。1938 年 12 月，英国宣布对中国提供 50 万

英镑的贷款；1939年3月，英国表示向中国提供500万英镑平衡基金借款，以帮助稳定中国币制。这些援助虽然很少，但是英国对中国提供实际性援助的进程，已经开始。

从1939年以来，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英国为了援助中国，在1940年10月开放了关闭三个月的滇缅公路；12月宣布向中国贷款1000万英镑；宣布冻结日本在英属殖民地的资产；废除1911年的《英日商约》。1942年2月中英开始就两国军事合作问题进行了数次会谈。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英两国成为共同反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的盟国，更需要在政策的各方面进行协调和合作，这是英国希望利用两国文化交流和合作来达到外交和政治上的目的的原因所在，也是英国政府在中国建立文化协会办事处的根本原因。

日本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的过程，同时也是对中国进行疯狂的文化侵略的过程。日本法西斯政权早就制定了一系列对华文化侵略的方针，特别是在1939年，随着日本侵略脚步的南下，日本文化侵略的政策也在不断调整中。这一年，日本内阁情报部制定了《关于东亚新秩序建设的宣传方针大纲》，提出了包括“新支那建设”、“东亚新秩序建设”等在内的宣传内容，妄图征服整个中国和整个远东太平洋地区。在这样的文化侵略政策的指导下，日本对中国进行了全面的文化侵略。

日本对中国的报刊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和管理，并操纵新闻舆论，千方百计地掩盖其对华侵略和屠杀的真相，对中国和世界民众进行欺骗性的宣传，并限制和禁止具有民族意识和抗日言论的出版物的出版。日本在沦陷区先后成了新民会、中日文化协会等奴化教育机构，篡改学校教材、编定新教材、强制实行日语教育、派遣留日学生等向中国人民灌输“大和精神”和亲日思想，以达到从精神上摧毁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使中国沦为日本殖民地的目的。

日本在侵华过程中，大肆破坏我国大、中、小教学机构和学术机关，使我国的教育事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如1937年7月29日，日军轰炸天津4小时，其重点轰炸的是南开大学，使南开大学成为一片废墟；在淞沪会战期间，遭到日军飞机袭击的文教机关和学校就有90多所，其中全部被毁的占75%。<sup>①</sup>全国有10余万初等教育学校毁于战火或被迫关闭。<sup>②</sup>

在日本大规模的入侵下，中国许多科教文化机构被迫内迁西南和西北地区，刚刚形成一定基础的各类大学和科研机构被摧毁，这严重影响中国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日本还在中国驱逐英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势力影响，挑拨中国民众与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企图以日本化的基督教来代替西方宗教势力在中国的影响，使宗教也成为日本侵略中国和远东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思想工具。

因此，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过程也是对英国在华文化利益的损害过程，同时也是对英国在华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损害的过程。日本对华进行文化侵略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其彻底将英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从中国，从整个远东太平洋地区包括澳洲在内的地区驱逐出去，为建立一个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而服务。日本侵略者这种疯狂的文化侵略政策和行为，使英国政府终于走上了以官方途径对中国进行文化援助，对中国进行文化外交和建立文化关系，以保障中英两个盟国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的道路。

1942年2月，英国文化协会和信息处联合派遣约翰·布罗费尔德（John. Bloeld，中文名字

---

① 孟国祥：《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

② 齐红深：《日本对华教育侵略（对日本侵华教育的研究与批评）》，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80~81页。

为蒲乐道)来华,促进中英文化关系的交流和发展,蒲乐道名义上为英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实际是一名负责中英文化方面的联络官员。

蒲乐道1913年生于伦敦附近。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蒲乐道曾经在牛津大学研究并讲授中国文学。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蒲乐道就已经来到中国,他曾经在北平、天津、香港、昆明、桂林等地居住过五年多的时间,曾经在天津、重庆等地教会学校中教授英语,还曾经在山西五台山当过一段时间的和尚。“二战”结束后,蒲乐道长期居住在香港和泰国,潜心钻研佛学和道教,成为西方研究佛教禅、密二宗和道教最著名的学者之一。

蒲乐道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因为其态度中有袒护日本侵略的言论和见解,遭到中国舆论的攻击。1937年蒲乐道深入中国内地旅行,特别是在中国西南各省旅行中,开始比较深入地了解了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以及中英之间的关系,所以在长途旅行后,他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开始积极主张英国对华援助。后来英国信息处在伦敦物色对于中国文化有研究方面的人才派遣来华,筹集中国战时文化教育方面的情报,并担任中英文化联络工作时,看中了长期居住在中国,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及中国文化有着比较深入了解的蒲乐道。1942年2月,蒲乐道接受英国文化协会和信息处的派遣,又一次来到中国。这一次,他是受英国文化协会和信息处所派,其目的是为了完成其关于中国教育现状的报告和提供中英文化联系合作计划的建议。

蒲乐道再次来到中国后,走访了中国许多地方的高校和文化教育机构,详细地调查研究中国教育文化状况,在此基础上着手拟订中英文化交流合作等发展计划。1942年9月他将其调查报告书,呈递给英国驻华大使薛穆。

蒲乐道的报告主要有三个部分组成:

报告的第一部分,是关于战时中国大学的情况。

首先,他对中国大学的分类、性质和一般特点做了说明分析,国立大学如北京大学、中央大学等受到中央政府资金的支持,科研设备比较先进,办学水平也很高。他认为,中国最好的学校中,有很多是国立大学。而省立大学一般来说,来自于所属省份,其资金比较缺乏,设备也很差。私立大学由教会或其他私人团体来支持,私立大学中的教会学校如燕京大学、南京大学在中国教育界有很高的名声。

其次,他分析了战争对中国大学的影响。他认为由于中日战争的进行,中国许多大学被迫西迁,大学的图书馆和科研设备,或者由于被迫放弃或者由于战火的毁损等原因严重减少;战争的进行、生活成本的上升,使高校师生生活变得日益艰难,许多人因此营养不良、缺医少药,甚至连必要的生活用品都缺乏;战争的进行还使中国教育和文化界,基本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战争的影响还使国家对教育的控制越来越强化,出现了法西斯化倾向。<sup>①</sup>

报告的第二部分,是发展与中国的文化关系。

蒲乐道首先指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文化联系的必要性和意义,一是“由于中国高校目前处在特别困难的战争时期……”二是由于在中国教育界与政界的紧密联系使英国有必要进一步发展两国文化联系,“特别是那些高校著名教授专家,在中国起着一种十分特殊的作用,发挥着比其他国家大得多的影响。因为在中国,高校与政治有更紧密的联系。一些大学教授常常是政府官

---

<sup>①</sup>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6, Far Eastern Affairs, p. 18.

员，同时许多政府官员曾经是大学教授，甚至一些人一身兼二任。”<sup>①</sup>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教育文化部门所做的任何可以缓解他们目前的困难的事情，都会使中国舆论支持英国”。“当英国自身也正在经受者严峻的战争考验和困难的时候，英国对中国的任何文化教育上的帮助，都肯定会使中国感激英国对他们的帮助。”而且这种交流合作和帮助，可以在加强中英两国盟国关系的基础上，起到坚定战争会是盟国最终取得胜利的信心。

蒲乐道断言，“让英国的文化和思想为中国人所接受，在未来中国领导人的心目中深深扎下根”，“如果从长远来看，也是十分有益的。”这种文化上的交流合作，还可以加强密切两国之间的联系，消除双方之间存在的一些误解，有助于两国之间战时的合作和相互援助，有助于减少未来英国在华开展经济活动的危险，并最终有利于英国经济利益的维护和提高。<sup>②</sup>

他举例说最近，英国国内在许多学校进行了一个调查，调查的目的是了解英国学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国的了解。“调查的结果显示，在英国学生中，多数人在想到中国时，往往就是留着长长的辫子、抽着鸦片烟、一副猥琐又低声下气的村民形象。甚至一些英国成人也常常表现出对中国的无知。虽然他们对中国已经有所了解，但是还很不够。这种误解的结果造成两国关系中的一些猜疑和厌恶。……最近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已经意识到这种误解的危险性，认为有必要通过特别的材料。”<sup>③</sup>蒲乐道接着说：“我认为通过制作便宜、信息丰富的大量的读物，让双方互相了解对方到底对方是什么样的人。”<sup>④</sup>即通过文化上的交流与合作来达到这样的目的。

蒲乐道还认为美国在华推行文化外交和合作的成功，是促使英国必须后来居上的又一重要因素。他分析了美国开展的对华文化教育活动对英国的刺激。他说：“多年来，美国领导着外国在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美国通过包括为中国学者和学生进行交换的成体系的组织，对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带来了极大的推动。美国也是最早退还‘庚款’用以发展中国教育的国家。这一切，都给中国教育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美国式烙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在这方面无所作为了。”

他建议，要进一步发展中英两国之间的文化教育联系，就要在中国成立英国文化研究所或俱乐部，发展中国在重庆设立的中英文化协会，推动其活动的进一步开展，在中国成立一个宣传英国文化的机构，使之成为英国文化在中国的中心，在两国之间进行文化教育上的合作。<sup>⑤</sup>

接着，蒲乐道在报告中提出了关于英国目前应该立即进行的对华文化计划，包括战时和战后对华文化计划。他认为，目前英国政府应该马上进行的工作，是从各种渠道筹措资金展开对中国学生的救济工作，对高校教师的救济工作。其次，针对中国高校目前面临的最严重的困难，即完全缺乏与外部世界科学技术进步之间的联系和合作的状况，英国文化协会及其他部门应该在科研期刊、高校教材、书籍、试验设备等方面尽快提供援助；英国文化协会要在两国互相交流学者方

---

①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6, Far Eastern Affairs, p. 28.

②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6, Far Eastern Affairs, pp. 18-19.

③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6, Far Eastern Affairs, p. 28.

④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6, Far Eastern Affairs, p. 28.

⑤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6, Far Eastern Affairs, pp. 29-37.



面，特别是在向战时中国派遣知名专家学者到中国讲学方面进行合作；英国文化协会、英国各大学和教育机构应该制定中国留学生安排计划，1943 年应该安排更多的中国学生到英国留学，向他们提供救助金，鼓励他们在英国从事学习和研究工作。

蒲乐道对两国在战争和战后时期文化教育方面的合作计划中，认为要进一步发展中、英两国之间的文化教育联系，应该在中国成立英国文化研究所或俱乐部，由它选择合适的中国大学进行文化教育上的合作，还要鼓励中国学生到英国留学，蒲乐道认为这些留英学生会在将来带着对英国和英国文化理想的高度认同回国。此外，蒲乐道认为应该在两国高校之间进行学者的互访和互换、鼓励和输送中国熟练技术工人到英国的工程学院或车间工厂等，进行学习和培训等，提高中国学生的实际工作水平。<sup>①</sup>

薛穆接到蒲乐道的报告后，在 1942 年的 9 月 15 日将报告汇报给了英国外交部和外交大臣艾登，薛穆高度评价蒲乐道建议的重大价值和意义。他在致外交大臣艾登的信中说：“我认为蒲乐道的报告，对在中国成立文化机构的建议很重要，英国的关注应该扩展到所有可能有助于发展两国文化联系，发展文化协会在华工作的方面……。”<sup>②</sup>

薛穆认为蒲乐道的报告非常重要，英国外交部应该把他的报告分发到英国议会、英国中国大学委员会、英国工业协会和英国文化协会等机构，向这些机构提供关于中国的信息，为这些机构开展对华文化外交政策的研究提供咨询。<sup>③</sup> 月 30 日，薛穆再次就蒲乐道报告致函艾登，并提出了对中国学生进行救济，开展两国之间的学者互换，鼓励中国学生留学英国，对中国文教机构提供图书、期刊、科研设备等方面进行援助的建议。<sup>④</sup>

1942 年 6 月，牛津大学中文高级讲师修中诚到达中国进行访问。修中诚是受到英国文化协会的部分资助来华访问的，英国文化协会同样想通过修中诚的考察来了解、分析在中国建立文化协会办事处，开展两国战时文化活动的可行性。

修中诚访问中国的结果，更使英国文化协会了解到了英国对华文化外交工作的不足，了解到了此前在中国开展的文化联系合作等活动的落后之处，特别是了解到要有效地开展英国对华文化外交活动，首先解决的是领导机构问题。当时英国对华开展文化交流合作活动的各机构的确需要改革，因为这些机构存在着严重的机构重叠、责任不清、效果不佳等问题。当时在中国开展文化交流合作活动的英国各机构，有英国文化协会、大学中国委员会、英国驻华信息处，英国工业协会等。中国方面成立的中英文化协会也在做着类似的工作。这些机构的存在有重叠之处，也有责任不清的问题。修中诚还指出，最近远东的形势有了新的发展变化，要求英国政府在两国文化交流合作上，进行机构调整 and 责任的明晰，以有效开展新形势下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为英

---

①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6, Far Eastern Affairs, pp. 29-37.

②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6, Far Eastern Affairs, p. 17.

③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6, Far Eastern Affairs, p. 17.

④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6, Far Eastern Affairs, p. 65.

国的国家利益服务。<sup>①</sup>

的确，当时在中国开展文化宣传活动的英国机构，除了修中诚以上所提到的那几个机构外，还有 1939 年 6 月英国首相丘吉尔支持下，在外交部中设置的对外宣传司。1939 年 9 月欧洲战争爆发之后，英国为了增强自己在国外的宣传活动力度，并搜集国外战时情报，于是又成立了情报部。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驻华大使馆附设新闻专员室，后来改为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在昆明、成都、桂林等地的英国领事馆则设有宣传局，这些机构或多或少也都在从事着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和宣传等方面的工作。

所以，当时英国对华文化机构之多、之复杂可见一斑，同时也使得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工作范围不清晰，分工责任不明确的特点。所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战争范围急剧扩大，战争形势非常严峻，反法西斯各盟国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改善、进一步密切，以更好地进行合作的情况下，有必要调整英国在华文化机构，成立一个专门从事两国文化关系的机构。

薛穆在修中诚考察报告的基础上，随后向英国外交部、外交大臣艾登提议，由英国政府任命一个专门的官员负责与中国高校和教育界联系，弄清他们的需求和资金利用情况，协调英国对华文化交流合作方面的事项。<sup>②</sup> 薛穆还说：“在过去，许多相关机构如文化委员会、高校中国委员会、英中文化协会、英国工业联合会和信息部等在活动和计划方案等许多方面存在着令人困惑和重叠之处。但是最近情况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是为一些没有正常执行的计划开始执行提供了机会。因此，英国大使馆提出建立一个专门机构从事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英国的这个提议已经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赞同。”<sup>③</sup>

薛穆还说修中诚在很多方面特别适合从事这样的工作，但是不幸，由于他的健康和专业方面的原因，不能被任用。他向艾登提议任命英国驻华信息处的一位官员蒲乐道，担任此项工作。说他在战前就曾经长期在中国从事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因此很适合担任这项工作。<sup>④</sup>

蒲乐道和修中诚的报告，一方面使英国外交部和政府更了解到了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的严重破坏，对英国在华文化、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影响和威胁，又了解到了战时中国存在的迫切的文化合作和援助的需求，两人的报告还向英国外交部和政府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对华进行文化援助合作的建议，特别是在组织建设方面的建议，这更促使英国政府决心在中国成立文化协会办事处，通过对华文化外交，开展两国之间的文化关系和合作，对中国进行战时文化援助，共同对抗日本的疯狂侵略。

以上这些方面的因素就是英国文化协会在 1943 年开设中国办事处的原因。在英国文化协会中国办事处成立之前，英国文化协会就派遣了以李约瑟为首的英国科学考察团访问中国。由此，英国开展了在英国文化协会以及随后不久成立的英国文化协会中国办事处具体领导下的两国战时文化交流和合作。在两国的交流合作中，中英科学馆的成立具有重大意义。

---

<sup>①</sup>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5, Far Eastern Affairs, p. 146.

<sup>②</sup>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5, Far Eastern Affairs, p. 146.

<sup>③</sup>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5, Far Eastern Affairs, p. 146.

<sup>④</sup>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5, Far Eastern Affairs, p. 146.

## 第二节 李约瑟与中英科学合作馆

### 一、李约瑟科学代表团访华

战时英国的对华文化政策，是帮助中国发展科学技术，促进中英文化的交流。这一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英国政府这种文化政策的制订和贯彻过程中，李约瑟博士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年出生于伦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18年进入剑桥大学冈维尔—基兹学院学习医学。不久转向生物化学，1921年开始在英国生物化学之父霍普金斯主持的生化实验室学习和工作。1937年燕京大学的沈诗章、金陵大学的王应睐、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的鲁桂珍，来到剑桥大学攻读生化化学的博士学位。李约瑟此后开始了与这三位中国留学生的频繁接触，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人类历史上的许多基本的科技发明都源于中国，西方人认为西方创造了人类的科学技术的观点是错误的。李约瑟也由此开始了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矢志不渝的学习和研究工作。

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英国参加到战争中来，1940年6月法国败降，英国成为反抗德、意法西斯侵略的重要一员。当时的英国外交部工作重点，是争取美国对英国的支持，甚至动员美国参加到反法西斯战争中来。所以，英国外交部和文化协会广泛发动英国科学界，利用与美国科学界的联系，游说美国科学界同情支持反法西斯侵略战争，并希望能够形成对美国政府有所影响的强大社会舆论。而从1940年6月到11月，李约瑟正好在美国进行讲学活动，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讲学。所以，英国情报部指示李约瑟，要他尽可能多地向美国学术界报告战时欧洲的科学状况，特别是要重点通报德意等法西斯国家，在欧洲对科学的破坏活动，对欧洲科学家的摧残行为，争取美国科学界捍卫科学和民主及资本主义制度。

李约瑟在美国进行讲学的同时，还走访了美国许多地方，访问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等著名的学术机构，发表了许多次演讲，讲述了英国科学界参与反对德、意法西斯侵略的事实，揭露了德、意法西斯国家对科学和科学家的破坏和摧残行为，特别揭露了德国法西斯国家对犹太科学家令人发指的迫害行为，呼吁美国的科学界和科学家与英国及其他国家的科学界科学家合作，为保卫英、美民主制度，为科学的生存和发展而站起来反对德、意法西斯国家的侵略，阻止这些法西斯国家统治世界的野心的实现。李约瑟的动员演讲，受到了美国科学家的热情欢迎和支持。

李约瑟把自己在美国对美国科学界的访问和会谈情况，汇报给了英国情报部，并说：“我对在美国所做这种工作的必要性，有深刻感受。如果有必要，我愿意明年再次回到美国，继续这项工作。”英国情报部迅速把李约瑟的报告转给了外交部，外交部也肯定了李约瑟的工作。<sup>①</sup>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苏中等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建立起来，英国和中国成为共同反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的盟国，两国之间的战时合作也开始升温。1942年1月21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接见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双方讨论了远东的局势和战时两国合作的可能途径问题。艾登在结束与郭泰祺大使的会谈后，将情况报告给了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并要求卡尔大使提出对两国合作活动的建议。次日，卡尔从重庆发回电报，建议立即安排一批杰出的英国各界人士访问中国，通过这些人与中国建立广泛的个人联系，扩大英国在中国的宣传力度。卡尔还认为这些人对中国的访问，可以使英国公众更多地了解中国抗击法西斯的斗争情况。卡尔在电报中还列出了自己推举的11位他认为合适的人选，这些人都是当时英国政界、军事界、外交部门、教育界、

---

<sup>①</sup> 转引自段异兵：《李约瑟赴华工作身份》，《中国科技史料》，第25卷，第3期，第201页。

宗教界等方面的知名人士，但是李约瑟并没有位于推荐名单之中。<sup>①</sup>

推荐李约瑟的部门是英国文化协会，推荐他的主要人物，是英国文化协会科学处的处长葛罗瑟（James Gerald Crowther）。葛罗瑟曾经就读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大学肄业后在《卫报》担任专职的科学记者，写了大量科普著作。他的政治观点比较左倾，在1930年至1936年间多次访问苏联，对苏联高度集中的科研体制十分推崇。“二战”爆发后，葛罗瑟加入了英国文化协会，被任命为科学处处长。在他当科学处处长的任期内，积极推动英国与其自治领、殖民地和其他国家的科技交流和合作。

1942年2月26日，李约瑟接到葛罗瑟的密函，葛罗瑟问李约瑟：“高层紧急需要一名优秀的英国人士访问中国大学，与中国学者和科学家交换观点，并向中国人民解释英国以及英国的生活与文化。……如果能安排到职位，您是否考虑接受邀请从事这项访问？”<sup>②</sup>

而早在此之前，英国外交部、英国文化协会和情报部召开联合会议，三方一致认为剑桥大学的李约瑟教授，是访华的非常合适的人选。李约瑟不仅在化学方面的研究造诣很高，而且有一定的中文基础，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有一定的了解，这在英国科学家中是很少见的。不仅如此，李约瑟与当时在剑桥大学读书的沈诗章、王应睐和鲁桂珍有广泛的接触，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很密切。所以李约瑟是一个访问中国的很适合的人选。

1942年4月，刚到中国就职的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在了解了国内有意派遣李约瑟为访华代表后，也表示赞同。6月薛穆致电英国外交部，说中国政府非常欢迎李约瑟教授访问中国，并建议李约瑟到华访问后为他在中央研究院安排一个名誉性的研究职位，可以允许李约瑟到中国大学巡回演讲。8月13日，英国文化协会正式批准了这一派遣计划。

1942年8月，英国文化协会批准了李约瑟访华计划后，李约瑟就开始了紧张的赴华访问前的准备工作。他首先在国内与有关部门和团体进行了联系，如对英国外交部、情报部、作战部、生产部、供应部、战时交通部、科学与工业研究部等政府部门进行了会谈，与英国文化部门，如英国文化协会、英国广播公司、《泰晤士报》等进行了联系，与中国驻英大使馆和美国驻英大使馆的官员进行了联络，这些机构在日后对李约瑟开展中英两国间的科技和文化交流活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42年11月，李约瑟在美国驻英大使魏奈特（John. G. Winant）的建议下，在赴华访问之前先到美国进行了访问。李约瑟等人在美国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国务院文化处、农业部等团体和政府部门进行了接触，了解他们对华开展文化技术交流合作的经验。因为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活动开展得较早，发展较成熟，有很多的经验值得英国学习和借鉴。在美国期间，李约瑟等人会见了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前任驻美大使胡适、宋子文的军需供应顾问拉杰曼等，还与中国当时在美的学术界的有名人物，如语言学家赵元任、文学家林语堂、化工专家侯德榜等人进行了会谈，进一步了解了战时中国科技教育界的一些情况。

在结束了对美国的访问后，由李约瑟率领的英国战时科学访华团又来到印度进行了短暂访问，与印度政府商讨了援助中国科学界的具体事宜。1943年2月24日，李约瑟等人终于经过了长途跋涉后，来到了中国战时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城市昆明。

而在李约瑟到达之前，牛津大学的陶德斯（E. R. Dodds）教授，已经在1943年的1月先行来到中国。陶德斯是牛津大学希腊语教授，同时通晓汉语，所以当英国外交部、英国文化协会、

---

① 转引自段异兵：《李约瑟赴华工作身份》，《中国科技史料》，第201页。

② 转引自段异兵：《李约瑟赴华工作身份》，《中国科技史料》，第202页。



英国情报部联合选择英国科学访华团成员时，陶德斯教授与李约瑟等人一起被列为合适人选。陶德斯教授是在1943年的1月就达到了中国，开始了对中国科学界的考察和访问。他首先在昆明等地参观访问了那里的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2月至3月在重庆和成都进行了访问，访问了那里的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武汉大学、中央大学等科研和教育单位；在4月底，来到贵州，访问了设在那里的浙江大学、贵州大学、贵阳医学院、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

1943年6月，陶德斯教授回到英国。他在中国虽然仅仅访问半年的时间，但仍然对当时中国处于西南后方的内迁大学和各科研机构进行了广泛的访问参观，与中国教育界和科学界的专家教授进行了详细的会谈，初步了解了中国高校和科学界的战时状况，洞悉了中国高校和科学界在当时严峻的战争形势下，因与世隔绝的状态而造成的教学设备和书籍及科研仪器的严重缺乏情况。陶德斯教授还将他在中国访问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以备忘录的形式汇报给英国驻华大使薛穆。

1943年2月来到中国的李约瑟，在昆明访问了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西南联大等中国科研机构 and 高校，结识了一大批中国科研和教育工作者，如吴有训、杨石先、汤佩松、熊庆来、钱临照等，对中国科学家在战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科学研究，并保持了很高的科研水平表示了由衷的钦佩。如他在西南联大了解到，该校化学系正在从事《本草纲目》中所列的治疗疟疾所用药物中膺碱和配矿体的研究工作。

在当时处于战争环境中，药物匮乏，特别是治疗疟疾特效药奇缺的情况下，该项工作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者们所从事的工作多与战争有关，直接服务于战争的需要，他们制成显微镜、望远镜，用光学玻璃制成透镜，还成功地制成用于控制无线电频率的石英晶体。北平研究院研制的水晶和中国国立资源委员会制造的无线电导航设备，被盟国军队使用。防疫研究所所制造的疫苗也被在远东作战的美英盟军使用，被中国军队广泛使用。<sup>①</sup>

3月24日李约瑟前往重庆，战时的重庆与昆明等地一样，聚集了许多内迁的中国中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如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中央地理研究所、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国立编译馆等近20家文教科研机构。这样机构，基本上设在北碚。李约瑟到达重庆后，必然要对北碚进行访问，对那里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访问，他在那里结识了一大批对他战后编纂鸿篇巨著《中国科技史》提供过很多帮助的中国科学家和教育界知名学者，如童第周、张孟闻、沈宗瀚、胡安定等人。

在重庆的访问及之前在昆明的访问，使李约瑟越来越认识到坚持科研教学的中国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的困境，也了解到他们极其需要打破中国科研学术界与世隔绝的状态，得到英、美等科研发展水平高的国家的援助。李约瑟在写给薛穆的备忘录中说：“我发现英国从事有关科学工作的政府组织，与中国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什么接触和联系。而很明显，科学合作援助首先意味着尽可能多地与中国建立联系，两国之间保持这种联系，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成立中英科学合作机构的必要性不容怀疑。位于伦敦的美国科学局和华盛顿的英国中央科学局，就是国际间科学合作和援助的极好榜样。而且这种需要不会随着纳粹国家的失败而结束。没有什么比中、英、

---

<sup>①</sup> 李约瑟：《中英科学合作馆第二年及第三年工作报告》，见李约瑟、李大斐编著，余廷明等译：《李约瑟游记》，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9页（后文引述该书，仅注书名、卷数及页码）。

美三国之间的这种合作更重要的了，现在是做工作，使中国与外部世界在科学上的联系建立起来的时候了。”<sup>①</sup>

李约瑟在这个备忘录中，提议建立的中英科学合作机构的具体任务应该是：保证对中国关于科学包括理论科学和自然科学信息的供应；对中国提供他们进行科学研究必需的仪器设备的供应；向中国提供包括缩微文献、科技期刊和科研书籍等科学文献的订购和援助；推荐中国高水平的科研工作者的著作和论文在英、美等国家出版和发表；帮助中国的科学产品出口到西方国家；组织中国科学代表团到英、美等国家进行考察和研究；英中两国之间进行科研专家和教授的互换等。<sup>②</sup>

1943年2月来到中国的李约瑟教授，在中国一直工作到1946年才离开。在中国长达三年的时间，以他为首的英国科学文化界在英国文化协会等英国有关部门的资助和支持下，对战时中国给予了巨大的科学文化上的援助。

## 二、中英科学合作馆的成立

成立中英科学合作馆是李约瑟在备忘录中提出的，其目的是与中国加强战时科学文化的合作。李约瑟希望通过这个机构使英国对战时中国科学上起到援助作用。李约瑟在备忘录中指出：“如果英国真心想帮助中国，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间了。如果我们不马上采取援助行动，那么就迟了，因为如果在中国与世隔绝的状态缓解后，英国对她的帮助，就其意义来说，就很小了。”<sup>③</sup>李约瑟在备忘录中还指出：“美国在科学技术援助中国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美国国防部文化部门对‘文化’一词，给予了十分广泛的解释，制定了宽泛的合作政策与中国政府各部门进行科学文化合作”、“我认为在此时，英国政府应当不遗余力地向中国表示我们的友好，这一定会在两国关系上产生深远的影响……”<sup>④</sup>

陶德斯在他的关于中国战时教育和文化的备忘录中，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有必要成立一个单独的权威机构——一个全职的中英学术关系组织。”<sup>⑤</sup>他还说：“我在中国各地的参观中，每到一处就受到中国教育官员和教授们的热情欢迎和友好招待……但是如果因此得出结论说中国高校教师对英国和英国文化政策是一种完全和单纯的尊重，那就错了。……在中国学者中间，存在一种持久的倾向，即认为所有或多数英国人是傲慢的、反动的、帝国主义的。”<sup>⑥</sup>陶德斯教授在访问过程中，还听到中国科技教育界“抱怨英国政府和英国大学在科学文化援助中国方面做得很

---

<sup>①</sup>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6, Far Eastern Affairs, p. 347.

<sup>②</sup>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6, Far Eastern Affairs, pp. 343-346.

<sup>③</sup>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6, Far Eastern Affairs, p. 353.

<sup>④</sup>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6, Far Eastern Affairs, p. 350.

<sup>⑤</sup>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6, Far Eastern Affairs, p. 360.

<sup>⑥</sup>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6, Far Eastern Affairs, p. 355.

少，在英中之间没有像在美中之间成立的哈佛——燕京这样相对等的文化援助合作机构。”<sup>①</sup>

但是陶德斯认为，来自中国科技教育界的“这种批评是本着友好的精神的，不应该被视为反英情绪的表现”。他认为中国科学教育界对英国的误解“可以利用长期的对华宣传，通过英国输送到中国的书籍、杂志和科学教育界个人之间的接触等手段有效地改变这种认识，最终会在中国中间形成一种对英国友好的看法和认识。中国人对英国看法的改变，还会有助于对英国在印度政策、对香港前途认识上所存在误解的消除，中国国内从战争开始以来，一直存在的怀疑英国愿意维持一个强大的日本，把日本作为在远东的一支制约中国、抗衡中国的力量的认识也会消除。”<sup>②</sup>

1943年4月19日，在中国考察访问的修中诚，在阅读了李约瑟和陶德斯两人提出的关于加强英国对华援助与合作的备忘录后，感到非常兴奋，于是这三个人联合致函薛穆，说：“我们都已经阅读过了这两个备忘录，我们一致同意这两个备忘录中详细描写的当时中国科研和教育方面的困难状况，我们请求您将它们转给外交部和英国文化协会，并希望这些合作计划能够马上实施。”<sup>③</sup>

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薛穆的理解和支持，薛穆在1943年的4月21日将李约瑟和陶德斯关于中英文化交流合作方面的备忘录，转给了外交大臣艾登。他在致艾登的信中支持两人的建议，并对艾登说：“以我之见，真正努力建立与中国的这种科学和文化联系是很值得的。……中国高校和学术单位正在经历着不可想象的困难，不管未来如何，这个受过教育的阶层是中国进步及中国政策必须主要依靠的对象。……我认为现在正是在两国间交换学者的时候，也是为中国提供切实的技术援助的时候。如果我们想获得并能拥有这些未来中国领导人的同情……我确信这种给予中国的援助和付出是十分值得的。”“最后我想强调的是这些计划应该尽快执行。”<sup>④</sup>

李约瑟和陶德斯提出的关于建立中英两国科学合作组织的计划，在1943年的7月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同意和支持，也得到了中国国防科学促进会的赞助，1943年10月英国政府正式批准了李约瑟、陶德斯提出的这个合作计划。<sup>⑤</sup>

因此，中英科学合作馆的成立原因，是英国出于改善中、英两个盟国之间的关系，共同反击法西斯侵略的结果，更是英国从两国关系发展的长远出发，为战后英国在华和整个远东地区政治地位的提高，从而保护和发展英国在远东地区经济利益考虑出发做出的外交决策。

作为抗战期间中英合作项目之一的中英科学合作馆，总部设在重庆。它是一个由英国文化协会负担经费的组织。中英科学合作馆和英国文化协会及中国政府内有关科学及工程的官员，在管理和计划制定等工作上有着密切的联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李约瑟的主要联络人和工作指导

---

①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ol. 6, Far Eastern Affairs, p. 355.

②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6, Far Eastern Affairs, pp. 355-356.

③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6, Far Eastern Affairs, p. 339.

④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6, Far Eastern Affairs, p. 338.

⑤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7, Far Eastern Affairs, p. 33.

者，是英国文化协会科学处的处长葛罗瑟；中英科学合作馆在理论科学事务方面援助中国的工作，与英国文化协会的科学处保持不间断的直接联系；在应用及军事科学事务方面的交流和对华援助中，它和英国生产部驻中国办事处进行直接联系。中英科学合作馆接受英国驻华大使馆的指导。<sup>①</sup>

中英科学合作馆的科学家由两国主要由中、英两国组成。最初有科学人员共7人，其中4人来自英国，2人为中国人，1名印度人。前后在中英科学合作馆工作过的英国科学家有6名，中国科学家有10名。来自英国的科学家除了李约瑟之外，还有李约瑟的夫人——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大斐（Dorothy. Moyle）、物理学家班威廉、生理学家毕铿（Laurence. Picken）、病理学家萨恩德（Sand）、地质学家波尔顿博士（Boulton）。中国方面的10名科学家有有机化学家黄兴宗、农业学家廖鸿英、药学家印碧云、有机化学家曹天钦、物理学家胡乾善、物理学家钱家祁、化学家侯助存、植物病理学家周家炽、生物化学家鲁桂珍、无线电物理学家龙怀民。

英国物理学家班威廉来自利物浦，战前在燕京大学讲授物理学多年并任物理系的主任。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和夫人一起逃离北平，进入晋察冀边区，在边区从事过教学工作。当中英科学合作馆成立后，四处找寻高级科研人员时，班威廉夫妇应邀来到重庆。班威廉在李约瑟外出访问时，和中国科学家胡乾善一起留在合作馆内主持日常的工作。

胡乾善曾经在英国留学多年，是中国研究宇宙射线方面的权威，在来到中英科学合作馆之前，在武汉大学任教。他在中英科学合作馆担任物理学和机械学技术顾问期间，还担任中央大学机械系的系主任并。

毕铿是毕业于剑桥大学的英国生物物理学家，是中英科学合作馆的生物和农业顾问。毕铿还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与李约瑟一样酷爱中国文明，能读懂《诗经》、《论语》、《孟子》等中国古籍，研究过甲骨文，后来在学习中国古琴的过程中对中国古乐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成为西方最早研究中国古乐的学者。“二战”结束后，他回到英国，在剑桥大学创建了唐乐研究室，成功地抢救整理出已成广陵散的唐代古谱，成为研究中国古谱的著名汉学家。他在战后曾经多次对中国进行访问。

萨恩德博士来自牛津大学的病理实验室，是英国著名的霍华德·弗洛里爵士的青霉素研究小组的合作者，在国内还从事血库建设和输血方面的工作。因此，萨恩德博士在中国期间，不仅在抗生素领域，而且在血库与输血工作方面为中国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中英科学合作馆还有一个汽车队，担负着英国对中国科学援助物资的运送任务。处于战争中的中英科学合作馆条件艰苦，工作繁忙。中英科学合作馆一般通过海、陆两条道路，对中国进行科学物资的援助；在紧急情况下，会动用英国皇家空军飞机，将在印度采购的援助物资，通过空中路线，飞越喜马拉雅山运输到昆明，然后再分发到中国各地和各科研单位。中英科学合作馆的科学家们，还经常到中国各大学和科研所，举行论文报告会和进行科学演讲。

“二战”后期英国文化协会和中英科学合作馆对中国的科学文化援助主要有：

第一，供应中国科学和教育界所需要的科学书籍、科研设备及其他物资。

1943年，中英科学合作馆向中国科研教育机构赠送289册书，1944年和1945年赠送书籍

---

<sup>①</sup> 李约瑟：《关于国际科学合作事业的第一个备忘录》，见李约瑟、李大斐编著，余廷明等译：《李约瑟游记》，第296页。



6775 册。<sup>①</sup> 1943 年经科学合作馆送往印度加尔各答购买科学设备、化学试剂的清单就有 77 份。英国情报部在此有人专门负责采购事项，物资在当地采购后经过英国皇家空军运输到昆明，科学合作馆共收到的 333 份订单都办理了，包括西南联大无线电研究所急需的几大桶稀有气体；北平研究院需要的光学玻璃；昆明物理学家们所需要的告诉电子振荡器等。<sup>②</sup>

由于在战时运输物资的困难和危险，在李约瑟的建议下，在英国国内工作人员将大量的英、美等国家的科学工程学方面的杂志制作成缩微胶卷，再运送到中国。中国科学家在收到这些缩微文献后，立即从中选出有用的、特别值得更广泛传播的文章、论文，再编辑成短文或文摘印刷成各种文摘杂志，如当时中华自然科学社的《选自缩微胶卷的短文与文摘》和《现期文献评论选集》；中国国际文化服务处也出版了类似的《科学服务》，大约出版了 10 期。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和天原化学厂合办的《化学工业——选自缩微胶卷的短文》等。<sup>③</sup>

第二，推荐中国高水平的科研工作者的论文和著作，到英、美国家发表和出版。战时由于交通阻塞或断绝，给中国广大科研工作者的科学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国际上最新的科研成果和信息无法进入中国为中国科学家们所了解，这些困难严重阻碍了战时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但是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仍然在坚持着科学研究，撰写了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但是却没有机会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没有让国际科学界了解中国科研的水平。李约瑟认为“为了保持中国科学家们的工作斗志，有必要把他们的科学论文和成果拿到西方国家发表”<sup>④</sup>。

在中英科学合作馆存在的三年中，总共向西方推荐 138 篇中国科研工作者的文章，其中向英国推荐 124 篇，向美国推荐 11 篇，向印度推荐 3 篇。<sup>⑤</sup> 这些文章由中英科学合作馆安全寄出后，以英国文化协会科学处为传播中心，大多被推荐到西方国家中第一流的科学期刊如《自然》和《科学杂志》上发表。战时中国的科学家们的科研水平，并没有因为如此恶劣的研究条件而倒退，因为这可以从外送论文的被采用和发表的比例上看出。据统计，这些外送的论文直接被采用的占总数的 73%，经修改后被录用的占总数的 12%，两者加起来总的录用比例是 85%。<sup>⑥</sup>

《申报》中曾经说中英科学合作馆“在此板条上刷有白垩之矮屋中，曾流通过无数科学新书籍、杂志、翻印本，一箱箱仪器化学品，一包包特殊种子与幼苗，以及在英与印特地为战时渴望资料之中国科学家筹备之材料，同时亦有中国科学家研究工作的报告以及农业上之材料，经过此屋，到达英国供科学家之用”<sup>⑦</sup>。正像李约瑟本人所说的那样，中英科学合作馆在两国之间，就

---

① 李约瑟，《科学前哨》，见李约瑟、李大斐编著，余廷明等译：《李约瑟游记》，第 52~55 页。

② 李约瑟，《科学前哨》，见李约瑟、李大斐编著，余廷明等译：《李约瑟游记》，第 56~57 页。

③ 李约瑟：《中英科学合作馆第二年及第三年工作报告》，见李约瑟、李大斐编著，余廷明等译：《李约瑟游记》，第 54 页。

④ BDFA, vol. 6, p. 345.

⑤ 李约瑟：《中英科学合作馆第二年及第三年工作报告》，见李约瑟、李大斐编著，余廷明等译：《李约瑟游记》，第 60~61 页。

⑥ 李约瑟：《中英科学合作馆第二年及第三年工作报告》，见李约瑟、李大斐编著，余廷明等译：《李约瑟游记》，第 61 页。

⑦ 《申报》，《英国科学家尼德汉夫人曾在嘉陵江畔矮屋中工作》，王钱国忠，《李约瑟文献 50 年》（1942—1992），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8~19 页。

是一个为科学和学问服务的邮局，这个邮局的宗旨就是帮助两国之间这种科学和文化上的联系和合作，这又是双方在智力上的双向“租借”。这个“邮局”和这种“租借”，使战时的中国科学界不再与外部世界隔绝了。

第三，将中国科学家的科技产品输出国外应用。中英科学合作馆不仅积极向英、美等国家推荐中国科学家们的理论成果，还热情向外推荐输出中国科学家们的科技产品。如中国空军研究署研制的用于飞机制造和修理上的竹制层板，被应用在盟国内部；中国国立资源委员会制造的全套无线电天线都在其他盟国军队中使用；中国防疫研究署生产的疫苗在西方国家使用；中国科学家们还向世界提供了葛藤种子，而这种葛藤有非凡的捆绑和防腐性。中英科学合作馆向西方介绍的中国科研工作者的理论成果和科技产品的发表和应用，一方面密切了中西科学文化和技术的交流，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科研工作者的科学研究热情，还使一部分原来认为在战时给予中国帮助是个巨大错误的西方人，开始逐步消除了对中国科研水平落后的看法和偏见。

第四，协助中、英两国科技人员的交流和互访。邀请中国学者访问英国，在英国进行考察和研究，是两国科学技术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这些访英学者在英国期间的费用也是由英国文化协会负责的，因为他们认识到“邀请中国学者访问英国，是比邀请中国学生到英国留学更好的投资，因为一个教授学者会立即起到一种更大的更广泛的影响”<sup>①</sup>。据统计，中英科学合作馆在成立期间，一共安排了8位中国教授和16位研究员到英国访问和做研究工作，如周后复、范存忠、洪谦、沈有乾、方重、孙毓堂等教授都是受到英国文化协会的邀请到英国讲学的。

范存忠教授是中央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主任，1944年他应邀在牛津大学讲学。在一年的时间中，他系统讲授了中国古代哲学、政治和文艺等对西方的巨大影响；方重也是中央大学的教授，研究英国文学，1944年应邀在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和爱丁堡大学等讲学，还担任着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客座教授；洪谦是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1945年到英国牛津新学院任研究员，讲授中国哲学。英国文化协会协助教育部选送67名中国留学生赴英留学，还资助了12名中国教授作为英国文化协会的客人访问英国。英国文化协会资助我国学生到英国学习研究，英方负担每个学生每年200英镑，不足之数，由政府补足。<sup>②</sup>

对于派遣英国教授和学者到战时中国讲学，也是英国文化协会积极开展双方人员交流上的一个重要工作。英国文化协会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英国高校和中英科学合作馆合作，克服了诸多困难如战争的危险和交通上的不便等，不断将英国学者派遣来华，进行学术上的交流和合作。

1942年，英国文化协会和牛津大学准备派遣该校教师麦卡伦等人来华讲学，但是因为战事没有成行。这年4月，英国文化协会派遣英国技术教育权威萨金特教授来华讲学。<sup>③</sup>同时，中英科学合作馆和英国文化协会还组织了英国德汉姆大学的肯维克教授对中国进行访问和考察活动，瑞查德森也被派往中国，与中国农业部一起开展农业方面的研究工作。<sup>④</sup>至于李约瑟、修中诚等人，更是中国人民特别熟悉的英国文化协会派遣来华开展科学文化合作的著名代表人物。

---

① B 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6, Far Eastern Affairs, p. 346.

② 杜元载主编：《革命文献》，第58辑，抗战时期教育，第258页

③ 杜元载主编：《革命文献》，第58辑，抗战时期教育，第105页。

④ B 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6, Far Eastern Affairs, p. 212-213.

英国文化协会和中英科学合作馆针对战时交通极其困难、不方便从英国派出科学家到中国讲学访问的情况，还就近组织在中国、香港的英国科研专家在华访问和讲学。如罗伯特·潘恩是一位信息处官员，就被派到复旦大学做交换学者；戈登·金博士，曾经在香港大学任教，也被派到中国的一所医学院任教。<sup>①</sup>

第五，为中国科研团体和高校提供科研教育咨询。李约瑟担任着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通信研究员，与这两个研究院的科学家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后来李约瑟还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教育部的顾问、经济资源委员会的顾问、中国空军研究署委托研究员等，1945年初又担任了英国驻华大使馆的科学参赞。中英科学合作馆的医学顾问、病理学家萨恩德博士担任了中央大学的客座教授、国立卫生署顾问。中英科学合作馆的生物、农业顾问、生理学家毕铿，担任贵州陆军军医学校的客座教授等，这些英国科学家们通过这种兼职方式为中国科研部门提供咨询意见。不仅如此，中英科学合作馆的英国科学家们还利用旅行方式，随时随地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提供科学咨询上的帮助。他们在中国旅行期间，进行了很多次具有咨询性质的科学讲演，李约瑟、李大斐、毕铿和萨恩德共作了123次科学讲座；在重庆的访问中至少另外作了100次演讲。<sup>②</sup>在中英科学合作馆的三年中，英国科学家们总共访问了中国科技机构296个，形成了近300份的价值极大的访问记录以及中国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登记册。以致有人开玩笑说，登记册可以作中国科学《名人录》的基础。<sup>③</sup>

此外，中英科学合作馆还利用电影、广播等媒体向中国科学界传播国外最新的科研信息，向中国普通民众普及科学方面的知识和常识。如英国的科技电影，特别是有关青霉素和麻醉剂的科技电影引起了中国民众特别的兴趣，中国广播公司还作了固定安排，重播BBC中文节目中的科学谈话。……李大斐博士、毕铿博士和萨恩德博士在重庆发表了广播讲话，李约瑟博士在成都发表了广播讲话，向中国民众传递科学知识。<sup>④</sup>

英国对华科学援助是在英国政府的领导下，在中国政府的领导和有效合作下，通过英国文化协会、中英科学合作馆及中英两国的许多相关机构共同进行的。所以，这种对华技术援助，就是英国对中国政府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领导全体军民继续抗战的一种肯定，是双方之间进行的一次成功的合作，是对中国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援助。

首先，成功地恢复了因为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断的中国和西方各国之间的科技文化交流。从1931年日本开始对中国的侵略以来，特别是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日本侵略范围在中国境内日益扩大，许多大中小学和科研机构被摧毁，图书馆、实验室等被焚烧，或者被迫内迁到西南和西北地区。从1941年以来，日本侵略的范围进一步加大，中国科学教育界除了脆弱的公路和航空与外界有一点联系外，基本上已经与外部世界隔绝了。在战时这种情况下，十分有必要恢复中国科学教育界与外部的联系，这不仅仅关系到最基础的中国理论科学的发展，还关系

---

①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5, Far Eastern Affairs, p. 147.

② 李约瑟：《中英科学合作馆第二年及第三年工作报告》，见李约瑟、李大斐编著，余廷明等译：《李约瑟游记》，第63页。

③ 李约瑟：《中英科学合作馆第二年及第三年工作报告》，见李约瑟、李大斐编著，余廷明等译：《李约瑟游记》，第52页。

④ 李约瑟：《中英科学合作馆第二年及第三年工作报告》，见李约瑟、李大斐编著，余廷明等译：《李约瑟游记》，第69~70页。

到与中国国家战争力量直接相连的应用科学的发展。所以，恢复中英之间、中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这种科技文化交流是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而英国文化协会和中英科学合作馆，帮助做到了这些。

其次，英国对中国进行战时科学援助是对中国物质和精神上的巨大的双重援助，对鼓舞中国科技教育工作者的工作热情，对提高中国军民的士气，继续坚持抗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日本对中国实行的文化侵略政策，使中国科技教育界对物质和道义上的援助需求非常迫切，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文化协会派出以李约瑟为首的英国科学家对中国进行的考察和访问，英国文化协会和中国政府共同合作成立中英科学合作馆，以及中英科学合作馆在三年的时间中对中国进行的全方面的科学援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使他们认识到中国的抗战不是在孤军奋战，是得到英国这个中国战时盟国巨大援助下的共同奋斗，从而更加坚信了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信心和勇气。这种在中国人民极端困难的抗战时期的文化科学援助合作，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种雪中送炭。

第三，英国对华科学援助，是中国和英国之间也是中国和西方之间文化交流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在英国对华科学援助过程中，派遣了以李约瑟为首的大批英国科学家到中国来，这与明朝时期利玛窦来华不同。利玛窦等人来华的目的不在于科学和文化的交流，而李约瑟等人来到中国的一个目的，是进行科学交换和合作，促进中国的抗日战争。与此同时，有许多中国的学者教授到英国进行讲学和访问，中英两国进行的这种战时文化交流合作在双方之间架起了一座相互认识和了解的桥梁，为东西方之间科学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条件。

第四，战时英国文化协会驻华负责人李约瑟博士，不仅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传播中华文明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在中国期间对中国 13 个省份进行了考察和旅行，大大开阔了眼界。他与中国各界人士交往，从国共双方军政要员到工人、农民、商人和学生，尤其结识了不同专业的中国专家学者，如科学技术界的竺可桢、钱临照等人。他们同李约瑟谈论各种科学史问题，启发了李约瑟的研究兴趣；李约瑟还与郭沫若、傅斯年、李济等讨论中国历史、社会、思想、经济和语言文字等问题，促进了他对中国的全面了解。李约瑟在各地还搜集了大量的中国古书典籍，在各地看到了工农业方面的传统生产技术，这对他日后在剑桥大学创办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研究中国科技史并写出鸿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都有极大的帮助。

应该注意的是，英国在战时对中国的科学援助，是在自己也处在战争状态、国内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宝贵的援助，是在忍受着巨大的牺牲的情况下，对中国提供的巨大的科学援助。如战争时期，法西斯德国经常派出飞机空袭伦敦等英国许多城镇，李约瑟说：“德国飞机对伦敦的一次燃烧弹空袭，就烧毁了出版商仓库中的几百万册书。”他还说自己在 1946 年时收到沈同博士的来信。沈同博士在信中描写了他所了解到的英国战时困难：“庄先生最近从英国写信给我，庄先生对战争困难时期英国大学的气氛印象非常深刻。他告诉我在布里斯托尔和伦敦买书都很困难，他无法找到一本自己用的牛津词典。这一事实使我非常感动。收到了中英科学合作馆如此众多的赠书，我希望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sup>①</sup>

又如维系中国和西方之间战时科学文化交流的是那条飞越“驼峰”的著名的，但充满了极大的危险的空中航线，因为在战时，除了跨越新疆、缅甸到中国境内的有限的脆弱的交通线路之外，只有这条吞噬了很多优秀飞行员的空中航线。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都为此倾注了极大的

---

<sup>①</sup> 李约瑟：《中英科学合作馆第二年及第三年工作报告》，见李约瑟、李大斐编著，余廷明等译：《李约瑟游记》，第 53 页。



努力，所以该航线尽管很脆弱，但是却从没有中断过。

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英国文化协会对战时中国的科学援助，特别是对中英科学合作馆对中国的科学援助给予了高度评价。如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兼北平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说：“英国文化委员会送李约瑟博士到中国来，这件事在中国和西方文化交通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他还说李约瑟博士是了解又同情中国的朋友：“同情我们但不了解我们的人，自然是我们的朋友，特别是在艰难困苦的时候；而了解我们但不同情我们的人所说的话是值得我们特别警惕的。然而最可宝贵的是又了解我们而又同情我们的人，尤其是他们的同情是由了解而来的。”<sup>①</sup>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汪敬熙也说，李约瑟等人是“在困难时候，雪中送炭的友人，是最使人想念的朋友”<sup>②</sup>。

中英科学合作馆成立时期，英国对中国的科学援助主要集中在理论科学方面，应用科学的援助实际上也是英国的政治家尤其是英国外交部的政治家以及英国工业界人士感兴趣的一项合作事宜。但是，在中英科学合作馆成立时期，也就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后期，由于条件的限制，英国对华技术援助可以说是不成功的。不过英国的确做了这方面的努力。

还在1942年9月，蒲乐道在其关于中国高校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他在对中国高校进行访问的过程中了解到，特别是从中国工程专业的学者那里了解到中国“邀请到英国的熟练技术工人来华，在工程学院、在车间中讲授技术问题，以提高中国学生的实际操作水平”。“我相信这个建议是切实可行的，是有益的。我们可以从对中国的这种援助中得到回报。”<sup>③</sup>蒲乐道的建议得到了薛穆的支持，他在1943年2月4日致函艾登，首先讲述了他了解的美国技术援华情况。“美国国防部的美中文化计划涵盖了很广的范围，还包括向中国派遣土壤保护、农业、动物畜牧、工业等方面的专家。……对这个计划，中国政府显然十分满意……美中文化计划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英国自然应该沿着类似的路线进行发展，将与中国合作的活动范围扩展。”<sup>④</sup>

1943年2月底来到中国的李约瑟，也提议英国的技术专家和大型工业企业中的研究人员到中国进行访问。<sup>⑤</sup>李约瑟在会见了中国卫生部官员后，了解到目前中国对药学、化工方面的技术专家，监督中国药业生产和化工生产。中国卫生部的官员还向李约瑟表示，中国四川适合种植柑橘的面积相当于美国加州的两倍，但是中国柑橘产量却只有美国的1/15，中国希望英国能够派出技术专家援助。他认为英国食品监督委员会在这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使英国能够提供这方面的合适人选。同时中国欢迎英国奶牛饲养业方面的专家，来华援助在中国的甘肃、四川和贵州等地发展养牛业。中国还需要英国提供以下技术援助：从铋矿中提取铋的技术专家，帮助中国对付坏疽以保护军队官兵的方法等。<sup>⑥</sup>李约瑟认为，在技术援助中国方面，让人无可怀疑的是，美国

---

① 李约瑟、李大斐编著，余廷明等译：《李约瑟游记》，第305~306页。

② 李约瑟、李大斐编著，余廷明等译：《李约瑟游记》，第304页。

③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6, Far Eastern Affairs, pp. 36-37.

④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6, Far Eastern Affairs, pp. 212-213.

⑤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6, Far Eastern Affairs, p. 351.

⑥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6, Far Eastern Affairs, pp. 351-352.

正在建立他巨大的领导地位。因此，英国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不能让美国一手包办。<sup>①</sup>

对蒲乐道和李约瑟提出的技术援助中国问题，薛穆在 1943 年 6 月 7 日再次致函艾登，说：“中国经济部部长控制着与中国战后工业化和重建相关的各组织，曾口头上向英国表达过欢迎英国专家。至于进一步的行动现在正在考虑中，在该问题上要尽可能地与美国保持一致。”因为这关系到“确保英国在战后中国重建和工业化进程中，英国能否全面的参与。对此问题，英国政府正在考虑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确定邀请英国技术专家访华的可能”。从薛穆的话中，可以看出英国对技术援助中国心切，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战后英国对中国恢复和重建工作的参与问题，这等于直接关系到战后英国在华利益的保障和进一步提高问题。这对一向特别关注经济利益的英国政府来说，是很重要的，对战后英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内就业率的提高、社会矛盾的缓和来说，更是十分重要的。

所以，薛穆又建议“在英国驻华大使馆内重新设立商业外交代表，因为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英国在华就没有了商业外交官员……”“建议新任的英国驻华商业外交官员应该有一个工程学方面的专家做商业秘书。同时应该有专门的官员负责在工业方面与驻华大使馆进行密切的联系”<sup>②</sup>，以便英国驻华大使馆对中国战后经济恢复和国家重建，做好人员和专业上的全面参与的准备工作。

艾登在接到薛穆的技术援助中国的建议后，立即在国内召开了有关部门参加的联合会议。在会上，各部门都一致同意英国应该满足中国对技术专家访问中国和援助中国的需求。它们还认为，目前最适合采取的措施是首先向中国派出基础重建方面如铁路建设和电站建设方面的技术专家。<sup>③</sup>艾登还告诉薛穆，让他通知中国政府并向中国政府说明，英国很愿意在这方面满足中国的需求。……一旦英国在接到中国政府的正式邀请后，就会向他们提供一份合适的派往中国进行援助的技术专家的名单。<sup>④</sup>

1943 年 8 月 31 日，中国政府正式表示欢迎英国派遣技术专家援助中国。那是在中国经济部长会见英国驻华商业顾问时所做的表示，中国经济部长对英国在华商业顾问说，中国政府特别满意英国政府做出选择英国真正的一流技术人才访华的安排。他还说这些人才都是在某一专门领域的专家，中国政府欢迎这样的人才和专家做顾问。这些英国专家将被放在中国政府内部与中、美两国专家共同制定中国战后重建计划，他们的薪水将由英国政府提供。经济部长还说 he 很高兴英国通过相关部门提交这个计划，并通过外长通知薛穆大使，中国正式欢迎英国政府向中国派遣他们选择的技术专家。

对于英国方面提供的技术专家名单，有关部门非常满意，他们认为博格斯德姆（Bergstrom）和杨（Young）两个人都是英国十分杰出的专家，能够和中国进行合作的专家。他们特别强调，由于杨还是一个在电力学方面的专家，这是中国政府特别需要的人才。此外，英国赴华专家名单

---

①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7, Far Eastern Affairs, p. 39.

②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6, Far Eastern Affairs, p. 122.

③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7, Far Eastern Affairs, p. 43.

④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7, Far Eastern Affairs, p. 43.

中，有造船业、塑料制造业和建筑业等方面的专家。这些专家都是中国急需的、欢迎的。同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孙科说他已经从中央政府那里得到指示，即中国任命英国技术顾问，不会排除在相同的工业领域中已经任命的美国专家，英美两国专家与中国的合作实际上对中国会更有利。<sup>①</sup>

### 三、英国工商业界与技术援华问题

英国工商界出于对战后发展的需要，对参与战后中国恢复和重建一直很期盼。他们希望充分利用中国这个有着巨大潜力的市场，复兴英国的工商业经济。他们认为：“考虑到战后英国出口商业的复兴和发展，以及中国潜在的资源，英国参与中国战后重建是没有什么疑义的。”“虽然英国的资金和资源在战争中消耗殆尽，但是这不会影响我们作为一个商业国家的力量，实际上我们唯一可以从战争中复兴的方法就是，通过利用我们的生产制造能力……我们历史上形成的买卖、金融、保险等多方面的技术和经验，以及遍及全球各地的我们制造的商品等等。”他们还建议，可以利用“各种无形的因素如外交上的友好和文化技术上的联系的加强等”，来达到目的。<sup>②</sup>在英国工商企业中，英国帝国化学公司，对中国农业发展和战后中国重建特别感兴趣，其工作人员布莱维特，已经前往中国，准备在英国驻华大使馆从事专门技术援华任务。<sup>③</sup>

英国工商界对中国提出的派遣中国学生到英国学习和培训的提议，也表示了赞同的态度。1943年6月，中国交通部长与英国驻华大使会谈时，询问英国方面能不能制定一个计划资助中国学生和优秀学徒到英国进行工业技术方面的培训，薛穆当即表示予以支持并致函外相艾登，呼吁英国国内有关方面“尽快制定大规模资助中国学生到英国进行技术培训的计划，并把它作为战后英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长期措施之一”<sup>④</sup>。“如果战后的中国有一个进步、有序和稳定政府，中国的战后发展和工业重建，一定会为英国工业制造业提供巨大的机会。到那时，那些曾经在英国参加工程学和工业等专业培训的人员，将是负责制定、指导和开展工业化进程的人员。在这些政策制定者和计划执行者中，越多这样在英国具有培训经历的人，中国的新兴工业就必将越多地需要英国的机器设备和其他供应物资。”<sup>⑤</sup>

艾登在接到他们的信函后，就将薛穆与中国交通部长会谈的情形，把中国希望英国为中国提供学生和学徒到英国参加技术培训的需求，向英国工业联盟进行了通报。艾登还指示外交部努力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艾登的回应，使英国工商界感到鼓舞。

1943年7月31日，薛穆再次致电艾登，说：“英国在华企业，最近不断询问英国在华商业顾问，关于英国纺织工业是否准备接受或考虑战后订单问题”，“我认为我们要鼓励英国公司探索在华战后的可能性等问题，要从现在开始探索战后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可能性问题，做好这方面

---

<sup>①</sup>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7, Far Eastern Affairs, pp. 82-83.

<sup>②</sup>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7, Far Eastern Affairs, pp. 428-429.

<sup>③</sup>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6, Far Eastern Affairs, p. 213.

<sup>④</sup>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7, Far Eastern Affairs, pp. 38-39.

<sup>⑤</sup>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7, Far Eastern Affairs, pp. 38-39.

的准备工作。美国全面的关于战后中美经济可能性的考虑这样的信息，我们要予以重视。”<sup>①</sup>

1943年8月，英国帝国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的驻华代表向中国经济部长提出资助6名中国学生到英国高校留学的建议，他说英国帝国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将向这些学生提供为期两年的奖学金。这些费用中，包括学生在英国旅游的开支以及在英国期间所有教育上的花费。该公司还考虑，尽可能地让那些在英国留学的学生进入他们的公司或工厂工作。

艾登认为：“这些方案与最初提议相比，更加具体，并有了很大的完善。同时也得到了中国交通部和经济事务部的一致同意，希望英国技术专家能够尽快访问中国，在中国当技术发展顾问。希望这一切能引起中国政府和领导人的重视，并主动向英国提出派遣技术专家，包括从农业到工业各专业上的专家作为中国政府的顾问，帮助中国制定出综合的、详细的，各方面都能协调好的战后重建计划来。”<sup>②</sup>

因为在他们看来，加强英国对华技术援助，是直接关系着英国战后国内经济复兴这一根本性问题。况且，美国在战争时期与中国在经济上、文化技术上和军事上等各方面的密切合作，使得中、美两国关系更加密切，令英国感到战后一定会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因此，只有尽早地加强与中国技术上的联系，才能使在战争合作中不断有不和谐声音出现的中、英两国关系走向和谐与密切，才能更好地维护和保证英国在远东和中国的一切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他们一致认为，中、英两国战时关系的发展历程表明：“恢复我们在远东的地位，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我们军事上的胜利和在印度问题上明智的、公平的解决，在缅甸和马来亚问题上同样明智的、公正的解决。而这些问题明智又公正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我们对中国实行一种合适的宣传和援助。”<sup>③</sup>

还在1943年8月时候，英国对开展技术援助中国计划的实行，与中国进行全面的工商业技术方面的合作充满了信心。因为1943年8月7日，薛穆致电艾登时，还说关于中国派遣500名技术学生到英国学习的计划，“据悉，这个计划已经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交通部将很快把此消息告诉英国驻华使馆。中国国家教育部、国家资源委员会等一些其他机构也提出了类似的计划，希望能够在英国和美国培训技术学生……”<sup>④</sup>

但是一个多月时间过去了，关于英国仍然没有得到来自中国政府方面的答复。薛穆分析认为，中国方面之所以迟迟没有答复的原因，可能是该计划的实施涉及众多政府部门，它“需要教育部和其他政府部门提出的类似的派遣计划的协调以后，才能做出最终的决定和答复”<sup>⑤</sup>。

中国政府对战后重建的详细计划还没有做出决定，对是否允许外资参与这些计划还没有最终决定。英国驻华大使馆经济顾问布鲁恩（Prideaux. Brune）分析其中的原因，是与英国在贷款援

---

①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7, Far Eastern Affairs, pp. 50-51.

②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7, Far Eastern Affairs, p. 99.

③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7, Far Eastern Affairs, p. 79.

④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7, Far Eastern Affairs, p. 61.

⑤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7, Far Eastern Affairs, p. 99.



助中国方面没有满足中国而导致了这样的后果。他说：“从 12 月间英国驻华大使与财政部长、经济事务部长的会谈中，似乎有理由认为中国不接受英国向对方派出技术专家的建议的直接原因，是英国在对华 5000 万贷款上没有满足中国的意愿。虽然这两个问题在财政部长的眼中看起来有联系，但是似乎它们之间没有相互的关系。

中国经济事务部部长明确告诉英国驻华商业顾问，说他没办法接受认为英、美技术专家参加战后重建计划与贷款谈判失败的有关说法。他还接着解释说，美国技术专家主要关注的是在目前技术援助问题上担当战时顾问，他们对战后重建问题上的观点是偶尔的、顺便的。他还说，中国欢迎英国技术顾问到他们认为对中国有益的地方进行援助活动，他将高兴地听到有什么英国专家的工作可以利用来帮助中国。<sup>①</sup>

布鲁恩强调：“似乎有理由认为中国方面对我们各种各样的培训技术学生和学徒的建议的失望，可能也是由于贷款问题上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中国财政部长由此产生的失望态度引起的。但是现在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疑心太重了。”

英国商业顾问被明确告知中国交通部，将选择 270 名中国技术人员到国外参加培训和学习，其中的 30 名将到英国，40 名去加拿大，200 名去美国。<sup>②</sup>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财政部长的心目中，5000 万英镑的贷款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仍不能达成某种妥协，中国很可能做出严重不利于我们利益的事情来”<sup>③</sup>。

在技术援华方面，英、中之间的合作没有能够如双方在文化和科学上的交流那样密切，甚至英国设想的大规模的对华技术援助以及由此肯定会带来的战后英国对中国的复兴计划，基本上没有真正达到协商一致，当然更谈不上什么密切的技术合作。双方在此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其实与英国 5000 万贷款问题，与英国战时对华政策中表现出来的殖民主义的一面有着直接的关系。

因为，在二战后期，经过几年抗战洗礼的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已经在心理上强大起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战争中也大大提高。中国从事反抗纳粹侵略的战争开始的最早，而且中国人民在远东一直担负着抵抗日本侵略的最大主力，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是在为自己而战，同时也是为在中国和在远东有利益的英、美等国家而战。所以，中国人民的长期艰苦抗战赢得了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的一致尊敬。在抗日战争中日益壮大起来的中国人民和政府，对英国政府对华政策中，时不时地表现出来的蔑视中国、损害中国权益等殖民主义政策和倾向也越来越不能够忍受。可以说，英国对华技术援助流产的根本原因就是英国统治集团对华政策中流露出的殖民主义倾向，直接原因是关于英国 5000 万对华贷款问题的久拖不决。

5000 万英镑贷款问题，开始于 1941 年 12 月蒋介石向英国要求一笔一亿英镑的贷款。蒋介石告诉薛穆，要求英国政府认真考虑这笔贷款，因为这一要求正如“一幅挂在墙上的图画”，是用来激励中国人民抗战的。<sup>④</sup>当时的英国财政困难，不愿意向中国提供如此巨大的贷款，而且英

---

<sup>①</sup>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7, Far Eastern Affairs, p. 229.

<sup>②</sup>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7, Far Eastern Affairs, p. 229.

<sup>③</sup>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7, Far Eastern Affairs, p. 229.

<sup>④</sup> *BDFA*, Part III, From 1940 through 1945, Series E, Asia, Vol. 5, Far Eastern Affairs, p. 39.

国误会了蒋介石的话，以为蒋介石提出这一要求只是希望英国在援华上向外界做出一种姿态。但是英国考虑到完全拒绝中国，可能会造成中英关系的恶化，但是英国又实在不愿意给中国提供如此巨大的贷款。

所以，在1942年2月，英国政府宣布对华贷款5000万英镑。但是，英国对贷款的使用却附加了许多限制性的条款，规定贷款只能在战时用于战争目的，只准中国政府利用贷款在英镑使用范围购买所需的战争物资。而同样是对华贷款，美国却没有附加任何限制性条件。中英双方曾经就贷款使用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直到抗战结束，仍然在争论中。所以，贷款问题在中英关系中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使得两国关系日益紧张。

英国之所以在贷款问题上，态度消极并附加了许多限制性的规定，主要是因为英国不希望中国通过抗战成为一个远东的大国和强国，成为自己在战后在远东地区进一步扩张的障碍。但是英国又要利用中国抗战维持自己在远东的利益和局势，利用中国的抗战达到消灭日本军事法西斯政权，彻底消灭对自己利益的危险因素。所以，英国在贷款问题上，表现出了消极的态度和行为。

因此在英国援华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殖民主义倾向，这种殖民主义倾向影响到了两国的战时合作，也使双方在技术上的合作计划不可能成行。但是，战时英国政府主导下的对华文化科学援助和合作，非常有利于中国的抗日战争，所以取得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合作，这也带来了科学援华的巨大成功和深远的影响。在这些影响中，李约瑟关于中国文明的思想，发射出灿烂光芒。

#### 四、李约瑟对中华文明的宣传

李约瑟在中国工作期间，不仅为援助战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中英文化的交流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中国科学》一书，产生了撰写《中国科技史》的想法。他还常常思考中国文明的一些重要问题，在这些问题中，他提出了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并做了解答，对宣传中国文明作出了贡献。

李约瑟高度赞扬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大伟大成就，批评西方没有认识到中国古代文明对世界所作出的贡献。1946年7月16日，他回到英国后，在英国伦敦“中英协会”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赞颂了中国文明，并强调说：“几乎在两年半前，我就对中英协会说过我的观点，即如我在《中国科学》一书中指出的那样，那种认为中国主要是一个农业国，没有对世界科学技术史的发展作出贡献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误导西方人民的。”<sup>①</sup>

《中国科学》是李约瑟1945年写的一本介绍战时中国科学、配有图片的书，该书1945年在英国伦敦出版。该书的第一部分，介绍战时四川、西北（陕西和甘肃）、东南（广西、广东、江西和福建）、西南（贵州与云南）各地的战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其中包括了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科学技术，介绍了延安的各大学和学科研究情况。<sup>②</sup>

在演讲中，他赞扬了中国四大发明对世界的贡献。他说，历史学家伯里（J. B. Bury）写了《进步思想史》一书。该书认为，印刷术、火药与指南针的发现，是“古代”与“现代”的区别。但是该书只提到文艺复兴在这方面的贡献，而没有一个字提到中国是这三大文明的发明者。他指出，该书甚至在注释中，也没有一个字提到中国的贡献。他认为这非常不公平，这反映了西

---

<sup>①</sup> Report of an Address by DR. Joseph Needham: Some Thoughts About China, The China Society, 3 Victorial Street, London, S. W. 1, 1946, p. 1.

<sup>②</sup> Dr. Josheph Needham: Chinese Science, Pilot Press LTD, 45 Great Russell Street, London, W. C. 1, 1945, pp. 5.

方人的无知。他说，西方人属于“欧—美”文明，因此就对欧洲文明自吹自擂，这不符合事实，会引起亚洲人的不满。<sup>①</sup> 他说，西方人似乎通常认为中国是一个纯粹的农业与艺术文明的国度。其实不然，中国人对世界科学技术，作出了重大贡献。李约瑟举例说明了他的观点。他说，中国在全世界最先发明了磁性指南针、炸药、造纸术和印刷术，以及接种牛痘等。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认识营养缺乏症的国家，最先发明冶铁、铸铁的国家。他还认为中国中医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他说：“在他们的传统药物中，在今天仍有几种具有重大的价值和用处。”<sup>②</sup>

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证明，中国人具有聪明才智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而中国科学家在战时非常艰苦情况下取得的科学成就，证明中国人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他特别认真地考察了战时中国的大学与科研机构，认为在他们做出的成就中，许多是世界一流的。他特别称赞抗战时期设在昆明的“中央研究院生物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一般生物学和病理学研究所”，称赞它们是世界一流的研究所。他认为这两个研究所研究人员的论文，是世界一流的。他也对西南联大的各院系的研究成果也赞叹不已。<sup>③</sup>

他强调说，过去西方把中国看成一个农业国，没有对世界科学计算作出贡献完全是错误的。中国不仅为世界科学技术作出过重大贡献，而且还在为世界科学做贡献。中国人是有能力发展出世界一流科学技术的。<sup>④</sup> 与此同时，他提出了一个非常令人深思的问题：“既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非常伟大，但是为什么中国古代文明没有发展成为现代科学技术？”<sup>⑤</sup>

其实，很早李约瑟就提出了这个问题。1944年2月，他在给英国政府的工作报告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在《中英科学合作馆第一年的工作报告》中（Report of the First Year's Working of the 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Bureau），他说“中英科学合作馆”已经安排人，把有关书籍翻译成英文，特别是翻译中国科学技术书籍。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回答上述问题。<sup>⑥</sup>他多次说：“中国人古代在科学技术上，的确非常伟大。问题是：他们为什么没有继续把他们的科学技术，上升到理论，构筑起其理论体系？或如西方那样，发展出现代科学？”<sup>⑦</sup>

李约瑟本人给予的答复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处于领先地位，在现代却落后了的原因有两点：

---

① Report of an Address by DR. Joseph Needham: Some Thoughts About China, The China Society, 3 Victorial Street, London, S. W. 1, 1946, p. 1.

② Dr. Josheph Needham: Chinese Science, Pilot Press LTD, 45 Great Russell Street, London, W. C. 1, 1945, p. 1-15.

③ Dr. Josheph Needham: Chinese Science, Pilot Press LTD, 45 Great Russell Street, London, W. C. 1, 1945, p. 68.

④ Dr. Josheph Needham: Chinese Science, Pilot Press LTD, 45 Great Russell Street, London, W. C. 1, 1945, p. 1-15.

⑤ Report of an Address by DR. Joseph Needham: Some Thoughts About China, The China Society, 3 Victorial Street, London, S. W. 1, 1946, p. 1-3

⑥ British Council Cultural Science Office In China, 1944 by Dr. Joseph Needom, F. R. S British Embassy, Chunking, Report of the First Year's Working of the 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Bureau, p. 7.

⑦ Report of an Address by DR. Joseph Needham: Some Thoughts About China, The China Society, 3 Victorial Street, London, S. W. 1, 1946, pp. 2-3.

第一，中国大一统后的封建制度，是一种“官僚封建制度”。这种制度，束缚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第二，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官僚封建制度的产生。他认为中国的历史发展与西方不同。在西方，从腓尼基人开始，经早期的希腊城邦（state city），到现代西方城市，如安特卫普和里昂，西方的历史根本离不开城市国家。而在中国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之对应。与西方的城市国家“城邦”或自由市相比，中国古代城市，主要是农业地区的中心。这些城市没有与矿山或航海活动有联系；没有选举产生的市长和高级市政官、市议员，其官员都由中央政府任命，也只对朝廷负责。这是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根本不同之点。

李约瑟认为，中国秦朝实现国家统一时，不是实现商业资本主义，而是实行“官僚封建制度”。在历史上，官僚思想深刻地渗透到整个中国人复杂的思想中。甚至在民间传说中，都充满了这种思想。但是在西方，科学技术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在中国，商人从未获得过与欧洲商人所获得过的那种权利。中国官僚政治的政策，是“重农轻商”，科学技术则是雕虫小技。这样就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了阻力。<sup>①</sup>

至于谈到中国古代为什么会实行“官僚封建制度”，李约瑟认为，这是由于中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因为中国是农业国，需要兴修巨大的水利网。他说欧洲没有季风，以及没有中国那样的特别的山脉与河流，因此不需要建造巨大的水利网。

中国从很古老的时候，就需要治水，修建水利网。而水利网的修建，超越了任何一个封建主的领地，需要统一的管理。他曾举例说，治理渭水，就不是一个县人官员能办成的事，需要许多县的共同努力，就需要有人管理。他认为，这就是中国官僚封建制度产生的原因。

最后，他得出结论：“如果有欧美的自然环境，而不是处在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广阔的海洋的这样的地区，那情况就将完全不同。我将大胆断言，情况将完全改变。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sup>②</sup>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文字。”<sup>③</sup>

李约瑟对中国封建制度的认识，可能有局限。但他怀着一颗热爱中国的心，从科学的角度，试图解释中国古代文明，特别是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达而在现代落后了的原因，其初衷是好的。这对西方了解中国，是有帮助的。他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仍然是值得深思的。因此，李约瑟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上，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

① Report of an Address by DR. Joseph Needham; Some Thoughts About China, The China Society, 3 Victorial Street, London, S. W. 1, 1946, pp. 2-3.

② Report of an Address by DR. Joseph Needham; Some Thoughts About China, The China Society, 3 Victorial Street, London, S. W. 1, 1946, pp. 2-3.

③ Report of an Address by DR. Joseph Needham, : Some Thoughts About China, The China Society, 3 Victorial Street, London, S. W. 1, 1946, p. 3.



## 参 考 文 献

### 一、英文资料:

#### A. Archival Sources, Unpublished:

1. Foreign Office Files: General Correspondence, Minutes and Memoranda, Far East (China, General); FO 371 (From 1937 to 1950), and Private collections of Ministers and Officials FO800.
2. War Office Files: Situation in China, WO 172, WO208.
3. Treasury: Files Relating to China T236. T238, T160, 1033 F15194/026/1-5, 1056 F17742, 1084, F15194/032, 1108 F17976/1
4. Board of Trade: Files concerning Burma, China and Hongkong: BT11, BT 60.
5. British Council: BW. 23.
6. Colonial Office: Files concerning Hongkong, CO129.
7. Prime Minister's Office Files: PERM1, PERM2, PERM#, PERM4.
8. Cabinet Conclusions, CAB65, CAB 66.
9. Cabinet Committees and Documents, CAB 69, CAB 87.

#### B. Archival Sources, Published:

1. The Private Papers of Sir Anthony Eden, Vol. 7.
2. Parliamentary Debates, 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5<sup>th</sup> Series, Vols. 374-411, London , 1942-1945.
3.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ronology of International Events and Documents, Vol. I-VI.
4. Josheph Needom, Report of the First Year's Working of the Sino - British Co-Operation Bureau, British Council Scientific Office in China, February 1944, (London, 1946) .
5.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based on File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1949) .
6. Foreig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7. BDFA,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 C. Manuscript Private Papers:

1. The Priministers' Papers: (PRO, London) .
2. W. S. Churchill, (Churchill College, Cambridge) .
3. Eden. Sir Anthony,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4. Bevin Ernest, (PRO, London)
5. Seymour, Sir Horace, (Churchill Coledge, London) .

#### D. Printed Books and Sources:

- Louis, W. Roger, Britain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 1919-1939, Oxford, 1971。
- Richard Sreemski, The Shaping of British Policy during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Melbourne, 1979。

- Friedman Irving S,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 New York, 1940.
- Endicott. Stephen. Lyon. , *Diplomacy and Enterprise, British China Policy 1933-1937*,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5。
- Lee. Brandford A. , *Britain and Sino-Japanese War, 1937-1939, A Study in the Dilemmas of British Decline*, London, 1973。
- Clifford. Nicholas. R. , *Retreat from China, British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37-1941*, Washington, 1967。
- Christopher. Thorne, *Allies of a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8。
- Shai, A, *Britain and China, 1941-1947*, London, Macmillan, 1984.
- Winston S Churchill: *His Complete—Speeches VOL. 6. (1935-1942)*, NY, 1974.
10.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IV. , London, 1975.*
11. *The Politics of War, Allied Diplomacy and the World Crisis of 1943-1945*, London, 1969.
12. *The Unknown War: North China 1937—1945*, (London, 1975) .
13. *Relations Between United States and Formosa 1941-1954*, Archives in the Green Library, University of Stanford, USA.
14. *America's China Sojourn*, USA, 1983.
1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Vol. XIV. , Washington, 1979.*
16. *Congressional Records, Vol. 97. 1951, Washington, 1979.*
17. *Science Outpost: Paper of the 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 British Council Scientific in China, 1942——46, London, 1946.*
18. J R M Butler, *Grand Strategy*, Vol. 2. London, 1957.
19. Lord Strange, *Britain in World Affairs*, London, 1961.
20. C M Woodhouse, *British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61.
- Johnson Chalmers,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1962.
21. *The Times 1937-1945, Microfilm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22. *New York Times, 1937-1954, Microfilms, University of Stanford.*
23. *The Japanese Times, 8 January 1950.*

## 二、中文参考资料

1.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编, 秦孝仪主编,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续编: 抗战时期对外关系》, 第二十辑第二编, 《中英关系》; 第三编, 《战时外交》, 第七编, 《抗日战争》, (台湾, 1963)
2. 齐世荣主编: 《绥靖政策研究》,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 1998)
3. 胡德坤 罗志刚主编: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纲》, 武汉大学出版社, (武汉, 2005)
4. 陶文钊 杨奎松 王建朗: 《中国对外关系》, 中共党史出版社, (北京, 1995)
5. 马振犊: 《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林, 1994)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 《顾维钧回忆录》, (北京, 1987)
7. 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 《抗战时期封锁与禁运事件》, (台北, 1978)
8. 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 《蒋中正思想言论集》, (台北, 1984)
9. 楚衡研, 《英国国家档案馆有关中国历史的资料调查报告》, (台北, 1986)

10. 香港文化出版社,《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香港,1976)
11. 高会,《抗战史》,(香港,1972)
12. 中央日报 1942
13. 大公报 1942—1946
14. 扫荡报 1943—1945
15. 新华日报 1944—1945
16. 沈清林,《中国外交史研究》,(上海,1946)
17. 吴景瑞,《近代中国外交史》,(上海,1942)
18. 冯子超,《中国抗战史话》,(上海,1946)
19.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参考资料》(上海,1950)
20. 河北人民出版社,《中国抗战史稿》,(河北,1983)
21. 重庆党史研究委员会,《重庆谈判记录》,(重庆,1983)
22. 江平,《中国民主党派史》,(武汉,1987)
23. 江苏省党史研究委员会,《苏南抗日根据地》(北京,1987)
24.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与中国经济理论》,(纽约,1947)
25. 董宣关,《蒋总统传》,(台北,1962)
26. 董琳,《顾维钧与中国战时外交》,(台北,1978)
27. 廖近章,《开罗会议与中国》,(香港,1962)
28. 张宪文,《中华民国简史》,(河南,1985)
29. 张伟林,《中华民国简史》,(台北,1958)
30. 《费正清及其在台湾的阴谋》,(台北,1969)
31. 康利娜,《艾森豪威尔主义》,(北京,1969)
32. 陈源,《美国军事集团威胁着世界和平》,(北京,1951)
33. 中国政治出版社,《麦克阿瑟将军文集》,(台北,1952)
34. 肖华,《英美矛盾简论》,(北京,1954)
35. 薛昌洪,《朝鲜战争前后美帝对全亚洲的侵略》,(北京,1950)
36. 香港美国新闻处,《美国外交政策》,(香港,1952)
37. 陈之奇,《美国对台政策 30 年》,(台北,1980)
38. 秦林书,《美帝援蒋奴役中国》,(北京,1950)
39. 秦楚青,《美国侵略台湾史》,(北京,1955)
40. 吉费克,《台湾桥头堡》,(香港,1954)
41. 人民. 出版社,《中国在安理会的正义斗争》,(北京,1951)
42. 赖兴华,《杜鲁门时代之对华政策》,(台北,1960)
43. 山西社会科学院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事记》(山西,1980) .
44. 萨本仁 潘兴明:《20 世纪的中英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96)。
45. 袁旭等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记事》,档案出版社,(北京,1988)。
46. 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上海,1985)
47.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资料选集》(1931—194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1986)。

48.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中国现代史》,1980年版
49. [日]服部灼四郎著,张玉祥 赵宝库译校:《大东亚战争全史》,商务印书馆,(北京,1984)
50. 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4)。
51. 班德雷,《紫石英号军舰事件,1949》,载英国《现代中国》杂志,第126期,第8—9页。(Amethyst 1949)
52. 林语堂,《中国的抗日战争与变化中的世界形势》,载《远东杂志》,1941(1)
53. 育宽,《论美国对日宣战》,载《远东杂志 M941》(2)
54. 吴志研,《英美宣言的八条原则》,载《东方杂志》,1941(3)
55. 邹鲁,《废除不平等条约和世界的持久和平》,载《东方杂志》,1943(1)
56. 张道藩,《中美新约与远东和平》,载《东方杂志》,1943(1)
57. 于新远,《美国对日政策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载《历史研究》,1979(12)
58. 王世弟,《论太平洋战争前美国远东战略及其演变》,载《历史研究》,1982(6)
59. 魏南平,《共产国际的反法西斯战线策略的形成及其伟大胜利》,载《西北大学学报》,1983(1)
60. 章百家,《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对美政策》,载《历史研究》,1987(3)
61. 袁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之演变》,载《历史研究》,1987(3)
62. 章百家,《中美关系史学会关于1945—1955年中美关系讨论会评述》,载《历史研究》,1987(3)
63. 吴川义,《英国关闭滇缅路始末》,载《政大学报》,(台湾),1983(1)
64. 吕诺德,《保持中国西部运输线的畅通》,载《香港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16卷,1976
65. 王澜干,《中国共产党国际反法西斯策略的形成、实施及伟大胜利》,载《西北大学学报》,1983(3)
66. 林迪生,《抗大简介》,载《山西大学学报》,1982(2)
67. 陈家晶,《中国远征军出兵缅甸的美国因素》,载《延安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68. 韩永利 方长明《论抗战初期英美民众援华制日运动》,载《民国档案》,2009年第1期。
69. 王建朗:《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载《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
70. 王炳毅:《关于英美阴谋刺杀蒋介石》,见 <http://news.qq.com/a/20071030/003007.htm>
71. 杨天石:《关于中英在西藏问题上的矛盾:蒋介石日记解读之二》,及《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0月25日,亦参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http://www.tianshui.com.cn/news/whzx\\_news/2008040821231693589.htm](http://www.tianshui.com.cn/news/whzx_news/2008040821231693589.htm)



## 出版后记

1987年，英国剑桥大学丘吉尔档案馆，对公众开放了战时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的档案（Seymour Paper），这对研究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对华政策，提供了大量新的解密档案资料。从此，国内外学者对战是中英关系的研究进入高潮。

1987年我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查找资料时，结识了英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福特先生（Joseph Ford）。福特先生1936年开始到中国工作，一直到1952年才离开中国，可以说是一个中国通。可是他当时并没有研究战时英国对华政策，而是在研究中国文化。通过福特先生，我先后认识了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和班德雷先生（Derek Brian）。李约瑟博士在战时是英国文化委员会驻华办事处主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受英国驻华大使馆领导。因此与福特先生关系莫逆。而班德雷先生从1947—1952年担任英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更是了解战时英国对华政策的许多情况。

班德雷先生当时正在研究1949年在南京发生的英国“紫石英”号军舰事件，该文后来发表在英国伦敦的《当代中国》（China Now）杂志1988年第3期上，在英国产生了较大影响。他得知我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对华政策时，就很支持我的研究。他很感慨地对我说：“我们本该早就研究这个问题的，但一直没有做这个工作。”他的话，从一个侧面说明，英国学者对战时英国对华政策，还没有进行深入研究。

李约瑟博士谈了他对战时中英关系的一些看法，赠送给我他珍藏多年的从1944—1946年他在华工作的记录和报告，以及他在中英友协的未曾出版的内部演讲稿等材料。这些研究对我的研究很有帮助。薛穆的夫人文森特女士（Vincent Seymour）已经抗战时期曾亲自开车到延安，运送英国援华医疗物资到白求恩和平医院的任桐年先生（W. Antony Neynold），也给笔者提供了不少资料。后来我又到美国查找相关资料，为研究战时英国对华政策进行准备。

近年来，我国对战时英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学术界对抗战时期国民党军统档案、重庆国民政府公报（1942—1944年）部分卷宗、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研究所“二战”史料以及英国“二战”时期部分已解密军政档案等，进行了研究，新的成果反映在扬天石、王建朗、马振犊、林孝庭、王炳毅、李桂权、陈须隆、张建魁、路琰、许陈静等人发表的文章之中。这些研究，对研究战时英国对华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宝贵的材料。本书的撰稿人之一陈淑荣在战时英国文化外交的研究上，也有独到之处。上述研究成果为全面深入地研究战时英国对华外交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武汉大学胡德坤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的课题，使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

本书第一章、第二章的作者为李世安、陈淑荣，第五章的作者为陈淑荣、李世安，第六章作者为李世安、孟晓雪，其余各章的作者均为李世安。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武汉大学胡德坤教授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课题组主要成员的帮助，得到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帮助，还得到了武汉大学出版社的帮助。特别是黎晓方同志为本书的编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作者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